

Macao Journal of Linguistics
Revista da Ciência Linguística de Maca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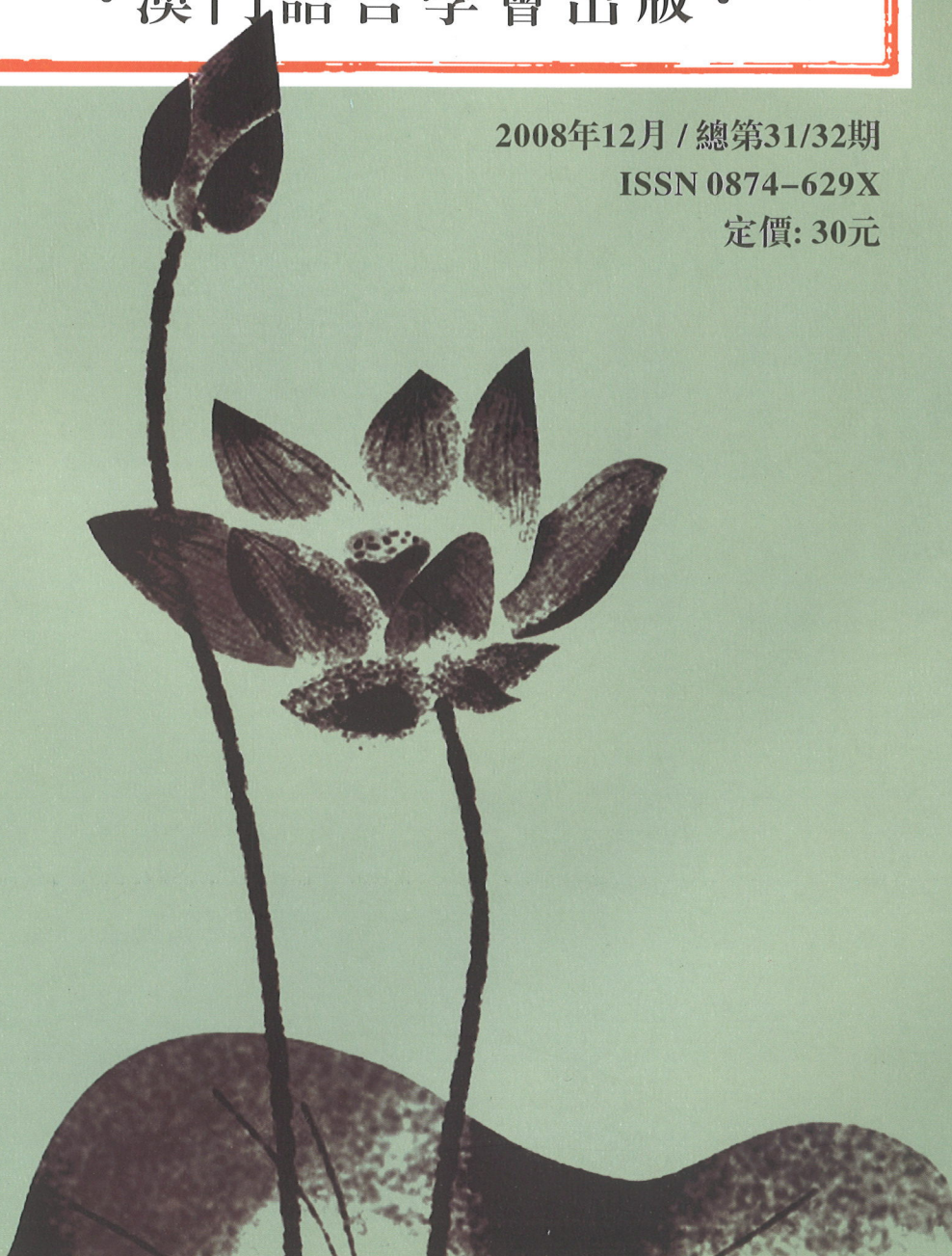
澳門語言學刊

· 澳門語言學會出版 ·

2008年12月 / 總第31/32期

ISSN 0874-629X

定價: 30元





《澳門語言學刊》創刊於1995年12月。發刊詞稱：

時代賦予澳門語言學工作者光榮而重大的使命，一連串語言本身的問題和與語言相關的問題要我們作出科學的答案。語言學者既要投身於社會，刻苦地掌握語言素材，又要虛心地學習與借鑑日新月異的語言學理論。為了完成歷史的任務，一群愛好語言學與研究語言學的志同道合者組成了澳門語言學會，開闢了這塊語言學成果的園地——“澳門語言學刊”，希望借此聯絡海內外的同道者，溝通學術的往來。語言本不分區界與國界，語言恰巧是不同人種、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相互溝通的橋樑；語言學工作者同樣應有環抱世界的偉大胸懷！

過去的十三年，澳門語言學會忠實履行當初的諾言，積極參與澳門後過渡期中文合法化工作，努力推動澳門語言學研究。

學刊迄今已出版30期，收錄學術論文近三百篇。學刊本著立足澳門語言研究，溝通兩岸四地的原則，廣邀各地學者撰稿，其中不乏一些著名語言學家的精彩文章。

◎ 改版瑣語 月卷

在辦好刊物的同時，學會特別重視作為一個民間學術社團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在澳門中文官方地位的確立及其進程、澳門法律語言、澳門語言規劃和澳門社會語言學等領域的研究均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學會先後以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語言風格、方言與共同語、語言規劃、語言與傳意、修辭、語體與文體、官方語言理論探討、社會語言學、兩岸現代漢語問題等主題，召開了十次較大規模的學術研討會，為促進和活躍澳門語言學的研究，加強海內外學者的交流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十三年間，共出版語言學專著及論文集十五本，本會會長的《中文回歸集》和《中文變遷在澳門》，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回歸前後的澳門語言問題，是澳門中文回歸的歷史的見證；《澳門語言研究》、《澳門博彩語研究》以及學會會員合著的《澳門·語言博物館》等著作，多方位、多角度地揭示澳門的語言奧秘，拓寬了澳門的社會語言學研究園地。

學術在發展，我們的團隊在不斷地壯大，新的生力軍增強了我們的學術力量。適逢澳門回歸九周年之際，我們回顧學會的歷程，整理辦刊的經驗，深感有與時代同步、進一步增進各地語言學者的交流並與海內外語言學刊物接軌的必要，因而作出改版的嘗試。改版後的《澳門語言學刊》開本加大，頁碼加多，並承諸多著名語言學專家應允出任編審，以期加重刊物的學術含量。學刊改版，海內外來稿十分踴躍，編輯部決定以第31、32期合刊方式出版，以後恢復一期一刊的做法。我們感謝編審委員們的支持，感謝作者們的賜稿，感謝兩岸四地以及海內外同行的關愛，感謝澳門語言學會會員們的不斷努力。學刊編輯將不會辜負社會的重託，耕耘好澳門語言學這塊園地。

編輯出版
總第31、32期合刊
定價

澳門語言學會
2008年12月出版
澳門幣30元

編審委員會主委
委員

程祥徵 / 澳門語言學會
曹先擢 /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
曹志耘 / 北京語言大學
戴慶廈 / 中央民族大學
鄧景濱 / 澳門大學
馮勝利 / (美國) 哈佛大學
黃坤堯 / 香港中文大學
黃行 /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江藍生 / 中國社會科學院
李如龍 / 廈門大學
李宇明 /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
劉丹青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劉叔新 / 南開大學
魯國堯 / 南京大學
陸儉明 / 北京大學
馬慶株 / 南開大學
馬秋武 / 同濟大學
高田時雄 / (日本) 京都大學
裘錫圭 / 復旦大學
邵敬敏 / 暨南大學
邵朝陽 / 澳門大學
沈國威 / (日本) 關西大學
沈家煊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孫茂松 / 清華大學
田小琳 / 香港嶺南大學
王寧 / 北京師範大學
邢福義 / 華中師範大學
徐大明 / 南京大學
徐傑 / 澳門大學
張洪明 / (美國) 威斯康辛大學
張振興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章宜華 /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鄭錦全 / 台灣師範大學
鄭遠漢 / 武漢大學
周洪波 / 商務印書館
周薦 / 澳門理工學院
周清海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竺家寧 / 台灣政治大學
鄭嘉彥 / 香港城市大學

主編
副主編
刊名題簽
編輯

周薦
徐傑 鄧景濱 邵朝陽
程祥徵
廖穎 劉毅 熊帆

地址
電話
投稿信箱

澳門宋玉生廣場獲多利中心21樓九鼎傳播
+853-2878 7799
aomenyuyan@163.com

稿約

《澳門語言學刊》係澳門語言學會主辦的專業學術期刊，創辦於1995年，已出版30期。自本期始，本刊新成立編審委員會負責學術指導。本刊實行編審委員會指導下的主編責任制，日常工作由主編、副主編負責。本刊新版為16開本，每期約10萬字，半年刊，由澳門九鼎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出版，於每年的6月上旬和12月上旬出版。

本刊刊登有關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現代漢語、漢語史、漢語方言和文字學方面的學術論文以及相關的學術評論。限於人力，本刊目前僅接受中、英、葡三種文字的論文。本刊竭誠歡迎海內外專家學者賜稿。

本刊提倡漢語研究與理論探索相結合，本體研究與應用研究相結合，共時研究與歷時研究相結合，普通話研究與漢語方言研究相結合以及漢語研究與少數民族語言相結合。本刊尤其歡迎以海峽兩岸四地語言現象為視角的研究論文，以期推進中國語言研究的發展。

本刊恪守學術自由的原則，鼓勵學術爭鳴。所有稿件，文責自負。凡投給本刊的文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工作單位等聯絡方式。文章發表時署名聽便。

中文來稿篇幅以不超過一萬漢字，英文和葡文來稿篇幅以不超過本刊10面為宜。逾五千漢字及相應英文、葡文篇幅的稿件需附論文摘要和關鍵詞，中文稿請附英文摘要和關鍵詞，英文、葡文稿請附中文摘要和關鍵詞。

凡投給本刊的文稿，體例請參照《中國語文》，不另說明。

本刊實行雙向匿名審稿制度。紙質稿請寄澳門宋玉生廣場335號獲多利中心21樓九鼎傳播郭濟修先生，電子稿請寄aomenyuyan@163.com，勿寄他人他處，以免延誤。投稿者半年內未收到本刊的採用通知，可自行處理，恕本刊不能一一退稿。請勿一稿兩投。大稿一經投給本刊，本刊即對專稿自動擁有決定是否刊用之權利，擁有對擬刊論文進行刪改、轉載等權利。凡不同意本刊對其文章進行刪改、出版、轉載者，請賜函示知，否則即視同同意。在本刊發表論文者，將獲贈當期本刊5冊。

目 錄

- 改版瑣語.....周薦 (001)
- 澳門語言學研究回顧與思考.....程祥徽/邵朝陽 (004)
- 兩岸四地的語言與語言規劃.....張振興 (011)
- 關於澳門語言規劃的思考.....黃翎 (018)
- 香港多元語言文化現象及語言文字規範化問題.....田小琳 (022)
- 回歸後香港的普通話推廣和使用狀況.....袁舫/王輝 (032)
- 普通話語音教學與測試中的若干問題.....孫海娜 (039)
- Labial-labial Co-occurrence Constraint in Cantonese.....Hongming Zhang (046)
- 廣西八步八都話的“先長閉元音”.....麥耘 (057)
- 漢沽方言中的聲調鏈變現象.....馬秋武/張瑩 (064)
- 疑問句末語氣詞“呢”的“句管控”考察.....沈威 (070)
- 現代漢語的時量成分與時量系統.....楊世鐵 (080)
- 辭書編纂現代化的新理念
- 人機界面工具使用的智能發揮.....張志毅 (088)
- 《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說”字條讀後
- 關於分地詞典如何處理“通用詞”的一點想法.....汪維輝 (092)
- 小議人名在網絡中的變異現象.....呂長鳳 (095)
- 從禮貌原則看中國的廣告語言.....高軍青 (098)
- 從地名看亞洲地區的語言接觸.....張惠英 (107)
- 試論語言接觸與漢語文白轉型.....徐時儀 (113)
- 姓名文化縱橫談.....楊琳 (121)
- 由“英明領袖”的“二簡”所想到的.....尉遲若水 (131)
- 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叢書《語言翻譯卷》序.....程祥徽 (133)
- 學習和研究應用語言學歷史的意義和方法.....于根元 (135)
- 學術訊息..... (130)

澳門語言學研究回顧與思考

A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Linguistics Research in Macau

◎程祥徽 / 澳門語言學會

◎邵朝陽 / 澳門大學

提要：本文從語文學與語言學兩方面回顧近二十餘年來澳門語言研究的成果，指出澳門語言研究的強項是語體風格學和社會語言學，著重說明澳門語言學社團成立的背景和一批語言學刊物的內容。最後希望澳門語言學工作者對照國家要求，尋找差距，進一步做好語言學研究。

關鍵詞：語文學 語言學 語用 語言規劃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logy and linguistic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tudies completed in Macau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The strength of research in Macau is stylistics and sociolinguistics, which points to the background under which linguistics associations were established in Macau, and the contents of a set of linguistics publications. Lastly, it is hoped that Macau linguists can conform to national standards, look for disparities and further improve linguistic research.

Key words: Philology, linguistics, Pragmatic use, language planning

語言和語言學

這是多餘的話，聊作開頭：“語言”和“語言學”是兩回事。語言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它的存在是客觀事實；語言學則是人類對語言現象的認識、觀感或態度。澳門語言多姿多彩，語種和方言種類繁多，這是毋庸爭辯的；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它，探索它的奧秘或社會價值，產生不同的見解，形成不同的觀點或流派，這些都是主觀行為，稱作語言學。

語文學成績顯著

語言研究是對語言進行研究。在文明悠久的中國，語言研究一般作“語文學”和“語言學”的劃分。語文學歷史很長，語言學是後起的，一般在語文學前加“傳統”稱傳統語文學，在語言學前加“現代”稱現代語言學。傳統語言學主要以漢字（單音語素）為研究對象，研究漢字的形、義、音，因而有了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這三門學科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創造了極其輝煌的成就；尤其是音韻學，它對音節結構的分析和對語音系統的歸納給今時今日的語音學做出了科學的榜樣。澳門的語言研究承繼語文學的傳統，在文字運用、詞義考證和方言對應等方面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可觀的成績，高水平的著述有冼為鏗先生的《談文字說古今》一至四集，文若稚、劉樺《廣州方言古語選釋》，陳伯輝《論粵方言詞本字考釋》，鄧景濱《粵音考異錄》，丁啓陣《論古無複輔音聲母》，老志鈞《魯迅的歐化文字》，以及廣東饒平客屬海外聯誼會、台灣饒平客屬聯誼會主編的《饒平客家話》等等。

澳門中國語文學會在傳統語文學研究方面擔當重要角色。它的會名即已標示其致力於傳統語文學研究

的性質。它的學術刊物《語叢》1987年創刊，第一期發表的文章幾乎全部屬於傳統語文學的性質：《澳門話研究》（木公）、《淺談報紙上的錯別字》（冬雁）、《談字議詞》（葉添）、《廣東省的四大方言》（閔鉞）、《海南島方音梗概》（陳義）、由《從濫用繁體字所想起》（陳懷萱）等。其後該刊闢“爭鳴園地”，以很大篇幅討論漢語的字音、詞源、詞語結構等問題，如“喪亂”的音義，安子介的析字法等。第五期更以十五篇文章進行“畫皮”構詞法的討論。由此可見該學會的研究興趣與宗旨。這個學會參與粵港澳三地的“國際粵方言研討會”的機制，輪流在廣東、香港、澳門三地舉行會議（第十屆會議在廣西南寧召開）。第六屆會議和第九屆會議在澳門舉行，會後出版論文集。

語言問題的研究

文字、訓詁、音韻的研究無疑主要是以語言內部成分和內部結構為研究對象，屬於語言的內部研究。此外語言學還必須關心語言外部的研究，即研究語言與社會、語言與運用的關係，因為語言具有社會性，語言是社會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喬姆斯基稱語言的內部結構為“語言奧秘”（mysteries），稱語言的外部關係為“語言問題”（problem）。近三十年來，語言的外部研究被冠以“社會語言學”的名稱。社會語言學誕生之前，語言研究就從來沒有（也不可能）脫離過社會生活而孤立地進行，只是沒有獨創理論和原則進行有系統的研究而已。社會語言學對語言的研究確實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顯示出理論指導實踐的巨大威力。社會語言學一般包括以下內容：第一語言的變異，並且聯繫社會因素來探討語言變異的原因和規律，常常用統計的方法和概率模式來描寫這些變異現象。有人稱之為微觀社會語言學。第二社會中的語言問題，如雙語、雙方言、語言的接觸等，被稱為宏觀

社會語言學。

第三人們怎樣在實際環境中使用語言進行交際，以及不同的社會、社團使用語言的差別。這些研究被稱為言語人種誌學。

語言的變異、雙語等語言問題以及言語人種誌學的現象在澳門大量存在。首先，語言的變異隨處可見，僅以粵語為例，人們聽到的並不都是純正的粵語，二是經過變異的粵語，例如福建粵語、北京人說的粵語、土生葡人說的粵語、泰國人說的粵語以及帶有形形色色語音特點的粵語。普通市民不曾留意，也不需要認真對待這些變異，但作為社會語言學的課題，卻需要加以描寫和說明。粵語如是，普通話、葡語、英語等等的情況與此相同。澳門雙語、雙方言以及語言接觸的現象更加突出。只就官方語言和通用語言來看，香港不過是“兩文三語”社會，澳門卻是“三文四語”社會。這種複雜的交際機制，使澳門成為研究社會語言學和應用語言學的理想園地。

人們怎樣在實際環境中使用語言進行交際的特點更值得研究，人們常常詬病的“葡式中文”問題，中文公文不像中文的問題，一個中文頻率高於其他任何語言的地區，其法律語言和公文用語卻遠離中文風格。這些問題都亟待社會語言學拿出解決的答案。

可以這樣說，語言外部研究是語言內部研究的延伸。有了語言的外部研究，語言學才顯得更加完整。

澳門的語言學研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

風格學研究領先

1985年，任教于澳門東亞大學的程祥徽在香港出版《語言風格初探》。這是中國第一本符合現代語言學要求的漢語風格學著作。于根元、宗廷虎、袁暉、劉煥輝等著名語言學家都肯定程著的地位。

1993年，澳門寫作學會接受中國修辭學會的提議主辦“語言風格學與翻譯寫作學術研討會”，南京大

學出版社出版該次研討會論文集《語言風格論集》。中國修辭學會第四屆理事會常委會認定：“這個研討會標誌著中國語言風格學的研究登上了一個較高的新台階，在中國修辭學、風格學研究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語體學屬於風格學範疇，澳門語體學研究相當繁盛，澳大碩士生湧現多篇風格語體學的論文，例如《現代漢語語體研究》、《紅樓夢語言風格》等等，還有在澳大任教多年的丁金國關於語體學的系列論文。1999年語言學會與寫作學會聯合舉辦“語體與文體學術研討會”，編輯出版論文集《語體與文體》。

語言和語用調查

社會語言學跳出傳統語言學研究語言本身的結構，作為傳統語言學的補充，特別注意語言生活狀況的調查和語言運用的研究。

一、語言種類的田野調查。較早發表的論文有《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程祥徽、劉羨冰）。此文最早刊于《中國語文》1991年1月號，後來被許多學術刊物轉載。澳門大學碩士論文《澳門多語現象研究》（張卓夫）、正在出版中的《澳門語言研究》（黃翊）是較全面的田野調查的成果。胡培周《澳門地區的語言現狀》屬於此類性質。《澳門語言狀況與語言政策》（黃翊，《中國語言生活狀況綠皮書》中的一個章節）則正式把澳門的語言狀況向全國作一介紹。

二、語言史的研究。劉羨冰的《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是這方面研究的表表者。書中論文首次談及澳門開埠時的語言狀況。研究澳門語言的歷史狀況的論文還有胡慧明《〈澳門記略〉反映的澳門土生葡語面貌》、朱斌《論貢沙維斯著作中清代官話之語言現象》、黃翊《清代中文檔案中的澳門漢語詞匯現象》等等。

三、語用研究。語用研究範圍很廣，包括法律語言研究、公文語言研究、博彩語研究、傳意語言研究、新聞語言研究、人名地名研究等等。這方面研究成果十分喜人。語言學會出版的《澳門：語言博物館》收集三篇主要論文和多篇其他相關論文。三篇主要論文是：《多語社會與語碼轉換——澳門語言狀況的分析與思考》（黃翊）、《澳門葡文法律中譯用詞研究》（龍裕琛）、《港澳博彩語研究》（邵朝陽）。陳滿祥《澳門黑社會秘密語研究》、傅玉蘭《澳門街道標幟及名稱》等都是語用研究的論文。值得一提的還有冼為鏗先生多篇評析“葡式中文”的文章。所謂葡式中文，是一種形似中文、風格卻是葡文的語文，類似葡文的直譯。葡式中文主要出現在法律翻譯和公文寫作中。因為澳門的中文法律語言尚未形成體系，公文格式也仿照葡文，所以葡式中文難於避免。只有等到能夠直接用中文立法，葡式中文才會完全休息。

四、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既包括理論的闡述，又包括制訂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實際操作。澳門進行過以下幾方面卓有成效的研究：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澳門雙語的特殊性，澳門官方語言的定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與一國兩制的關係。1992年在爭取中文在澳門的官方語言地位的關鍵時刻，澳門社會科學會及時召開了“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出版論文集《澳門語言論集》。那是一次成功的社會語言學盛會，國家語委刊物《語言文字應用》以“一項引人注目的語言計劃”為題發表專文，認為這次會議和論文集“為廣大讀者提供了有關澳門語言文字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珍貴資料，並為‘科學、適用、穩妥、動態’地制訂澳門的語言計劃鋪設了路基”。程祥徽的《中文回歸集》、《中文變遷在澳門》比較系統地論述了澳門雙語問題、澳門官方語言問題以及制訂澳門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問題。其他有胡培周《澳門特別行政

區的語文政策要注重語文應用功能——參加首屆全國語言文字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等。

澳門回歸後，語言文字運用面臨如何正確處理一國兩制的問題。語言學會舉辦“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與一國兩制”學術座談會，討論認為：港澳用語用字與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矛盾是需要逐步解決而且必然可以逐步解決的，這是因為：①粵方言與普通話的矛盾是一種語言內部的矛盾，是方言與共同語之間的矛盾。方言向共同語的靠攏或集中是語言發展的趨勢。②繁體字與簡化字之間的矛盾是同一種文字體系內部的矛盾，繁簡字的對立不是水火不容的對立，而是可以相互溝通的。③港澳與內地交往日漸頻繁，作為最重要的交往工具的語言文字勢必日漸走向統一。④港澳特區的粵方言與繁體字現狀的確是過去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分裂時的產物。不同的“兩制”有相同的語言文字才能更好地維護“一國”，只有在使用同一種語言文字的情況下才能更好執行“一國兩制”政策。⑤事實上港澳語言文字正在高速地向普通話和規範漢字靠攏。討論認為，我們的任務是順應語言文字的發展趨勢，因勢利導，加速這種發展的進程。政府部門、語文界、教育界、新聞界、政界……都可以在自己的工作範圍或專業範圍內發揮獨特的作用。我們企盼著在同一天空下的漢語和漢字能夠早日統一起來。

語言學會與語言學刊

八十年代澳門已經有了語文學社團，為什麼還要另組語言學會呢？

1995年成立的澳門語言學會在其學術刊物《澳門語言學刊》創刊詞中宣示：

“……這裡實行葡漢雙官方語言政策，中文的官方地位正處於落實的過程。……中文要達到官方地位的目標還需要跋涉一段艱苦的歷程。時代就是這樣賦予澳門語言工作者光榮而重大的使命，一連串語言本

身的問題和與語言相關的問題要我們作出科學的答案。”澳門語言學會是應時代需要成立的。

澳門語言學會成立後不間斷召開研討會、學術座談會、研究成果匯報會。除了上述幾次研討會外，還主辦過語言與傳意國際研討會、方言與共同語國際研討會、港澳（暨海外）漢語探新國際研討會、語文規劃的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回歸周年紀念、學術成果匯報、新書發行儀式、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與一國兩制學術座談會、中國社會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官方語言的理論探討學術研討會等；出版的論文集有《語言與傳意》《方言與共同語》等。

《澳門語言學刊》至今已出版30期。創刊號刊登了張志公教授的《研究語言的目的在於應用》、高名凱教授的遺作《風格學的基本概念》、岑麒祥教授《軼事趣聞》等等，打正理論刊物的旗號。十一年來，澳門語言學會致力於理論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發表的文章如《索緒爾學說在中國》（滕慧群）、《海外語言學研究動態與研究方法概論》（馮潤華）、《索緒爾生平事跡及其學術道路》（趙蓉暉）、《論幾個現代語言學流派的功能觀》（王德福）。

新詞、外來詞以及詞語運用的研究突破了陳規，出現了新的內容，例如《源自葡語的借詞和譯詞》（老志鈞）、《澳門外來詞簡析》、《港澳流行語淺析》、《淺論港澳新詞語的產生與使用》（龍裕琛）、《試談未來澳門特區語言》（余妙麗）、《新聞媒介與語言變遷》（尹德剛）、《香港中文報刊的語文探新》（黃坤堯）、《港澳兩地新聞標題的動詞比較初探》（鄒嘉彥 錢志安）、《世紀之交報刊語言的變化趨向》（譚汝為）。

語言政策和語文規劃的研究受到了重視，重要論文有：《澳門回歸與澳門語文的前景》（程祥徽）、《“一國兩制”的語言使用問題——社會語言學的新課題》（戴慶廈）、《制定語文政策 落實基本法規

定》（郭濟修）、《語文規劃研究述評》（丁金國）、《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馮潤華）、《語言規劃的回顧與前瞻——兼談澳門語言學會對語言規劃工作的貢獻》（譚汝為）、《語言規劃與澳門的社會語言調查》（王培光）、《新世紀的澳門語言策略》（程祥徽）、《馬來西亞：多語言文化背景下官方語言的推行與華語的拼爭》（郭熙）、《話語特有詞語：新加坡社會寫真》（汪惠迪）。刊登過的語言運用方面的論文有：《辭章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鄭頤壽）、《論修辭要善於傾聽》（林興仁）、《從章回小說回目談修辭學與語用學的重合面》（鄭鐵生）、《病辭應成為修辭學的研究對象》（程國珍）、《反義正說與正義反說——論言辭的反諷》（沈謙）、《論語體詞》（袁暉）。此外還有語言與文化的關係的論文：《澳門文化與多語制》、《澳門的文化定位及其特殊功能》（魏美昌）、《澳門跨文化傳譯中的幾個問題》（盛炎）、《澳門的雙語環境與雙語培訓》（張卓夫）。

本澳推普工作做得較好，《澳門語言學刊》刊載過多篇有關語言教學、語言規範和普通話水平測試的文章，例如《成年人學話要有理論指導》（程祥徽）、《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蔣紹愚）、《試論澳門漢語教學之發展》（趙永新）、《試論澳門特區語文素質教育》（彭嘉強）、《澳門之推普策略種種》（程祥徽）、《澳門地區普通話（漢語）教學特點初探》（許亦峰）、《普通話教學討論》（張進萍）、《教授葡國學生學習中文的一些體會》（鄧思平）、《漢語測試與語言心理學》（劉鐮力）、《水平測試與普通話教學》（黃翊）。此外，語言學會編著、出版了《港澳通用普通話教材》（劉照雄、程祥徽主編）、《普通話進階》（黃翊編著）。

文字問題也是澳門語言研究的一個關注點，語言學會著眼於港澳用字，學刊發表的文章有：《關於〈規範漢字表〉的研制》（王鐵琨）、《兩岸四地漢

字系統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及其出路》(張群顯)、《漢語規範化的範圍、根據、操作以及科學屬性》(王衛兵)、《港澳用字》(程祥徽)。此外程祥徽《繁簡由之》在香港、台北兩地出版後,多次再版、重印。

公文寫作方面的文章:《澳門中文公文的回歸之路》(程祥徽)、《澳門中文行政公文的撰寫準則建議》(龍裕琛)等等。

社團和政府的作為

澳門的語言學研究工作基本上是由民間社團做的,除了上述澳門中國語文學會和澳門語言學會之外,澳門粵方言學會、澳門中華教育會、澳門業餘進修中心、澳門成人教育學會、澳門普通話聯誼會、許多企業部門和商業機構以及其他一些民間社團也都參與推普、語文教育等項工作。澳門日報、澳門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等媒體在語文知識的推廣和語言問題的宣傳上也發揮了作用。政府在公務員學語言培訓方面投入過不少資源,尤其是統計局進行人口普查時把語言能力作為調查內容之一,為語言學研究提供了難得的原始資料;澳門基金會出版中國語文和葡國語文的著作,特別注重澳門本地學人的著述;澳門大學和澳門基金會合作出版的《澳門研究》、公職局刊物《行政——澳門公共行政雜誌》不時發表一些語言問題的文章;法律翻譯辦公室曾為法律的葡譯中做過大量工作;公職局為公務員提供語言課程;澳門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師結合澳門語言實際所做的研究、碩士生和博士生的培養,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開設語言課程等等;澳大、理工兩間大學也有一些語言學出版物,例如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中文系《澳門大學中文集刊(一)》,理工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普通話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漢語(普通話)教學與測試研討會論文集》,李向玉、張西平及趙

永新合編的《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盛炎《澳門語言之歷史、現狀、發展趨勢與未來之語言政策》等等。

以上回憶很有可能挂一漏萬,因為我們不過是作為舉例才開列以上一些著述名稱的,目的並非開列清單,而是通過舉例展示本地區語言學研究的面貌。

不算感想的想法

透過上述回顧,我們想說幾點感受,不知算不算得上是感想:

一、最近這二十年來,澳門語言學研究開始了一個飛躍。這個飛躍是從傳統語文學研究飛躍到現代語言學研究。語言研究開始出現這種飛躍,社會的需要是決定性的動力。試想如果不是處於葡萄牙長期佔領的環境,何來中葡雙語現象?如果不是處於澳門回歸的歷史時期,何來官方語言的角逐?社會和時代提出了語言問題,人們就要為解決問題想出對策。於是雙語理論、官方語言理論、共同語理論等等應運而生。因此值得思考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必需把語言問題與社會、時代聯繫在一起來考慮。

二、語言問題的解決一定要有理論的支持。一直以來有人批評澳葡政府時期的雙語政策,那時因為澳葡政府故意混淆個人雙語與社會雙語的界限,把公務員們送往葡國學幾個月的葡語,又去北京學幾句普通話,似乎人人都成了雙語人,而實際上政府部門處處可以聽到能說幾句葡語和幾句普通話的公務員,卻很少有人能用高水平的中文(和葡文)制定法律文本。這是以個人雙語取代社會雙語的結果。澳葡政府實行這種錯誤的語言政策留下的後遺症在今天的特區立法工作中暴露無遺,澳門直至今今天還不具備用中文撰寫法律文本的能力,使“法律本地化”大打折扣。社會雙語是指在全社會範圍內存在兩種官方語言,市民用哪一種語言均可,並不要求每個人都會說兩種語言。

否則，加拿大官員都得會說英語和法語，新加坡官員更需要會說馬來語、英語、華語和泰米爾語！如果是中國官員，豈不是要會說五十六個民族的語言！

三、語言研究不是一揮而就的事情，它是一門專門的學問，需要刻苦學習，認真掌握。當然，每個正常人都具備語言能力，任何人都有權利根據自己的認識或想象發表關於語言的見解。就像凡是會寫字的人有了一管毛筆都可以成爲書法家。在某些人眼中，仿佛語言學是最不需要接受專業訓練的學科。在行動上，他們動輒憑藉幾本社會學詞典的釋義振振有辭地發表一通與澳門語言實際毫不沾邊的空論，解決不了社會生活的需要；嚴重者甚至以其昏昏，把錯誤的語文知識、錯誤的語言理論灌輸給讀者。例如報紙公然登出這樣的文章，異想天開地說什麼“道歉”是“副詞和形容詞的合成”，這不是把明明白白的道理說得玄乎其玄，教壞沒有語文抵抗力的孩童！同時也敗壞了澳門語文工作者的聲譽，以爲澳門語文工作者竟然是如此這般的水平！須知語文知識性的文章負有規範語言現象、指引學生語言運用的任務，你胡說八道圖一時之快，受害的則是廣大學生和語言運用者。因此這種輕浮作風必須廢止，必須儘快建立起一支有理論修養而又實幹苦幹的語言學專業隊伍，對澳門語言現象進行一番切實的考察和研究。

如何回應綠皮書

我們在寫這篇回憶文章的時候正值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發佈《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5》（簡稱語言綠皮書）。綠皮書在其總述部分用了187行文字寫澳門語言狀況，全文如下：

澳門使用語種主要有漢語、葡萄牙語和英語，粵方言使用廣泛。‘土生葡人’的葡漢雙語人同時以葡語和漢語為母語，其中有極少數人會說一種以葡語為基礎的混合語（克里奧爾語）。閩方言、客家方言、吳方言等也有使用。‘葡式中文’盛行。屬於澳門自己的中文法律用語和公文用語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公文格式也沒有最後統一。沒有統一的中小學語文課本、語文教材。沒有專門的機構協調語言之間的關係，也沒有專門的機構處理語文業務範圍內與範圍外的聯繫。

我們似乎可以從這些行文字中尋找澳門語言工作的差距，對照國家的要求，進一步開展澳門語言學的理論研究並將研究的結論付諸實踐。

兩岸四地的語言與語言規劃

The Language and language planning of China mainland,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張振興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提要：本文討論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兩岸四地的語言規劃。著重指出，兩岸四地語言規劃的焦點是處理好四個方面的關係：普通話與方言、普通話與“國語”、語言與文字、語言與規範。在語言規劃的過程中必須遵循一定的原則，這就是要尊重歷史，照顧現實，規範寬容，求同存異。

關鍵詞：語言 方言 普通話 國語 語言規劃

Abstract:The paper discusses the language planning of China mainland,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The author argues the planning focus is to resolve four sections relationship: Putonghua and dialects, Putonghua and “Mandarin”,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and language and standard. The principle is to take history respectation and the reality, standard and tolerant into account, and to seek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Key word:language, dialects, putonghua, “mandarin”, language planning.

語言與語言規劃

語言是什麼？以往的教科書都說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語言本身是沒有階級性的。這個話只說了一部分，並不完全。其實，語言還是一種資源。資源可以分為自然資源和社會人文資源。人的語言有系統性，有語音、詞彙、語音的系統性，從這個角度說，語言具備自然資源的性質；但這個系統性是社會使用過程中形成的，是發展的，變化的，從這個角度說，語言是社會人文資源。

就因為語言資源的這種雙重性，我們就經常覺得語言是一種天造地設的東西。語言從什麼地方來的，英語為什麼是音素分析的，而漢語為什麼是音節劃分的；程祥徽教授說，英文裏有I、my、me、we、our、us，而中文裏只有“我、我們”（參看程祥徽 2008）；漢語裏說“一個、兩個”，壯侗語族很多語言必須說“個一、個二”。這些問題可以去研究，去討論，但各說各的，事實上說不清楚。可是，語言裏很多東西也是可以說清楚的，英語 red、blue、white，漢語一定說成“紅、藍、白”，這是因為反映的事實是一致的，兩種語言的語義是對應的；南方很多方言“飛、肥、風”讀雙唇音的[p]，北京話一定讀唇齒音的[f]，這是因為這些字的古音來歷相同，南北方言語音發展不平行造成的；北京話 sǐ 這個音節只有“死”一個字，是因為這個字犯忌諱，其他本該同音的字都回避了，幾乎所有的方言都回避了；西北地區很多漢語方言也說“飯吃”、“茶喝”、“北京去”，把北京話的動賓結構說成賓動結構，這是因為這些漢語方言跟藏語、土族語等少數民族語言長期接觸的結果，這些少數民族語言是“賓動”結構的。語言本身或語言應用裏還有很多東西都可以說清楚的。

為了更好地發揮語言的使用功能，減少語言使用中的人為障礙，我們有時候必須對語言裏很多說得清

楚的東西，進行一些人為的，或者是行政的干預。例如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台灣大力推廣“國語”，大陸也規定推廣普通話是“國策”之一。兩岸幾乎在相同時間裏對漢語所實施的行為，其利弊得失另當別論，但這就是一種很實在的干預，語言應用和社會語言學的學術術語上就叫語言規劃。什麼叫語言規劃？簡單地說，語言規劃就是用一種必要的，適當的語言框架，引導語言行為的走向和發展（參看Robert B. Kaplan、Richard B. Baldauf, Jr 1999）。一種建設性的、改進取向的語言規劃，目的在於提高一種或多種語言在國家語言生活中的質量和地位。

語言規劃並不是中國有，也不是現在才提出來的。世界上很多國家都講語言規劃。例如朝鮮、越南都通過漫長的語言規劃，改變了自己的文字系統，促進了民族語言的統一。新加坡、加拿大、西班牙、瑞士等國家，也通過艱苦的語言規劃努力，使國家的語言生活逐漸趨於和諧。其中很多經驗是值得借鑒的（參看黃宣範 1993）。以下四點經驗是最為重要的：

第一，把語言看成是一種資源，也把語言看成是一個問題，而且是一個很大很重要的問題。“把語言看成問題”是有道理的。語言問題處理是否切當，確實關乎國家政治經濟的穩定和發展。

第二，把語言看成是一種權利，要高度重視語言的自主權利。尊重語言和語言使用的自主權利，是尊重人權的重要環節。所以，應該反對一語獨尊的語言政策，一語獨尊是專制政權的作風，應該加以屏棄。

第三，語言必須實行國家規劃，必須制定國家政策。並且把這個規劃和政策納入國家法律的軌道。沒有國家規劃和國家政策的干預，語言的使用和發展將走向盲目的軌道，這是非常危險的。

第四，在制定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的時候，必須堅持遵守語言平等的原則，遵守語言開放的政策。在語言平等原則的前提下，提倡和推廣使用優勢語言，但一定要尊重和保護弱勢語言，尤其要尊重和保護瀕

危語言或方言。

兩岸四地的語言現狀

本文在於討論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台灣地區兩岸四地的語言規劃。討論本題之前，首先需要簡單說說兩岸四地的語言現狀。

兩岸四地同文同種，絕大多數人說的都是漢語。在13億多人口中，說漢語的人口估計多達12.5億，說其他語言的少數民族人口中，很多也改說漢語，或者也兼說漢語。以國內使用人口總數計算，漢語當之無愧是世界第一語言。可是具體分析起來，兩岸四地的漢語使用情況還是有差別的。

大陸地區漢語的使用有高度的統一性。從北邊的哈爾濱到南邊的昆明，從東邊的連雲港到西邊的烏魯木齊，幾百萬平方公里的地域，好幾億的人口都說的是官話，互相之間的交際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困難。這種語言的統一性是世界上其他國家少有的。最近幾年來推廣普通話，普及中小學教育，加上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大大地加快了語言統一性的趨勢。但是，由於方言的廣泛存在，所造成的漢語的分歧性，在大陸地區顯而易見。東南地區吳語、閩語、粵語、湘語、贛語、客家話、徽語、土話平話，還有北部地區的晉語，無論從哪個角度衡量，都跟官話有很多差異。並且就總體來說，今天乃至今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這些方言還有很強的生命力，舊時流傳“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的方言隔閡，在南方一些地區還是一種應當正視的語言事實。

港澳地區和台灣地區的漢語也有統一性和分歧性的兩方面。但表現出來的面貌却跟大陸地區大不相同。香港和澳門都是兩文三語，但香港是中文英文，普通話粵語英語，澳門是中文葡文，普通話粵語葡語。長期以來，英語英文在香港是官方的優勢語言，葡語葡文在澳門是官方的優勢語言。兩地回歸以後，

普通話中文也成為兩地的法定官方語言，其重要地位迅速提升。可是在民間，在日常語言生活中，無論是香港還是澳門，粵語都是最重要的語言，還有一小部分人說客家話、閩語等其他漢語方言，這種情況至今沒有明顯變化。英語或葡語對粵語的影響是有限的，至於日常語言生活當中，以英語或葡語為第一語言的人數，也是少數的。所以港澳地區的兩文三語實際上是不對稱的。台灣地區情況更特殊一些。台灣通行“國語”、閩南話和客家話。“國語”就是大陸地區所說的“普通話”，異名同實。閩南話跟福建廈門、漳州、泉州一帶的閩南話幾乎完全相同。客家話跟廣東梅縣、興寧、五華、海陸等四縣也高度一致。台灣的“國語”推行時間長，現在具有明顯的優勢地位。閩南話百年來跟台灣社會政治密切相連，起落沉浮，一言難盡。討論兩岸四地的語言規劃，必須從上說語言現狀的實際情況出發。

兩岸四地語言規劃的焦點

面對兩岸四地的語言規劃，有四個焦點問題應該首先考慮。

(一) 普通話與方言 什麼是普通話？教科書上一向說明：“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基礎，以現代典範的白話文為詞彙和語法規範。”就這個定義性的說明來說，有很多可以討論的地方。“以北京語音為基礎”，就是說普通話不等於北京話。“以現代典範的白話文為基礎”，什麼是“典範的白話文”？毛澤東、魯迅的文章是典範的白話文，這個也許沒有問題，但是，普通話的詞彙語法規範只是以幾個領袖人物的文章為標準，顯然不合理。所以現在很多情況下，是缺少甚至是沒有詞彙語法規範的。從這裏可以看出，我們對普通話推廣工作做得多，真正從學術上進行研究還是做得很不够（參看張振興 2006）。台灣的“國語”情況也大致如此。

說到方言，兩岸四地也不可籠統言之。從全國範圍來說，粵語、閩南話都是方言，可是香港、澳門的粵語是兩地大多數人日常最常用的語言，閩南話是台灣大多數人最常用的語言。所以，就其實際應用和社會地位來說，港澳的粵語，台灣的閩南話跟廣東的粵語、福建的閩南話不能完全相提並論。這裏特別需要講相對論。就方言本身來說，港澳的粵語與廣東粵語不完全一樣，程祥徽教授舉例說過，港澳粵語口語或書面語裏，至今仍然使用“布政、律政、卒之、式微、昇死”等一批詞語，可是廣東的粵語裏已經是難得一見，或根本不用了（參看程祥徽 2008）。台灣閩南話和福建的閩南話也不完全一樣，例如台灣閩南話管鄉下叫“莊較、草地”、管烹飪叫“料理”、管署名叫“押名”、管火車站叫“驛頭”，因過於認真、要求完美而顯得過於挑剔就說“猴神”，形容女子言語刻薄，做事手段厲害就說“罣姐”，形容女人活潑美好就說“麗鬥”，還有一批這一類的詞語，是跟福建閩南話不同的（參看周長楫 2006）。所以在實行兩岸四地語言規劃的時候，同樣叫粵語，叫閩南話，要充分看到歷史上形成的統一性，也要看到由於各種原因而形成的差異性。要尊重這種差異性，不要完全畫等號，更不要强行畫等號。

普通話和方言是一雙對子。普通話在方言之上，又在方言之中。沒有方言也就無所謂普通話。漢語的主要方言仍然具有很強的生命力，粵語、閩南話、上海話甚至還具有很大的經濟價值，所謂賺錢的方言。普通話是需要依靠方言來豐富發展的，現在常說的“買單、發燒友、跳槽、炒魷魚”等詞語就是從粵語來的。普通話借用了上海話的“尷尬”，“尬”字讀成的 gà；英文 card 南方人翻譯成“卡片”，到了普通話裏“卡”字照南方人的讀法說成 kǎ，“門卡住了”也說成“門 kǎ 住了”，這個 gǎ、ka 甚至突破了普通話原來的語音結構的框架。著名的《現代漢語詞典》是一部具有規範性質的普通話詞典，但却收錄了

數以百計的方言詞語，這也是為普通話預設的發展通道，非常有遠見。“暖壺、暖瓶、熱水瓶”，“教室、課堂”不妨都說，不必去追究哪個是普通話，哪個是方言。因此推廣普通話或“國語”，不等於不要方言。說漢語，要說整體漢語，既要說普通話，也要說方言，這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方面，都是我們寶貴的語言資源，華夏民族的共同財富。一段時間裏，或某些場合下，無論是台灣，還是大陸都出現過强行推廣普通話或“國語”，不尊重方言的傾向，這是應該引為教訓的。當然，我們也反對有人出於政治目的，不顧語言事實，人為地抬高方言地位的做法。把台灣閩南話稱為“台灣語”是荒唐的。

（二）普通話與國語 大陸和港澳地區叫普通話，台灣地區叫“國語”。“國語”是沿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前的說法。例如著名語言學家黎錦熙就編纂過一部很重要的《國語辭典》。所以普通話、“國語”實際所指的是一樣的，其語音結構、語法規則幾乎完全相同，如果有個別細微的差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詞語上也絕大部分相同，但有不一致的地方。例如：

台灣“國語” 火車母 火車頭 放送頭 自動車 自轉車 水道水 水道頭

大陸普通話 火車頭 火車站 播音器 汽車 自行車 自來水 水龍頭

一眼就可以看出，台灣“國語”的這些說法，是從台灣閩南話轉說的，而台灣閩南話的這些說法，是日本占領時代從日語借入的。我們已經注意到，台灣“國語”實際上也已經還原到大陸普通話的說法，說“火車頭、火車站”等等了。一些新詞語，大陸普通話和台灣“國語”也不同。例如台灣“國語”叫“導覽器、保全公司、就學貸款、修正液、小手、保養品、狂牛病、本頁、駭客、筆規、彩視、感電、硬碟、游標、超博士、作業系統”等，在大陸普通話裏分別叫“瀏覽器、保安公司、助學貸款、修改液、扒

手、保健品、瘋牛病、主頁、黑客、圓規、彩電、觸電、硬盤、光標、博士後、操作系統”等（參看俞允海 2008）。

港澳地區和大陸雖然都叫普通話，在詞語用法上也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例如港澳地區管煤氣開關叫“氣喉”，管自來水開關叫“水喉”，大陸地區就分別叫“開關”、“水龍頭”，港澳地區說“標投、複康、質素、取錄”，大陸地區分別說“投標、康復、素質、錄取”（參看俞允海 2008）。

兩岸四地這一類詞語的差異，不能一一盡舉。這些差異的形成也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原因。有這些差異，正好說明漢語的多樣性、包容性，說明漢語的表達是豐富多彩的。所以不要人為地去統一，而是要讓其敞開交流，相互吸收。有兩個例子很生動。一個是“牽手”。本來這個詞來自閩南話，台灣“國語”把它吸收進去，指情侶或配偶。後來傳入大陸，普通話裏也經常出現，如2006年7月4日CCTV-1廣告說“某公司牽手某公司”如何如何，這個詞變成了動詞，是“聯合”或“合作”的意思。另一個例子是“搞”，這個詞最早可能來自西南官話，很快地通過普通話流傳全國，在口語裏經常取代“做、幹、辦、獲得、取得、整治（人）”等詞語。這個詞也很快在台灣“國語”裏流傳開來，2007年3月台灣《中國時報》一篇文章說：“生活在台灣的人，幾十年來，早就‘搞’字琅琅上口，發揮得淋漓盡致”，“年輕人調皮，行使另類，可以說‘搞怪’；大腦少根筋，粗心犯錯，可以說‘搞飛機’；故意整人可以說‘惡搞’；傷腦筋的事無法定案，可以說‘搞不定’；盡情發揮可以說‘大搞特搞’，加上更口語的‘搞不清楚’、‘搞什麼’（有人將之中英結合成為“搞what”）……生活語言中用到‘搞’之一字的，不勝枚舉。”後來“搞怪”“惡搞”這些說法又回傳大陸。這些例子再次生動說明，語言的交流是不管意識形態的。

（三）語言與文字 語言可以從嘴裏說出來，也

可以用文字寫出來。平時說“中文”如何如何，既指嘴裏說的漢語，也指漢字寫出來的漢語。說到漢字，我們應該有一種崇敬和自豪。漢字的創造是我們祖先對人類文明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所以傳說蒼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真是驚天地，泣鬼神，了不起呀。儘管嘴裏說的漢語，方言分歧複雜，寫出來却是很一致的，這就是言文不一致的好處。漢字在維護國家民族統一的進程中，功勞蓋世，是世界上任何一種文字都不能比擬的。

兩岸四地都使用漢字。即使最主張台灣“獨立”的人，也不敢說取消漢字，“陳水扁”三個字要是寫成非漢字的樣子，估計他自己也不幹。不過，有一個繁簡的問題，却是讓很多人爭論不休的。文字是人造的，人寫的，因此同樣一個音義的東西，有的字筆劃少，有的字筆劃多，這就出來繁體的，簡體的，還有異體的。《康熙字典》裏已經有一個筆劃很多的“龍”了，它還得收一個三個“龍”相疊成品字型的字，成了48畫，有人多事，再造了四個“龍”上下左右相疊的字，筆劃多達64畫！簡化字寫作“龙”，自然很多人歡迎。陝西一種麵食叫“biang biang麵”，陝西各地有人為這個 biang 造了好幾個非常複雜的字，為這些個字還專門編了好幾首歌，告訴大家這個字怎麼寫（參看孫立新 2001）。這些當然都是比較極端的例子，不足為訓。很多字自古其實是很“簡化”的，是後來的人不嫌麻煩，根據形聲字造字法把它變成繁體的。例如，《詩經·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其中“采采”，已經有“手”了，有人根據“睬、睬、彩”，又加上一隻手繁體成了“採”。這個真叫狗尾續貂。想睡覺了，原來就寫作“困”，後來有人又加了“目”旁寫作繁體的“睏”，粵語的人嘴裏說的“困”跟“訓”字同音，也加了“目”旁合成寫作“瞋”，這就成了方言字了。港澳地區文化發達，習慣上總是嘴裏能說出來，字上就要能寫出來，所以就造了很多方言字，

最常見的是很多加上“口”旁的表音字。外面的人看了可能很不習慣，可是廣東人、港澳人津津樂道，這裏自有道理。

所以，港澳台地區使用繁體字，大陸地區使用簡體字，都是漢字。都有一定的歷史背景，無所謂誰的就一定最好，誰的就一定不好。“台灣、台灣”，“台子、枱子、檯子”都見於台灣地區報紙，哪個對，哪個不對？一般人說不清楚；“面、麵”都簡化為“面”，“乾、幹、幹”都簡化為“干”，“發、髮”都簡化為“发”，南方人總覺得跟嘴裏說的不一樣；有人寫文章，就把“扭轉乾坤”寫作簡體“扭转乾坤”，把“头发”還原成繁體寫作“頭發”，把“文学泰斗”還原成繁體寫作“文學泰鬥”，著實讓人哭笑不得，很是無可奈何。因此繁簡體的得失利弊，不要跟意識形態掛鉤。文字是用來表達語言的，它自身有極強的調節功能，讓其在使用過程中加以調整，再加適當的人工干預，這是最好的辦法。

（四）語言與規範 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語言需要一定的規範，這是誰都知道的道理。有的規範很容易說清楚，有的規範一時說不清楚。例如：按捺（na，“納”）不住不讀按捺（nai，“耐”）不住；鏗（qie，“竊”）而不舍不讀鏗（qi，“棄”）而不舍；徘徊（huai，“懷”）不讀徘徊（hui，“回”）；心肌梗塞（se，“色”）不讀心肌梗塞（sai）；窠（ke，“科”）臼不讀窠（guo，“果”）臼；桎梏（gu，“固”）不讀桎梏（gao，“告”），等等，這都是普通話規範過的，不規範就亂了套了。可是為什麼這麼規範，有的可以說清楚，有的真的一下子說不清楚。

意思是要規範，說普通話“國語”要分清zcs, zh ch sh和jqx三套塞音擦音聲母，要分清n和l聲母。這些不分，說話交際就要犯糊塗，犯很多錯誤。儘管南方人，包括港澳台地區的人分清這幾組聲母不容易。但有的地方不要規範死了，不要把規範變成桎

梏。語言是用來交際的，很多時候需要照顧語言習慣，照顧實際條件和可能，要留有餘地。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普通話的輕聲和兒化。北京話和很多官話方言有輕聲和兒化，所以普通話很多口語詞語也有輕聲和兒化。比試比試，筆墨官司、財氣、不見得、玻璃、菜籃子、車把勢、慈姑、但不是，這些詞語的最後一個音節要讀輕聲；挨個兒、單個兒、哥兒倆、一點兒、這兒、花兒、當口兒、擋橫兒（阻擋），這些詞語都要兒化。南方人，包括港澳台地區的人，方言口語裏也有相當於兒化輕聲的東西，但都沒有普通話裏的這種輕聲和兒化，說起來非常困難。我們知道，普通話裏完全依靠輕聲和兒化來區別語義的對子很少，而需要輕聲和兒化的詞語却很多，從語言學習的角度來說，這是很不經濟的。所以，對於大量的港澳台地區的人來說，說普通話“國語”的時候，不要一下子就強求輕聲和兒化的規範，畢竟不是人人都要當普通話的考試員、都要通過漢語水平考試的。

以上說的是語音的規範問題。其實，就目前情況來看最迫切的是漢語行文的規範，特別是行政、法律一類公文的規範。例如澳門一本關於法律方面的《實用指南》，是從葡文翻譯過來的，常見一些在中文裏顯得彘扭的表達方式。例如：

……亦從事教育工作，是作為司法研究中心前身的最初數屆司法官培訓課程的負責人。

我們可將之下定義為社會集體的協調和良好秩序，是其存續及對其宗旨謀取等的必要條件。

紀律懲戒法，好若規則的實在“銅板”，是一門新興的法律。

雖然二者相異，……并因此產生兩個譴責。由於這些譴責各有不同的目標，所以并無違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則。

這些是我們偶然看到抄下來的。多看香港、澳門出版或印行的中文文件或書刊，此類不當應該不難看到。這裏有的是專門用詞或表達方式香港澳門與內地

不同，不能看作錯誤。但是確有一些是屬於一般詞語誤用、文白搭配不當、句子艱澀等各類問題。這些文件如果用於兩岸四地的經濟、法律交流，是會耽誤事情的，必須儘快實現文本規範。

結論

上文簡略討論兩岸四地跟語言規劃有關的幾個問題。程祥徽教授說，兩岸四地的語言問題不難解決，要以幾個共識為前提：（1）以普通話（國語）為前提；（2）擱置爭議，繁簡並存；（3）詞語對比，相互吸收；（4）解決問題，互信為先。程教授又說，我們要把兩岸四地的語言規劃落實到具體項目上來。最迫切、最實際、最容易落實的項目是“編纂相關的語文工具書：繁簡對照字典，兩岸四地對照詞典，法律用語對照詞典。”（參看程祥徽 2008）我非常贊成程祥徽教授的主張和提議。

這裏略加補充的是，在兩岸四地語言規劃的時候，還要遵循一定的原則，這就是要尊重歷史，照顧現實，規範寬容，求同存異。

要尊重歷史，就是既要充分考慮兩岸四地絕大多數人口說的都是漢語，寫的都是漢文，中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又要充分考慮到兩岸的漢語和中文有差異，還要充分考慮到香港澳門兩文三語的歷史背景，英文、葡文長期以來在香港、澳門社會語言生活中發揮過重要作用。語言文字的使用要注意過渡性、繼承性。這是一種歷史事實，要尊重這個歷史事實。

要照顧現實，就是從現在兩岸四地語言文字社會使用的現實出發，制定語言文字規劃框架，制定切實可行的語文政策。在推動語文政策實施的時候，要前後有序，循序漸進，不急不躁。不要急於統一兩岸的普通話和“國語”，也不要急於用一語一文統一香港、澳門的社會語言生活。

要規範寬容，就是兩岸四地社會語言文字的使用

在各自的範圍內要有規範，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所以在語言文字使用過程中，要制定一些規則，供社會公眾共同遵守。這個規範應該共同遵守漢語和漢字在歷史上形成的通則。但是，規矩不能太死，規則要有餘地。在公眾可以容納的範圍內，只要不影響交際，不妨礙司法公正，不違反法規，就要有寬容精神。

要求同存異，就是兩岸四地的語言文字學界，在推動社會語言文字使用的過程中，會有不同的意見，這個時候要互相討論，互相切磋，求同存異。尤其切忌帶上意識形態的情緒與偏見。

參考文獻：

- 1、程祥徽 2008 為我們共同使用的語言作規劃，在《兩岸四地語言學論壇》（澳門，2008年12月）上的專題報告（未刊稿）。
- 2、黃宣範 1993 《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 3、孫立新 2001 《戶縣方言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
- 4、俞允海 2008 大陸和港臺新詞語語差研究，新浪網 2008年10月18日下載。
- 5、張振興 2006 語言規劃與漢語方言研究（第四屆全國社會語言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語言規劃的理論與實踐》），[北京]語文出版社。
- 6、周長楫 2006 《閩南方言大詞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7、Robert B. Kaplan、Richard B. Baldauf, Jr., 1999,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on to Theory,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關於澳門語言規劃的思考

Thoughts on Language Planning in Macau

◎黃 翊 / 澳門理工學院

摘要：首先明確“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的概念。澳門的語言規劃須從政治、經濟、人文、地理四方面進行，其內容包括語言選擇、語言協調和語言本體等。

關鍵詞：語言規劃 語言政策 語言選擇 語言協調 語言本體規劃

Abstract: First, a distinction has to be made between the concepts of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ies”. Language planning in Macau involves four areas of consideration—political, economic, humanistic, and geographical, which include language choice, language coordination, and language nomenclature.

Keywords: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choice, language coordination, language nomenclature, language corpus planning

“語言規劃”作為語言學的一個術語在中國只有20多年的歷史，但是語言規劃這件事卻已進行了幾千年。秦始皇實行“書同文”措施就是一次語言規劃的成功實踐。漢朝政府派官員駕駛輜軒車下鄉採集民謠和方言以作為施政參考，說明中國的語言政策早已有之。歷代政府設立專門機構編纂字書、韻書、字典等等，都具有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性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更加步入正軌，取得豐碩成果；但“也有局部的失誤或

敗，……面對如此豐富的實踐經驗和教訓，我們的研究總結和理論概括工作卻顯得過於薄弱”。（仲哲明，關於語言規劃理論研究的思考，載周玉忠、王輝主編2004）澳門語言狀況複雜，無論在實踐方面還是理論方面，語言規劃要做的事很多，而首先要做的是明確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基本概念。

語言規劃的核心術語有“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現代漢語詞典》稱政策是“國家或政黨為實現一定歷史時期的路線而制定的行動準則”；規劃是

“比較全面的長遠的發展計畫”。這就是說，政策是服從規劃並為實現規劃而制訂的；規劃則是制訂政策的依據和依歸。規劃更為宏觀，重在設計與策劃；政策比較微觀，重在具體的執行。但在術語的運用上有時難以分辨，有時難免出現混淆，往往是用“規劃”的時候涵蓋了“政策”。

現代社會有必要制訂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是因為存在著“語言問題”。語言本身也是問題，這個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內部問題，二是外部問題。內部問題指語言本身的結構規律，以及這個結構規律的演變方式和演變趨勢，例如漢語及其方言音韻上聲韻調的結構規律和演變規律，詞語上的語素組成和構造方式，語法上語法成分與句式構成的關係等等。這些相當於喬姆斯基所說的“語言奧秘”（mysteries），語言奧秘在今天還不能完全解開。外部問題指語言與社會的關係，這個包括語言與使用語言的族群的社會、政治、經濟的複雜關係。這些相當於喬姆斯基所說的“語言問題”（problem）。一般來說，解決語言的內部問題主要是語言學家的任務，而語言的外部問題卻是不能只靠語言學家的。不過，任何一種語言問題都是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也是可以解決的問題，例如一個社會共同採用何種語言、不採用何種語言等等。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物件是語言與社會的關係問題，也就是“語言問題”。制訂較長遠的計畫去解決語言的外部問題就是語言規劃，根據規劃的指標制訂政策，從而使規劃得以實現就是語言政策。何人去進行語言的規劃以及何人去執行政策呢？一般地說，是國家、政府成立的機構。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多方言的國家，語言方面要做的事很多，大至各民族語言平等的考量，小至少數民族自治地區門牌、票據、表格、會標、標語以及政府機構的信封信紙要同時使用民、漢文字等等。語言政策和規劃直接影響民族的團結、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統一。由於歷史原因，澳門的語言問題很多，例如國語、官方語言和正式語文概

念的混亂，立法語言和公文語言的艱澀難明等等，減弱了法律和行政的功能，影響一國兩制決策的實施和特區的穩定繁榮。因此制訂語言政策和規劃的任務十分繁重。制訂和實施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將有利於語言問題的合理解決，更好地發揮語言的交際功能和社會功能。

如前所述，社會語言學研究的問題包含兩個方面：一是語言本身的問題，例如個人的語言變異等等；二是語言與社會的關係問題，例如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等等。前者可稱社會語言學，後者可稱語言社會學。語言規劃是屬於語言社會學範疇的，它包含語言學的因素，更包含社會學的因素，例如社會政治、經濟、人文、地理等因素。

澳門土地面積小，人口不多但語言複雜，三語四言（漢、葡、英三語，漢語分粵方言和普通話）分別處於不同的語用環境中。各種語言狀況的形成是由社會政治、歷史、文化、經濟、人口等諸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因此，處在一個社會中的各語言，其功能分佈也不會是一樣的，例如粵語的使用人數雖然超過澳門總人數的95%，但從未正式進入政務、司法和政府機構，英語雖然不是官方語言，但在經貿、科技等範圍內廣泛通行。這些因素在語言規劃時必須認真考慮。葡國科英布拉大學經濟系教授兼社會所主任蘇保榮曾對現今的澳門社會作過這樣的描述：“澳門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微型世界，是一個十分特別的葡國的老殖民地，又是一個多種文化、多種語言的社會。她將好幾個多元——文化的多元化、社會政治的多元化、語言多元化、法律多元化——共冶於一爐。”（轉引自楊秀玲，研究社會語言學，迎接劃時代的挑戰，程祥徽主編 1994）這種多元社會的多元語言分佈是澳門語文規劃的背景。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九條規定了中葡文的地位，這是中文進入澳門官方地位的法律依據。官方地位的中文，不是別的漢語方言，而是與國語（National Language）、標準語（Standard Language）的概念聯繫在一起的，即漢語普通話。但澳門現實的語言狀況是：粵語是人們交際的最主要的工具，普通話目前通行的範圍還是有限的。粵語不僅通行於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而且在正式政府公務、文化教育、司法審判等場合仍作為主要語言使用。當然也應該看到，隨著普通話的官方地位的落實，語際交流中各種語言的地位也在改變。普通話已開始受到更多的重視，不僅在華人中學漢語普通話的人數在日趨增多，即使在土生葡人中，也有不少人開始學習普通話。對普通話的認識，正在由理智上的認識向感情上的接受演進。這種情勢是澳門言語社會語用中語碼轉換的主導勢向。

語文規劃還需考慮經濟因素。澳門今天的現實和未來的發展前景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向著國際化的現代化都市發展。現代社會衡量一國一市的國際水準是其經濟實力，國際化的現代都市的特徵是經濟的高度發展。因此，作為溝通現代業務與聯繫世界的重要工具的英語，現在就已經廣泛地應用於本埠商業、旅遊、教育和文化，隨著澳門國際化水準的提高，英語的價值也將進一步提升。完全可以預見，英語的地位將會進一步穩固。未來澳門語際交流語碼轉換的英語“含量”比現在將有增大是確定無疑的。

人文因素也是必須考慮的。澳門多種語言共生共存的磨合史表明，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遠超任何政治因素。從1553年葡國人獲准在澳門定居到現在450多年以來，葡萄牙語從來沒有成為主導語言，而漢語（在口語上表現為粵方言，在書面上表現為語體文）卻不僅沒有一絲一毫的蛻萎，反而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抵禦、消融了外來文化，並以其強韌的力量使許多來澳門的葡國人接受漢化的生活方式。這就是葡語始終

沒有被華人社團的絕大多數居民接受的原因。當然，不同文化的相互影響還是有的，多語的相互影響與滲透，語界的模糊和語言的混雜使用也在所難免。

語文規劃還要顧及地理因素。澳門位於珠江口右端，背靠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濟發展迅猛的中國大陸，左端隔海與最具經濟活力的香港相望，形成“省港澳”三足鼎立的格局。這一地理位置，決定了澳門必須與這兩個地區同步發展的命運，即所謂“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整個這個地區，居民對粵語的忠誠度都很高。特別在港澳人心目中，粵語情意結是其他語用者所難理解的。因此，粵語在澳門的地位將會有一個長久的穩固期。語言態度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包括民族歷史文化、社會政治制度、經濟結構以及人口的數量與品質、性別與年齡、職業與教育等的配比關係。一種語言在語言狀況中所處的位置與人們對它的態度，並非總是成正比的，例如葡語在澳門，曾經長期處在至高無上的官方地位，但它卻始終沒有成為澳門社會普遍通用的語言。

二

關於澳門語文規劃的內容，主要有如下三項：語言選擇、語言協調和語言本體規劃。

第一，語言選擇。所謂語言選擇，是國家或地區以立法的形式對語言進行人為干預的表現，是國家或地區的語言政策選擇的結果，就是確定某一種語言或某幾種語言為國家或地區法定的官方語言。至於選擇何種語言作為官方語言，那是決定於多種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在澳門，有粵語、普通話、上海話、福建話、英語、葡語、土生葡語等等多種語言和方言，但最後確立漢語和葡語的官方語言地位就是就是一種語言選擇的結果。在語言選擇之後，澳門執行語言規劃任務的機構或個人選擇何種語言進行規劃？從不同的語種說，是漢語而不是英語、葡語；漢語中

是普通話而不是漢語的其他方言；普通話首先是它的書面語而主要不是它的口語；粵方言是否列入規劃的範圍，值得研究。有些人進行粵語正音的研究，從學術角度看無可厚非，從實用角度（即澳門居民都要說標準的粵方言）看則未必十分必要。普通話的書面形式列為澳門語言規劃的首選，是因為普通話的書面形式就是寫作公文、草擬法律時使用的語體文，它充當澳門特區的“官方語文”和“正式語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在澳門的語言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當然要求使用純正的葡語文，然而規範葡文的任務主要應在葡文的故鄉葡萄牙本土進行。

第二，語言協調。在澳門的語言選擇中，選擇了葡語與漢語普通話作為兩種官方語言，這個實際上是語言選擇過程中語言協調的結果。語言選擇之後，仍然存在不斷的語言協調過程。例如，必須協調這兩種官方語言在行政、司法等各個方面的相關性和公平性，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所體現的一致性。這種協調還表現在充分調動漢語和中文在澳門社會生活中的積極作用，同時又充分尊重葡語和葡文在澳門歷史和現實中的重要地位。即使在澳門的漢語內部，也有一個語言協調的過程，特別要協調好普通話與粵語之間的關係。由於人口、歷史的原因，粵語在澳門社會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隨著政治、經濟的快速發展，普通話在澳門顯得日益重要。如何處理二者之間的關係，需要照顧各方面的實際要求，也有一個尊重歷史，尊重現實的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語言協調過程。

第三，語言本體規劃。語言規劃的協調工作做好了，規劃的物件選擇了出來，這兩項任務屬於語言規劃的外部工程，處理的是語言和社會的關係，此外還要對語言本身進行規範，解決語言本體的規劃問題。語言本體規劃的目的是對語言本身的語音、語法、辭彙及書寫系統進行改造。（徐大明等，1997）規範的目的是確定語言的正確用法，糾正和改進不正確的語

言形式，保持官方語言的純潔性。在澳門，語言本體規劃最主要是針對在澳門流行的普通話而言的。為了引導澳門居民正確使用普通話，一方面必須大力引進普通話的各類教材，以及各類字典詞典，另一方面必須根據澳門具體情況，對澳門普通話語音、辭彙和語法等現況進行調查，摸清普通話在澳門的變異程度和變異特徵。值得提出的是，在澳門進行普通話本體規劃的時候，我們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在普通話應用和教學中對“標準化”、“規範化”的問題，要提得恰如其分，不要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以免增加使用者和學習者的思想負擔。例如對普通話的兒化、輕聲這一類的語音問題就可以考慮放低要求。除此之外，澳門的語言本體規劃也包括對粵語的規劃，因為粵語是澳門大多數人日常使用的主要方言。文字改進也是語言規劃的重要內容。豪根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主張在語言規劃研究中，要把文字與言語的關係顛倒過來，文字是主要的，言語是次要的。其理由是文字具有超時空傳遞資訊的媒介功能。所謂文字，其實是書面語言的代名詞。在澳門，具有官方地位的漢語主要也是指它的書面形式。因此，改進文字也就是改進書面語。文字改進的另一含義是書寫的問題。對現階段的澳門漢語說來，就是繁體字和簡化字的關係問題。澳門現在通行繁體字，有一間小學在試行簡化字教學，另有學者提出“繁簡由之”的主張。這些都是屬於語言本體規劃的範圍之內。

語文規劃是一件涉及社會群體利益的事，既可以是建設性的，也可以是破壞性的。從建設性方面看，它可以促進和擴大語言的各種功能；從破壞性方面看，它可以遏制某種語言的發展，甚至採取強硬手段消滅某種語言。本文贊同這樣的主張：語文規劃不應事先承諾促進或防止語言變化，也不應該承諾在不同言語社團間鼓動統一或分化。它可以為語言純潔化工作，也可以為語言混合服務，還可以提倡利用或限制語言資源。其任務是保證交流的穩定性和有效性。

香港多元語言文化現象及 語言文字規範化問題

Research on the Phenomenon of Multi-languages and Cultures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Written Language of Hong Kong

◎田小琳 / 香港嶺南大學

提要：在香港經常居住的世界各民族有十幾個以上，香港社會呈現出多元語言文化的現象。由於本地居民仍以粵方言人士為主，因而粵方言是香港社會流通的強勢口頭語言；而由於歷史的原因，英國語文始終是香港社會最受重視的正式語文。以書面語來看，社會公認中文書面語應是規範的，但港式中文仍是香港社會流通的強勢書面語言。香港回歸中國以後，中文提昇為正式語文，普通話亦日漸流通。“兩文三語”是政府推行的語文教育政策。“兩文三語”政策的實施，有利於加快香港社會的語言文字走向規範化標準化的進程，同時又要尊重社區文化，在制定和推行政策時處理好原則性和靈活性的關係。

關鍵詞：多元語言文化現象 慣用語言 粵方言 強勢口頭語言 母語教學 粵式中文 港式中文 中英混合文 強勢書面語言 普通話教中文 正式語文 中文標準書面語 兩文三語 規範化 社區文化

Abstract: There are people with more than 10 nationalities living in Hong Kong. The

phenomenon of multi-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Hong Kong occurs. Cantonese is the most important language of local residents, therefore it is also the mightiest spoken language; owing to the historical reasons, English is always thought highly. As for written languages, as we all know the written Chinese should be standard, but the Hong Kong Chinese is still the most common one. After Hong Kong's return to Chinese sovereignty, Chinese became an official language, and Putonghua was more and more popular.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was implemented as the language policy. This quickens the step of standardization. While carrying out this policy, the respect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flexibility should be taken note to.

Key Words: phenomenon of multi-languages and cultures, idiomatic language, Cantonese, mighty spoken language, mother tongue teaching, Canton Chinese, Hong Kong Chinese, creolized language of Chinese and English, mighty written language, teaching Chinese in Putonghua, official language, standard written Chinese, Bi-literacy and Tri-lingualism, standardization, culture of community

一、香港社會種族分類及慣用語言狀況

1、香港社會種族分類

香港政府關於《二零零六年中期人口統計》的資料，是我們現今可以看到的最新最準確的資料，因為人口統計5年一次，未來一次的統計要到2011年。儘管這些資料本身，每年都會有一些變化，但目前的資料足夠供我們來做有關的分析。在香港政府關於《二零零六年中期人口統計》的“人口特徵”部份，香港的種族華裔人口有6,522,148人，非華裔人口有342,198人，總計人口6,864,346人。在上述統計報告的“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中，對於非華裔的少數族裔人口有詳細描寫：

“在二零零六年七月，共有342,198名少數族裔人士居住在香港，占全港人口的5.0%。當中包括菲律賓人(32.9%)、印尼人(25.7%)、白人(10.6%)、印度人(6.0%)、混血兒(5.3%)、尼泊爾人(4.7%)、日本人(3.9%)、泰國人(3.5%)、巴基斯坦人(3.2%)、其他亞洲人(2.3%)、韓國人(1.4%)及其它(0.6%)。大部份(98.2%)在港的少數族裔人士都是常住居民，而只有6,028名(1.8%)是流動居民。二零零一年居住在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士數目為343,950，和二零零六年的數字相若。”

由以上的統計看，在香港經常居住的世界各國的民族有十幾個以上。

香港社會各種族慣用語分類

在有近700萬人口的香港，人們各自的慣用語就包括了多種語言和中國的多種方言。根據政府統計處披露的數字，我們再來看下面一個表格，反映一九九一年、一九九六年、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六年按慣用語語言劃分的五歲及以上人口的慣用語情況：

慣用語	1991		1996		2001		2006	
	數目	佔總計的百分	數目	佔總計的百分	數目	佔總計的百分	數目	佔總計的百分
廣州話	4 583 322	88.7	5 196 240	88.7	5 726 972	89.2	6 030 960	90.8
普通話	57 577	1.1	65 892	1.1	55 410	0.9	60 859	0.9
其他中國方言	364 694	7.0	340 222	5.8	352 562	5.5	289 027	4.4
英語	114 084	2.2	184 308	3.1	203 598	3.2	187 281	2.8
其他	49 232	1.0	73 879	1.3	79 197	1.2	72 217	1.1
總計	5 168 909	100.0	5 860 541	100.0	6 417 739	100.0	6 640 344	100.0

釋：(1) 這些數字不包括失去語言能力的人士。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二零零六年中期人口統計辦事處

修訂日期：2007年2月22日

當然，會說普通話的不止6萬人左右，在慣用廣州話、英語等人口中，還有不少會說普通話；同理，會說英語的也不止18萬人。這裏說的慣用語可看作該使用人口的母語。

在關於“慣用語”的調查中，報告的結論如下：

“少數族裔人士及華裔人士在家中常用的語言明顯地是有相當大的分別。在五歲及以上少數族裔人士中，有46.7%報稱英語為他/她們在家中最常用的語言，其次是廣州話(32.4%)、日語(3.0%)、菲律賓語(2.1%)、印尼語(1.9%)、普通話(1.0%)及其它中國方言(非廣州話及普通話)(0.4%)。相反地，93.9%的五歲以上華裔人士在家中最常用廣州話，其次是其他中國方言(非廣州話及普通話)(4.6%)、普通話(0.9%)及英語(0.5%)”

由以上精確的數字統計，已呈現出香港社會多元

語言文化的現象。這個社會的多元語言文化現象可以提供給我們有關社會語言學、文化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等很多的研究課題。

2、香港社會多元語言文化現象剖析

香港常說的“兩文三語”，是將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分開來說的，“兩文”指中文、英文，“三語”指粵語、英語、普通話，下文行文時也按兩文三語分開來分析。

2.1 粵方言是香港社會流通的強勢口頭語言

2.2 粵方言在香港流通範圍之廣超過英語、普通話及其他方言

粵方言流通的範圍之廣，超過英語、普通話及其他的方言。從上文2006年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到，以廣州話為慣用語的人約為600萬人，佔全港人口90.8%。這樣一個佔絕對優勢的數字已經很說明問題。粵方言在香港社會是無處不在的。政府和各行各業的工作語言，電台、電視台的傳媒語言，中小學的教學語言（母語教學指粵方言教學），家庭成員及朋友之間的交流語言，粵方言均呈強勢。例如，特首和各級官員對市民發表講話，立法局中議員的發言、辯論，高層社交圈子的交談，大學教師、中小學教師之間的交談，如果沒有外國人在，都是用粵方言。不用說一般的市民，隨時隨地都在說粵語。

2.2.1 粵方言流通的歷史原因及現實原因

從歷史上看，英國管治香港一百五十年，英語仍不能取代粵語。這情況不同於新加坡，值得研究。首先是地理環境決定的，香港緊連中國大陸，本是廣東省的一部分，香港人的祖籍散佈在廣東省各地，與廣東有不可分割的血脈連繫。其次，從人口結構看，英國雖管治香港，派總督到香港，卻始終未有大量英國人移民香港，形不成講英語的語言環境。第三，香港的教育狀況在歷史上未如理想，貧富懸殊的社會中，草根階層始終是大多數，受到的英語教育有限。因而

百多年來，香港人雖然始終重視英語，英語還是無法在香港完全流通，代替不了粵語。

從現實的情況看，香港回歸祖國已經十一年，普通話雖然已受到重視，能說會聽普通話的香港人越來越多，但普通話遠遠還沒有成為社會的流通語言，更不要說是強勢。

況且，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在眾多方言中，粵方言似乎是一種“強勢”方言。這個“強勢”主要指粵方言對現代漢語的影響，特別是在詞彙方面的影響。珠江三角洲為改革開放的龍頭，經濟的實力提高了粵方言的地位，加上港澳在九十年代的回歸，一時間有“普通話南下，粵方言北上”的說法。粵方言還隨著粵語歌曲而傳播。看看《現代漢語詞典》2005年第5版，已將一些粵方言詞語和香港的社區詞語收入在內，例如：手袋、買單（埋單）、生猛、打工、家居、物業、樓花、寫字樓、炒魷魚、升班馬等。其他方言包括以上海話為代表的吳方言似乎沒有粵方言這樣強的影響力，儘管長江三角洲也在改革開放中居有重要地位。這個現象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香港人酷愛粵語，認為自己的母語是粵語，教育界討論的“母語教學還是英語教學”，其中母語教學指的是粵語教學。他們從不認為普通話是母語，有的人甚至認為普通話教學類似第二語言的學習。這種心理狀態也是粵語流通的重要原因。

粵方言雖然在口頭上佔優勢，但在書面上粵式中文卻呈弱勢，這個問題在下文再談。

2.3 英語 / 英文仍然是香港社會最受重視的正式語文

2.3.1 英語 / 英文流通的範圍

英語 / 英文是香港社會最受重視的正式語文。英語雖然在口語的應用上不如粵語範圍那麼廣，但也有相當流通的範圍，可以說僅次於粵語。例如，香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大部分均可用英語流利交際。在外資機構服務的人員，在金融商貿界的中高級管理層，

在政府的公務員中，在教育界的教職員中，大部分都能說英語。受過中等教育的人，亦有一定的英語交際能力。

香港的中學有英文中學和中文中學之分，英文中學的教學語言除中國語文、中國歷史等課程之外，均應該用英語教學，這是英語應用的一個很大的範圍。大學的絕大部分課程均為英語教學。香港的電台、電視台均有專門的英語台。香港政府機構的工作用語，英語也佔有相當的比例。

此外，香港家庭所僱用的約十幾萬菲律賓女傭，在家裏都是用英語對話，她們大都有高中、大學的學歷，對香港少年兒童的英語水平的提高，也有一定的作用。

總之，在工作用語、傳媒用語、教學語言、交流語言中，英語均佔有重要地位。英語作為香港社會流通的一種口語，在以上這些場合比普通話的應用更廣泛。

作為書面語的英文，流通的範圍比英語口語更廣。政府的文件、法律文本、商貿金融方面的文件，學校的文件，均以英文本為正式文本，香港回歸之後，政府的文件、法律文本及商貿金融方面的部分文件才開始有正式的中文文本。而文件的起草者，多是以英文起草，形成正式文本，然後再翻譯為中文文本。

2.3.2 英語 / 英文最受重視的原因

歷史的原因自不待說，英國管治香港150年，推行英語是既定的政策，只有英語才享有正式語文的地位。這種情況維持至香港回歸前。再看工業革命以來，世界上英美等大國崛起，經濟的實力帶動了英語在世界上的地位。延至今日，英語已成為世界上最流通的語言。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作為世界金融中心，必須保持在英語方面的優勢，才能與各發達國家沒有語言障礙的交流。這也是中國內地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注重英語教育的原因，上海、北京各大城市的

年輕學子直追香港學子的英語水準。

英文在香港地位更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下文簡稱《基本法》）的法律保障，在《基本法》第一章總則第九條裏，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

以香港人的心理因素來看，更是將子女的英語教育擺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從幼稚園開始就有英語幼稚園，中上層很多家庭將子女中學就送往國外。一般都認為，只有英文好才能在求職上發揮優勢，才能找到好工作。這使英文的流通具有市場的激發力。當然，也有人詬病香港的英文水準較過去落後，並歸咎於母語教學，這是另外需要討論的問題。在重視英文教育上所有家長和市民的看法都是沒有分歧的，是高度一致的。

2.4 港式中文是香港社會流通的強勢書面語言

2.4.1 港式中文流通的範圍遍及中文報章雜誌書籍

我在中國語言學會第13屆學術年會（秦皇島，2006.8）上提交了“港式中文泛論”一文，後經修改更名為《港式中文及其特點》，已發表在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上。文中闡明了我對港式中文的諸多看法，不再贅述。

港式中文是標準中文在香港這個社會區域的特殊書面語形式，行文中順暢地夾雜粵語，夾雜英語，顯示出港式中文的語體風格。

我們說港式中文在香港中文書面語的流通中呈強勢，主要是就它出現的範圍和數量來說的。以範圍來說，港式中文遍及各大中文報章雜誌，例如：蘋果日報、東方日報、太陽報、明報、信報、星島日報、頭條日報等等，就連注重語言文字規範的大公報、文匯報上也一樣有港式中文。雜誌中的明報週刊、東週刊、壹週刊、3週刊、快週刊、忽然一週、飲食男女更是充斥了港式中文。以數量來說，港式中文每天出現的數量之多，可能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這還需要一

個準確的數字統計。給我們的感覺已經是比比皆是，撲天蓋地。

2.4.2 港式中文流通的原因

港式中文以夾雜粵語、夾雜英語為其主要語體特徵，這是與上文2.1/2.2所談到的問題直接連繫的。正因為粵語是最流通的口語，英語也相當地流通，因而寫文章時，便會自然而然將口語中認為生動、準確的粵語、英語語句帶到筆下。而且這些筆者會認為好像不用這些粵語、英語語句就不夠過癮，就像是表達不到位。

香港很多人說粵語時也常常夾雜著英語的詞語，而且將這些英語詞語加上粵語的聲調、語調和粵語融為一體。這可以叫做港式口語。同是粵方言的其他地區沒有聽到這種情況。

港式中文是香港多元語言文化在中文書面語中的折射，也反映了香港人的一種心理。他們對港式中文是喜聞樂見的，是每天都看慣了的。儘管他們認為中文書面語應以標準書面語為規範，在教育界也不主張以港式中文為學生學習的範文；但對中文報刊中出現的大量港式中文卻並不要求採取規範，而是以一種較寬鬆的態度來對待。這就是香港社區的文化。

從另一方面來推論港式中文流通的原因，那就是因為很多港人還不能說流利的普通話，掌握的普通話詞彙量不足夠，特別是對普通話的口語詞和口語句式運用不純熟，寫作時不能完全用普通話流暢思維。有的概念不知用普通話的詞語怎麼說，就用上粵語的詞語來代替。

還有一類港式中文，其中一些語句是英文的硬譯。因為作者更熟悉英文，平時寫作習慣是用英文。一旦寫中文時，是用英文思維，再譯為中文。這樣，語句中便可能出現佶屈聱牙的情況。港式中文中夾雜用英文的情況是來自英文的顯性的影響，而由英文硬譯成的港式中文，則來自英文的隱性影響。

2.5 普通話在香港社會的流通量日漸上升

2.5.1 普通話日漸流通的表現

如果你在近十幾年經常到香港，已經可以明顯感到香港人的普通話水平在不斷提高。自由行的內地遊客，到各大商場及街道上的小商店，都有會普通話的營業員上前熱情招呼。公共交通如港鐵上的播音，既有粵語、英語，也有普通話的指示。無綫電視和亞洲電視，各自都有兩個台，一個粵語，一個英語，現在也加插普通話新聞之類的節目了。如果家裏登記了有線電視或now台，已經可以直接看到CCTV和鳳凰台了，香港電台也已有了一個專門的普通話台，這就是說結束了粵語和英語完全壟斷電視台、電台的時代。

就工作語言來說，兩屆特首就職宣誓，特首到京述職，香港政府官員與中央及內地官員接觸時，一律用普通話交流，這些都是正式的官方場合，香港官員就不能再用粵語或英語，而一定要用普通話，這也是一個突破。政府公務員訓練處已將普通話列為培訓課程，越來越多的公務員特別是高官，可以用普通話流暢交流。

從教育方面看，1998年起，普通話科已成為中小學的核心課程，十年來，上百萬的中小學生都已開始學習普通話。其實，香港的各級各類學校，從幼稚園到大學都設有普通話課，加上社會上民辦的各種普通話學校、補習班，以及私人授課，普通話教育在香港可以說是遍地開花。

最後再從測試角度看，香港人重視文憑、資格認定，政府部門和各種行業在學歷、資格方面都有嚴格的從業規定。普通話測試也受到追捧。香港本地設有四種普通話水平測試。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前為考試局）1988年設有普通話水平測試，1990年至2008年舉辦普通話高級水平測試；2000年開始舉辦中學會考普通話科考試；2001年開始舉辦教師語文能力（普通話科）評核。四種考試，至今累計有近十萬人參加。

自1996年至今，十年來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先後與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樹仁大學（前

樹仁學院）、香港教育學院、嶺南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公開大學共九所大學聯合舉行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各大學均舉辦試前預備班對大學生和各界市民進行培訓，迄今為止，考試報名人數場場爆滿，中大還出現過考生半夜排隊報名的情況。現已共有4萬多名考生參加了考試，及格率逐年上升。

2.5.2 普通話日漸流通的原因^[註]

香港回歸祖國，與國家關係日益密切，國家標準語普通話的地位日漸上升，是不言而喻的事。加上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發展成果巨大，世界各國看好中國市場，漢語熱迅速在世界各地傳播，孔子學院已在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二百多所。這種形勢對香港也有促進作用。

香港政府制定的語言政策很明確，立法已確定中文和普通話在社會中的地位。隨之教育部門推行了一系列有關的措施，使普通話教育從中小學做起，為推普打好了基礎。從1986年到1998年，經過十年的時間，普通話科從選修變為核心課程，2000年又將普通話列為中學會考的一個獨立會考科目，2001年開始舉辦教師語文能力（普通話科）評核，這項對教師的考核已成為一種常規考試。

說到普通話在香港的日漸流通，不能不提到香港的商貿界人士。在改革開放初期就進入內地的港商，為了不斷發展開拓自己的行業，紮根於大江南北的大中小城市。他們每天要接觸普通話，要用普通話和內地同行交流、做生意，就逼自己非學好普通話不行。因而商貿界在這三十年中起了帶頭推普的先鋒作用。

2.5.3 普通話推廣的新趨勢

回歸十年，普通話在香港社會的流通量日趨上昇，但仍未成為流通的語言，如何才能加快普通話流通的速度，使香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在未來的一二十年會聽會說普通話，這是香港語言生活中要考慮的一件大事。

我認為，還是要從教育入手。香港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簡稱“語常會”），正在進行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計劃。以“普通話教中文”是1999年課程發展議會提出的遠程目標，回歸十年，這遠程目標已是該擺上近程議事的日程上了。2007年10月30日，語常會已公佈撥款2億元港幣，計劃於2008/09學年開始，每年支援30所小學和10所中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其實，據不完全統計，坊間已有百所中小學開始逐漸分階段推行以普通話教中文。

只有普通話作為中文科的教學語言在全港中小學全面實行，香港中小學生的普通話能力才能上一個台階。因為普通話科每週只有一個教節，而中文課卻是每天都有的。接觸機會的多少直接影響教學效果。

遺憾的是，語常會和教育局並未訂出實現此計劃的明確時間表。香港普通話研習社、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等團體和學校，向政府提出“十年內全面起動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建議。民間的聲音在促進和推動政府儘快制定政策。

其實，還有一個更好的辦法可以同時進行，那便是在電視上開辦更多的普通話節目。香港市民大部分人多看無綫電視和亞洲電視的四個台，那些台營造的是粵語和英語的語言環境。如果在電視台營造更多的普通話語境，小孩子便可以無師自通地學會普通話。不必像現在，小學、中學、大學的學生都在從頭學漢語拼音，用了很多時間，還是學不好，也說不準。

我們寄希望上百萬的少年兒童、中小學生，在十年以內能以流利的普通話和人溝通，那將改變香港目前語言生活的面貌。

2.6 中文標準書面語是社會公認的規範書面語

2.6.1 上文說到港式中文在香港中文報刊中有撲天蓋地之勢。但香港學術界、教育界的大部分人，還是認為中文的標準書面語才是規範的書面語。這首先反映在中小學的中國語文教材上，課本是“聖地”，不

容粵式中文、港式中文進駐。如果學生作文裏夾雜了粵語或英語的語句，是要扣分數的。

中文報刊中，大公報、文滙報、信報、明報及明報月刊、信報月刊、亞洲週刊等報刊，比較注重文章的語言文字規範，其中專欄作家中不乏寫作的高手，他們的作品為讀者展示了標準的書面語，展示了美妙的中文。當然，政府公文、法律公文、司法公文的中文文本也是標準的書面語，不會帶有粵方言的色彩。其中個別的有英語的隱性影響，那大概是因為由英文翻譯成中文的。我想這種情況只要有關部門重視，以後也會有所改善。

2.6.2 標準中文與港式中文、粵式中文、中英混合文

中英混合文畢竟只佔極少數，粵式中文也不佔優勢；可以和標準中文一爭天下的就是港式中文。這就是香港社會的歷史文化、現實文化背景在語言文字生活中留下的活印記，是十分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問題。提倡規範和標準，本是不容置疑的事，但試想，如果把所有中文報刊雜誌上的港式中文，一夜之間都變成了標準中文，那似乎就不像是香港這個社會區域的文化了。這的確是一個矛盾的問題。如果一二十年以後，普通話在香港更流通了，也許標準中文流通的範圍就會擴大，港式中文的數量就會相對減少。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始終有密切的關係。

（附注：本文後附有三篇文章：粵式中文、標準中文和港式中文，可明顯看出它們之間行文的區別）

3. 香港社會的語言文字規範化問題

3.1 法律依據

香港在制定語言文字的政策方面首先要符合《基本法》，這是香港作為中國特區、作為法治社會的重要準則，制定任何政策都不例外。上文已提到，按照《基本法》的規定，中文和英文都是正式語文。關於教學語言，《基本法》第六章第一百三十六條也有明

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制度和承認學歷等政策”。

我認為，香港在制定有關的語言文字政策時，同時還應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語言文字的統一常常凝聚着民族大義，語言文字的統一、規範、標準是現代強國的重要標誌，是傳承中華民族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保證。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十九條明確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2000年10月31日經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已於2001年1月1日起施行。這是中國第一部語言文字方面的專項法律。在第一章總則的第二條裏規定：“本法所稱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普通話和規範漢字”，第三條規定“國家推廣普通話，推行規範漢字”。這是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確了普通話和規範漢字作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地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已施行了七年多，希望香港制定語言文字政策的有關部門了解和熟悉這部法律條文。儘管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在制定語言文字政策時有相當的自主權，但在一些原則問題上和國家政策步調一致只會給香港帶來好處。因為說到底，語言文字是用來交流的工具。

3.2 “兩文三語”語文教育政策的制定

3.2.1 “兩文三語”政策符合香港社會語言生活的實際及未來的願景

1997年10月香港回歸祖國初時，政府就明確提出在香港推行“兩文三語”的語文教育政策，這是十分及時的。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1997年、1998年、1999年三份施政報告和政府公布的《工作進度報告》中，都一再明確提出“兩文三語”的語文教育政策及推行這一政策的具體措施。

1997年10月，董建華特首在第一份施政報告中說：“我們的理想，是所有中學畢業生都能書寫流暢的中文、英文，並有信心用廣東話、英語和普通話與人溝通。”在1999年第三份施政報告中再次強調“特區政府的一貫宗旨，是培養兩文三語都能運用自如的人才。”近年來，行政長官曾蔭權於2006-2007年的施政報告中，亦提出“運用語文基金及其他資源，繼續致力提升社會大眾的中文（包括普通話）及英文水平”。將這一語文教育政策推廣至全社會。

可以說，“兩文三語”中對於“中文、普通話”的推廣符合“一國”的原則，對於“廣東話、英語、英文”的提倡則保留着“兩制”的特點。

從口語方面說，香港需要繼續提高英語水平，大力推廣普通話，粵語的流通應該說已達到了要求。從書面語方面說，書寫標準中文和標準英文的水平都需要再提高，港式中文流通的範圍似應適當縮小。這是從現實中看到的問題，也是願景。

3.2.2 “兩文三語”政策的實施

我在已發表的《香港中文教育政策述評》（《雲南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17-24頁）中詳細談到政府在推廣普通話、推行母語教學、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及推行簡化漢字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本文不再重複。

3.3 制定政策和尊重社區文化

3.3.1 提倡規範化、標準化和尊重社區文化

根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精神，在語言文字方面提倡規範化和標準化是既定政策。香港在推廣普通話，提高中文書面語地位方面，政策方針和實施措施都是符合《憲法》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總精神的。這是從宏觀上把香港作一個中國的特區來看的。

同時，我認為也要尊重香港這個社會區域的文化，比如，香港人對粵語作為母語的熱愛，這是好事情，方言可對標準語產生積極的影響。就是有朝一日

普通話成為香港社會的流通語言了，粵語仍可以保持目前的流通度。各地到香港的移民像現在一樣，繼續把粵語學好，融入香港社會，也是值得稱贊的事。

3.3.2 制定和推行政策的原則性和靈活性

原則性和靈活性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香港政府在這方面也有處理得很好的例證。為推廣普通話，1998年政府規定普通話科納入中小學的核心課程，這就需要大約5000多名中小學的普通話科教師，但依過去的教育制度，並未檢定普通話科教師的資格。政府從1997年起啟動教師語文能力評核標準的釐定工作，包括普通話科和英語科兩科，至2000年4月正式公布《教師語文能力等級說明及評核綱要》，2000年9月正式實施。這一政策的制定當時也受到很大的阻力，甚至有教師團體組織教師遊行反對此事。但政府堅持推行，因為沒有合格的師資，就沒有合格的課程。這就堅持了原則性。在制定《教師語文能力等級說明及評核綱要》過程中，投入了大量人力，進行了細緻的研究，因而在要求教師通過的等級規定上是完全符合香港教師現狀的，並未提出過高的等級要求。這就體現了制定政策的靈活性。這個評核試至2008年共舉行了11次，參加評核的人數共計17698人。絕大部分任教普通話科的中小學教師都已通過了評核要求，可以說，這是一個很圓滿的結果。

目前，在教學語言政策的制定特別是“以普通話教中文科”的問題上，又出現了如何處理制定政策的原則性和實施推行政策的靈活性問題。我認為，以普通話作為教學中文科應是一個既定的教學語言政策。拿一張世界地圖來看，不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就只有香港了，政府在這方面不必有任何的猶豫。當然，香港碰到實際的問題又是師資不足，那就在這方面制定靈活的實行政策，訂定實際可行的時間表。遲遲不拿出時間表，只有使更多的學生受到影響。

在香港的語言文字政策制定和推行上，還存在很多需要研究的問題，標準中文和港式中文的問題，繁

體字和簡化字的問題，各級學校教學語言（粵語、英語、普通話、混合語）的問題等等，我認為都有一個原則性和靈活性的尺度掌握問題。掌握得好，政策推行得順利；掌握得有偏差，社會語言生活會受到影響。所以理論和實踐結合的研究是至關重要的。

參考文獻：

- 1、《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7月，香港，第1版。
- 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學習讀本》，語文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 3、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編《提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印務局，2003年。
- 4、香港普通話報特稿〈十年內全面起動用普通話教中文〉，刊於《香港普通話報》2008年2月第81期（2-6頁），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出版。
- 5、田小琳〈香港回歸和推廣普通話〉，刊於《北京文史資料》第73輯（63-73頁），北京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 6、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編著《港式中文與標準中文的比較》，香港教育圖書出版公司，2006年第1版。
- 7、蘇新春著《文化語言學教程》，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 8、田小琳著《香港中文教學和普通話教學論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 9、田小琳著《現代漢語教學與研究文集》，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5月第1版。

註釋：

【註】標準中文與港式中文、粵式中文、中英混合文

港式中文

粵式中文

聽講有個地方，嗰度無嘈雜嘅聲音，只有雀仔嘅叫聲，同埋啲唔同季節裏面啲好好聽嘅風聲，嗰度無污染嘅空氣，只有花草樹木發出嘅香氣，嗰度冇無理嘅暴力，人與人之間只有和諧嘅相處，嗰度亦都無物質上嘅享受，所以人同人之間仲有嗰份純真嘅感情，其實係人都知道呢個世界上根本冇一撻咁嘅地方，但我相信有，一直都好希望能夠同女人喺呢一撻地方生活，呢個係我咁多年嚟嘅夢想。

撰文：黃麗玲（文中說，上段話原文出自梁朝偉手筆）

節錄自《獨家專訪新娘子 婚禮細節全披露》，《明報周刊》，2072期，2008年7月26日。

標準中文

聽說有個地方，那裏沒有嘈雜的聲音，只有鳥兒的叫聲，和在不同季節裏，好好聽的風聲。那裏沒有污染的空氣，只有花草樹木發出的香氣。那裏沒有無理的暴力。人與人之間只有和諧的相處，那裏也沒有物質的享受，人與人之間還有那份純真的感情。其實，每個人都知道，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這樣一個地方。但是我相信有，一直希望能夠和我的女人在這樣一個地方生活，這是我多年來的夢想。

撰文：林青霞

節錄自〈林青霞撰寫 不丹國的婚禮〉，《明報周刊》，2073期，2008年8月2日。

In and Out

In: 老愛聚成一群，關上門嘲笑他們認為Out的名人、朋友、上司和老闆，出外卻見不得大場面的人。

Out: 同上。

In: 會考狀元。

In: 排隊撲中六學位的學生和家長。

Out: 無視學生和家長在八號風球下苦等的老師和校長。

Out: 香港教育局（還是會？是署？Out到沒人記得）。

In: 去不丹結婚。

Out: 不丹皇權。整輩子沒見過明星似的，全程招待貴客，化身為maitre-d' hotel，侍者領班，還是曾志偉的好友。

In: 不丹的二十七歲親仔國王，和比他更親仔的父王。幸而陛下沒有下海娛賓，不然不丹馬上Out。

In: 生子。安祖蓮娜祖莉，以及四十歲以上仍未有仔的明星。

Out: 領養烏哩馬查兒童。大明星如安祖蓮娜祖莉和畢仔，養子養女經常曝光，全部一臉寵壞相。

In: 荷李活紅星高價把新生嬰兒照片賣給八卦雜誌。

Out: 米高積遜同他那幾個金髮白皮膚的「兒子」。

In: 聲色藝都不怎麼樣的歌星都叫做一姐一哥。

Out: 真正嗓子好不走音的歌星。

In: 嫁個有錢人。

Out: 嫁個有情郎。

撰文：林燕妮

《明報周刊》，2074期，2008年8月9日。

回歸後香港的 普通話推廣和使用狀況

The Popularization and Using Status of Chinese Mandarin in HK since 1997

◎袁 舫 / 商務印書館

◎王 輝 / 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

提要：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隨著主權的移交，香港的語言生活發生了深刻變化，“兩文三語”並存發展，成為香港社會的重要特色之一。本文試對香港回歸後普通話在香港主要應用領域（教育教學領域、公務領域、有聲傳媒領域和經貿、社會服務領域）的推廣及使用狀況作一粗略描述，同時對香港目前幾種關於普通話的公開性考試進行考察，並分析香港推普的突出特點。

關鍵詞：香港 普通話 推廣 使用

Abstract: Since 1997, the language using status in Hong Kong has changed greatly.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ignificant issues that which was called two kinds of letters and three kinds of language used in one society. In this essay, it is tried to make a description of the Mandarin's usage and popularizing in the applied fields, such as teaching, office, phonic-media, economics, and social services, and also to make a research on the several kinds of the currently used public exams and in order to make a analysis on the significant characters of popularize the Mandarin in HK.

Key words: Hong Kong, Chinese Mandarin, popularizing, usage

一 解讀“兩文三語”語文政策下的普通話

1997年之後，香港的語文政策概而言之是“兩文三語”。“兩文三語”被廣泛視為香港現行的一般性的語文政策。不過“兩文三語”並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簡稱《基本法》）中予以表述。關於法定語文，《基本法》第九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兩文三語”最初是以香港政府語文教育政策目標的面目出現的。^[註1]

1999年，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長官的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指出：“特區政府的一貫宗旨，是培養兩文三語都能應用自如的人才。”語文政策和語文教育政策本屬兩個層面的問題，但“兩文三語”提出後，因多次在各種政府公開場合宣示，所以被廣泛視為香港一般性的語文政策。僅就政策方向而言，兩者也是一致的。香港回歸後，以普通話為慣用語的人數比例雖仍不高，但能聽會講普通話的人比例增長迅速。據香港嶺南大學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1000名受訪者中54%可聽懂普通話，比兩年前上升14%；而能講普通話的人數占41%，比兩年前增加10%。^[註2]目前，推廣普通話日益成為香港政府與民間共同的目標和努力方向。今天在香港，普通話以國家通用語言的地位快速推廣，與粵方言共存並用。

二 普通話在香港主要社會領域的使用和推廣情況

1、教育教學領域

普通話在香港普遍使用，成為社會交際用語之一，根本途徑是通過切實可行的語文教育政策，在教

育領域扎實推行。“兩文三語”1997年被明確為香港教育部門的政策目標後，普通話在教育領域得到充分重視。

①中小學

普通話科1998年被正式引進中小學作為核心課程，由選修課轉為必修科目，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學生從小學就可以在學校修讀普通話。數年間，香港中小學的普通話科教學迅速發展。“2002年，據教育署統計，95.5%的中學和98.7%的小學開設普通話課程。目前，可以說九成九以上的中小學開設普通話課程”。^[註3]尤其是一些學校嘗試用普通話作為全部科目（英文科目除外）或部分科目的授課語言。據香港教育統籌局（簡稱“教統局”）統計，截至2004年8月，以普通話為授課語言的中小學已達21所。

1999年香港中文大學推出一項“用普通話教中文試驗計劃”，吸引部分中小學參與。近年來，用普通話教中文成為香港語言教育界一個討論的熱點。^[註4]2005年香港教統局局長李國章在《香港教育統籌局局長就〈施政報告〉動議辯論致辭全文》中表示：“課程發展議會早在2000年提出，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乃該議會的長遠目標，這一目標亦為語常會于2003年時所認同。”鑒于“為數不少的學校在推行此目標時面對不少困難，包括課程及教材的配合、缺乏適當的語境配合、學生的接受能力，以及學校和教師的準備等”，“我們有必要研究，如何對有意轉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學校，在各方面提供支援”。^[註5]由於政府支持，研究機構及學校積極探索，“有些教育界人士斷言，在可見的將來，普通話普遍成為中文科的教學語言，將與廣州話分庭抗禮，各顯特色。”^[註6]

②大專院校

香港政府不統一規定各大學的教學語言。香港中文大學，將普通話明確為授課語言之一，各科目分別以“C”（粵方言Cantonese）、“M”（普通話

Mandarin)、“E”(英語English)注明授課語言。該校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開設了4種教育專業普通話文憑課程,其中普通話教育文學碩士學位課程,在香港和全國都別樹一幟。

香港理工大學重視普通話教育,不僅開設注重實用的普通話課程,還要求政府資助的全日制學生于畢業前參加校內語文評核,該校聯合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和北京語言大學等單位的專家學者,設計開發了“香港普通話水平考試(PSK)”,2004年得到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的確認和香港教育主管部門的認可,香港首家孔子學院也於2006年在該校掛牌。

香港嶺南大學秉承“博雅教育”理念,將普通話納入全人教育課程體系,實用中文(含普通話)成爲該校一年級學生必修的核心課程。爲了評核和提高學生的交際能力,嶺南大學還設有中文離校試(包括口試和筆試兩部分)。據統計,截止2005年8月,該校學士學位學生參加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PSC)的人級比例達88.09%,^[註7]明顯高於普通社會人士的平均水平。目前香港8所大專院校和香港公開大學、香港樹仁大學均開設了普通話課程,大多爲選修科目。

③普通話師資

師資水平是保證教學質量的必要條件。目前香港高等院校的普通話導師,多來自內地,各中小學普通話科教師則多以粵方言爲母語,因此香港普通話科師資培訓的重點在中小學教師。香港教育學院是香港普通話教師的重要培訓基地,該學院的“小學普通話科教師在職培訓課程”和“中學普通話科教師在職培訓課程”,對香港普通話教師專業能力培養發揮了積極作用。該學院的四年全日制榮譽學士學位課程(小學)的普通話科副修課程,首次將普通話列爲教育學士課程中的一個獨立的副修科目,具有開創性意義。

對於普通話師資培訓工作,香港政府十分重視。

“1997年至1998年,有900名普通話教師獲得在職培訓。1998年至2000年兩個年度有1900名普通話教師受

訓。到目前,全港中小學普通話教師都受過不同程度的培訓。”^[註8]爲了確保教師的語文水平,2000年9月,香港政府正式推出評核中、小學語文教師能力的“語文基準”(普通話爲三個科目之一)。語文基準的實施,極大促進了普通話教師的學習積極性,按政府要求2006年所有普通話科教師都應達到標準。香港政府對於普通話教師持續專業發展也予以鼓勵和支持,普通話教師參加普通話課程和認可的公開考試可以獲得政府“持續進修基金”最高1萬港元的資助。對於普通話教師參加普通話沉浸課程和增潤課程,教統局和語常會都給予津貼。2006年語常會通過語文基金資助6家院校和機構,組織400餘位中文和普通話教師,前往內地修讀爲期4周的普通話沉浸課程,“普通話暑期沉浸課程資助計劃”自2000年啓動以來,經過幾年發展,已成爲一種頗有成效的培訓模式。

2、公務領域

在公務領域,香港政府通常以英語和粵方言召開記者會、發布消息,內部會議則以使用粵方言爲常。目前普通話在公務領域雖被定爲正式用語,但使用有限。例如2006年1月香港政府新聞網《政府的結構·立法會會議》中表述:“立法會所有會議均公開進行,讓市民旁聽。議員可用普通話、粵語或英語發言,席上提供即時傳譯服務。會議過程亦以中英文逐字記錄,載於《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內。”^[註9]在與中央政府活動相關的重大場合,或內地人士較多的場合,政府官員多以普通話作爲正式用語。香港回歸主權交接儀式以及董建華、曾蔭權兩任行政長官就職典禮均使用普通話宣誓;2002年10月29日,香港法庭首次以普通話進行庭審。^[註10]這些都彰顯出普通話在香港作爲正式工作用語的地位。普通公務人員目前有相當人數能懂會說普通話。

爲推動公務員學習普通話,香港公務員培訓處設置多層次的普通話課程,如漢語拼音、初級普通話、

中級普通話以及高級普通話證書課程；還組織編寫和製作適應公務員自修的普通話課本、影音資料和軟件。香港公務員事務局法定語文事務部為全港公務員提供網上普通話服務。為提高培訓效果，有些部門的公務人員被送往內地進行培訓。例如，自2001年9月以來，香港警務督察協會與廣東暨南大學華文學院聯合舉辦多期“香港警務人員普通話培訓班”，截至2006年5月，有超過1500名香港警察參加了培訓。^{〔註11〕}香港民政事務總署也於2005年3月與廣東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合作開展了首屆普通話課程培訓。^{〔註12〕}

3、有聲傳媒領域

普通話在香港廣播電台和電視台等傳統有聲傳媒領域，使用程度很低。香港現有的“兩家無綫電視台的普通話節目播出時間不多於總時數的5%。”^{〔註13〕}2006年5月16日，香港廣播事務局向鳳凰衛視發出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牌照，鳳凰衛視中文台以普通話為廣播語言，此次正式成為香港電視服務持牌機構之一，會對普通話在香港的傳播產生積極的影響。語常會舉辦的“普通話節2006”首度委托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製作電視節目，推廣學習普通話的經驗，有關節目在無綫電視翡翠台播出。香港電台1997年開設普通話台，這個普通話台不僅是香港目前惟一用普通話廣播的電台，而且是香港多種普通話推廣活動的重要組織者、主辦者和傳播平台。

4、經貿和社會服務領域

香港回歸祖國後，特別是2003年實施內地與港澳地區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以來，香港與內地在經貿、旅遊、教育、文化等方面合作和接觸日趨頻密。資料顯示，深港兩地目前約有30%企業屬跨境經營，至少有40萬港人在內地長期工作和生活。^{〔註14〕}隨著近年來在港中資機構的發展和香港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對內地更加開放，內地赴港

工作和就讀的人數快速增加，據《2006年在港內地專才發展年報》統計，到2005年“年均來港就讀人數已經達到5000人；2005年底，在港就讀、就業人數則達2萬人的規模，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群體。”^{〔註15〕}為了帶動香港社會經濟發展，香港政府做出多項吸引人才來港的法規和政策。自2003年7月實施“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以來，“香港在過去三年已成功吸納超過一萬一千名內地人才。”^{〔註16〕}為了拉動香港經濟，鼓勵內地旅客訪港，香港2003年7月開始實施“個人游”政策，到2007年元旦，香港開放內地個人游的城市增至49個，^{〔註17〕}內地訪港游客僅2006前8個月，就達926萬人次。^{〔註18〕}內地目前已成為香港最大的旅客客源地，內地旅客已超過香港總旅客的五成。香港經貿和社會服務領域，主動適應這種變化。例如，香港旅遊業議會，開設導遊及領隊實用普通話課程、旅行社營運人員實用普通話課程等，作為技能提升計劃的組成部分。香港地鐵從2003年9月底開始在車站和車廂增加普通話廣播，並加強對一綫員工的普通話訓練，地鐵公司還聘用受過普通話專門訓練的“普通話大使”為內地游客提供服務。香港三大巴士公司之一的九巴公司使用普通話報站名，深受內地旅客歡迎，該公司還向司機派發普通話自學光碟。香港國際機場、香港迪士尼、香港電訊、匯豐銀行等，都開設有普通話服務項目。普通話在香港經貿和公共服務領域使用的廣度快速拓展，應用水平迅速提高，正逐漸成為某些公司、企業特別是零售、酒店、旅遊等行業員工的從業要求之一。

三 香港的普通話考試

考試在教育評價和人才評估方面有特殊作用，香港歷來重視考試評估在教育教學領域和人才質量認證方面的意義。香港目前關於普通話的考試，除了作為教育考試的中學會考外，主要有香港考試評核局的

“普通話水平測試”和“普通話高級水平測試”，“教師語文能力（普通話科）評核”和國家語委的“普通話水平測試”（PSC）等。

2000年香港舉行了首屆普通話會考。鑒於1998年就讀小學一年級的學生將於2007年完成中三課程，語常會於2003年要求香港考評局修改中學會考的普通話考試。2003年語常會發布《提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按此提議，2007年將推行統一考試，評定學生經過九年基礎教育階段的普通話學習後所達到的普通話能力等級。“普通話水平測試”和“普通話高級水平測試”由香港考試評核局主持，其測試對象是香港普通市民。該項測試歷史較長，目前有越來越多的市民參加該考試。香港政府1997年提出為初中的英語教師、普通話教師以及用中文授課的小學教師制定語文基準考核，2000年4月正式發布了《教師語文能力等級說明及評核綱要》，有關普通話科的文件指出：“設立教師語文（普通話）能力等級，旨在提供一個客觀機制，以衡量中、小學普通話教師教授該科的語文能力”，同年9月，“教師語文能力（普通話科）評核”正式實施。2006年普通話科教師基準評核工作已經完成，有學者建議“這個語文評核試在總結並修訂後，應當繼續保留下來，作為一個常規考試”。^[註19]

國家語委主持的“普通話水平測試”（PSC），作為一項服務性語言測試，1996年開始引入香港。在國家語委幫助下，香港已有9家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嶺南大學、香港教育學院、香港樹仁大學、香港公開大學）設立測試機構，開展普通話水平測試。普通話水平測試在香港測試對象範圍較廣，既有教師等專業人士，也有普通市民。該項測試適應了香港學習普通話的社會需求和人才市場客觀評價需要，也使自身得到穩定增長和持續發展。2004年以來，年均參加人數超過6000人次，呈“高台運行”態勢。截至2006年底，參加普通話水平測試的香港人士

已達35242人次。目前，普通話水平測試已經成為目前香港參加人數最多的普通話考試之一，有較大的社會知曉度且廣受社會以及專業領域認可，成為政府持續進修基金、“教師語文能力（普通話科）評核”等所認可的權威測試。在香港，普通話水平測試還有力促進了當地普通話的培訓和教學。從“超考試效度”（超出考試本身的效度）上講，普通話水平測試具有良好的“反饋效度”（教學反饋）。除了各合作方的培訓以外，香港社會多家民營培訓機構，將《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的內容納入了培訓課程。

四 香港推廣普通話的突出特點

1、社會推普有聲有色

香港推廣普通話的主要原動力來自社會民間，香港有多家普通話推廣和培訓機構，其中不少是政府註冊的非牟利機構。例如創辦於1976年的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秉承“天下華人是一家，人人都說普通話”的信念，30年來（至2006年）共開辦了16700個班，培訓學員達301500人次。^[註20]該社2001年還開辦了以普通話為主要教學語言和校園語言的“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把該社的推普宗旨落實到小學基礎教育層面。香港民間推廣普通話機構的普通話課程提倡多元化，教法靈活，注重實用。課程之外，普通話推廣的聯誼活動也豐富多彩，兼顧教育性與趣味性，與香港流行的綜藝性都市文化以及商業文化緊密配合，具有鮮明的特色。例如，由香港電台普通話台2001年倡議發起的“香港推廣普通話大聯盟”，集結了全港推廣普通話團體（2002年成員數目已超過150個）。該聯盟2001年主辦了大型推普活動——“普通話日”；2002年語常會開始參與主辦，活動拓展為“普通話月”；2003年開始，發展成為規模更大“普通話節”。到2006年，“普通話節”已成功舉辦4屆，推出大型活動40多項，總參與人數逾28萬人次。^[註21]

“普通話節”通過多項大型活動，營造講普通話的社會環境和氛圍，並把推廣普通話信息傳播到社會不同角落。“普通話節”還把社會與學校聯繫起來，多所學校成爲“大聯盟”成員，“普通話節”特爲學生和教師設立多項活動，例如“普通話節2006”設立的“‘學生普通話廣播訓練班’廣播比賽暨嘉年華”“新人類移動大舞台”“普通話青年領袖思辨交流營”“2006大專普通話辯論賽”“粵港澳普通話大賽”“普通話戲劇講座”“普通話戲劇工作坊”“‘學生學校獎’頒獎禮暨分享會”等活動，深受學生和教師歡迎。歷屆“普通話節”活動邀請陳曉東、梁詠琪、李克勤、楊千嬅等知名藝人擔任普通話節大使；而且組織上千家商鋪參與“普通話購物優惠計劃”活動。“普通話節”已成爲香港至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2003年爲期2個月，2006年發展爲逾3個月）、組織最完整的推廣普通話活動，目前也正發展成爲香港一項長期的語文活動。

2、政府推普穩健務實

在1997年回歸祖國後，香港特區政府采取了穩健務實的方式支持推廣普通話。一方面政府特別重視語言教育，在語言教育政策上，通過“兩文三語”的政策目標，明確普通話的語言地位；另一方面積極投放資源，通過設立語文基金和持續教育基金、優質教育基金等方式，對普通話教育和推廣活動予以切實的支持。香港推廣普通話未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而是政府乘主權回歸和經貿發展之大勢，因應社會各階層民衆學習普通話之熱潮，以含蓄穩健的方式推動。香港政府在語言政策決策與建制安排上也富有特點，在政府內部設有教統局統籌語文教育政策，另外于1996年設立語常會，作爲政策諮詢機構。語常會經費由政府負責，成員多爲民間社會賢達人士，其主要職責是向政府提供語文政策意見，並負責管理語文基金。據統計，截止2006年8月15日，僅語文基金資助的

“普通話”和“中文及普通話”計劃項目就達54個，撥款額7770萬元。^{〔註22〕}近年來語常會參與主辦的“普通話節”，架起了政府和傳媒界、教育界、商界合力推廣普通話的橋梁。香港政府的推普方式，“有爲”“穩健”“務實”，符合香港的特點和語言狀況。

3、民間看重實用價值

無論社會還是政府，在香港推廣普通話都必須正視民衆的語言態度。香港民衆以實用性和經濟視角衡量語言，注重實際，學習語言的價值取向上，經濟的考量遠在政治和語言本身之上。以前學習英語如此，現在香港民衆把學習和推廣普通話當作一種商機和個人增值途徑。匯豐銀行總經理柯清輝在出席香港第一屆“普通話日”開幕禮時稱：“在本地培訓香港人講普通話肯定是最有價值的投資項目之一”。^{〔註23〕}

普通話在香港商界已上升至“招財用語”的地位，不少公司爲員工包班提供普通話培訓。據《香港青年》一份調查顯示，27%的受訪者選擇以普通話作爲最想學習的項目，列青年人最想學習10大項目之首。^{〔註24〕}學習和推廣普通話已經成爲香港的民生需求，普通話的價值，促使民衆、社會和政府都樂意把更多資源投放在普通話的教育與推廣上。

綜觀1997年之後香港的語文生活，“兩文三語”並存發展，已成爲香港社會的重要特色之一，推廣和使用普通話已經成爲香港社會發展的需要，普通話在香港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和發展空間。

註釋

【註1】見香港教育署，《中學教學語言指引》，1997年9月。

【註2】董會峰《港人普通話水平提高》，《人民日報》2002年10月16日。

【註3】【註18】【註19】田小琳《香港中文教育政策述評》，《北京觀察》2006年第8期。

【註4】【註6】何偉杰、林建平《方言或標準語——中學生的態度和取向》，<http://www.fed.cuhk.edu.hk/pth/research.Php>

【註5】2005年10月27日《香港教育統籌局局長就〈施政報告〉動議辯論致辭全文》。資料來源：香港政府新聞網<http://sc.info.gov.hk/gb/www.info.gov.hk/gia/genergl/200510/27/P200510270249.htm>

【註7】田小琳《普通話水平測試在香港嶺南大學》，《華文世界》（台北）總97期，2006年5月。

【註9】見香港政府新聞網：<http://sc.info.gov.hk/gb/www.info.gov.hk/gia/genergl/200510/27/P200510270249.htm>

【註10】《香港法庭首次以普通話審案 盤問時間長達40分鐘》，新華網：http://news3.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0/30/content_613230.htm

【註11】見暨南大學華文學院網站，<http://hwy.jnu.edu.cn/publish/funonews.asp?id=216>

【註12】見光明網：http://www.gmw.cn/01gmr/2005-03-29/content_205424.htm

【註13】《香港語言狀況與語言政策》，《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5）上編》，商務印書館，2006。

【註14】《就業舞台連深港 英才天地寬廣了》，《深圳特區報》2006年7月1日。

【註15】《香港吸引人才 內地學子達2萬——〈2006年在港內地專才發展年報〉問世》，人民網<http://edu.people.com.cn/GB/1053/4670996.html>

【註16】《過去三年香港已成功吸引逾一萬一千名內地人才》，援引自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2006至2007年施政報告《以民為本務實進取》。見中國新聞網2006年10月11日。<http://www.chinanews.com.cn/ga/gaynd/news/2006/10-11/802719.Shtml>

【註17】《內地居民訪港“個人游”計劃07年再擴至5省會城市》，中國新聞網2006年10月11日。<http://www.chinanews.com.cn/ga/gaynd/news/2006/10-11/802654.shtml>

【註18】《今年前8月訪港旅客超過1670萬 已達全年目標60%》，中國新聞網2006年9月26日。<http://www.chinanews.com.cn/ga/kjww/news/2006/09-26/796111.Shtml>

【註19】見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網站，[Http://mandarin.edu.hk/index.php?module=abc&type=admin&operation=show&topic=directors%20words](http://mandarin.edu.hk/index.php?module=abc&type=admin&operation=show&topic=directors%20words)

【註21】見香港政府新聞網，<http://sc.info.gov.hk/gb/news.gov.hk/tc/category/atschool/060922/html>

【註22】見http://cdl.emb.hkedcity.net/cd/scolar/html/projects_cn.htm

【註23】《董建華籲港人學好普通話迎世貿商機》，大洋網，http://www.dayoo.com/2001-09/14/content_219670.htm

【註24】《青年增值最愛學普通話 希望改進語文抓緊中港商機》，《蘋果日報》2006年6月19日。

參考文獻：

[1] 何國祥.《香港世紀之交的普通話教育》[M], 香港: 香港教育學院出版, 2001.

[2] 何國祥.《“市場主導”政策下香港試用普通話教中文的情況》[A].首屆港澳地區普通話水平測試及教學學術研討會論文, 2004年4月.

[3] 李學銘.《母語、教學語言及一些相關問題》[A].李學銘.《中國語文教學的現況與發展——李學銘語文教育論文集》[C].香港: 學思出版社, 2003.

[4] 黎歐陽汝穎.《為香港的普通話科教學定位》[A].香港教育署《集思廣益: 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普通話科課程》[C], 1997.

[5] 楊聰榮.《香港的語言問題與語言政策——兼談香港語文政策對客語族群的影響》, 資料來源: <http://mail.tku.edu.Tw/cfshih/ln/paper02.htm>

普通話語音教學 與測試中的若干問題^[註1]

Issues on teaching and testing aspects Of Chinese Mandarin pronunciation

◎孫海娜 / 國家語委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

提要：本文針對普通話教學及水平測試中常見的問題，主要從教學方法討論部分普通話語音的相關知識，以期在教學中進行有目的的訓練，從而提高學習者、應試人的語音準確度，並為普通話水平測試員的評分提供一些參考意見。

關鍵詞：語音知識 語音準確度 語音測試

Abstract: In this essay, having focused on the problems that frequently appeared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process and level-based testing, it is discussed ab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Mandarin phonetic system mainly at the angle of teaching methods. It is hoped that motive training can be hold in teaching process to raise the veracity of the testee' s pronunciation, and can also give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tester of PSC on the valuation.

Key words: knowledge of phonetic system, veracity of pronunciation, testing of pronunciation

1、引言

語音知識貫穿於教學示範及聽音、辨音的全過程，對於指導他人準確地習得一種語言的語音是不可或缺。對漢語普通話聲母、韻母知識的掌握和運用是漢語語音教學者的基本功。

在普通話水平測試（PUTONGHUA SHUIPING CESHI，以下簡稱PSC）中，“讀音‘錯誤’原則上是指普通話語音（音位）系統中，把一個音（音位）誤讀作另一個音（音位）。……語音‘缺陷’概括地說是指發音沒有完全達到標準程度的情況。……‘缺陷’還包括一些在語音學可以區分描寫，而在普通話語音（音位）系統中不構成對立的語音現象”^[1]。語音學、音位學的知識同樣是PSC中評判語音正誤的理論基礎。

本文將針對普通話教學及水平測試中常見的問題，側重於教學方法，討論部分普通話的輔音、元音相關知識，以期在教學中進行有目的的訓練，從而提高學習者、應試人的語音準確度，並為普通話水平測試員的評分提供一些參考意見。

2、關於普通話輔音的幾個問題

關於普通話輔音，須從調音部位、調音方式、發聲和氣流機制等方面綜合來談才是全面的。本文僅以調音部位為例，探討如下問題：

2.1、關於調音部位的劃分和命名

認識調音部位是普通話輔音教學的基礎課。我們以j組聲母為例，來看看目前較普遍的描述：“舌面前部和硬腭前部構成阻礙。”^[2]“舌面前部向齒齦和前硬腭的部位抬上去，舌尖不妨抵著下齒背。”^[3]“發

音時，舌面前部抵住前硬腭。”^[4]“舌尖抵下門齒背，前舌面緊貼前硬腭。”^[5]以上闡述中，對非主動調音器官——上腭成阻點的描述有“前硬腭”“硬腭前部”和“齒齦和前硬腭的部位”，對主動器官的描述為“前舌面”“舌面前部”，我們的問題是，“前硬腭”和“硬腭前部”是相同的部位嗎？“齒齦和前硬腭的部位”具體指哪里？“前舌面”與“舌面前部”有區別嗎？語音學上，對輔音是以主動發音器官（舌頭）-被動發音器官（上腭）的方式來定義的，具體的教學更需要把實際部位說清楚，這樣就需要我們再次來認識一下它們。

2.1.1、主動調音器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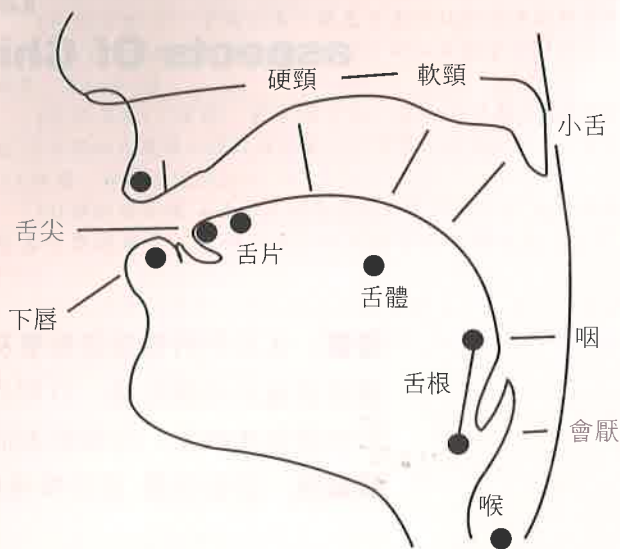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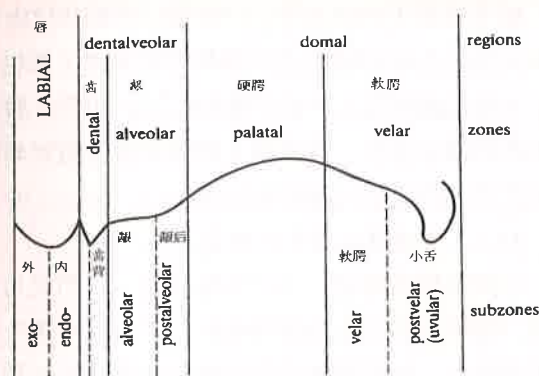


圖1：主動調音器官，據Ladefoged & Maddieson (1996:14)^[6]

根據Ladefoged & Maddieson (1996)，舌頭分四部分：舌尖、舌片^[6]、舌體、舌根。朱曉農（2006）對此進行了較明確的闡釋，“舌尖定義為從舌沿（舌頭最前的邊緣帶）開始，往上往後2-3個毫米的一小片地方。舌尖後面是舌片。舌片的定義較為複雜。當我們合上嘴巴，舌尖頂到下齒背時，從上面齶脊的中點往下投影，在舌頭上留下一個投影點。通過此點畫一條橫綫，然後從這橫綫往前、往後都拓展2-3毫米，

這樣一條大約5毫米的橫帶就是舌片。舌體是舌片往後的水平部位，與硬顎、軟顎、小舌走向一致。舌體分前後兩部分，再細點可把舌體後部分為‘中舌體’和‘後舌體’。舌根則是垂直的部位，大體與咽壁平行。此外，在舌沿的下面是舌下部。這個部位有人叫下舌尖 sub-apical，有人叫下舌片 sub-laminal，兩者功能無區別。”^[1]

2.1.2、被動調音器官



Upper articulatory locations

圖2：被動調音器官，據Donald and Paul, 1977^[1]

圖2對上腭的劃分是較理想的。此外還需注意幾點，1、上齒以齒沿為分界，向後為上齒背。2、齒到硬腭之間的一段區域被劃分為“齶（alveolar）”“齶後（postalveolar）”兩段，曲拱最明顯處是它們的分界，稱“齶脊（alveolar ridge）”。齒到齶脊之間稱“齶”。齶脊到硬腭稱“齶後”。3、齶後與硬腭前端（前腭）交界處有一條較細的稜，它是齶後與硬腭的分界線，這條稜在口腔中的明顯程度是因人而異的，以它為界進入硬腭區，上腭的表皮變得平滑了。我們這裏姑且稱之為“齶腭綫”，取其齶後、硬腭分界綫之義。

2.2、普通話三組輔音聲母調音部位的教學與測試

據毛世楨（2001）^[1]以音位負載的角度對普通話

聲、韻、調進行的統計，j組、zh組（r不計在內）是在語料中出現頻度較高的聲母，應作為普通話教學重點。同時，教學和測試實踐顯示，z組聲母與前述兩組聲母由於調音部位接近，加之學習者母語方言的干擾，較易出現相互混淆、影響的情況，同為普通話教學難點。我們這裏據語音學中輔音調音器官的定義方法，將要討論的三組普通話聲母加以定義：j、q、x——舌片-齶腭音；zh、ch、sh——舌尖-齶後音；z、c、s——舌尖-齒音。

2.2.1、舌片-齶腭音^[1] j [ɹ̥], q [tɕʰ], x [ɕ]

發這一組聲母時，要求舌尖抵住下齒背，舌片接觸或接近齶後及齶腭綫。

從普通話拼音規律來看，j、q、x只與齊齒呼、撮口呼韻母相拼，而這兩組韻母開頭字母i[i]、ü[y]發音時，均要求舌尖抵住下齒背，因此完全可以明確要求學習者舌尖抵住下齒背，這樣更利於音節的拼合及音位區分。

舌片的定義這裏不再贅述，在教學中，還可以借助單元音i[i]（這個音是基本元音，所有學習者都應該能夠發出來）來找。具體方法是，1、持續發i，同時體會舌體的前部兩側緊貼齶後及白齒兩側，舌面中縫綫部分的凹陷，氣流通過；2、調音結束時，將緊貼齶後及白齒兩側的部分所對應的舌中間凹陷處自然填補（注意是舌面前部填補凹陷、緊貼齶後和齶腭綫，舌體不要貼上去，要繼續保持舌中後部與上腭的較大空間）。此時與齶後和齶腭綫緊貼的窄面即為“舌片”。

j組聲母較易產生的問題是被動或主動成阻部位偏前。造成偏前的原因是，舌片前部與上齒齶過於接近，構成了阻礙。這種情況下發音多帶有“尖音色彩”，在PSC中判定為“缺陷”。而當舌尖與上齒背構成阻礙時就發出了另一組聲母zcs，在普通話音位系統中將A音位讀作B音位，要判定為“錯誤”。教學時，需強調舌尖至舌片間部分一定不能與上齒背、上

齒齦成阻。糾正方法包括舌尖深埋於下齒齦、用力抵住，舌邊用力撐住齦後的兩側，全力體會發*i*時舌的著力點；上下齒扣攏，舌尖遠離上齒背等。總的來說，舌尖至舌片間部分與上齒背、上齒齦的空間感最重要，教學者應視偏誤產生的具體原因選擇糾正方法。

*j*組聲母可能產生的偏誤還有主動或被動調音部位偏後，變成爲舌體或前硬腭（離開齦後，甚至未接觸齦腭綫）成阻，發成了舌面-硬腭音，這種情況在PSC中可視爲“缺陷”。

2.2.2、舌尖-齦後音^[12] zh [tʃ]、ch [tʃʰ]、sh [ʃ]

發這一組聲母時，要求舌體後縮，舌前部上舉，舌尖接觸或接近齦後。

舌如不後縮，想要與齦後接觸，非卷不可。這組音已經被實驗語音學證實是不卷舌的^[13]，因此教學中尤要強調“後縮”這個先決條件。後縮後舌前部上舉，舌邊與上腭兩邊從犬齒到第一臼齒有接觸^[14]。這種接觸，是用來支撐舌頭這個海綿體向上“翹起”的，沒有這個支撐，舌的中縫綫不能保持挺直。

這組聲母較易產生的問題主要有，1、被動成阻部位偏前或偏後。偏前，多指舌尖接觸齦脊甚至齒齦，“翹”度不够。只有舌體整體傾斜才稱“翹”，而非單純舌尖抬起。偏後，是指舌體過於後縮，舌尖觸不到齦後，只能與硬腭前部成阻；2、發成了捲舌音或帶有了捲舌色彩，即舌體後縮不够，舌尖只能卷起與齦後成阻；3、發此音時嘴角緊張，也會引起色彩變化。以上在PSC中均劃入“缺陷”列。

2.2.3、舌尖-齒音^[15] z [ts]、c [tsʰ]、s [s]

發這一組聲母時，要求舌尖抵上齒背或下齒背，舌尖或稍後部位與上齒背構成阻礙。

要點是與上齒背構成阻礙，而不是舌尖抵在哪裏。舌尖抵上齒背或下齒背，在聽感上音色相當。實際發音中舌尖抵在下齒背的人不在少數。

易出現的問題是被動成阻部位偏前，即舌尖與上

下齒同時構成阻礙，發成了齒間音 [tθ]、[tθʰ]、[θ]。這種情況，雖然在語音學可以區分描寫，但在普通話語音（音位）系統中不會構成對立，PSC視爲“缺陷”。

3、關於普通話元音音位的幾個問題

3.1、普通話舌面元音的教學

據李愛軍（2003）^[16]，“中度口音的10位上海人和10位北京人的9個單元音在聲學元音圖上位置也有差異，上海普通話的元音圖更邊緣化”，可見，發音帶有方音的標志之一，是舌面元音的發音位置欠準確。這裏我們主要就這一問題進行討論。

3.1.1、普通話元音舌位的前、央、後

舌頭是個海綿體，可以伸縮移動，我們說舌位的前後，指舌頭在口腔位置的前後，但是舌根這一頭始終是固定的。因此判斷舌位前後的指標一定不是指整個舌頭，而是舌頭非固定的一端——舌尖在舌體前伸後縮時所到達的位置。因此，需要向學習者解釋的問題就是，前伸伸到哪？後縮縮到哪？懸在口腔中還是有所依托？

常見著述作對舌面元音的舌尖位置有“舌後縮”“微離下齒背”“微離下齒齦”等說法，其實這“微離”並不是舌尖“無依無靠”懸空在口腔，而是頗有講究的。

孫修章（1988）提出發eng、ng時“將舌尖緊緊抵到下牙床靠下有筋疙瘩的地方，控制舌尖不動，然後讓舌根抬起來。”^[17]“發ng要張開嘴，把舌根頂上去，舌頭必須往後縮，舌尖不要懸著，要抵在下牙床下面有筋疙瘩的地方。”^[18]石鋒（1993）提出“對於前元音，要求發音時舌尖的位置必須在下齒背上；發後元音時，舌尖要接觸到舌背面和口底相接處的肉質凸起——舌蒂；央元音的發音要求舌尖放在下齒背和舌蒂之間的下齒齦的位置上”，^[19]進一步明確了元音

發音時舌尖的位置^[21]。除了舌尖指向目標區域，舌面同時要儘量保持平展也是一個重要指標，否則“近腭點”就會改變（例如舌面拱起），即使舌尖擺在目標位置，音色也會出現偏誤。教學實踐也表明，舌面元音的“前、央、後”的教學，使用這一套方法，使得學習者發音時有法可依，便於自我矯正，是最有效的。

3.1.2、普通話元音舌位的高、中、低

關於元音舌位的高低問題，目前共有二級、三級、四級、五級、七級5種高度模式。這裏傾向於更精細的描寫。參照B.Bloch和G.L.Trager（1942）提出的七級高度的元音舌位圖，將普通話語音系統中的舌面元音標示其中（捲舌元音和兩個舌尖元音[ʮ、ʮ]不在此列）：

FRONT		CENTRAL		BACK	
Unr.	Rounded	Unr.	Rounded	Unr.	Rounded
High	i	y			u
Lower-high	I				U
Higher-mid	e			ɤ	o
Mean-mid	E		□		
Lower-mid	ɛ				
Higher-low	æ				
Low	a		A		ɑ

圖3：普通話舌面元音舌位圖，據B.Bloch和G.L.Trager 1942^[21]

另外，舌位的高低與口腔開度密切相關。有學者指出，上下頷的開度應該指上下齒的距離^[22]。筆者認為，打開口腔，下頷後部也要有開度。當然，由於生理因素，開度是前大後小，但下頷整體打開於低音音和後元音的發音是十分有利的。

3.1.3、普通話元音唇型的圓和展

唇型的圓展，教學中要把握兩點：1、圓不圓，看嘴角。只有嘴角收緊、豎起來，才叫圓唇；嘴角拉開，才是展唇。2、[y]的唇型是撮唇、攏唇，外唇部

肌肉向中間撮攏，唇呈扁圓形。學習者通過輔助工具（如小鏡子）進行自我對照，較易掌握。

3.2、普通話/a/、/e/音位及其變體的教學與測試

3.2.1、普通話的/a/音位及其變體（標示如圖4）

普通話/a/音位包括如下變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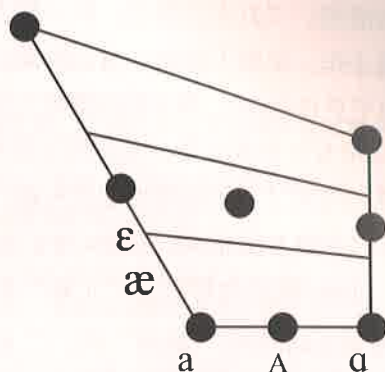


圖4：普通話a音位舌位圖

央低不圓唇元音 [A]（a ia ua）

後低不圓唇元音 [ɑ]（ao iao ang iang uang）

前低不圓唇元音 [a]（ai uai an uan）

前次低不圓唇元音 [æ]（ü an）

前中低不圓唇元音 [ɾ]（ian(yan)）

教學時，通常以[A]來定位，舌尖抵下齒齦，舌體平展，口大開。發好[A]後，舌體向下傾斜，舌尖下移抵舌蒂，其餘條件不變，即可發出[ɑ]；舌體向上傾斜，將舌尖移至下齒背，其餘條件不變，發音為[a]。

再以[a]定位，舌尖保持在下齒背位置，舌體平展，口由大開合攏為較開，即為[æ]。同樣條件下，再次合口，注意保持展唇，發[ɾ]音。

以上是/a/音位及其變體的發音方法，在實際口語中，單獨出現的只有[A]，因此不要求學習者單獨掌握其他變體的發音。但教學者在韻母發音教學中應該將不同變體示範并加以比較，訓練學習者從聽覺感知

以及實際操作中區分出不同的音位變體。

在PSC中，將同一音位的一個變體讀作另一個變體，如將[A]讀作[a]，視為“語音缺陷”。

要提出來的是ian和ü an的音位問題。一些著述將二者描寫為同一變體[æ]^[23]，但實際情況較為複雜。王福堂（1995）^[24]、葉軍（1997）注意到ü an為[yæn]，而ian為[iɛn]的情形：“五六十年代，開口度大的情況較多，但近幾十年，年輕人念ian、ü an時開口度普遍較小，韻腹似乎更接近/e/，如果開口度較大念得接近/a/，會被認為帶有土音或方音。ü an開口度大了還可接受，而ian開口度大了，可接受性要差一些。”^[25]這一認識與PSC的處理方法相同，在PSC中，如果將ü an發作[yæn]、[yɛn]應該說都是在“正確”的範圍內的。而將ian發為[iæn]則按“缺陷”判，二者若發為[yæn]、[ian]，則同為“缺陷”。筆者體會，由於ü an的a受韻頭是圓唇元音的影響，確實較ian的a更低一點，將ü an描寫為[yæn]、ian描寫為[iɛn]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同時，在上聲和去聲的條件下，受聲調影響，二個韻母中a的開口度均會比平聲時略大。

3.2.2、普通話的/e/音位及其變體（標示如圖5）

普通話/e/音位包括以下變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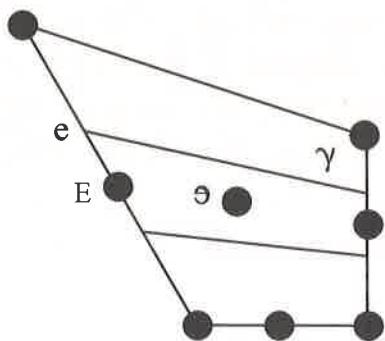


圖5：普通話e音位舌位圖

央不圓唇元音 [r] (en、uen、er[26])

後中高不圓唇元音 [ɣ] (eng、ueng)

前中元音 [E] (ei、uei)

前中高不圓唇元音 [e] (ie、üe)

教學時以[r]定位，舌尖輕觸下齒齦，口腔自然打開，舌面平展。發好[r]後，舌體向下傾斜，舌尖下移抵舌蒂，口微合，舌面平展保持不變，發音為[ɣ]。

回到[r]，舌體向上傾斜，舌尖上移抵下齒背，其餘條件不變，發音為[E]。之後舌尖、舌面保持不變，口微合，發[e]音。

/E/音位及其變體的發音需注意：1、[r]為央元音，舌位可形容為不高不底、不前不後。舌體較放鬆，但同時須注意舌根要稍拉緊，控制舌體不要前涌，否則舌尖可能接觸上齒背而發為前元音。2、普通話中的單元音[ɣ]發音時，口腔器官并不是完全不動的，有一個舌根輕微隆起-下降的過程。

4、餘論

本文所討論的，僅僅是普通話教學、測試中的部分問題，對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產生的偏誤，能否判斷準確、用一些有效的方法糾正，恐怕還有賴於教學者的聽音、辨音的能力。相對而言，普通話水平測試員的聽音、辨音的能力就更重要。針對不同方言區、不同母語的學習者，將其母語的音位系統與普通話音位系統進行對比分析，使得教學更具有針對性，是教學者更進一步要下的功夫。

至於理論知識要教到哪個層面，就要看產生偏誤的原因以及學習者的實際情況，例如他們的接受、理解能力等。年紀小或接受程度低的學生，也許只要告訴他們某個音舌尖的擺放位置就可以了，而成人，尤其是師範學校語言專業的學生，相對系統的教學就是必要的。

最後要提出的是，語音教學除了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知識外，還應使語音學習具有自我調校性。“口

耳之學”中，口和耳同樣是重要的。這不單指教學者的口和耳，學習者的也一樣。目前的教學方法重視生理發音特徵，還應同時強調聽覺感知，即學習者對語音的自我感知、自我調校，因為在“言語鏈”中“口”與“耳”本身就是緊密相連、不可分割的。

註釋：

[註1] 本文承朱曉農教授、王輝副教授提出寶貴意見，謹致謝忱。本文曾參加第八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略有改動。

[1] 宋欣橋，普通話水平測試員實用手冊，212頁，商務印書館，2004

[2] 林焱、王理嘉，語音學教程，6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3] 羅常培、王均，普通語音學綱要，104頁，商務印書館，2002

[4] 吳金娥等，國音及語言運用，101頁，三民書局，2003

[5] 宋欣橋，普通話語音訓練教程，84頁，商務印書館，2004

[5] 轉引自朱曉農，關於中文語音學術語的幾點看法，第七屆中國語音學學術會議，2006

[6] “blade”，也有翻譯為“舌葉”的，但是由於目前對“舌葉”的定義紛雜不一，本文採用朱曉農的翻譯——“舌片”。

[7] 朱曉農，關於中文語音學術語的幾點看法，第七屆中國語音學學術會議，2006

[8] 本圖經筆者稍作修改。

[9] 毛世楨 施雲，漢語普通話的音位負載，新世紀的現代語音學——第五屆全國現代語音學學術會議論文集，2001

[11] 又稱舌面前音。

[12] 又稱舌尖後音。[13] 周殿福、吳宗濟，普通話發音圖譜，商務印書館，1963

[14] 同上。

[15] 又稱舌尖前音。

[16] 李愛軍等，漢語普通話和地方普通話的對比研究，第六屆全國現代語音學學術會議論文集（上），68頁，2003

[17] 孫修章，小學漢語拼音教學輔導，58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18] 孫修章，小學漢語拼音教學輔導，60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19] 石鋒，元音定位發音法概述，語言學通訊，1993，3-4

[20] 孫稱“筋疙瘩”即石所稱的“舌蒂”。

[21] Bloch.B., Trager, G.L., Outline of Linguistic Analysis, LSA, 1942. 這裏僅列出相關的普通話元音。

[22] 馮蒸，國際音標元音舌位圖中與舌位高低有關的幾個問題，外語教學與研究，1995.2

[23] 宋欣橋，普通話語音訓練教程，163-164頁，商務印書館，2004

[24] 王福堂，ü an韻母主要元音的音值，語文建設，1995

[25] 葉軍，《漢語拼音方案》在對外漢語教學使用中的一些問題，語文建設，1997.8

[26] 捲舌元音[ʁ]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參考文獻：

1. Bloch.B., Trager, G.L., Outline of Linguistic Analysis, LSA, 1942
2. 鮑懷翹，普通話單元音分類的生理解釋，中國語文，1984
3. 馮蒸，國際音標元音舌位圖中與舌位高低有關的幾個問題，外語教學與研究，1995.2
4. 李愛軍等，漢語普通話和地方普通話的對比研究，第六屆全國現代語音學學術會議論文集（上），2003
5. 李明，音位學在語音教學中的作用，語言教學與研究，1982
6. 林焱、王理嘉，語音學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7. 羅常培、王均，普通語音學綱要，商務印書館，2002
8. 麥耘，對國際音標理解和使用的幾個問題，方言，2005-2
9. 毛世楨等，漢語普通話的音位負載，新世紀的現代語音學——第五屆全國現代語音學學術會議論文集，2001
10. 石鋒，元音定位發音法概述，語言學通訊，1993
11. 宋欣橋，普通話水平測試員實用手冊，商務印書館，2004
12. 宋欣橋，普通話語音訓練教程，商務印書館，2004
13. 孫修章，小學漢語拼音教學輔導，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14. 王福堂，ü an韻母主要元音的音值；語文建設，1995
15. 王理嘉，漢語拼音運動與漢民族標準語，語文出版社，2003
16. 王理嘉，音系學基礎，語文出版社，1991
17. 吳金娥等，國音及語言運用，三民書局，2003
18. 顏森，音位問題與語音教學，江西師範大學學報，1999
19. 葉軍，《漢語拼音方案》在對外漢語教學使用中的一些問題，語文建設，1997.8
20. 游汝傑等，論普通話的音位系統，中國語文，1980
21. 趙元任，音位標音法的多能性，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2
22. 周殿福、吳宗濟，普通話發音圖譜，商務印書館，1963
23. 朱曉農，關於中文語音學術語的幾點看法，第七屆中國語音學學術會議，2006

Labial-labial Co-occurrence Constraint in Cantonese

漢語廣州方言唇音特徵共現限制現象研究

©Hongming Zhang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Nankai University

©張洪明 /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 / 中國南開大學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henomenon of labial-labial co-occurrence constraint in Cantonese, which is a long outstanding problem. The author tries to view the topic and reach a solution in a framework of the feature geometry theory. A new hypothesis is proposed here. If the trigger element is the primary feature, the redundancy rule will be applied after creating onsets and before creating codas; and the OCP is effective before the rule application. If it is the secondary feature, the redundancy rule should be applied after creating codas, and the OCP is effective after the rule application. The feature nodes in different tiers may have the different phonological behaviors, either by the difference in the order of the rule application or in the effect of the OCP. Supporting evidence for this hypothesis is not from Cantonese only, but also from some other non-Chinese languages.

Key words: co-occurrence constraint, 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 (OCP), syllable-structure building rules, redundancy rule, order of rule application, primary feature, secondary feature, feature geometry theory, tiers, feature node

提要：很多學者都曾經研究過漢語廣州方言唇音特徵共現限制現象，但遺留問題仍然不少。本文通過對該方言中唇音特徵共現現象的全面考察，分析了它的構造音節起始規則、收尾規則、冗餘規則等，區分首要發音特徵層次和第二發音特徵層次，運用幾何特徵樹理論，揭示不同層次特徵節上的不同語音行為，證明這些不同行為或表現在規則運用的次序上，或表現在對音形限制原則的不同反映上，或表現在不同的同化方向上，從而解決了廣州方言唇音特徵共現限制中一些困惑已久的問題。本文對漢語廣州方言所作的有關分析，還得到了來自非漢語語言的支援，例如澳洲 Warlpiri 語言中的唇音和圓母音的和諧現象以及非洲 Yoruba 語言中的母音和鼻音同化現象。

關鍵詞：共現限制 音形限制原則 音節結構構造規則 冗餘規則 規則運用次序 首要發音特徵 第二發音特徵 幾何特徵樹理論 層次 特徵節

1. Introduction

Feature co-occurrence constraint is one of important issues in phonological study (Leben 1973 and 1978, McCarthy 1986). This paper centers on the phenomenon of a restriction for the occurrence of labial features in Cantonese, which has been studied by

many scholars in differ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s (Kao 1971, Hashimoto 1972, Gao 1980, Yip 1988 and 1989, Fu 1990, Cheng 1990, Tam 2008), but is still an outstanding problem. I will try to view the topic and reach a s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eature geometry theory (Clements 1985, Sagey 1986, McCarthy 1988, Yip 1989).

2. Cantonese phonotactic backgrou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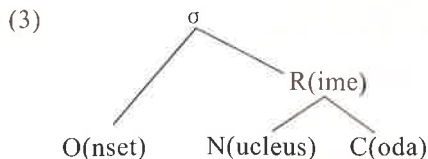
Cantonese's consonant system is shown in (1):

(1)	p	p̣	m	f	
	t	ṭ	n		l
	ts	tṣ	s		
	k	ḳ	ŋ	h	j
	ḳ	ḳ̣		w	

(2) is a generalized vowel system of Cantonese. In Cantonese, each vowel can be either long or short.

(2)	i	y	u
	ɛ	œ	o
		a	

The syllable structure of Cantonese can be presented as (3):



3. Labial-labial co-occurrence constraint

Cantonese has a well-known morpheme structure constraint that prohibits certain combinations of labial

segments (see appendix tables). According to Yip (1988),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labial-labial co-occurrence constraint in Cantonese. The first type of constraint holds between the non-adjacent onset and coda of labial consonants, as shown in (4):

(4)

onset	-	coda	
* C	V	C	
labial		labial	OCP-violation
p	a	m	

(This is the same with some other examples like: **fap*, **map*, **pim*, and **mim*)

In the feature geometric tree (Sagey 1987), the labial articulator node is activated in both labial consonants and rounded vowels. So, if the 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 (hereafter OCP) is effective in primary feature, namely *labial-labial, it seems that we will have case (5a).

(5) a.

Onset	-	coda	
? C	V	V	
labial		labial	OCP-violation
p	a	u	

b. *mau*, *fau*, *piu*, and *miu* are o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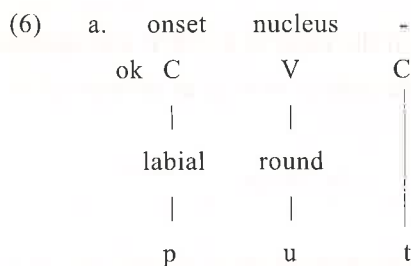
NOTES:

1. All data discussed here are adopted from Kao (1971), Hashimoto (1972), and Gao (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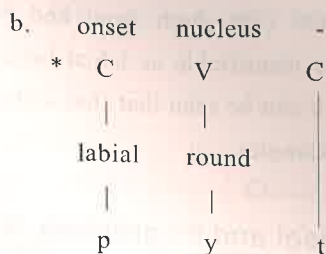
2. This kind of structure may occur in loan words, onomatopoeia, and baby talk words. But since most of Chinese linguists do not consider that these words exist in the original structure of Cantonese, I also ignore them here. Please see both Yip (1988) and appendix tables of this paper, which are revised based on Gao (1980) for reference.

In fact, case (5a) is possible. In Cantonese, there are many such examples as in (5b). These data can be employed to support three different hypotheses. First, they may support the claim of C-place node vs. V-place node by Clements (1989) because the different phonological behaviors of consonantal labial and vowel labial to OCP prove that consonantal labial and vowel labial belong to different place nodes. Second, they may support the claim of C-plane vs. V-plane proposed by McCarthy (1981, 1989) because belonging to different planes, /p/ and /u/ will not violate OCP. Third, they may support the claim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abial feature and round feature proposed by Sagey (1987). The labial articulator node is activated in both consonants and vowels, but that only the latter are also specified [+round]. Note that Cantonese has both front and back round feature *round-round, instead of labial feature *lab-lab.

However, in Cantonese, there is a second type of constraint which holds between the onset and the nucleus. Labial consonants may precede back rounded vowels, but not front rounded vowels, as shown in (6a) and (6b) respective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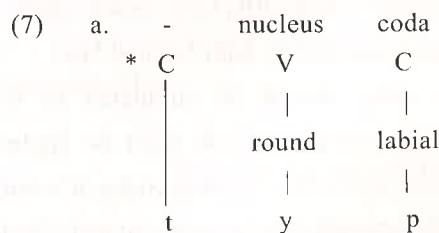


(This is the same with such examples as: *pok*, *mui*, *pun*, and *fu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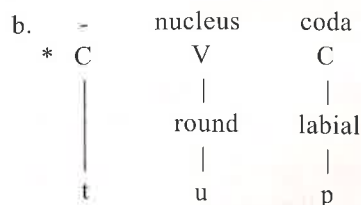


(This is the same with such examples as: **pyn*, **myt*, and **fœk*)

It is worthwhile to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ack and front rounded vowels in (6). One hypothesis may be proposed that only front rounded vowels are assigned for labial feature and are therefore identifiable as labial and subject to the prohibition. This hypothesis, however, is not tenable. That is because in Cantonese there is a third type of constraint which holds between the nucleus and coda. In other words, a rounded vowel (either front or back) followed by a labial consonant is completely impossible, as shown in (7a) and (7b) respectively.



(This is the same with some other examples like: **sym*, **kœp*, and **tœm*)



(This is the same with some other examples like: **sum*, **kup*, and **tum*)

As seen in (7a) and (7b), both front and back rounded vowels must be identifiable as labial between nucleus and coda.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6a) and (6b) is just a pair of counterexamp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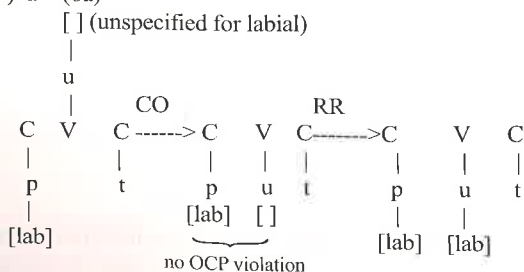
4. Yip's proposal and its problem

To explain this front round vowel vs. back round vowel phenomenon, Yip (1988) proposed the syllable-structure building rules in which only front rounded vowels are underlyingly marked labial. When a syllable structure is built, first the prevocalic consonant is marked as an onset, and then redundant values of [round] are assigned, including [+round] for the non-low back vowels. Assigning a value of a terminal feature like [+round] automatically entails assigning the superordinate articulator node, in this case labial. Then postvocalic consonants are marked as codas. The order is shown in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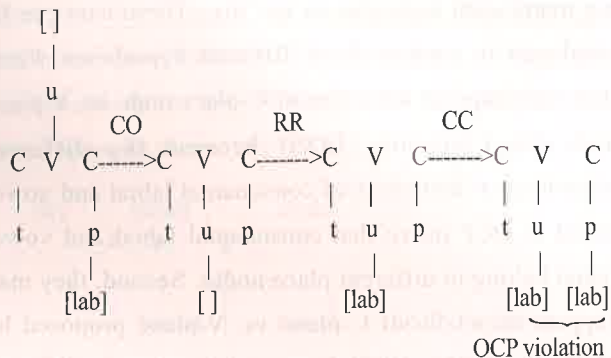
- (8) a. Create Onsets (CO): *ok pu*, but **py*
- b. Redundancy Rule (RR) for [+round] apply
- c. Create Codas (CC): both **up* and **yp*

The linear order should be stipulated in the hypothesis (8) that redundancy rule must be applied after creating onsets and before creating codas. It is only in this way tha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6) and (7) can be solved, as seen in (9):

(9) a = (6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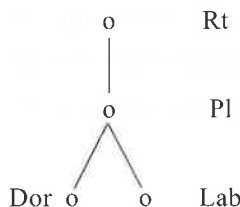


b = (7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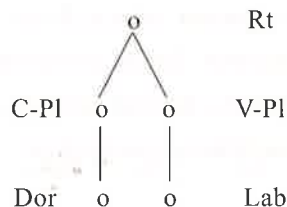


Although Yip's hypothesis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back rounded vowel in case (6) and (7), it fails to explain why OCP is not effective in case (5), but must be effective in secondary articulatory $k^{\bar{}}$. In the feature geometry framework, secondary articulator $k^{\bar{}}$ can be presented in several different ways, such as (10a) by Sagey (1986) and (10b) by Clements (1989).

(10) a. (Sagey 1986) $k^{\bar{}}$:



b. (Clements 1989) $k^{\b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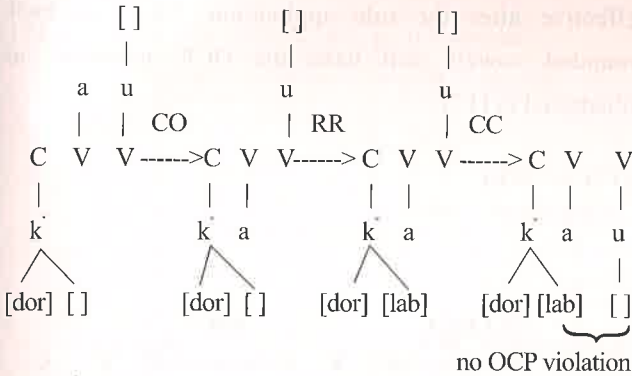
In Cantonese, if the onset is $k^{\bar{}}$, OCP will operate no matter whether the coda is *-u* or *-p*, as shown in (11).

(11) a. $*k^{\bar{}} au$ b. $*k^{\bar{}} a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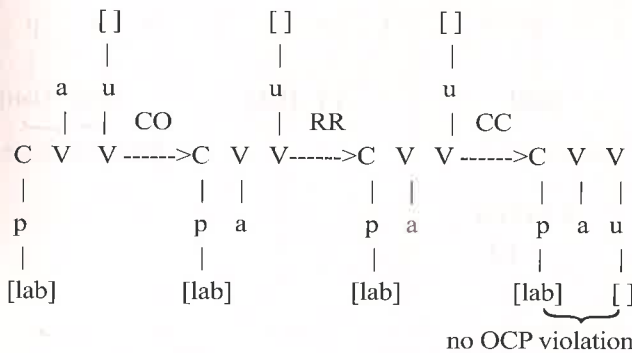
Suppose the hypothesis in (8) is correct, case (11a) and case (5) should have not only the same derivation but also the same result. For instance, supposing the redundancy rule is applied before creating codas, the

derivation of (11a) and (5) will be given in (12), respectively.

(12) a = (11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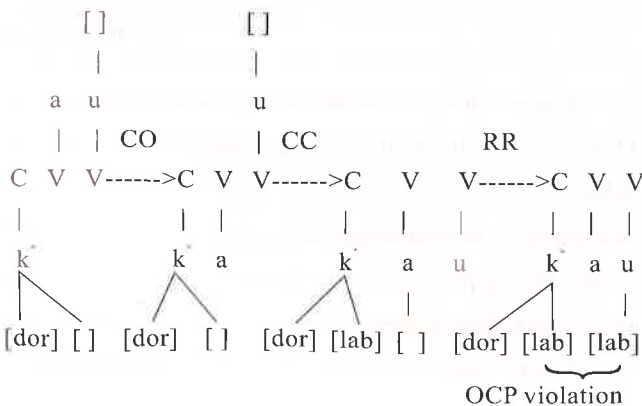


b. =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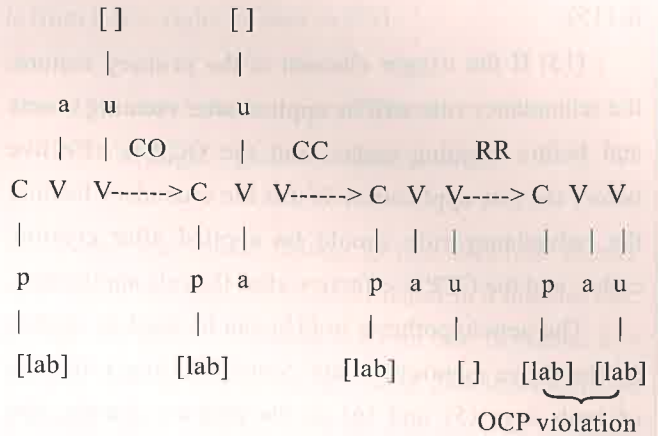


If the redundancy rule is applied after creating codas, the derivation of (11) and (5) should be shown as in (13), respectively.

(13) a = (11a)



B = (5)



If the derivation in (12) is correct, we will have the result in (14a); if (13) is correct, we will have (14b) instead. In Cantonese, however, neither (14a) nor (14b) is grammatical, but (14c).

- (14) a. ok ḳ au vs. ok pau
- b. * ḳ au vs. * pau
- c. * ḳ au (=11a) vs. ok pau (=5)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hypothesis in (8) is not without problem.

5. New hypothe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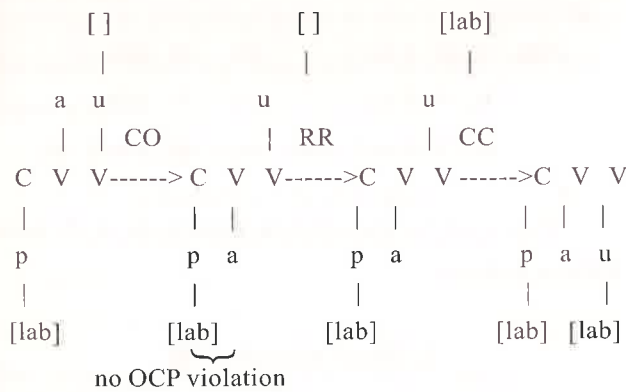
To propose a new hypothesis, it is needed to have a stipulation in the order of the redundancy rule application, which should not be applied completely before creating codas, as in (12), nor applied thoroughly after creating codas, as in (13); but be applied either before or after creating codas, depending upon the property of trigger element. Taking what forms the first element in linear order in the OCP of a syllable structure as a trigger and what forms the second element of the

OCP as a victim, the new hypothesis is proposed given in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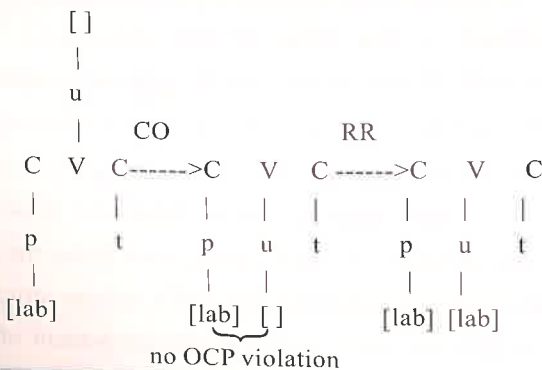
(15) If the trigger element is the primary feature, the redundancy rule will be applied after creating onsets and before creating codas; and the OCP is effective before the rule application. If it is the secondary feature, the redundancy rule should be applied after creating codas, and the OCP is effective after the rule application.

The new hypothesis in (15) can be used to explain all the above mentioned data. Since the trigger element of both case (5) and (6) is the primary feature, the redundancy rule must be applied after creating onsets and before creating codas, and the OCP should be effective before the rule application. Thus the back rounded vowels will not affect the OCP, as seen in (16).

(16) a =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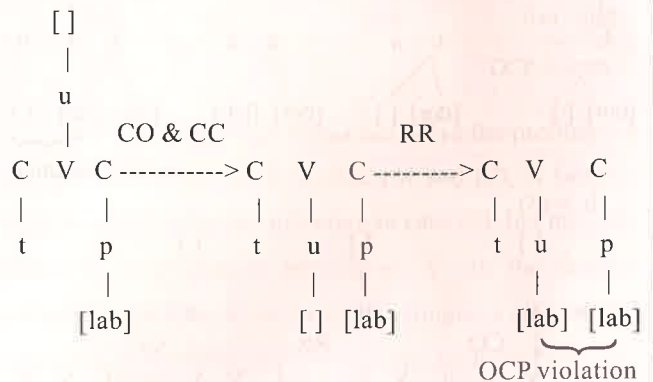


b = (6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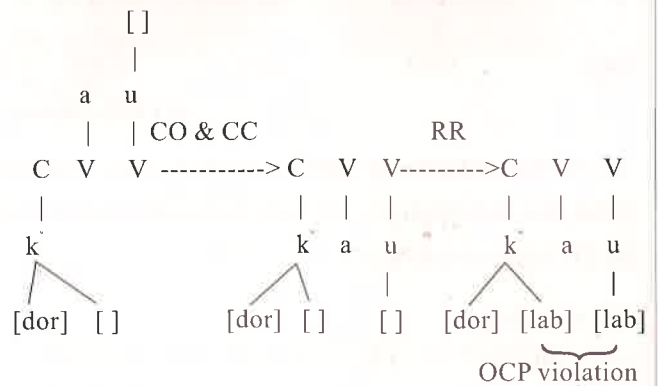


Since the trigger element of both case (7) and (11) is the secondary feature, the redundancy rule must be applied after creating codas, and the OCP should be effective after the rule application. Thus the back rounded vowels will have the OCP operation, as illustrated in (17).

(17) a = (7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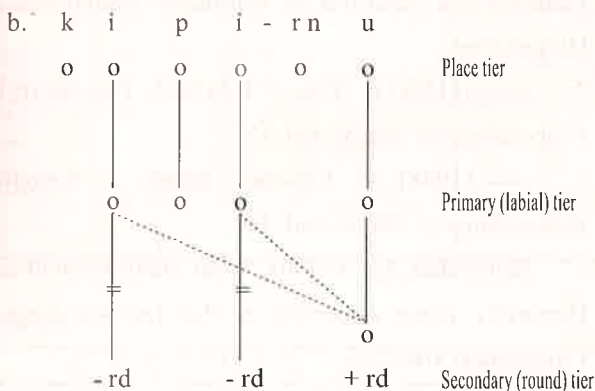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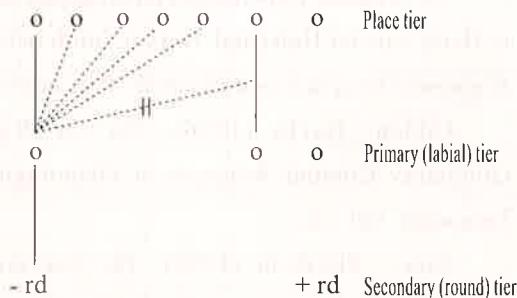
b = (11a)



It is worth to notice that the hypothesis proposed in (15) raised a theoretical issue. The feature nodes in different tiers may have the different phonological behaviors, as shown either by the difference in the order of the rule application or in the effect of the OCP. We have supporting evidence not only from Cantonese, but also from some other non-Chinese languages. Sagey

(1987) has discussed Warlpiri's labial harmony, as shown in (18a), and round harmony, as shown in (18b).

(18) a. Ngami r n i - k u - p u rdangka



According to Sagey, blocking in (18a) is accounted for by analyzing labial harmony as spreading a labial node which dominates [-round] from left to right. (18b) is not blocked by a labial node as spreading a feature [+round] from right to left. Although we hold different views on assigning [-round] in (18a), we share at least one point in common. It is that different spreading directions result from difference in feature tiers in Warlpiri. In other words, spreading in the primary tier is from left to right, but in the secondary tier it is just the other way round.

The same situation also can be seen in Yoruba. According to Schleicher (1990), Yoruba's vowel

assimilation is from right to left, but nasal assimilation is from left to right, as seen in (19).

(19) itō+ ewúre → itēwúre
 'thigh' 'goat' 'goat's thigh'

Nasal and vowel belong to two different feature tiers. By Clements (1985), nasal is put in a manner tier, but by McCarthy it is placed in a root tier. However, it is obvious that in Yoruba the spreading directions differ in different tiers. And all of these can serve as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hypothesis, claimed in (15).

Selected References

Archangeli, Diana and Douglas Pulleyblank (1986).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s*, ms. University of Arizona and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Campbell, Lyle (1974). Phonological features: problems and proposals, *Language*, vol. 50.

Chen, Y.M. (1986). From Middle Chinese to Modern Canto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1-3.

Cheng, L.L.-S. (1990). Feature Geometry of Vowels and Co-occurrence Restrictions in Cantonese, in *Proceedings of WCCFL*, vol. 9.

Clements, G.N. (1985). The Geometry of Phonological Features, *Phonology Yearbook*, vol. 2.

----- (1989). *A Unified Set of Features for Consonants and Vowel*, ms. Cornell.

Clements, G.N. and Samuel Jay Keyser (1983). *CV Phonology*, Cambridge: MIT Press.

Duanmu, San (1990). *A Formal Study of Syllable*,

Tone, Stress and Domain in Chinese Languages, MIT Dissertation.

Fu, J. Q. (1990). *Labial-labial Co-occurrence Restrictions and Syllabic Structure*, ms. UMass Amherst.

Gao, Hua-nian (1980). *Guang-zhou fang-yan yan-jiu* [Study of Cantonese], Hong Kong.

Goldsmith, John (1990). *Autosegmental and Metrical Phonolog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Halle, Morris (1986). *On Speech Sounds and Their Immanent Structure*, ms. MIT.

Hashimoto, Oi-kan Yue (1972). *Phonology of Cantonese*, Cambridge.

Hyman, Larry M. (1988). Underspecification and Vowel Height Transfer in Esimbi, *Phonology*, vol. 5.

Kao, Dianal (1971). *Structure of the syllable in Cantonese*, Mouton.

Leben, W. (1973). *Suprasegmental Phonology*, MIT Dissertation.

----- (1978). The representation of tone, in *Tone: A Linguistics Survey*, N.Y., Academic Press.

Lin, Y.-H. (1989). *Autosegmental Treatment of Segmental Processes in Chinese Phonology*, UT Austin Dissertation.

Maddieson, Ian (1984). *Patterns of Soun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ddieson, Ian and Peter Ladefoged (1988). *Multiply Articulated Segments and the Feature Hierarchy*, ms. UCLA.

McCarthy, John (1984). Theoretical Consequences of Montanes Vowel Harmony, *Linguistic Inquiry*, vol. 15.

----- (1986). OCP Effects: Gemination and Antigemination, *Linguistic Inquiry*, vol. 17.

----- (1988). Feature Geometry and Dependency: a Review, *Phonetica*, vol. 45.

----- (1989). Linear Order in 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 *Linguistic Inquiry*, vol. 20.

Mester, R. Armin (1986). *Studies in Tier Structure*, Ph.D. Dissertation, UMass, Amherst.

----- (1988). Dependent Tier Ordering and the OCP, in Harry van der Hulst and Norval Smith (eds.) *Features, Segmental Structure and Harmony Processes*, Part II.

Odden, David (1986). On the Role of the 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 in Phonological Theory, *Language*, vol. 62.

Sagey, Elizabeth (1986). *The Representation of Features and Relations in Nonlinear Phonology*, MIT Dissertation.

----- (1987). Place Feature Geometry, in *Proceedings of NELS*, vol. 18.

----- (1988). A Two-root Theory of Length, in *Proceedings of NELS*, vol. 19.

Schleicher, A.F. (1990). Nasal Stability and Feature Hierarchy, paper presented at *Mid-America Linguistic Conference*, vol. 25.

Tam, Su San (2008). *Phonotactic Constraints in Four Southern Min Dialects*, MPhil thesi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Van der Hulst, Harry (1988). The Geometry of Vocalic Features, in Harry van der Hulst and Norval Smith (eds.) *Features, Segmental Structure and Harmony Processes*, Part II.

Yip, Moria (1988). The Obligatory Contour Principle and Phonological Rules: A Loss of Identity, *Linguistic Inquiry*, vol. 19.

----- (1989). Feature Geometry and Cooccurrence Restrictions, *Phonology*, vol. 6.

Appendix Tables

Table (1)

	a	a:i	ai	a:u	au	a:m	am	a:n	an	a:ŋ	aŋ	a:p	ap	a:t	at	a:k	ak
p	+	+	+	+	-	-	-	+	+	-	+	-	-	+	+	+	+
p ^h	+	+	+	+	+	-	-	+	+	+	+	-	-	-	+	+	-
m	+	+	+	+	+	-	-	+	+	+	+	-	-	+	+	+	+
f	+	+	+	-	+	-	-	+	+	-	-	-	-	+	+	-	-
t	+	+	+	-	+	+	+	+	+	-	+	+	-	+	+	-	+
t ^h	+	+	+	-	+	+	+	+	+	-	+	+	-	+	-	-	-
n	+	+	+	+	+	+	+	+	+	-	+	+	+	-	-	-	-
l	+	+	+	-	+	+	+	+	+	+	-	+	+	-	-	-	+
ts	+	+	+	+	+	+	+	+	+	+	+	+	+	+	+	+	+
ts ^h	+	+	+	+	+	+	+	+	+	+	+	+	+	+	+	+	+
s	+	+	+	+	+	+	+	+	+	+	+	+	+	+	+	-	+
j	+	+	+	-	+	-	+	-	+	-	-	-	+	-	+	+	-
k	+	+	+	+	+	+	+	+	+	+	+	+	+	+	+	+	-
k ^h	+	+	+	+	+	-	+	-	+	-	-	-	+	-	+	+	-
ŋ	+	+	+	+	+	+	-	+	+	+	+	+	-	+	+	+	+
k ^w	+	+	+	-	-	-	-	+	+	-	-	-	-	+	+	-	-
k ^{hw}	+	-	+	-	-	-	-	-	+	+	-	-	-	+	+	-	-
w	+	+	+	-	-	-	-	+	+	+	+	-	-	+	+	+	-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ble (2)

	ε	εi	εŋ	εk	œ	œy	œn	œŋ	œt	œk	ɔ	ɔi	ɔu	ɔn	ɔŋ	ɔt	ɔk	i
p	+	+	+	+	-	-	-	-	-	-	+	-	+	-	+	-	+	-
p ^h	-	+	+	+	-	-	-	-	-	-	+	-	+	-	+	-	+	-
m	+	+	+	-	-	-	-	-	-	-	+	-	+	-	+	-	+	-
f	-	+	-	-	-	-	-	-	-	-	+	-	-	-	+	-	+	-
t	-	+	+	+	+	+	+	-	-	+	+	+	+	-	+	-	+	+
t ^h	-	-	+	+	+	+	-	-	-	-	+	+	+	-	+	-	+	-
n	+	+	-	-	-	+	-	-	-	-	+	+	+	-	+	-	-	+
l	-	+	+	-	-	+	+	+	+	+	+	+	+	-	+	-	+	-
ts	+	-	+	+	-	+	+	+	+	+	+	+	+	-	+	-	+	+
ts ^h	+	-	+	+	-	+	+	+	+	+	+	+	+	-	+	-	+	+
s	+	+	+	+	-	+	+	+	+	+	+	+	+	-	+	-	+	+
j	+	-	-	-	-	-	+	+	-	+	-	-	-	-	-	-	-	+
k	+	+	+	-	-	+	-	+	-	+	+	+	+	+	+	+	+	-
k ^h	+	+	-	+	-	+	-	+	-	+	-	-	-	-	-	-	+	-
ŋ	-	-	-	-	-	-	-	-	-	-	+	+	+	+	-	-	+	-
k ^w	-	-	-	-	-	-	-	-	-	-	+	-	-	-	+	-	+	-
k ^{hw}	-	-	-	-	-	-	-	-	-	-	-	-	-	-	+	-	+	-
w	-	-	-	-	-	-	-	-	-	-	+	-	-	-	+	-	+	-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ble (3)

	iu	im	in	iŋ	ip	it	ik	u	ui	un	uŋ	ut	uk	y	yn	yt	m	ŋ
p	+	-	+	+	-	+	+	-	+	+	-	+	-	-	-	-	-	-
p ^h	+	-	+	+	-	+	-	-	+	+	+	+	-	-	-	-	-	-
m	+	-	+	+	-	+	+	-	+	+	+	+	+	-	-	-	-	-
f	-	-	-	+	-	-	-	+	+	+	+	+	+	-	-	-	-	-
t	+	+	+	+	+	+	+	-	-	-	+	-	+	-	+	+	-	-
t ^h	+	+	+	+	+	+	+	-	-	-	+	-	+	-	-	+	-	-
n	+	+	+	+	+	-	+	-	-	-	+	-	-	-	+	-	-	-
l	+	+	+	+	+	+	+	-	-	-	+	-	+	-	-	+	-	-
ts	+	+	+	+	+	+	+	-	-	-	+	-	+	+	+	+	-	-
ts ^b	+	+	+	+	+	+	+	-	-	-	+	-	-	+	+	+	-	-
s	+	+	+	-	-	+	+	-	-	-	+	-	+	+	+	+	-	-
j	+	+	+	+	+	+	+	-	-	-	+	-	+	+	+	+	-	-
k	+	+	+	+	+	+	+	+	+	+	+	-	+	-	+	-	-	-
k ^h	+	+	+	+	-	+	-	+	+	-	+	-	+	-	-	+	-	-
ŋ	-	-	-	-	-	-	-	-	-	-	-	-	-	-	-	-	-	-
k ^w	-	-	-	-	-	-	-	-	-	-	-	-	-	-	-	-	-	-
k ^{hw}	-	-	-	-	-	-	-	-	-	-	-	-	-	-	-	-	-	-
w	-	-	-	-	-	-	-	+	+	+	-	+	-	-	-	-	-	-
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廣西八步八都話的“先長閉元音”

“Front long-closed vowels” of Badu dialect in Babu, Guangxi

◎ 麥 耘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提要：廣西八步區的“八都話”有一種複合元音，其第一個元音較長而閉，後續元音較短而開，這在漢語方言中略顯特殊。本文用語音實驗方法來展示。

關鍵詞：八都話 先長閉元音 語音實驗

Abstract: The first vowels of a type compound vowels of Badu dialect in Babu, Guangxi, are long-close and the following vowels are short-open. They reveal a little particularity in Chinese dialects. This paper demonstrated these vowels with the phonetic experimental technique.

Key words: Badu dialect; Front long-closed vowels; Phonetic experiment

一 引言

1.1 廣西壯族自治區賀州市八步區在1997年以前叫“賀縣”，地處桂、湘、粵交界，北邊是湖南的江華，東邊和南邊是廣東的連山、懷集、封開和廣西的蒼梧，西邊是

廣西的富川、鍾山。八步區境內主要通行粵方言，還有客、閩、湘、西南官話和一些系屬不明的土話，少數民族語言有瑤語、壯語和苗語。

在賀州市和八步區政府所在地八步鎮的周邊地區，分佈著一種被稱為“拐話”的土話，大體上分佈于賀江以南的為“八都話”，分佈于賀江以北的為“九都話”。在鄰近的廣西富川和湖南道縣、江華等地，也有自稱“八都話”或“九都話”、“七都話”的漢語方言。

在八步區，說八都話的人口主要聚居於鵝塘鎮和八步鎮廈良村等地。筆者調查的點是鵝塘鎮滙田村，發音人蔣運清先生（1941年出生）。調查時間是2004年夏天和秋天。

1.2 八步區八都話（鵝塘）韻母系統由30個韻母組成，如下（詳參麥耘^[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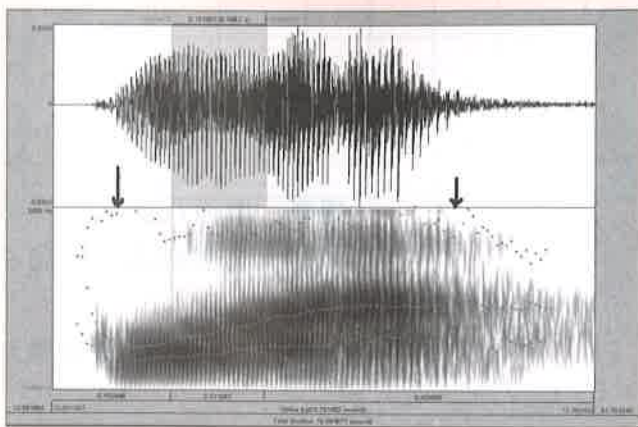
a	家飽太冊蠟	ai	台禮年黑彎
au	包頭牛屋墨	aŋ	閩
ra	寫遮爬曆習	i:au	巧劉秀又擾
i:aŋ	東朋暗分焊	u:ai	住竹熄衰刷
ɣ:aŋ	增從團溫春	e	班盞田咸廉
eu	早刀作捉藥	ə	北德色釋刻
əi	皮遲四麗蜜	əŋ	幫黃農安甘
i:ə	表齊兼切室	i:əŋ	將張堅香用
ɣ:ə	平輕關全月	u:ə	婆鵝果闊國
u:əi	土苦書酒骨	u:əŋ	魂文挽往懂
o	彈三生更坡	ɿ	紫次絲字事
i	支奇耳十日	iu	雀腳若約育
iŋ	民今形升松	ɣ	女朱收曲識
ɣŋ	軍群運永趁	u	補府好母學
ui	背開隊水出	ŋ	吳梧五午魚

二、語音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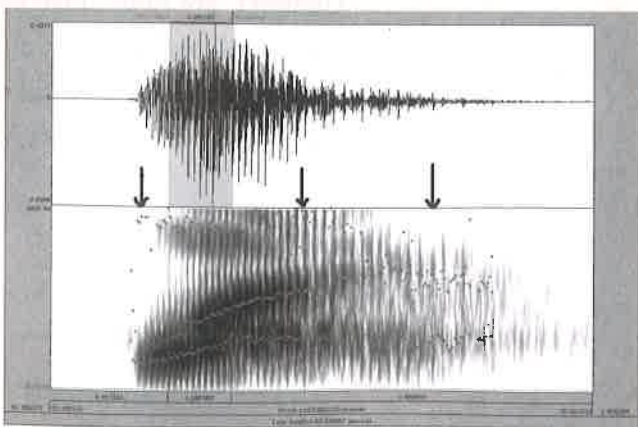
2.1 筆者為這個音系設置了kw, k^hw, ŋw, w, j聲母，所以上列韻系裏沒有介音（iu韻母的i和ui韻母的u都是韻核元音）。不過帶有這些聲母的字也可以視為是帶有介音的，如：刮kwai⁴³ | 快k^hwa⁵³ | 瓦ŋwa³³ | 彎wai⁵⁵ | 藥jeu²¹³。圖1是幾個帶w/j的音節的語圖。

本文用Praat做語圖^[1]。灰色部分是w/j與後續元音的過渡段^[2]，這是大致標出的，目的是讓讀者看出w/j與其後續元音在音節中的相對長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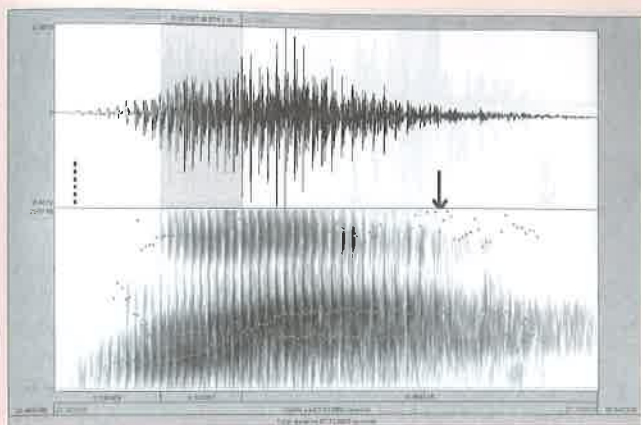
圖1 帶w/j的音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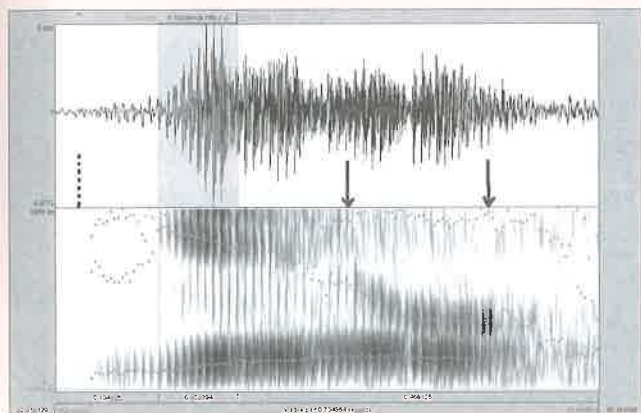
1-1 怪 kwai⁵³



1-2 刮 kwai⁴³



1-3 話 wa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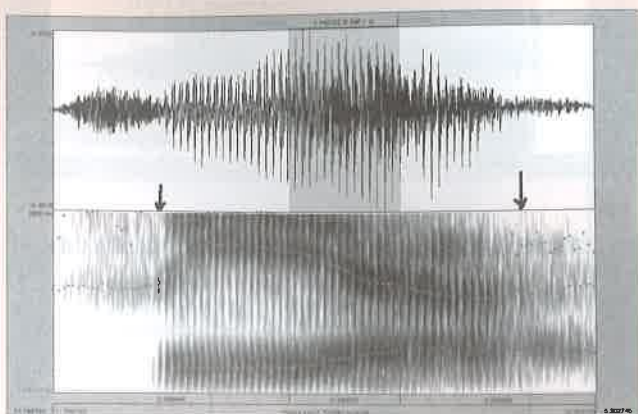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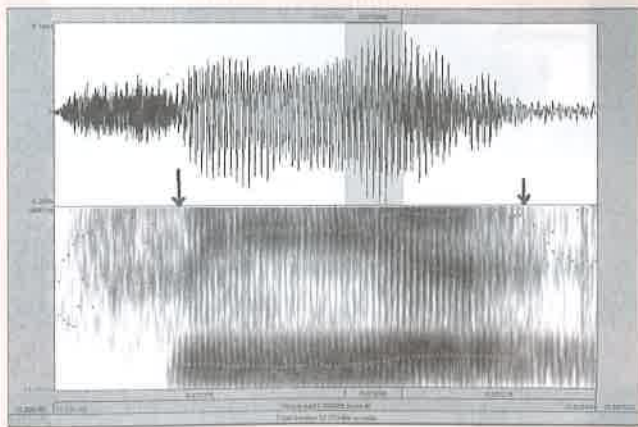
1-4 藥 jeu212

圖1-1以箭頭標示韻母的起點和終點⁵³，圖1-2頭尾兩個箭頭與圖1-1一樣，中間的箭頭則是韻核向韻尾過渡的起點。在“怪”kwa、“刮”kwa⁵這兩個音節中，w穩定段⁵⁴的長度都是a穩定段的三分之一左右。圖1-3和1-4是w/j作聲母（也可視為w/j作介音而零聲母）。韻母起始的箭頭沒出現，代之以表示w/j起始的虛線。這種情況下w/j會長一些，但仍比後續元音短：在“話”wa中，w不到a的一半，在“藥”jeu中，j是e的三分之二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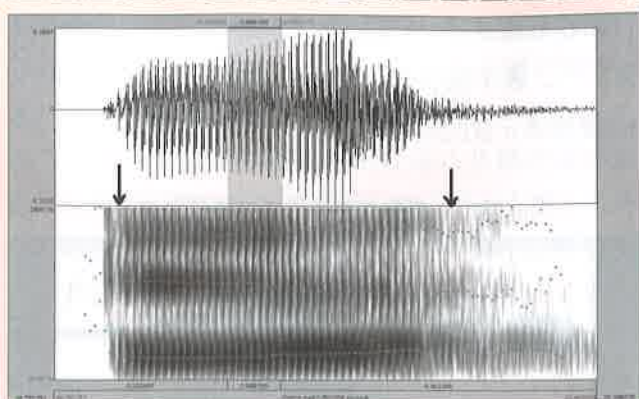
2.2 在1.2所列的韻母表中，有11個以ʔ、ʔ和ʔ起頭的韻母（下加橫劃者），在筆者的處理中，這些r~、

y和u並不是介音。它們比較長，本文稱為“先長閉元音”⁵⁵，表中加長音符號(:)表示。圖2是4個r、y和ʔ後接單元音的韻母的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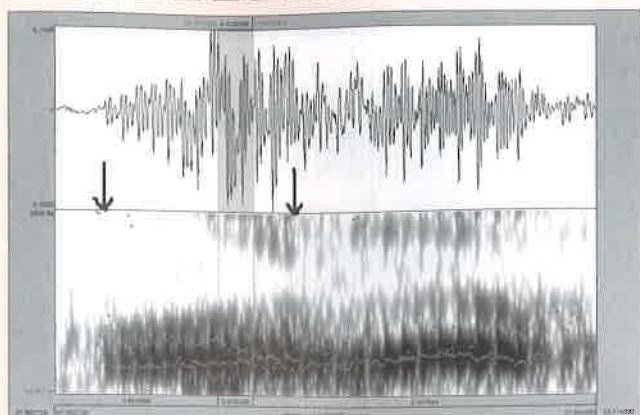
圖2 先長閉元音後接單元音的音節

2-1 斜 sia³³2-2 消 sia⁵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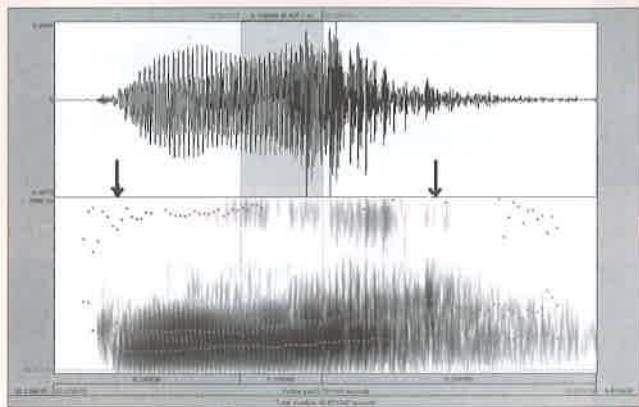
灰色部分是r/y/u與後續元音的過渡段。圖2-2“消”sia⁵⁵中的r長達a的一倍半，圖2-1“斜”sia和圖2-4“過”kuə⁵中的i/u都比後續元音略長；只有圖2-3“平”pyə⁵中的y比ə短，但也有ə的大約三分之二，比w在前面有聲母時的長度（看圖1-1和1-2）仍然要長一倍⁵⁶。



2-3 平 pɿ:ə³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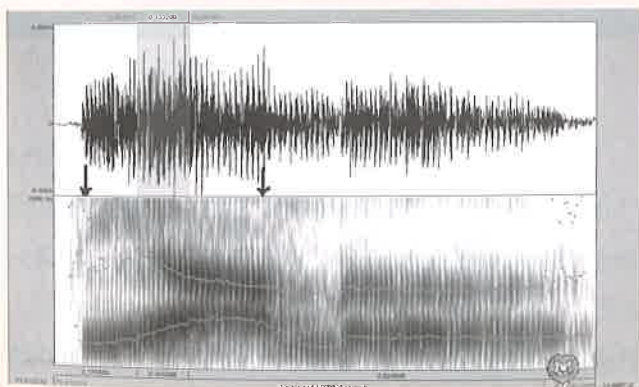
3-2 過 ku:ə⁵³ 得leu⁴³



2-4 過 ku:ə⁵³

2.3 以上是單音節的發音，圖3兩例是在雙音節中的。

圖3 語流中的先長閉元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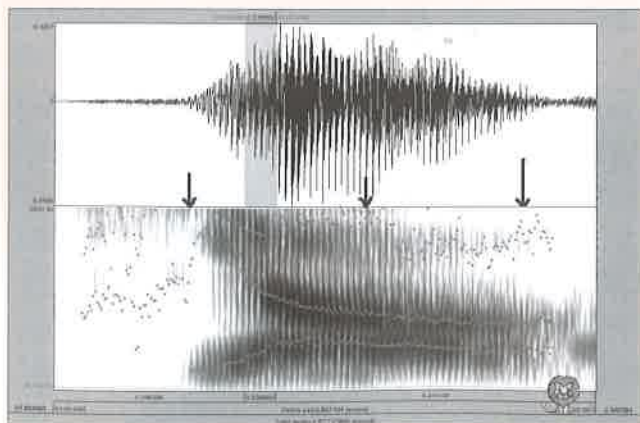


3-1 積 tɿ:a⁴¹ 德lə⁴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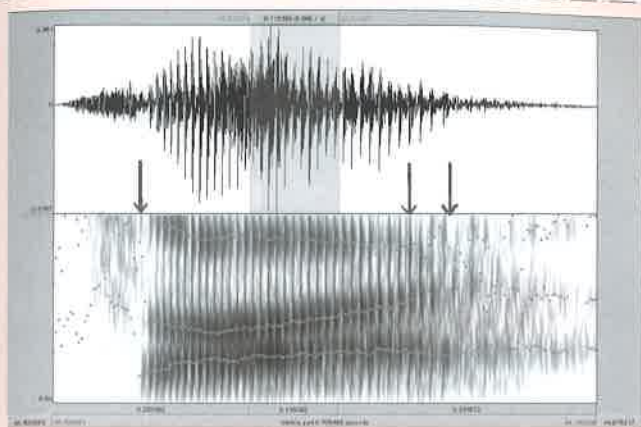
圖3-1是雙音節詞的錄音，語速較慢，截取了1100毫秒，“積”tɿ:a中的r是a的五分之四弱。圖3-2是在長篇話語的語流中截取的，語速較快，截取了近300毫秒，“過”ku:ə中ɿ的長度則是ə的二又三分之二。

2.4 圖4是先長閉元音後接複合元音（即帶元音韻尾）的情況。這種韻母有三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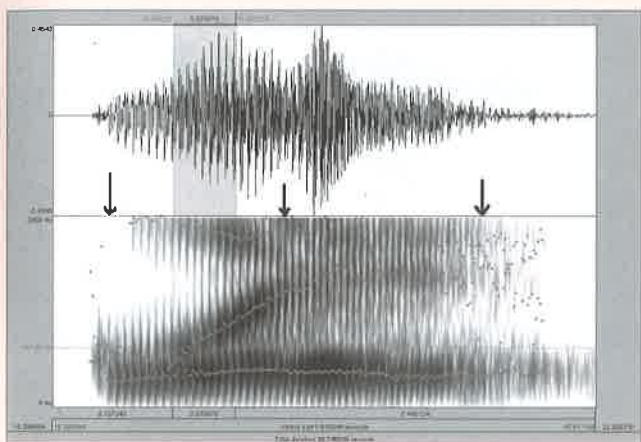
圖4 先長閉元音後接複合元音的音節



4-1 斤 xɿ:au⁵⁵



4-2 袖 sɔ:ai³¹



4-3 古 kɔ:ai³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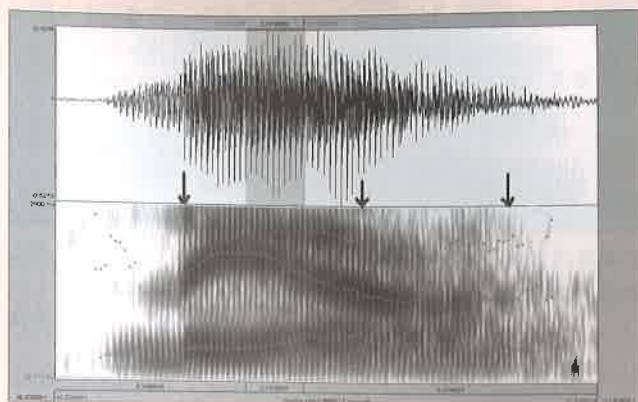
中間的箭頭是a/ə向韻尾過渡的起點處。在“丘”*xɪau*中，*i*的長度約為a的三分之二，而在“古”*kɔ:ai*中，*u*的長度為a的一又三分之一，在“袖”*sɔ:ai*中，*u*更長達a的一又三分之二。比較圖1-1和1-2，尤其是1-2，可知這種閉元音的確比介音長得多。

2.5 下面是這類韻母中帶鼻音韻尾的，共有四個。看圖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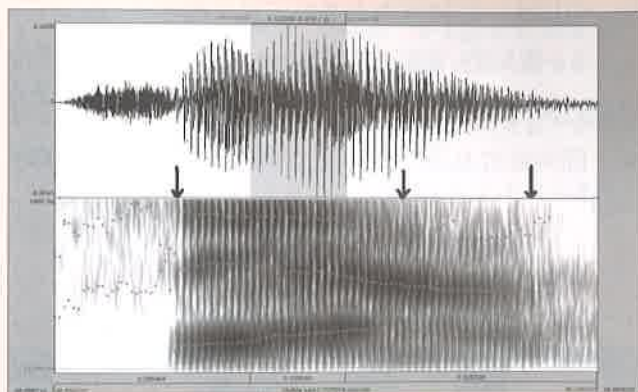
“將”*ɬ:əŋ*中*i*的長度是ə的一又三分之一，“東”*lɾaŋ*和“從”*sɿ:əŋ*中的*i/ɿ*都比a略長。圖5-4有兩個灰色部分，前一個是聲母w與u的過渡段（這個過

渡段屬於元音u的一部分），後一個是u與ə的過渡段。
“魂”*wɔ:əŋ*中u的穩定段是ə的四分之三^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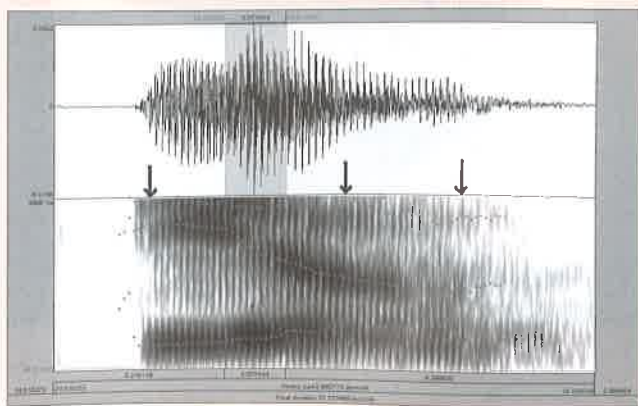
圖5 先長閉元音後接元音並鼻音的音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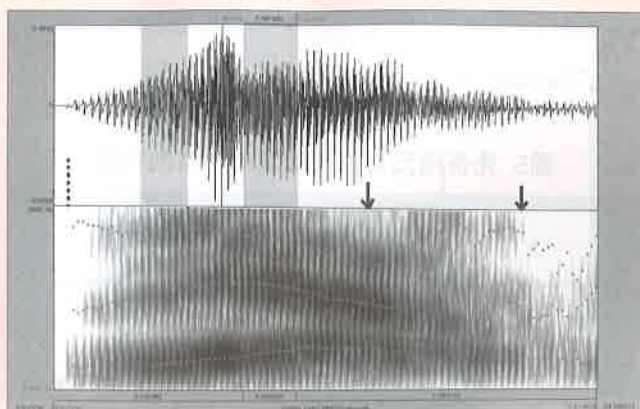
5-1 東 lɾaŋ⁵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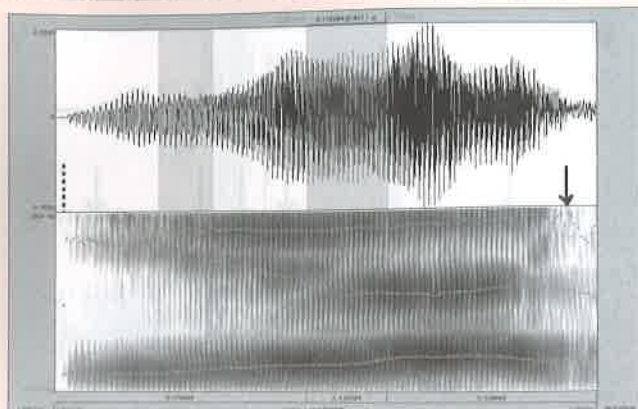
5-2 從 sɿ:əŋ³³



5-3 將 ɬ:əŋ⁵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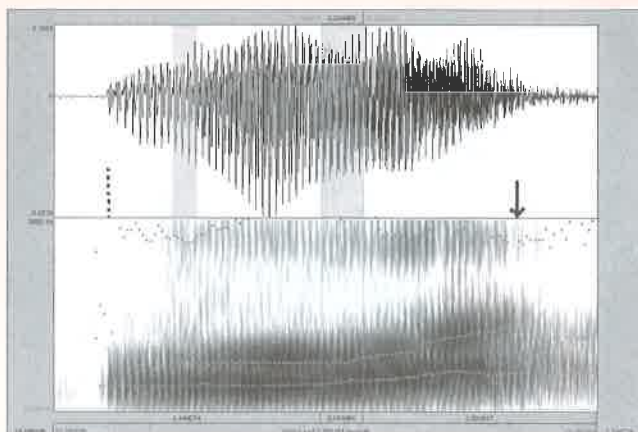
5-4 魂 wɔ:əŋ³³



6-2 圓 jy:ə³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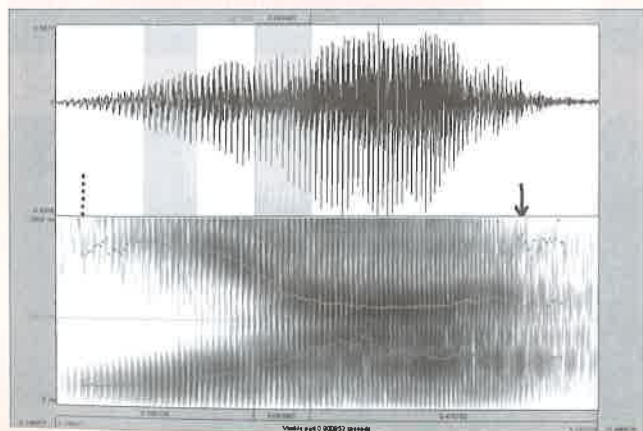
由以上材料可見，在很多情況下，先長閉元音比後續元音長，雖然也有一些先長閉元音比後續元音短，但仍比一般被視為介音的音素長得多。

2.6 假如把“魂”處理為uəŋ，則u=w+ɔ，其長度就接近ə的二倍半。在各種語言中，ə元音處於其他音素之間時都容易弱化，所以這個例子或許還不能說明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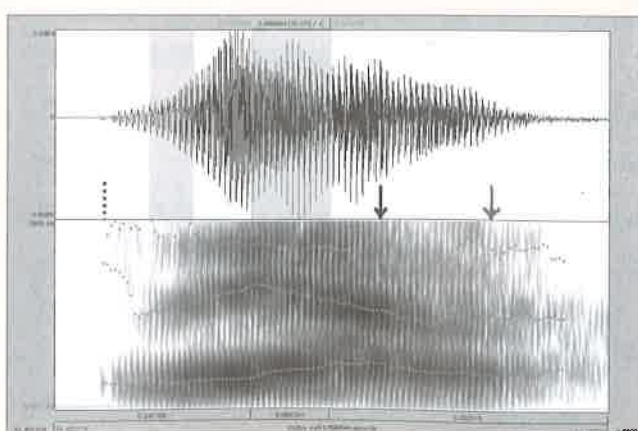


6-3 河 wɔ:ə³³

圖6 w/ɲ聲母拼先長閉元音的音節



6-1 野 jɹ:a³³



6-4 溫 wɹ:əŋ³³

每圖中的兩個灰色部分的含意跟圖5-4一樣。這些先長閉元音大多比後續元音略短，但若同w/j相加，則“野”jɿa中的j+i是最短的，也有a的五分之四，“圓”jy:ə的j+y^⑧和“河”wɔ:ə的w+ɔ都比ə長，“溫”wɿ:əŋ的w+y^⑨更是a的近三倍長^⑩。拿圖6和5-4與圖1-3、1-4比較，可以知道“w/j+先長閉元音”跟w/j的差別。

三 結語

3.1 韋樹關^[1]把湘南、桂東北的土話稱為“五嶺話”，並把八步八都話歸入其中。據曾毓美^[2]，在湘南江華縣的一種土話——寨山話中，也有如同八步八都話這樣的帶“先長閉元音”的韻母存在。有些侗台語中也有這種韻母（梁敏、張均如^[4]）。顯然它們在這個現象上是有歷史聯繫的。

在其他漢語方言中也有類似現象，如徽語、吳語的一些方言點。它們與湘南、桂東北的土話之間是否有歷史上的關聯，還需要研究。

3.2 對這些韻母如何處理，關係到對漢語音節結構的觀念。把“先長閉元音”視為介音顯然不妥。潘悟雲^[5]把這種韻母中前面的閉元音視為韻核，後續元音稱為“後滑音”。看來這種處理是有相當道理的。

註釋：

① 除特別說明外，窗寬都為700毫秒左右，寬頻圖顯示域取0至2800赫茲。

② 標示過渡段主要根據第一共振峰的走向，亦即主要考慮元音的開閉度。

③ 本文以兩個標誌定韻母終點：(1) 共振峰尤其是F2散亂不完整；(2) 能量降到與起點能量相若。兩者一般是一致的。

④ 穩定段指扣除過渡段的部分。以下作比較的，如不特別指出，就都是指穩定段。

⑤ 實際上它們不是最閉元音，只是接近最閉，而且在發音

人比較放鬆時，還會念得更開一些。不稱“前響複合元音”，因為前面這個元音的音強（能量）往往比後面的還小。

⑥ 本文從調查時所錄的字音中，每個帶先長閉元音的韻母裏取一字做了一圖，基本上是隨機選取的，所以並不能認為這個字就代表該韻母的情況。譬如“消”字ɿ長ə短，不代表所有ɿ:ə韻母字均如此，“平”字ɿ短ə長，也不代表所有ɿ:ə韻母均如此，餘均同。

⑦ u:əŋ韻母多與w聲母拼，若與其他聲母拼則實際上讀[uŋ]，就不是帶先長閉元音的韻母了。

⑧ 圖6-1和6-2為800毫秒。

⑨ j在此處是個圓唇的變體。

⑩ 在八都話裏，w和j除與一般元音拼外，w主要拼u，j則主要拼ɿ/y，例外是w拼ɿ:əŋ韻母（此時w和ɿ都因相互影響而偏央），而這個韻母不拼j。這是從音系上很難把先長閉元音處理為介音的一個理由。

參考文獻：

- [1] 麥耘，廣西八步鶴塘“八都話”音系[J].方言,2008,(1).
 [2] 韋樹關，賀州八都話考察報告[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人類學研究專輯,2000.
 [3] 曾毓美，湖南江華寨山話[M].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4] 梁敏、張均如，侗台語族概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5] 潘悟雲，漢語的音節描寫[J].語言科學,2006,(2).

漢沽方言中的聲調鏈變現象

Tonal Chain Shifts in Hangu dialect

◎馬秋武 / 同濟大學
◎張瑩 / 天津職業大學

提要：本文運用Praat軟件對漢沽方言單字調和兩字組進行聲學實驗，實驗結果表明：在漢沽方言兩字組連讀變調中存在單向非循環鏈變現象，即上聲變成陽平、陽平變成陰平的非循環鏈變。

關鍵詞：漢沽方言 連讀變調 語音實驗 鏈變

Abstract: We use Praat software to make an acoustic experiment on citation tones and disyllabic tonal sequences of Hangu dial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exist unidirectional noncircular tonal chain shifts in Hangu disyllabic sequences, that is, shangsheng changes into yangping and yangping into yinping.

Key Words: Hangu Dialect; tone sandhi; phonetic experiment; chain shifts

一、引言

漢沽是天津市的一個遠郊區，位於天津的東部，渤海的西北岸，蘆運河的下游，地處津京唐三角地帶，東臨河北省唐山市豐南區，北接寧河縣，西與寧河縣、塘沽區及北京清河農場相鄰。漢沽雖然是天津的一個郊區，但其方言近似與寧河方言，東部高莊等

數村接近豐南縣，西部煙頭沽村略帶塘沽、北塘話齒音多的特點，統屬於冀魯官話區保（定）唐（山）片的薊（縣）遵（化）小片。漢沽本地方言以市區中心寨上話為代表。關於漢沽方言的研究，除了在《漢沽志》（邵振鵬 1990）的方言有些描述外，我們沒有看到相關論述。針對這種情況，我們對漢沽方言單聲調以及兩字組進行了聲學實驗，實驗結果發現漢沽方言兩字組連讀變調中存在著一種非循環鏈變現象。

二、鏈變

鏈變是指語言中的連鎖性音變，這一概念早在歷史語言學之初就已論及。鏈變有輔音鏈變，如在不列顛凱爾特語(British Celtic)裏-pp->-p->-b->-β-; -tt->-t->-d->-e-; -kk->-k->-g->-y-這種比較系統的輔音鏈變(朱曉農 2005)。也有元音鏈變，後者比前者更常見。如在瑞典語裏a:>ɔ:>o:>u:, 以及在中古英語裏a:>ɛ:>e:>i:>ai; ɔ:>o:>u:>au這種長元音的大轉移(Jespersen 1954:232)。

根據拉波夫(Labov 1994:116)的觀點，元音鏈變有三種情況：(1)長元音高化、(2)短元音低化、(3)後元音前化。拉波夫把上述三條看作是統管元音鏈變的“通則”，其中長元音的高化十分普遍，幾乎沒有反例。

許多漢語方言中也存在著鏈變現象，如白語中前元音高化的鏈變： $*\alpha \rightarrow \varepsilon$ ， $*\varepsilon \rightarrow e$ ，客人 $*k' \alpha > *k' \varepsilon$ ，晚上 $*pe > pe$ 。根據史料記載，漢語歷史上至少發生過兩次長元音鏈變式高化大轉移。在漢語裏，鏈變主要涉及的是元音，輔音鏈變很少發生。

另外，漢語也存在著聲調鏈變，如閩方言的順時針聲調鏈變和山東德州方言的逆時針聲調鏈變。應該指出的是，上述兩種聲調鏈變是典型的循環性變調，即變調構成了一個封閉的“環”。但我們在對漢沽方言兩字組連讀變調的實驗研究中發現，漢沽方言的聲

調鏈變現象不同於閩方言和德州方言的循環聲調鏈變，它是一種單向非循環的聲調鏈變。

三、聲學實驗

(一) 實驗說明

本研究的發音人共兩名，其基本情況如下：男性發音人，58歲，工人，初中文化；女性發音人，55歲，退休工人，初中文化。兩位發音人一直生活在漢沽區的老城區，都能講地道，流利的漢沽話。

《漢沽志》中提供的聲調的記音方式基於傳統方言學的“口耳之法”，故所記的調值有待核實。因此，在此次聲學實驗中，發音詞表收集了40個單音節詞（每個調值選擇十個單音節詞），80個雙音節詞（每種音調組合選擇5個雙音節詞）。所選取的單字調和兩字組都是漢沽人所熟悉和常用的。

語音材料的錄製使用的是聲音處理軟件Cool Edit，高質量的麥克風。語音材料的分析采用的是國際上通用的語音分析軟件Praat 4. 2.29。錄音過程中將噪音減小到最低，單聲道錄音，採樣頻率為16,000赫茲。每位發音人按平時說話的速度把發音表中的單字調和兩字組各讀三遍，每個字或詞之間間隔約為2秒鐘。

(二) 採樣和計算

採樣時選擇錄音效果最好的一遍，在進行採樣計算之前要先確定發音人的調域。由於發音人的調域在單字調和兩字組的表現情況不盡相同，因此單字調域要從單字的四個聲調中確定，兩字組調域從詞組中確定。由於發音時聲帶的慣性作用，基頻曲綫往往會出現所謂的“彎頭”和“降尾”，這些彎頭和降尾不屬於調型段，所以測算時沒有計算在內。男聲的單字調域數值是97~158Hz，女聲單字調域數值是107~275Hz。男聲兩字組調域數值是56~234 Hz，女聲

兩字組調域數值是50~349Hz。本項實驗要確定的是漢沽方言的單字調和兩字組的調值。首先，用Praat軟件將錄音材料的單字音按聲調切分出來，然後對切分出來（各11個）的單字音的頻率進行取樣，將每個單字音的聲調大致按10等分取11個點的基頻數值，這樣一個調值可以得到110個基頻數值，然後把所有這個調值的從第1點到第11點的基頻數值分別算出平均值，最後采用石峰(1986)提出的下列公式將所取的點的基頻值換算成五度值。

$$T = [(\log x - \log b) / (\log a - \log b)] * 5$$

（a為調域上限，b為調域下限，x為a和b之間的測量點）

兩字組的分析亦是如此，先用Praat軟件按照不同的兩字組組合進行切分，然後將每個兩字組的分解成前字和後字，把每個被分解出來的前字和後字按照單字調分析的方法取樣和計算，最後按照前述公式換算成五度值，得到的單字調和兩字組調值如表1至表5所示：

表1 單字調基頻數值及換算成五度值（頻率值單位均為赫茲）

聲調	結果	F01 平均值	F02 平均值	F03 平均值	F04 平均值	F05 平均值	F06 平均值	F07 平均值	F08 平均值	F09 平均值	F10 平均值	F11 平均值	五度值
	陰平	男	123	126	129	133	137	141	141	141	142	142	
	女	225	224	224	226	227	229	232	235	239	234	247	45
陽平	男	131	127	123	118	114	112	110	109	108	107	107	32
	女	231	217	208	200	193	189	184	179	174	167	163	43
上聲	男	150	140	128	112	106	98	96	97	100	103	106	512
	女	247	223	179	143	131	107	142	129	154	167	174	513
去聲	男	156	157	158	158	158	157	156	154	150	143	133	54
	女	275	273	269	266	260	253	244	232	216	199	181	53

表2 前字為陰平的兩字組基頻數值及換算成五度值（頻率值單位均為赫茲）

聲調	結果	發音人	平均值										五度值	
			F01	F02	F03	F04	F05	F06	F07	F08	F09	F10		F11
陰平	前字	男	136	133	131	131	131	131	131	130	127	124	109	34
		女	268	264	263	262	263	266	268	274	273	261	251	34
陰平 +	後字	男	111	110	111	112	114	117	121	127	130	130	131	34
		女	238	218	216	218	220	221	225	232	240	250	223	34
陰平 +	前字	男	139	138	136	134	134	135	139	143	143	141	137	34
		女	274	269	267	270	274	282	291	295	294	294	274	34
陰平 +	後字	男	126	125	126	121	113	107	102	98	96	95	95	42
		女	274	251	230	209	196	188	182	176	171	166	151	43
陰平 +	前字	男	130	130	128	129	134	142	149	155	160	162	171	45
		女	263	263	266	266	275	284	289	294	299	300	284	34
陰平 +	後字	男	178	185	185	181	172	153	122	103	95	98	110	523
		女	344	298	206	140	95	89	85	111	128	129	119	512

聲調	結果	發音人	平均值											五度值
			F01	F02	F03	F04	F05	F06	F07	F08	F09	F10	F11	
陰平 + 去聲	前字	男	102	110	108	105	102	101	100	100	101	100	95	34
		女	260	213	207	201	197	193	195	197	197	198	197	34
	後字	男	120	129	139	148	156	161	164	162	153	126	60	53
		女	295	298	309	309	306	305	298	286	262	226	182	53

表3 前字爲陽平的兩字組基頻數值及換算成五度值（頻率值單位均爲赫茲）

聲調	結果	發音人	平均值											五度值
			F01	F02	F03	F04	F05	F06	F07	F08	F09	F10	F11	
陰平 + 陰平	前字	男	138	139	135	133	132	131	130	128	124	121	117	34
		女	265	243	242	237	239	238	240	241	241	238	233	34
	後字	男	118	118	114	111	111	113	117	122	125	130	130	34
		女	220	202	197	195	195	198	204	210	218	231	213	34
陰平 + 陽平	前字	男	133	134	136	138	141	145	150	152	154	153	147	34
		女	251	246	251	250	254	261	268	272	271	265	254	34
	後字	男	140	127	127	121	115	109	104	101	99	96	94	42
		女	245	232	214	201	192	185	180	176	179	162	139	43
陰平 + 上聲	前字	男	148	148	148	150	155	161	167	167	177	178	174	45
		女	269	269	270	273	279	285	289	293	291	282	279	34
	後字	男	177	169	154	120	78	56	91	95	98	99	97	513
		女	323	305	150	90	49	49	142	183	185	183	184	512
陰平 + 去聲	前字	男	113	107	104	102	108	102	103	104	106	105	103	34
		女	229	219	217	212	208	203	199	197	199	203	201	34
	後字	男	159	152	153	156	159	161	162	162	158	149	140	54
		女	267	271	278	286	291	291	287	278	263	208	192	53

表4 前字爲上聲的兩字組基頻數值及換算成五度值（頻率值單位均爲赫茲）

聲調	結果	發音人	平均值											五度值
			F01	F02	F03	F04	F05	F06	F07	F08	F09	F10	F11	
上聲 + 陽平	前字	男	128	126	119	115	112	108	107	106	105	100	92	42
		女	241	232	225	217	209	202	196	192	189	188	192	43
	後字	男	119	117	117	120	124	132	140	146	155	159	157	34
		女	214	206	204	206	209	216	227	241	255	254	223	34
上聲 + 陽平	前字	男	116	116	114	111	110	114	125	131	137	142	146	434
		女	210	192	188	187	188	194	203	221	243	261	261	434
	後字	男	121	125	128	129	124	117	109	106	103	97	91	43
		女	257	247	229	219	207	196	188	183	177	172	170	43

聲調		結果	發音人	平均值									五度值	
				F01	F02	F03	F04	F05	F06	F07	F08	F09		F10
上聲 +	前字	男	125	120	115	115	119	124	132	138	143	150	160	435
		女	213	206	198	194	196	202	211	224	242	256	257	435
	後字	男	164	192	184	177	165	144	128	108	93	93	97	523
		女	318	278	237	120	54	56	88	147	174	179	176	513
上聲 +	前字	男	137	130	126	123	121	119	117	111	112	116	117	42
		女	248	236	226	215	205	196	186	184	183	183	185	43
	後字	男	175	184	192	196	196	190	182	170	160	140	117	53
		女	258	263	272	280	286	289	284	268	247	221	203	53

表5 前字為去聲的兩字組基頻數值及換算成五度值（頻率值單位均為赫茲）

聲調		結果	發音人	平均值									五度值	
				F01	F02	F03	F04	F05	F06	F07	F08	F09		F10
去聲 +	前字	男	186	174	169	161	153	143	135	126	120	111	104	53
		女	302	292	285	277	264	246	229	215	208	201	197	54
	後字	男	104	116	113	115	119	126	140	151	152	142	147	34
		女	214	206	206	206	210	216	223	232	240	241	233	34
去聲 +	前字	男	152	152	154	156	158	158	158	158	156	150	118	53
		女	284	282	285	286	287	286	285	285	284	279	272	54
	後字	男	107	110	116	120	119	115	108	104	100	96	91	32
		女	250	233	219	205	192	186	181	177	173	169	169	43
去聲 +	前字	男	177	170	169	177	183	185	183	17	174	17	173	55
		女	308	305	305	305	307	308	310	311	312	308	298	54
	後字	男	175	149	128	102	86	61	73	93	96	103	105	513
		女	331	297	299	340	349	329	204	231	183	183	178	513
去聲 +	前字	男	170	163	160	157	170	146	139	134	130	125	118	53
		女	284	285	281	273	262	252	238	225	215	207	205	54
	後字	男	153	169	164	164	164	164	162	155	143	84	81	52
		女	269	270	273	275	273	269	262	250	231	206	191	53

四、實驗結果與分析

由表1可以分別得出兩位漢沽方言發音人單字調的調值，陰平：34和45，陽平：32和43，上聲：512和513，去聲：54和53。兩位發音人的四個單字調調值彼

此略有差異，但從調型上看，基本上屬於同一個調型。

《漢沽志》方言部分記錄的單字調值如表6所示：

表6 《漢沽志》方言部分記錄的單字調調值

陰平	陽平	上聲	去聲
34	22	312	53

將表6的調值與我們實驗得出的結果相比較，便會發現：我們實驗得出的陽平調值和調型與《漢沽志》所記錄的調值和調型不同。在Praat軟件中可以看到陽平調尾的下降，儘管調值的下降並不是很大，所以《漢沽志》中陽平調值的記錄可能與當時所用的傳統記音方式有關。另外，實驗得出的上聲調值與《漢沽志》所記錄的調值也有所不同，但從調型上看，兩種方法獲得的調型是一樣的。由實驗結果可以看出，漢沽方言上聲調域有所提升。綜上所述，我們得出漢沽方言單字調的調值如下：陰平34，陽平43，上聲513，去聲53。

表2至表5清楚的表明，漢沽方言兩字組連讀變調是前字變調，後字不變。陽平在前字位置上將變成陰平。上聲在陰平和去聲前均變成陽平(43)，上聲在陽平(43)和上聲(513)前分別變成新的調值434和435。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上聲變調後出現的新調的調尾與隨後聲調的調頭有明顯的關係。從音系的角度上看，變調的調尾很可能是因與後字調頭協同發音所致，這顯然屬語音範疇，而非音系問題。因此，本文認為：在前字為上聲的兩字組中，前字上聲均變成陽平。這樣，漢沽方言兩字組連讀變調的規律是：上聲變陽平，陽平變陰平，如此形成聲調的單向非循環鏈變。

五、結語

本文運用Cool Edit 錄音軟件和Praat語音分析軟件對漢沽方言單字調和雙字調進行了聲學實驗，實驗結果表明：漢沽方言兩字組連讀變調中存在著聲調鏈變現象，即上聲變陽平、陽平變陰平的單向非循環變調。漢沽方言的這一聲調鏈變不同於閩方言、山東德州方言的聲調循環音變，它有起始，也有終點，變調後的兩字組中前字只可能是陰平、陽平和去聲，上聲在兩字組起始位置上均變成了陽平。天津漢沽方言兩

字組連讀變調中所產生的這種聲調非循環鏈變現象值得注意，這種現象在漢語裏是否常見？它的成因以及音變機制是什麼？這些問題都有待於我們做進一步的調查、分析和研究。

參考文獻：

- [1] 邵振鵬. 漢沽志 [M]. 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1990.
- [2] 石鋒，天津方言雙字組聲調分析[J]. 語言研究，1986(1).
- [3] 朱曉農. 元音大轉移和元音高化鏈移 [J]. 民族語文，2005(5).
- [4] Jespersen, Otto 1954.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Part I: Sound and Spelling.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 [5] Labov, William 1994.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Internal Factors. Cambridge, MA: Blackwell.

疑問句末語氣詞 “呢”的“句管控”考察

An inquiry on the theory of clausal government to the particle “ne” in the end of the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沈 威 / 華中師範大學

提要：對於語氣詞“呢”是否為疑問語氣詞，語法學界的爭論由來已久，不過對語氣詞“呢”，長期以來人們也形成了一些定論，比如“呢”只能用於非是非問，本文擬運用“句管控”理論考察句末語氣詞“呢”，並得出以下結論：「1」“呢”用在疑問句末不表疑問。「2」“呢”既能用於非是非問，又能用於是非問。「3」語氣詞“呢”在疑問句末尾並非表“深究”義。

關鍵詞：呢 句管控 是非問 深究義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particle “ne” in the end of the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in the field of linguistics.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conclusion about particle “ne”, For example, “ne” can’t use in interrogative of affirmative, negative. The author will apply the theory of clausal government to inquiry the particle “ne” and have these conclusions: (1) “ne” does not mean question mood (2) “ne” can use in interrogative of affirmative, negative (3) “ne” does not mean “get to the bottom”.

Key words: “ne”; the theory of clausal government; interrogative of affirmative, negative; “get to the bottom”

2 “呢”是否表疑問的句管考察

1、引言

對於語氣詞“呢”在疑問句末的解釋各類詞典的解釋如下：「1」《現代漢語虛詞詞典》（張斌主編）認為語氣詞“呢”用在疑問句（是非問句除外）末尾，增加深究意味。「2」《現代漢語常用虛詞詞典》則認為：語氣詞“呢”表示疑問語氣，用在疑問句末尾（是非問句除外），表示疑問語氣，並含深究的意味。（1）用在特指問句末尾。（2）用在選擇問句或正反問句的末尾，表示疑問，有時含有商量或探詢的語氣（3）用在反問句的末尾，加強反問的語氣，而且往往帶有某種感情色彩。「3」《現代漢語虛詞詞典》（侯學超編）則認為：（1）用於特指問句句尾，要求回答具體內容。（2）用語選擇問句句尾，要求回答其中一項。（3）非疑問形式的體詞短語加“呢”，可以構成特指疑問句和選擇疑問句，疑問點隨上下文而定。「4」《現代漢語八百詞》認為：語氣詞“呢”表示疑問，用於是非問句以外的問句。（1）用於特指問句，句中有疑問詞“誰、怎麼、什麼、哪”等。（2）用在選擇問句的兩個（或三個）項目的後邊。（3）用於反問，常與“哪里、怎麼、何必”呼應。

以上各類詞典普遍認為“呢”用在疑問句末尾表示疑問語氣，“呢”只能用於非是非問，且對語氣詞“呢”的解釋主要集中在對其用法進行了歸納。對“呢”在疑問句末的語法意義並沒有做出詳盡的歸納。

本文對上述各類觀點有以下的幾點疑問：（1）語氣詞“呢”用在疑問句末尾是表示疑問語氣嗎？（2）語氣詞“呢”是否只能出現在非是非問句後面？（3）疑問句末語氣詞“呢”是表“深究”義嗎？

下面，將對上述三個疑問進行證明和討論。

目前學術界對“呢”形成的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有兩種，一種觀點是以呂叔湘、朱德熙先生為代表的，他們認為“呢”在疑問句句末有表示疑問的功能，應為疑問語氣詞，另一種觀點以邵敬敏先生為代表，他認為“呢”在疑問句中並未負載疑問信息，因而不是疑問語氣詞。

雖然本文的結論和邵敬敏先生的結論相同，但對於邵敬敏先生的論證過程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在邵文中指出：非是非問中，由於特指問、選擇問、正反問都具有特殊的疑問形式，它們已負載了疑問信息，因此句調念成升調或者降調都可以，“呢”也不一定非出現不可。換言之，升調和“呢”也都是羨餘信息。^[1]孫瑞、李麗虹等學者在文獻^[2]中用了刪除對比法來說明邵先生的這種證明方法值得商榷，我們採用刪除對比法，將邵文的觀點形式化為：

$$Y=X+D+'NE' \quad (1)$$

其中，Y代表非是非問句，X代表特指問、選擇問、正反問中對應的疑問語氣詞或者“是……還是……”、“X不X”等句法結構，D代表語調，‘NE’代表語氣詞“呢”。請看下列：

「1」玉梅說：“為什麼寫好了又都圈了呢↗？”
（趙樹理《三裏灣》）

在例「1」中，Y=“玉梅說：“為什麼寫好了又都圈了呢↗？””，X=“玉梅說：“為什麼寫好了又都圈了？””，D=“↗”，‘NE’=“呢”。按照邵文的觀點，既然Y和X都表示疑問，所以‘NE’（即“呢”）和D（也即語調“↗”）都是羨餘信息，所以‘NE’（即“呢”）不表示疑問，用這種論證“呢”不表示疑問是存在問題的。將邵文的觀點形式化為圖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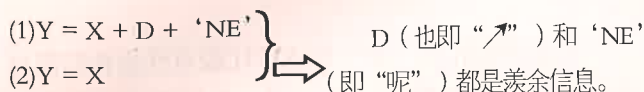


圖1

由圖1所示，邵文的結論需要兩個前提條件的成立，即條件（1）和條件（2），但條件（2）是否成立，並不一定，因為很難說，Y（“玉梅說：“爲什麼寫好了又都圈了呢↗？”），和X（“玉梅說：“爲什麼寫好了又都圈了？”）是完全相等的。失去了這個前提條件的支持，得出的結論是否正確就值得商榷了。

除了利用刪除對比法分析外，本文擬用“句管控”的理論對“呢”不表示疑問進行論證。

小句的組詞與表意，語句的聯結與相依，規律的形成與生效，方言的語法差異，都依存於特定的句法機制，都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地取決於特定的句法機制。可以說句法機制管控著整個語法面貌的大局。所謂“句管控”，指的便是句法機制對各種語法因素的管控作用。¹¹

由於句法機制管控著整個語法面貌的大局，要弄清楚語氣詞“呢”所在的句子是否表示疑問，只有在接受了“句管控”之後，才能得以落實。

如果說語氣詞“呢”表疑問，那麼就是說當“呢”出現在句末的時候整個句子就應該是疑問句。語言事實究竟是否如此呢？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任何理論脫離了語言事實就會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下面我們將用“句管控”的理論來對上述問題進行解釋：

我們認為要考察“呢”是否表示疑問要先弄清楚其所在的句法管束條件。

現代漢語中，管束一個句子使其產生疑問的因素是疑問標記。首先看看疑問標記的定義：疑問標記就是在某一情況下能單獨負載疑問信息的語言成分。

[5]。現代漢語疑問標記包括：疑問語調、疑問語氣詞、特指疑問詞語、疑問句法結構（以“X不X”和“是p還是q”爲典型）。¹⁴

疑問標記可以獨用也可以複合使用，其中常見的是疑問語氣詞和疑問語調兩者複用、特指疑問詞語、疑問語調和疑問語氣詞三者複用、疑問句法結構、疑問語調和疑問語氣詞三者複用的情況居多。

我們認爲句末爲語氣詞“呢”的疑問句是因爲受到了疑問標記的句法規約，如果句子失去了疑問標記的管控作用，即使句末有語氣詞“呢”，句子也不表示疑問。

我們看下面幾組例子：

「2」你是個半脫離生產幹部，對你那資本主義生產抓得那麼緊，爲什麼讓人家這些完全不脫離生產的幹部比你管更多的事呢？↗（趙樹理《三裏灣》）

我們可以發現，例「2」爲疑問句，句中除了包含語氣詞“呢”，還包含了特指疑問詞語“爲什麼”和疑問語調“↗”。由於有特指疑問詞和疑問語調的句法規約，從而使得例「2」爲疑問句。

「3」是不是有敵特作內綫呢？↗（馮德英《苦菜花》）

例「3」也爲疑問句，例「3」中除了包含語氣詞“呢”，還包含了疑問句法結構“是不是”和疑問語調“↗”。正因爲句子中含有了疑問句法結構和疑問語調的句法規約，從而使得例「3」爲疑問句。

以上兩例都爲疑問句，它們作爲疑問句的原因都是因爲受到了疑問標記的句法規約，如果句中不包含疑問標記，句子脫離了疑問標記的管控作用，那麼語氣詞“呢”所在的句子並不表疑問。請看下面的例子：

「4」現在可要鬧了，聽說想到東三省再去做皇帝呢。↘（魯迅《二心集》）

「5」將墜的病葉的斑斕，似乎也只有在極短時中相對，更何況是葱郁的呢。↘（魯迅《野草》）

「6」那女孩可急了，忙用脚去勾他的脚，說：
“喂，大哥，我說的你呢？\」（安安《春毒》）
「7」淨要三十五歲以下的，連我們這號四十出頭，好
胳膊好腿的都不香呢？\」（白帆《那方方的博士
帽》）

例「4」~例「7」均不是疑問句，它們的的句末雖然有語氣詞“呢”，但是其所在的句中沒有疑問標記的句法規約，即使所舉的例「6」和例「7」句末有問號也不表疑問，以上四例由於失去了疑問標記的句法規約，所以上面四例均不表示疑問。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語氣詞“呢”所在的句子表疑問並不是任意的，而是有著嚴格的句法管控，當“呢”所在的句子有疑問標記的管控作用的時候句子表示疑問，而反之，當“呢”所在的句子失去了句中疑問標記的管控作用則句子就不再表示疑問。

康亮芳在證明“呢”是疑問語氣詞的過程中，認為在“非疑問形式+呢”構成的問句中，疑問標記“呢”單獨負載疑問信息。康文中的述說摘錄如下：

“非疑問形式+呢”構成的問句即非是非問句的一種簡略形式。例如：

「8」餘正芳：你考上沒有？衛大嫂：你們呢？（《老舍文集》438頁）

「9」大哥，鳴鳳呢？（《曹禺文集》12頁）

「10」黃媽，你看呢？（《曹禺文集》30頁）

這類問句的疑問焦點是隱含在句子中的，在不出現疑問語調的情況下，疑問標記“呢”單獨負載疑問信息，表明該句是疑問句，屬非是非問。^[4]

我們對上述觀點質疑如下，當我們去掉例「8」~例「10」中的管控成爲疑問句的因素之一：疑問語調後，句子分別變爲：

~「8」餘正芳：你考上沒有？衛大嫂：你們呢\？

~「9」大哥，鳴鳳呢\？

~「10」黃媽，你看呢\？

再將例~「8」—例~「10」與下面的例子進行對照：

「11」我們呢\，不出手就不說，一出手就撈他一把。（杜鵬程《保衛延安》）

「12」老孟呢\，也不示弱，他和誰一吵咀，就不講理了，信口胡說，如質問小李：劉中正的事情你怎麼知道？（李曉明 韓安慶《平原槍聲》）

「13」我看呢\，咱們先得端正一下自己的思想。（《編輯部的故事》誰是誰非(下)）

例~「8」中的“你們呢”和例「11」中的“我們呢”，出現的形式完全一樣，但一個爲疑問句，一個不是疑問句，同樣的例~「9」中的“鳴鳳呢”和例「12」中的“老孟呢”形式完全一樣，但~「9」爲疑問句，例「12」不表疑問，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例~「10」和例「13」中，可見使得例~「8」—~「10」爲疑問句起決定性因素的並不是語氣詞“呢”。我們可以發現，使例~「8」—~「10」爲疑問句的決定性因素爲：句子的上下文中存在省略的隱含焦點的句法規約。比如例~「8」，補全後應爲：餘正芳：你考上沒有？衛大嫂：你們考上沒考上呢\？，使該句子爲疑問句的決定性因素爲：句子受到疑問標記之一句法結構“考上沒考上”的規約，例~「9」補全句法成分後應爲：大哥，鳴鳳在哪兒呢\？使得該句子成爲疑問句的決定性因素的爲：句子受到隱含的疑問標記之一疑問代詞“在哪兒”的規約，例~「10」補全句法成分後應爲：黃媽，你看怎麼辦呢\？使得該句子成爲疑問句的決定性因素爲：句子受到疑問標記之一隱含的特指問疑問詞語“怎麼辦”的規約。

正是由於上下文語境中存在隱含著的句法語義格局的管控才使得，例~「8」—~「10」爲疑問句，而相反，在例「11」~「13」句中，上下文環境中並不存在隱含句法語義的管控，所以它們不是疑問句。

可能有人會說，有的“非疑問形式+呢”的句子單獨說（即不存在上下文）的時候也表疑問，如何解

釋呢？

比如在這樣一個沒有語境的句子，請看下例：

「14」小王呢↘？

在沒有語境的情況下，如果單獨提到例「14」，我們都會在大腦中迅速形成一個場景，能和例「14」配套的場景有很多，可以是：小王在哪里呢？小王贊成不贊成呢？小王來了沒有呢？小王參加不參加會議呢？等等，但是大多數人會形成一個常規場景，這種場景往往是最常見的，對於例「14」來說，這個常規場景就是：小王在哪里呢？

致使例「14」為疑問句的決定性因素不在於語氣詞“呢”，而在於其存在著隱含的特指問疑問詞語或者疑問句法結構等疑問標記的管控規約作用，如果例「14」的語調是上揚的即為“↗”，那麼管控句子：“小王呢↗？”為疑問句的因素為特指問疑問詞語或者疑問句法結構和疑問語調“↗”。此時句子“小王呢↗？”受到致使句子成為疑問句的雙重句法規約。

在康文中還試圖用這樣一個事實證明句末語氣詞“呢”表疑問。曹禹先生的《家》中，464個非是非問句，句末帶“呢”的特指問有81個。在這81個問句中，“非疑問形式+呢”構成的問句多達50個，占全書帶疑問語氣詞“呢”的特指問句的54%，而“非疑問形式+↑”構成的問句幾乎沒有。這就說明，非是非問句簡略式中，通常用句末語氣詞“呢”表示疑問。即使用疑問語調表示疑問“呢”表疑問語氣的性質也不能被否定。^[2]

我們認為康亮芳先生的這種論證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憑一部作品中的統計數據即得出結論是不可靠的，再次，即使在非是非問句的簡略式中，“非疑問形式+呢”出現的頻率高於“非疑問形式+↑”，也只能說明語氣詞“呢”常常用在疑問句末尾，而不能得出句末語氣詞“呢”表示疑問這樣的結論。

3. “呢”作是非問的句管控考察

儘管目前學術界對於語氣詞“呢”是否為疑問語氣詞有爭論，但是對於語氣詞“呢”還是存在一些共同的想法，比如語氣詞“呢”只能用在非是非問的末尾。

通過對大量語料的發掘我們發現語氣詞“呢”不僅可以用在非是非問句後，而且也能用在是非問句後。請看下列例子：

「15」陳昆生把一個小旅行袋彎腰放在了靠門邊的地上，直起身來帶著笑說：“啊，秀玉，好久不見了，看電視呢？”（諶容《夢中的河》）

「16」阿芳看到他痛苦的表情，忙問：“大哥，你沒事呢？”（安安《春毒》）

「17」王華欣在電話裏笑著說：“騾子，還記恨我呢？”（李佩甫《羊的門》）

「18」你還是在唱貓腔呢？（莫言《檀香刑》）

「19」“米蘭你現在帶著呢？”（王朔《動物凶猛》）

語氣詞“呢”用於是非問這一用法比較特殊。

一般規律和特殊現象並存，各自存在的條件只有在“句管控”中才得以區別。從這一角度看，“句管控”包容了從一般到特殊的全部規律。越是特殊的現象及其規律，管控越嚴，要求越具體。^[3]

通過觀察上面的例子可知：語氣詞“呢”用於是非問其實有著嚴格的句法管控。

管控語氣詞“呢”用於是非問的句法語義格局為：（一）動作現場性。表現在可以加“在”、“現在”等詞。（二）句子的信大於疑。表現在句子不能完全為疑，且往往信大於疑。也不能完全是信。如果句子完全為“疑”而沒有“信”，則句子將不再是非問而是非是非問。但也不能全是信，即使句子的信可以遠遠大於疑的程度。如果全是信，句子將會是陳述句。

例「15」~例「19」中，語氣詞“呢”所在的問句都是是非問句。它們所在的句子受著上述提到的嚴格的句法語義格局的管控，例「15」~例「19」均表示動作的現場性，都是說話人現場和被說話人的對話，為了體現其現場性，往往可以加上“在”、“現在”等詞。比如例「15」就能說成：“啊，秀玉，好久不見了，在看電視呢？”，例「16」可以說成：“大哥，你現在沒事呢？”，例「17」可以說成：“驢子，還在記恨我呢？”例「18」和例「19」由於句中有“在”，所以加上“在”反而顯得累贅。除了動作的現場性規約外，句子的信要大於疑，且句子必須要有“信”，如果句子都是“疑”沒有“信”，則語氣詞“呢”所在的問句將不再是是非問。

比如這樣一個場景：甲看到乙和一個貌似她他媽媽的人丙一起向他走過來了，甲對乙問道：你媽呢？（說話的同時用頭指了丙的方向）。這時甲的問話就是是非問，因為在甲的眼裏，丙就是乙的媽媽，甲對這個問題是信大於疑，這時甲的問話“你媽呢？”意思是“她是你媽媽吧？”因為這時受到了（一）動作現場性（二）信大於疑的雙重句法規約。從而該問句為是非問。

如果脫離了這兩種句法規約的任何一個，甲的問話都不再是是非問而是特指問了，比如甲完全不知道乙的媽媽在哪兒，這時甲對乙說：“你媽呢？”這時甲的意思就是“你媽在哪兒呢？”“你媽去幹什麼去了呢？”等等，該問句就是特指問，而非是非問了。

用“句管控”的思想我們繼續觀察下面的例子：

（1）我正在看你寫的書呢。

~（1）我正在看你寫的書呢？

（2）我正在看他寫的書呢。

~（2）我正在看他寫的書呢？

經過觀察可知，例（1）和~（1）、例（2）和~（2）這兩組例子都不可能為問句，只能是陳述句，因為主語是第一人稱“我”，所以該主語引發的動作

是百分之百的“信”，這樣就不滿足管控“呢”用於是非問的條件（二）了。

（3）你正在看我寫的書呢。

~（3）你正在看我寫的書呢？

（4）你正在看他寫的書呢。

~（4）你正在看他寫的書呢？

在這兩組句子中，例（3）、例（4）為陳述句，而例~（3）、例~（4）為疑問句。兩組句子有兩種不同結果的原因在於，句子處於不同的句法語義格局，例~（3）、例~（4）所在的句子受到“信”大於“疑”的語義規約，從而規約其為疑問句。而例（3）、例（4）未受到那樣的句法規約，這兩例均為全“信”，並無“疑”在裏頭，故而都為陳述句。

（5）他正在看我寫的書呢。

~（5）他正在看我寫的書呢？

（6）他正在看你寫的書呢。

~（6）他正在看你寫的書呢？

上面兩組句子，例（5）和例（6）為陳述句，例~（5）和例~（6）例為是非問句，例~（5）和例~（6）之所以為是非問句，是因為受到說話人“信”大於“疑”的規約。如果失去這個規約，像例（5）和例（6）句子都是“信”並無“疑”，失去了致使“呢”成為是非問的條件（二），從而都是陳述句了。

以上分析是“呢”所在的句子為是非問的句法管控條件。“呢”用於是非問與典型的帶“嗎”的是非問有著明顯的不同之處，下面我們分析一下其語用價值的不同。

我們對例「15」~例「19」做如下變換：將句末的“呢”均換成“嗎”：

~「15」陳昆生把一個小旅行袋彎腰放在了靠門邊的地上，直起身來帶著笑說：“啊，秀玉，好久不見了，看電視嗎？”（諷容《夢中的河》）

~「16」阿芳看到他痛苦的表情，忙問：“大

哥，你沒事嗎？”（安安《春毒》）

~「17」王華欣在電話裏笑著說：“騾子，還記恨我嗎？”（李佩甫《羊的門》）

~「18」你還是在唱貓腔嗎？（莫言《檀香刑》）

~「19」“米蘭你現在帶著嗎？”（王朔《動物凶猛》）

例「15」與例~「15」同是是非問，但它們的區別在於例「15」的疑問度比例~「15」的疑問度要低得多，例「15」中陳昆生問“看電視呢？”的時候，他已經知道被問者秀玉本身就是在看電視，屬於明知故問，而如果改成例~「15」中的問句“看電視嗎？”，陳昆生問“看電視嗎？”的時候，他並不知道秀玉是否在看電視。

例「16」與例~「16」都是是非問，但「16」相對~「16」來說，疑問程度要低得多，阿芳已經看到秦漢林表情痛苦，問到：“大哥，你沒事呢？”只是關切的問候，相當於問：“大哥，你沒事吧？”，這裏的疑問程度很低，而如果阿芳已經看到秦漢林表情痛苦，問到：“大哥，你沒事嗎？”則疑問程度很高。

例「17」和例~「17」同為是非問句，但例「17」的疑問程度相比例~「17」來說要低得多，“騾子，還記恨我呢？”表明王華欣已經感覺到騾子在記恨他，而如果說成：“騾子，還記恨我嗎？”則王華欣對騾子是否記恨他並不之情，例「17」比例~「17」的疑問程度降低許多。

例「18」~例「18」與例~「19」—例~「19」的分析對比，與前面幾例的分析對比類似，在此不一一贅述了。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語氣詞“呢”不僅可以用於非是非問末尾，而且也能用於是非問末尾，但是“呢”用在句末表示是非問是有著嚴格的句法管控的，失去了這個管控就不是是非問。當“呢”用於是非問的時候其與典型的用於是非問末尾的語氣

詞“嗎”賦予句子的涵義有不同之處，它們的差異在於：問句的疑問度降低了，發問者用“是非問+呢”的形式提問，往往是“信”大於“疑”，從這個角度上也能證明疑問句末尾的語氣詞“呢”並不表疑問。

4.句管控視角下對疑問句末的語氣詞“呢” 是表示“深究”義的質疑

《現代漢語常用虛詞詞典》中認為：語氣詞“呢”表示疑問語氣，用在疑問句末尾（是非問句除外），表示疑問語氣，並含深究的意味，這種看法代表了很大一部分觀點。邵敬敏先生在文獻[3]中提到，“呢”在非是非問句中表示“提醒”兼“深究”。熊仲儒先生在文獻[7]中提到：在言語表達中，在不引起歧義的前提下，詢問他人時較少使用“呢”，其原因可能就是因為“深究”義不太符合禮貌原則；在獨白時，較多使用“呢”，其原因也可能就是因為“深究”義能促使自己思考。孫汝建先生則認為：語氣詞“呢”用在疑問句句末，增添“深究”的口氣。^[1]以上學者普遍認為語氣詞“呢”在疑問句中表示“深究”義，下面我們將在句管控的視角下探討語氣詞“呢”是否有無“深究”義，那麼我們要提出幾個問題：1. 什麼是“深究”義，它和“疑問”義有什麼不同？2. 大量表示“深究”義的疑問句與語氣詞“呢”並無直接的聯繫是否能說明什麼問題呢？

首先我們看第一個問題：“深究”義表示什麼，它和“疑問”的關係是什麼？

關於“深究”義，並沒有一個確切的定義，我們姑且給它下個定義：“深究”就是表示說話人特別想知道所問話的內容。如果用在問句中，表“深究”的疑問句就是發話人特別想知道所問結果的問句，往往和“究竟”、“到底”、“如何”、“何以”、“為什麼”等詞連用。表深究的疑問句，首先要是疑問

句，在疑問句的基礎上又進一步表示特別想知道結果。對第二個問題：大量表示“深究”義的疑問句與語氣詞“呢”並無直接的聯繫是否能說明什麼問題呢？

邵敬敏先生在文獻^[1]中提到：正由於“呢”有提醒疑問點的作用，因而它就不帶“呢”的疑問句多了一層“追根尋底”的意思，等於說“到底……？”“究竟……？”可見，“呢”在非是非問句中的派生意義是表示“深究”。^[1]對此觀點我們並不認同，如果說“呢”在疑問句中等於說給疑問句多了一層“追根尋底”的意思，那麼我們看下列幾個例子：

「20」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趙樹理《三裏灣》）

「21」只是感到對他的工作沒有政治基礎，究竟能起個什麼效果呢？（李英儒《野火春風斗古城》）

「22」他的長官究竟是誰呢？（劉流，《烈火金鋼》）

「23」胡杏，那可愛、可憐的小丫頭，究竟保得住、保不住呢？（歐陽山《苦鬥》）

「24」它與匪徒究竟有沒有關係呢？（曲波《林海雪原》）

「25」羅維民緊張地思考著，一時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究竟該不該告訴趙中和呢？（張平《十面埋伏》）

例「20」~例「25」這幾例都是表示“深究”的意義，如果說加上“呢”的疑問句比不加“呢”的疑問句多了“到底……？”“究竟……？”等意思在裏面的話，為什麼這些疑問句在句末出現了“呢”外還要加上“究竟”等詞表示“深究”呢？

我們再看下面一組例子：

「26」何科長問張信：“玉生究竟屬哪個組？”（趙樹理《三裏灣》）

「27」她抽開門門，盯著進來的披著防雨東西的

人：“你究竟是誰？”（馮德英《迎春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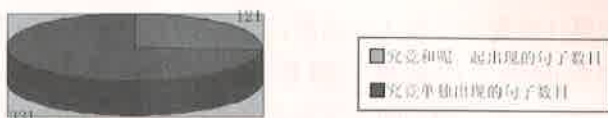
「28」這的確是個好機會，究竟可靠不可靠？（劉流《烈火金鋼》）

「29」陳文娣在心裏自己問自己道：“你究竟是愛他，還是感激他？”（歐陽山《三家巷》）

我們可以看到例「26」~「29」這幾例也是表示深究的意義，但是，這幾例中句末並沒有出現語氣詞“呢”，我們認為句子表深究的意味是由問話人特別想知道結果的句法語義格局顯現出來的，而這種句法語義格局往往也同“究竟”、“到底”等詞一同出現，“深究”義與有無語氣詞“呢”並無直接聯繫。

我們對華中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的現當代語料庫（以下簡稱CCL語料庫），中表示“深究”義的句子進行了統計，統計圖如下：

疑問句中出現“究竟”表深究義的句子統計圖(圖1)



疑問句中出現“到底”表深究義的句子統計圖(圖2)



從圖1、圖2我們可以發現表“深究”義的句子末尾既可以出現語氣詞“呢”也可以不出現語氣詞“呢”，句子的“深究”義不是由語氣詞“呢”造成的，而是由問話人特別想知道結果的句法語義格局規約出來的，往往這種句法語義格局會伴隨著“究竟”、“到底”等詞的出現，語氣詞“呢”與句子表達“深究”義與否並無直接關係。我們接著再看下面幾個例子：

「30」二虎又問道：“你是什麼人？”（劉流，

《烈火金鋼》)

「31」史更新什麼的幹活？（劉流《烈火金鋼》）

「32」說得對，我再問你：日本人爲什麼放出你來？（劉流《烈火金鋼》）

「33」朱老鞏氣憤憤地說：“我看看誰敢損壞這座古鐘？”（梁斌《紅旗譜》）

「34」到底在什麼地方？（李英儒《野火春風斗古城》）

例「30」所在的語境是：肖飛將二虎撂倒後，二虎拿著刺刀問肖飛，在這種情況下，二虎等於是說“你究竟是什麼人？”，句子含有深究義，但是句末並未出現語氣詞“呢”。例「31」所在的語境是：毛驢太君對獨眼龍進行盤問，就是問“史更新究竟是什麼的幹活？”，但是在句末並未出現語氣詞“呢”。例「32」的上下文語境是：何大拿逼問保長解文華問他爲什麼會被日本人放出來，這種情況也是也是包含追根問到底的意思，但是句末並未出現語氣詞“呢”，例「33」的上下文語境是：馮家大院的人要砸鐘，並請來當地有威望的嚴老尚幫忙，朱老鞏舉起鋤刀站在鐘前保護鐘，朱老鞏說的這句話就是“我看看到底誰敢損壞這座古鐘？”，但是，疑問句末並未出現語氣詞“呢”。例「34」所在的語境是：“這，你不必管啦，我已經安排妥當了。”“到底在什麼地方？”楊曉冬被她逼問的無奈，向城牆根努了努嘴。”這時銀環逼問楊曉冬睡在什麼地方，明顯含有深究義，而語氣詞“呢”並未出現。

可見語氣詞“呢”在疑問句末出現與否與句子的深究義並無必然聯繫，在表深究的疑問句末尾，語氣詞“呢”可以出現，也可以不出現。疑問句的“深究”義並不是語氣詞“呢”造成的，而是由問話人特別想知道結果的句法語義格局規約出來的。

我們接著再看幾例：

「35」他說：“咱們調解委員會，不能給人家調

解得沒有事，反叫人家分了家，群眾會不會說閑話呢？（趙樹理《三裏灣》）

「36」周大勇說：“同志們，你們坐在泥水裏，苦不苦呢？”（杜鵬程《保衛延安》）

「37」俺們有什麼法子呢？（馮德英《苦菜花》）

例「35」~「37」這幾例疑問句的句末都帶語氣詞“呢”，我們將這幾例去掉句末的語氣詞“呢”後，句子變爲：

~「35」他說：“咱們調解委員會，不能給人家調解得沒有事，反叫人家分了家，群眾會不會說閑話？”~「36」周大勇說：“同志們，你們坐在泥水裏，苦不苦？”~「37」俺們有什麼法子？我們認爲例「35」~「37」只是普通的疑問句，其中並未包含“深究”義，如果不考慮語用的因素，僅從表達疑問的角度看可以看出例~「35」至~「37」這幾例同例「35」~例「37」並無差別，爲了讓例「35」~例「37」表達“深究”的意味，可以顯示的加上“究竟”、“到底”等詞語，變成“群眾究竟會不會說閑話呢？”“到底苦不苦呢？”“俺們到底有什麼法子呢？”來表示“深究”義。

上面幾組例子可以看出：表深究義的句子末尾既可以出現語氣詞“呢”也可以不出現語氣詞“呢”，其深究義不是由語氣詞“呢”來表達，而是由問話人特別想知道結果的句法語義格局規約出來的。

以上的說明都是在語氣詞“呢”用在是非問句下的時候得出的。如果語氣詞“呢”用在是非問的末尾，說它帶有深究義也說不通，請看下面的例子：

「38」“還沒完呢？”（王朔《給我頂住》）

「39」看見我笑咪咪地問：玩捉迷藏呢？（王朔《看上去很美》）

「40」還記著我踩塌您家房的仇呢？（王朔《劉慧芳》）

「41」“怎麼，替兒子寫檢查呢？”（王朔《我是

你爸爸》)

例「38」的語境是：趙蕾明明看見關山平和周瑾兩人在說話並沒有結束而發問的，很顯然在這裏語氣詞“呢”並不含深究的意味。例「39」的語境是：老院長在夕陽下散步，看見“我”小心翼翼地走過剛擦過滑溜溜的瓷磚地，從後面溜掉，而發的問，顯然這裏疑問句信大於疑，該疑問句並無“深究”義。例「40」的語境是：劉大媽笑著站起來，“不行不行，我不會喝。”“瞧不起我？還記著我踩塌您家房的仇呢？”，夏順開給劉大媽敬酒，劉大媽不喝酒，這時“還記著我踩塌您家房的仇呢？”只是夏順開為了拉近和劉大媽的距離，並無“深究”義在裏面。例「41」所在句子的語境是：夏經平已經猜到馬林生在給兒子寫檢查了，所以這時的問句“怎麼，替兒子寫檢查呢？”並不包含任何“深究”義，相反的，因為語氣詞“呢”的存在，減少了疑問的成分。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語氣詞“呢”用在疑問句末，並不表“深究”義。

5、結語

(一) 語氣詞“呢”用在疑問句末尾不表疑問語氣。疑問句的疑問語氣是由疑問語調、特指問疑問詞語、疑問句法結構等疑問標記或者由語境中省略的這些成分的句法規約形成的，如果句子失去了疑問標記的管控作用，即使句末有語氣詞“呢”，句子也不表示疑問。

(二) 語氣詞“呢”不僅可以用於非是非問句末尾，而且也能用於是非問句末尾。

管控語氣詞“呢”用於是非問的句法語義格局為：(1) 動作現場性。表現在可以加“在”、“現在”等詞。(2) 句子的信大於疑。表現在句子不能完全為疑，且往往信大於疑。也不能完全是信。如果句子完全為“疑”而沒有“信”，則句子將不再是非問

而是非是非問。但也不能全是信，即使句子的信可以遠遠大於疑的程度。如果全是信，句子將會是陳述句。

(三) 語氣詞“呢”用在疑問句末並不表示“深究”義。句子的“深究”義不是由語氣詞“呢”造成的，而是由問話人特別想知道結果的句法語義格局規約出來的，往往這種句法語義格局會伴隨著“究竟”、“到底”等詞的出現，語氣詞“呢”與句子表達“深究”義與否並無直接關係。

任何理論，都不是一開始就完善的。為了理論的不斷完善，必須步步逼進地讓理論貼近語言事實。^①本文對用在疑問句末的語氣詞“呢”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這些意見不能說就是正確的，還需要大量的實際語料和事實來檢驗。關於用在疑問句末的語氣詞“呢”，還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問題，筆者擬另文撰述。

參考文獻：

- [1] 邢福義. 說“句管控”. 方言. 2001(2).
- [2] 邢福義 沈威. 理論的改善和事實的支撐——關於領屬性偏正結構充當遠賓語[J]. 漢語學報 2008年第3期.
- [3] 邵敬敏. 語氣詞“呢”在疑問句中的作用[J]. 中國語文. 1989年第3期.
- [4] 孫瑞 李麗虹. 語氣詞“呢”研究述評[J]. 集美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6年第4期.
- [5] 李宇明. 疑問標記的複用及標記功能的衰變[J]. 中國語文 1997年第2期.
- [6] 康亮芳. 從現代漢語疑問句的構成情況看疑問句句末語氣詞“呢”[J]. 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8年第4期.
- [7] 熊仲儒. “呢”在疑問句中的意義[J]. 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9年第1期.
- [8] 孫汝建. 句末語氣詞的四種語用功能[J]. 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5年第2期.

現代漢語的時量成分與時量系統

Numeral-classifier Constituents and System in Modern Chinese

◎楊世鐵 / 淮北煤炭師範學院

提要：本文首先考察了現代漢語時量成分的類型和範圍，然後根據它的語義特點把時量成分作了兩類劃分——有定的和無定的，指小的和指大的，並從靜態和動態兩個方面分析了這兩種分類的相對性和實際價值。最後，文章還考察了現代漢語時量成分的存在方式及其特點，指出現代漢語的時量成分是成系統的，這個時量系統由數詞系統和量詞系統組成，它常常以各種變體的形式表現出來。

關鍵字：時量成分 時量系統 有定 無定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to the type and scope of numeral-classifier constituents in Modern Chinese, this paper have classified numeral-classifier constituents into two kinds, that is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augmentative and diminutive. The author also analyzed the relativity and actual value of these two classifications. Finally, the paper concluded that numeral-classifier constituent in Chinese which appears in every kinds of variant forms is systematic and composed of numeral system and classifier system.

Key Words: numeral-classifier constituents system definite indefinite

引言

時量成分是漢語中很有特點的一類語法單位。對這類單位，由於著眼點不同，人們的叫法也不一樣，有的注重這類單位的語義特點而稱作時段或時段時間詞，如丁聲樹等（1980）和陸儉明（1991）；有的則注重這類單位多數由數詞加上表示時段的範圍量詞（朱德熙先生叫准量詞）構成的而稱為時量或時量成分，如朱德熙（1982）和馬慶株（1981）。我們認為，在現代漢語中，能夠表示時段的語法單位，除了數量詞組以外，還有詞，如“一會兒”“一陣兒”等等，“時量成分”這個術語比其他術語的涵蓋面要廣一些，既可以統括短語和詞兩級語法單位，又能兼顧這類單位的語義和形式兩個方面。所以，本文採用“時量成分”這一術語，並認為時量成分是能夠表示時段的短語或詞。

對這類單位的特點及它們在句子中的位置等問題，前人已作了不少研究，但全面細緻分析的文章還不多。邢福義（1995）指出，“弄清漢語裏時間方所的表達採用一些什麼樣的形式，形成什麼樣的表述系統，這是深入認識漢語的重要角度。”受此啟發，我們覺得還有必要對現代漢語的時量成分再作一番考察，看看時量成分到底包含哪些內容、如何給它們分類以及各類之間的關係如何，等等。

本文將從靜態和動態兩個方面進行考察。

一、廣義的時量成分和狹義的時量成分

1.1 漢語的時量成分是一個開放性的語法類。表現為：（一）或大或小、或長或短的時量成分的數量難以計算；（二）時量成分的構成非常複雜，既有短語也有詞。為此，我們先確定一下時量成分的範圍。

1.2 漢語的時量成分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時量成分包括至少包括以下幾類：

A. 由“數詞+量詞”或“數詞+個+准量詞”^①構成的、表示時段的數量詞組。例如：

十秒（鐘） 一上午 兩晚上 三五天 兩三個星期
許多年 幾年 十二三年 百八十年 一輩子 五、六個
小時 半個月 若干個月 四個季度 兩個世紀

B. 表示一段時間的詞，如：

一會兒 一陣（兒） 不久 片刻

C. 表示時段的一般性短語，例如：一些日子
好長時間 很久 好久 一瞬間 沒多久 沒幾天
不幾天 沒多大工夫

D. 包含A類數量詞組或時間名詞的、中心詞為“時間”“期間”“工夫”等等的名詞性短語。例如：三個月的時間 春節期間 一眨眼的工夫

E. 中間加“一”的動詞重疊形式，例如：

（小張去郵局了，他讓你）等一等（。）

（鑰匙不見了。快）找一找（！）

（我們）歇一歇（再走吧。）

（到前邊那個路口先）停一停（，我下去辦點事兒。）

F. 數詞“一”加動量詞，例如：

（說）一通 （吃）一氣 （來）一下兒 （吸）

一次 （討論）一番 （說了）一遍

G. 表時段的介詞短語和方位詞組，例如：

在去年 自去年10月 從上個月 在解放以前 兩個鐘頭以前
香港回歸以後 文革期間 一個月當中 五年裏
解放以來 九年以上 十五年以下

H. 既表時點又表時段的、普通的时间名詞，例如：過去 以前 從前 現在 眼下 目前 時下 將來 未來 昨天 今天 以後 早晨 夜裏 春天 明年

上述8類單位都能表示時段，都屬於時量成分，但內部性質又略有差異：A、B、C、D四類只表示時段，具有單義性，但D類是在A類的基礎上構成的名詞性短語，真正表示時段的只是其中的數量組合，考慮到表時段的數量組合在整個短語中的地位的附屬性特

點，雖然表意上與A類並無太大區別，還是把它看作不同於前類的時量成分較好，並稱為廣義的時量成分。E類和F類由數詞“一”加上動量詞構成，大多數情況下，它們表示動作行為的方式或次數，只因暗含著“一段時間”，因而也常常被人們看作時量成分，^[2]鑒於這兩類單位表示時段的不明確性，也應看作廣義上的時量成分。H類是人們常說的時間名詞，G類由介詞或方位詞加上時間名詞或數量詞組構成，跟D類有些相似——多是在A、B兩類的基礎上構成的，且形式上又較為複雜；這兩類既可以表示時段又可以表示時點，表意上具有不確定性，所以也屬於廣義的時量成分。這裏，我們區分廣義和狹義時量成分的標準是：表意是否單一、結構是否複雜。

為方便討論，我們把本文所討論的時量成分限定為狹義的時量成分。這樣，本文所說的時量成分主要包括下面三種情況：由“數詞+量詞”、“數詞+個+准量詞”構成的表示時段的數量詞組（A類）；只表示時段的詞（B類）；一般的表示時段的短語（C類）。此外，對於中間能插入“整”“多”“來”“大”“小”等表示時段的數量詞組，如“一整天”“十多天”“兩個多星期”“二十來年”“四個來月”“一大會兒”“一小陣兒”等，因其沒有破壞原有的整體結構，而且表意單一，故也可以納入狹義的時量成分中來考察。^[3]

二 時量成分的類

2.1 如上文所說，現代漢語中的時量成分多由數詞和量詞組合而成，因而這類單位多屬於詞的自由組合，這一特點就決定了時量成分的數量是難以計算的，即使如此，但它們表現出來的語義類型是有限的，我們可以憑借這有限的時量成分的語義類型給它們分類。

2.2 首先，根據時量成分表示的語義是否確定，

可以把時量成分分為有定的（definite）和無定的（indefinite）兩類。^[4]有定的時量成分（記作Td）表示的時間量是確定的；無定的時量成分（記作Ti）表示的時間量不確定。例如：

Td. 半秒種 一分鐘 兩刻鐘 三個小時 四天 五個星期 九個月 十年 兩個世紀 一整天 整三年

Ti. 一會兒/陣兒 不久 一瞬間 一下午 三個晚上 許多天 幾天 多半年 一大會兒 十多分鐘 四五個小時 六個來鐘頭 三五十年 半輩子 好長時間

Td類是有定的時量成分，表示的時間量是固定的；Ti類是無定的時量成分，它表示的時間量總具有伸縮性。

當然，我們說有定的時量成分表示一個固定的時段，並不意味著在任何時候它都是固定的，在進入句子以後，這種“固定性”可能會發生變化。比如，由數詞“兩”構成的時量成分在運用中就常常表示不確定時量，如：“你過兩天再來”“回家呆上兩個月”中的“兩天”和“兩個月”，一般都不表示確指。這裏，“兩”字的讀音起了決定作用：重讀時一般為確指，輕讀時一般為虛指。再如“我在北京學習了三年”這句話中的“三年”，也不可能指整整三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事實上，少幾天多幾天，甚至一兩個月，都可以這樣說。類似現象我們可用語言的模糊性來解釋，也可以從語用的角度來說明：用於科學計量的、有定的時量成分表示確指，而日常生活中的有定的時量成分，除非通過重讀有意強調以外，一般都虛指。這大概跟漢民族的時間觀念不強有一定關係。

無定的時量成分表示不確定的時段，這是絕對的。因為無定的時量成分中，或者數詞表意不確定，如“幾”“二三”“三五”；或者量詞部分表意不確定，如“會兒/陣兒”“上午”“中午”“下午”“晚上”“輩子”；或者數量詞組中含有不確定的修飾成分，如“來”“多”“大”“小”等。正是這些不確

定的因素決定了無定的時量成分在任何時候表意都不確定。可見，有定的時量成分表意的固定性是相對而言的，即相對於Ti類時量成分在任何時候表意都不固定這一點是確定的。

Td類和Ti類時量成分的上述語義特點，可從下圖中看得更為明顯（以“三個小時”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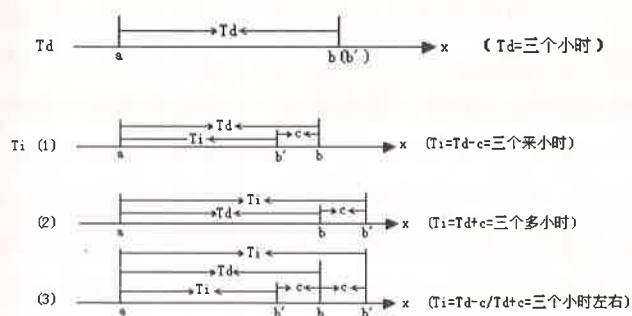


圖1

(X表示時軸；a表示記時起點；b或b'表示記時終點；ab表示固定時段，在本圖中表示“三個小時”，ab'表示相應的時量成分；c表示時段的可能的伸縮度。)

2.3 除了把時量成分分為有定和無定兩類之外，還可以根據它表示的時段的長短分為指小的、指中的和指大的三類。指小的時量成分（記作Ts）表示短時段，如“一秒鐘”“一會兒”；指大的時量成分（記作Ti）表示長時段，如“八十年”“一輩子”；指中的時量成分（記作Tm）表示不太短也不太長的時段，如“三分鐘”“兩天”。

2.3.1 時段的長短是相對而言的。如“七年”，單看時，它表示的時段是長是短很難確定，因為“七年”比“兩年”長，比“十三四個小時”更長，但把它跟“二十來年”比就顯得短一些，若跟“一輩子”相比就更短。可見，時段的長短往往通過比較才能看出來。

另外，時段的長短還跟說話者的心理有關、跟語境有關。說話者的心理是潛在的、隱性的，語境則是

外在的、顯性的。說話者的心理可以通過語境和說話時語音的輕重表現出來。從說者的心理來看，說話者認為某個時段長它就長，認為短它就短，聽者借助語境同樣能覺察出來。這裏，語境和語調對區別一個時量成分的大小起了決定作用。例如：

1) 你才復習了三四個小時就想通過考試？

2) 現在孩子們的作業太多了，每天晚上都要寫三四個小時。

1) 句中的“三四個小時”明顯指小，2) 句中的“三四個小時”明顯指大。我們之所以能做出正確的判斷，這裏依據的正是語境，如前一句中的“才”字和反問語氣。

2.3.2 以上我們從動態角度對影響時量成分大小的原因做了簡要分析，如果不考慮這些因素，單就時量成分本身來看，它所表示的時段是長是短也很複雜，其中，數詞、量詞、整個的數量組合以及組合中的修飾成分都對它產生影響。下面我們就從靜態角度先討論數詞表示的數目大小對它產生的影響，再討論量詞的語義類型對它的影響，最後結合數量組合中的修飾性成分來討論整個時量成分的大小問題。

2.3.2.1 數詞（指基數詞，下同）是表示數目的，任何時候都有大小之分。另外，數詞分簡單的和複雜的兩類，複雜的數詞，像“兩千零九十”“三千五百七十六”等，在口語中很少使用，我們可以忽略不計。

簡單的數詞指係數，或係數加係數，或係數加位數，或簡單的係位構造，如：零、半、一、二/兩、三、二三、六七、十、十一、十二、十一二、二十、三十、一百、一千、一萬、一億等等。在這些構造簡單的數詞當中，“零”表示沒有，不能單獨跟量詞組合表示時量，此外，“千”“萬”“億”等也很少與量詞結合用於口語中，比如我們很少說、也很少聽到有人說：“兩千秒”“三千個小時”“五萬天”“七萬個月”“一億年”等。所以，這幾個數詞在分類時

也可以不加考慮。這樣，剩下的數詞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到“十”、“十”到“百”，在前一類中，“一”是指小的，“十”是指大的，“五”“六”處於中間位置，可以看作指中的，小於“五”的數詞如“四”可以認為是接近指中的而是指小的；“七”是接近指中的而是指大的。同理，在後一類中，“十”是指小的，“百”是指大的，“五十”“六十”是指中的，“三十”是指小的，“八十”是指大的。此外，結合這兩類來考慮，小於“一”的可以認為是指小的，大於“百”的可以認為是指大的。這裏的指小、指大或者指中沒有一個絕對的客觀標準，因而它只是相對的。為清楚地揭示這種關係，我們以前一類為例，列圖如下：^[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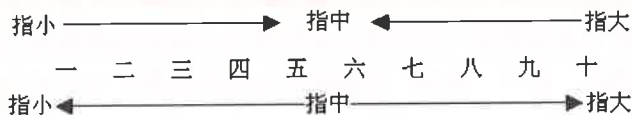


圖2

2.3.2.2表時段的量詞也有大小之分，如“世紀”大於“年”，“年”大於“月”，“月”大於“旬”，“旬”大於“周”等等。量詞的大小影響了時段的長短。從語義類型上看，能表時段的量詞主要有：秒（鐘）、分（鐘）、刻（鐘）、小時、天、周/星期/禮拜、旬、月、年、世紀、會兒/陣兒、輩子等。其中，前十個表意確定，屬於一類；後兩個表意不確定，是另一類。在前一類中，“旬”和“世紀”不太常用，可以忽略，在剩下的八個裏面，“秒（鐘）”是最小的表示時段的量詞，“年”是最大的，“小時”“天”大致處於中心位置，可以看作是指中的。在其左邊的、小於它的量詞都是指小的量詞，在它們右邊的、大於它的量詞都是指大的量詞。至於第二類，因為只有兩個，而且語義相對又處於兩端，所以一個是指小的（“會兒/陣兒”），一個是指大的（“輩子”）。這種語義關係可以表示為下圖

（以第一類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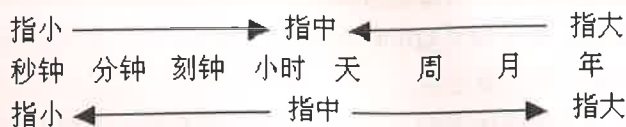


圖3

2.3.2.3 數詞和量詞都有指小、指中和指大的區別，由它們組合而成的時量成分也有這樣的區別。時量成分指小、指中，還是指大，一方面受數詞本身表示的數目大小的制約，另一方面也受量詞語義類型的影響，此外，還受數量詞組中的修飾性詞語的制約，而且這類詞語往往是制約某時量成分指小、指中或指大的決定性因素。比如，凡是帶有“來”的數量詞組一般是指小的時量成分，帶有“左右”的數量詞組一般是指中的，而帶有“多”“整”的數量詞組一般是指大的。因為它們反映了說話者的心理，是說話者心理的外在表現（可稱之為時量長短的標記）。下面就根據上述數詞、量詞及附加性詞語的特點，把時量成分分為指小的（記作Ts）、指中的（記作Tm）和指大的（記作Tl）三類。

Ts. 一會兒/陣兒 不久 幾秒鐘 二三分鐘 四分鐘 三個來星期 一個來月

Tm. 一陣子 二十分鐘 兩刻鐘 大概三個小時 七八天 五個月左右 一下午 一晚上

Tl. 好久 幾十分鐘 一陣子 十七八個小時 三十幾天 十整天 半個多月 一整年 這麼些年 一輩子^[6] 人們也許會發現，在上述所列舉的三類時量成分中，指小的時量成分中含有指大的量詞，而指大的時量成分中也含有指小的數詞和量詞，其實，這正是時量成分語義複雜的表現。我們上面說過，影響時量成分的指大指小有多種因素，因而在劃分時量成分時就不能只看其中的一個因素，如數詞的大小或量詞的大小等，而應該全面加以考慮，特別是數詞。因為數詞指大、指小還是指中，並不僅僅像上面說過的那麼簡

單，在使用中，它往往還受到與表示時段的量詞的、可能的、組合的影響，如表示秒、分鐘的數詞一般是1-60，表示刻鐘的數詞一般是1-4，表示月的一般是1-12等等，若非在書面語中表示科學計量，口語中很少會突破這個限制，像下面的這些說法我們就很少聽到：七十八秒、六刻鐘、三十四個月等。正是由於考慮到了種種複雜情況，我們才得出上述分類。

總之，我們劃分時量成分指小、指中和指大的標準是：首先看有無長短的標記、有何種標記，其次看量詞的類型，最後再考慮數詞的各種情況。^[7] 從以上兩個角度劃分出來的兩類時量成分的小類彼此有包含關係。例如，有定的和無定的時量成分都分別包含指小的、指中的和指大的三類；反過來，指小的、指中的和指大的時量成分也都分別包含有定的和無定的兩類。如下圖所示：

類別	舉例	語義特徵	
Td-s	半秒鐘 一分鐘 半個小時	[+指小]	
Td-m	二十分鐘 六個小時 四天 五個月 三年	[+指中]	[+有定]
Td-l	三十個小時 十整天 十一個月 四十五年	[+指大]	
Ti-s	一會兒/陣兒 幾秒鐘 二三分鐘 一個來小時	[+指小]	
Ti-m	一陣子 三十幾分鐘 八九天 十幾天 三五年	[+指中]	[+無定]
Ti-l	幾十分鐘 三十幾天 七個多月 這麼些年 一輩子	[+指大]	

三、時量系統

3.1 上面說過，時量成分主要由數詞和表示時段的量詞組成，因此，本節在討論時量系統時，先從數詞和量詞入手，最後再看數量組合的情況。

3.2 數是成系統的，數詞也是成系統的。能夠跟表示時段的量詞組合的數詞，如基數詞中的係數、系位構造，總是由小到大依次排列並存在於言語者的心理意識中，它們自然地構成一個連系統：一、二、三……十、十一……二十、三十……一百、一百零一、一百零二……二百、三百……

3.3 現代漢語中能表示時段的量詞由以下一些組成：

A. 秒鐘——分鐘——刻鐘——小時——天——周/星期/禮拜——旬——月——季度——年——世紀

B. 早晨——上午——中午——下午——晚上

這些量詞具有如下特點：A類由小到大按照固定的順序排列，前後相連的兩個量詞之間多具有相應的換算關係：若干個前者可以構成一個後者，一個後者等於若干前者。如六十秒鐘構成一分鐘，一分鐘等於六十秒鐘；七天構成一個星期，一個星期等於七天等等。這些量詞兩兩前後相連從而構成一個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體現了量詞的系統性。B類是對一個整體“天”的分割後形成的，缺少其中任何一個部分，這個整體就不會存在，這體現了量詞的另一種系統性。

3.4 數詞是成系統的，量詞也是成系統的，由數詞和量詞組合而成的時量成分也應該是成系統的。我們把由時量成分構成的系統叫時量系統。時量系統有大小之分，大系統之內包含若干小系統。我們先看小系統。

3.4.1 在現代漢語當中，時量成分按量詞的語義類型至少可以劃分出以下幾類：（“……”表示省略了的、具體的時量成分，“——”表示某兩類不同時量成分之間的、可能的轉換）。^[8]

A. ……半秒（鐘）……一秒（鐘）……十秒（鐘）……三十秒（鐘）—— ……六十秒（鐘）——……

b. ……半分鐘……一分鐘……十五分鐘——……三十分鐘——……六十分鐘——……

c. ……半刻鐘……一刻鐘……兩刻鐘—— ……四刻鐘—— ……

D. ……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十二（個）小時——……二十四（個）小時——……

E. ……半天……一天……七天（一星期）——……十天（一旬）——……十五天——……

三十天——……

F. ……半(個)月……一個月……倆月/兩個月……六個月——……十二個月——……

G. ……半年……一年……十年……五十年——……一百年——……

h. ……半個世紀……一個世紀……兩個世紀……五個世紀……

i. ……一會兒/一陣兒……幾個小時……(好)一陣子……半天……十幾個小時……十多天……一陣子……二三十天……半個多月……三十來年……一輩子……

上面這9類時量成分，因內部各自構成體系：即前後相連構成一個整體，所以我們都可以把它們看作小時量系統，其中a、b、c、d、e、f、g、h八個系統都是由簡單的數量詞組構成的純時量系統，我們可分別稱之為“秒系統”“分鐘系統”“刻系統”“小時系統”“天系統”“月系統”“年系統”“世紀系統”等，最後一個則是由表示無定指的名詞或量詞與個別數詞構成的，它能囊括上述所有各類小時量系統的因素，從而形成一個整體性的時量系統，我們可以叫它“雜時量系統”。這個“雜時量系統”與前面8個小時量系統的總體處於並列關係，而這8個小時量系統之間既是平行關係，也有叉接關係。其關係如下圖所示：

漢語時量小系統圖 3.4.2時量大系統是指由各類小時量系統構成的時量系統，它是所有的時量成分的聚合。由於漢語時量成分的數目難以計算，無法把這個聚合體的單位全部列舉出來，因而，只能選取部分時量成分作代表。例如：

……半秒種……一秒種……三十秒種/半分鐘……六十秒種/一分鐘……(一會兒)……十五分鐘/一刻鐘……三十分鐘/半小時……六十分鐘/一小時……(好一陣子)……十二個小時/半天……(十幾個小時)……二十四小時/一天……七天/一周/一星期/一個禮拜……(十來天)……十天/一旬……十五天

/半個月……三十天/一個月……(一個多月)……三個月/一個季度……六個月/半年……十二個月/一年……五十年/半個世紀……(六七十年)……(一輩子)……一百年/一個世紀……

從這個角度看，這些作代表的時量成分構成的系統並不就等於由所有的時量成分構成的系統，它只是時量大系統的一個模式(variant form)。我們還可以把這個大系統的模式進一步簡化，得出時量系統的最簡式(記作T—Sm)，並稱之為時量大系統：

T—Sm: ……一秒種……一分鐘……(一會兒)……一刻鐘……一個小時……一天……一星期……一旬……一個月……一個季度……一年……(一輩子)……一個世紀……

總之，現代漢語的時量系統，是由數詞和能表示時段的量詞組合起來形成的時量成分構成的系統。其中，起決定作用的主要是量詞系統，數詞系統對時量系統的構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從這個角度說，漢語的時量系統是由數詞系統和量詞系統組成的。

四、結語

4.1 由本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時量成分的語義類型是有限的，但具體的時量成分是無限的，這就說明我們不能把時量成分看作是語言的單位，而應該看作是言語的單位。鑒於此，有人把時量成分以及其他由數詞和量詞構成的單位叫做數量詞，這種叫法還需要進一步討論。我們的意見是叫數量詞組。

4.2 把時量成分劃分為“有定的”和“無定的”兩類，我們有足夠明確的標準，因此這樣劃分出的兩類時量成分，在內部具有語義上的同一性，對外部具有很強的排他性。如果把它們放到具體的語境中並結合語用來分析，就會發現，無定的時量成分是絕對的，不管是從語言的還是言語的角度來看，都是無定的；而有定的時量成分具有相對性：靜態觀察時是有

定的，動態觀察時有時是有定的，有時則是無定的。而把時量成分分為指小的、指中的和指大的三類，則缺乏絕對客觀的標準，因而這種劃分只是相對的，或說是嘗試性的，主要表現為：由於受多方面因素制約，在具體的語境中，指小的時量成分有可能指大，指大的時量成分也可能指小。給時量成分分類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遠非想像中的那麼容易。如何找到一些形式上的標準，使時量成分的分類更為合理，還值得人們去深入研究。

把時量成分分為有定的和無定的，分為指小的、指中的和指大的，對解釋下面這類語言現象可能有所幫助：能說“他們兩個相愛了一輩子”，不能說“他們兩個相愛了一會兒”，也不能說“他們兩個相愛了兩個小時”；能說“這件衣服買了三個小時”，不能說“這件衣服買了一會兒”，也不能說“這件衣服買了一輩子”，等等。^[1] 4.3數詞構成一個系統，量詞也構成一個系統，由數詞和量詞組合構成的時量成分也構成一個系統，最後的這個系統叫做時量系統。但是，數詞系統和量詞系統屬於詞類範疇，而時量成分是超語言的單位，因而時量系統屬於句法範疇。語言正是這樣由不同層次的大系統套小系統組成的一個層級體系。

註釋：

[1] 參見朱德熙（1982）。

[2] 馬慶株（1984）指出，“這類時量成分表示的時量很短，從語言心理上，動作的開始點和動作的結束點之間的距離趨近於零。”

[3] 有些表示時段的數量詞組，前後可以受“好”“整/整整”“多”“少”“大”“小”“老”“約/大約/約莫”“大概/大致”“將（jiāng）/將將/將近”“剛/剛剛”“不大”“老大”“很大”“這麼”“那麼”“左右”等等修飾，例如“好半天”“整/整整一晚上”“多半個月”“少半年”“大半年”“小半月”“老半天”“約三個小時”“大概一個星期”“將近六個月”“剛兩分鐘”“不大/很大/老大一會兒”“這麼幾天”“那麼幾年”“一星期左右”等等，雖然意義上

與中間能插入修飾性成分的那些時量成分沒有太大區別，但由於其結構比上面那些稍微複雜，為避免麻煩，還是看作廣義的時量成分更好。

[4] 參見馬慶株（1984）和邢福義（1995）。

[5] 數詞、量詞以及時量成分的分類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值得我們深入研究。本文所作的分類，雖然缺乏形式上的標準而帶有主觀性，不過可以用模糊數學的理論來解釋。參見樓世博等（1983）。

[6] 漢語中的“（好）一陣子”表示的時段很不確定，可以是幾個小時，也可以是十多天甚至一個多月。例如：（1）他們在他的腰圍弄了好一陣子，好像是為他繫上一件什麼東西似的，這就是後裙。（安徒生《皇帝的新裝》，《外國文學作品選》，少兒報社，1979年。）（2）在美國衛星拍攝的照片上，本溪市從地球上消失了，只留下一團神秘的煙霧。有人曾大為恐慌了一陣子，以為本溪成了核恐怖之源。（蔣子龍《北與南》，《蔣子龍散文自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95年。）

前句中的“好一陣子”表示的時段不可能超過一天，後句中的“一陣子”不可能少於一天。因此，我們既把它看作是其中的時量成分，也看作是指大的時量成分。下文在分析時量系統時，也做了相應處理。

[7] 指中的時量成分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因為從理論上講，這種分類中有指中的一類，所以我們粗略地列舉了一些，實際上，在運用中這類時量成分不是指大就是指小，表現為不大不小的情況是很難判斷的。

[8] “愛”這類動詞只能跟無定的、指大的時量成分組合；“買”不能跟指小的、有定的，或指小的、無定的時量成分組合。這類現象很有意思。值得繼續研究。

[9] 由於“周/星期/禮拜”“旬”不太常用，這裏沒有列舉，只在下面的時量系統圖中用虛線標出。

參考文獻：

- 1、丁聲樹等 1980《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商務印書館。
- 2、樓世博等 1983《模糊數學》，科學出版社。
- 3、陸儉明 1991《現代漢語時間詞說略》，《語言教學與研究》第1期。
- 4、馬慶株 1981《時量賓語和動詞的類》，《中國語文》第2期 1984《動詞後面時量成分與名詞的先後次序》，《語言學論叢》第十三輯，商務印書館。
- 5、邢福義 1993《現代漢語數量詞系統中的“半”和“雙”》，《語言教學與研究》第4期，又見《語法問題思索集》，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5年。1995《時間方所》，《語法問題思索集》，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 6、朱德熙 1982《語法講義》，商務印書館。

辭書編纂現代化的新理念

——人機界面工具使用的智能發揮

New Ideas of Modernization in Compile Dictionaries

◎張志毅 / 魯東大學

提要：本文探討了辭書編纂現代化的兩個新理念：細化義位，精華義徵。而它們必須建立在一個基礎上：發揮智慧，利用語料庫。

關鍵詞：辭書編纂, 現代化, 新理念。

Abstract: This paper inquires into two the new ideas of compile dictionaries: Meticulous descriptions sememe; Most concise semantic feature on the basis of advance in wisdom make use of corpus.

Key Words: New ideas, compile dictionaries, modernization.

1、辭書編纂現代化的當務之急

辭書編纂現代化包括許多內容,例如編纂手段電腦化、數字化,語料的資料庫化,釋義的現代化,而這一切又取決於理念的現代化。辭書編纂現代化的當務之急至少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機介面國際前沿產品的創造,一方面是

人機介面工具使用的智慧發揮。

人機介面國際前沿產品的創造，例如電子研究性辭典，其中每一個條目不僅有盡可能的語言性注釋，而且有相關學科的知識概述。它比“詳解詞典”還要詳解，比“百科全書”還要百科。莫斯科語義學派把這種條目內容叫“集成化”描寫或“一體化”描寫。又如《俄語詳解組合辭典》，它不同於傳統的《搭配詞典》，它必須給出搭配的多種可能和搭配的語音、語法、語義、語用（語境）條件，並盡可能形式化，以便電腦識別自然語言。

人機介面工具使用的智慧發揮。哲學認為，目的和手段，具有連續性和轉換性。同樣，產品和工具，也具有連續性和轉換性。例如，電腦和語料庫是工具和產品關係，語料庫和辭書又是工具和產品關係。在使用語料庫這個人機介面工具編纂辭書中，應該特別注意智慧的發揮。本文只談後一個新理念。

2、發揮智慧，利用語料庫，增改或細化義位

漢英一些對應詞，雖不可能完全等值，但是西方詞典比漢語詞典對應詞的義項常常繁多、精細。如英語run有“跑”等36個常用義項，非常用義項還有70來個。漢語的“跑”，《現漢》《漢語大詞典》都只有6個義項。又如詹森《英語詞典》（1775）take(拿)及物義項130個，不及物義項21個。漢語的“拿”在《漢語大詞典》只有13個義項。新版20卷《牛津大詞典》set（放，置）的主要義項有400個（俄國謝列蓋統計，轉自薛恩奎2006：150）。即便小型詞典，該詞也占2頁篇幅。“放”在《故訓匯纂》中彙集了104個“古訓”，到了《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分別給出給出27個、31個義項。相反的例子較少，如from（從）在《牛津大詞典》中給出15個義項，而“從”在《故訓匯纂》中彙集了271個“古訓”，當然其中絕大多數是語境義即語用義，到了《漢語大字典》

《漢語大詞典》都給出20多個義項。

以上這些絕對數量之間的比較，帶有簡單枚舉性，反映的多是直覺內省，論證的力度和有效性是有很小的。而相對數量則帶有定量分析性，反映的多是理智觀察，論證的力度和有效性是有很大的。請看下列百分比：漢語最常用詞和次常用詞共3051個，其中多義詞1337個，占43.8%，每個多義詞平均有2.91個義項。而英語常用詞共2078個，其中多義詞1673個，占80.5%，每個多義詞平均有4.65個義項，漢語的多義詞及其平均義項數量都是英語的近50%。這些差異，不完全是語言的實際情況的差異，而一部分原因是所見的語料多寡不同，研究者或編者認識的粗精各異，所以提煉出的義項多少有別。小型詞典宜粗，中型詞典粗細適中，大型詞典宜細，常用詞更應精細。因此，我們必須充分利用10多億平衡語料庫，發揮智慧，精審細辨，提煉出常用詞的新義項。例如：

【書】《現漢》只有一個義項——“裝訂成冊的著作”。

《牛津》有兩個義項：

- (1) “寫成或印成的著作……”
- (2) 旨在出版的書面作品。

精審漢語語料庫，“書”應改寫並增補為兩個義項：

- (1) 用紙等裝訂成冊的、自成知識系統的、供人閱讀的東西。
- (2) 正在寫的書，如“他在寫書”。

【科學】名詞之下，《現漢》只有一個義項——“反映自然、社會、思維等的客觀規律的分科的知識體系。”

《牛津》《韋氏新世界詞典》等英語詞典都給出5個義項。細辨漢語語料庫，“科學”至少應給出4個義項：

(1) 在觀察、研究、實驗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知識體系。如“學習科學”“用科學”。

(2) 專指自然科學。如“科學技術”“科學實驗”。

(3) 專指知識體系的一種或一個分支。如“化學是一門科學”，“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

(4) 指科學研究。如“從事科學工作”“科學院”“科學選題”。

【學校】《現漢》只有一個義項——“專門進行教育的機構”。

英語的school有名、動二性，在名詞之下，《牛津》給出9個義項。

仔細研究漢語語料，至少應給出5個義項：

(1) 專門進行教育的機構。

(2) 指學校的領導者。如“跟學校簽了合同”。

(3) 指學校的師生。如“學校正在忙著考試”。

(4) 指學校的建築物。如“在山上能看見學校”。

(5) 比喻獲得知識的方式、場所。如“實踐是一所特殊的學校”“社會就是他的學校”。

(“書、科學、學校”，見陳曉鷗1997)此外，還有“控制”“假”“我們”“詞典”“語言”等都須補充義項。

3、發揮智慧，利用語料庫，調整或精化義徵

詞典釋義中的義徵，指義位的語義特徵或義素，特指義位元的顯著特徵、區別特徵；不是指事物的所有屬性，呂叔湘(1980:63)先生把它們叫“細節”，也不是指概念的本質屬性。釋義中的義徵，有三個量：超量，造成累贅、羅索、義域過窄；不足量，造成過簡、缺漏、義域過寬；適量，則義值相等，義域寬窄適當。從義值視角劃分，釋義中的義徵，有三個值：誤值，錯誤的義素，不該放進釋語中；偏值，偏離正確的值，不準確的義素；零值，不起區分作用的值，可有可無的義素。在海量語料庫面前，精化義素比細化義位的工作，更繁多、更複雜、更艱巨。因為用有限的語素反映無限的事物的無限“細節”，有語素標記的細節為“顯示”，沒有語素標記的細節為“暗示”。(呂叔湘1980:64)釋義時，既要釋出顯示細節，也得扼要釋出暗示細節，釋出義素的多少，影響義位的精確度、區別度、義域寬度。義素的多少必須適度。例如：

【田徑運動】體育運動項目的一大類，包括各種跳躍、投擲、跑賽和競走等。(《現漢》)

a serie of contests in nning,jumping, shot-putting, etc.perfomed on a track or on a field.(WNWCD4) / 在跑道或運動場上進行的跑步、跳躍、射擊等系列專案的比賽。(韋氏新世界大學詞典第4版)

《現漢》《WNWCD4》偏窄，應有“全能運動”；《WNWCD4》窄中又有寬，不應有“射擊”。應釋為：

體育運動項目的一大類，包括各種跳躍、投擲、跑賽、競走和全能運動等。

【乳汁】成熟的雌性哺乳動物所分泌的(a)一種白色(b)液體(c)，用於餵養幼崽，直至斷奶為止(d)。(《柯林斯》)

雌性哺乳動物產生的 (a) 白色液體 (b)，是她們幼崽的食物 (c)。尤指牛奶

(d)，適於人類飲用和製造黃油和乳酪 (e)。
(《牛津現代高級英語學習詞典》)

由乳腺分泌出來的 (a) 白色液體 (b)，含水、蛋白質、乳糖、鹽類等營養物資

(f)。通稱奶 (g)。(《現漢》)

《柯林斯》給出：(a) 來源義徵，(b) 外部義徵，(c) 上位義徵，(d) 功用義徵。其功用義徵，還不足量。《牛津》的前三個義徵跟《柯林斯》相同，後兩個——d 是特指義徵，e 是其他功用義徵。其功用義徵，有些煩瑣、超量。《現漢》給出的 f 是內部義徵，似無必要。g 是轉碼資訊，很有必要。根據以上認識，“乳汁”在中型語文詞典中應解釋為：

通稱奶。母體產生的，餵養幼子（或作他用）的白色液體。

又如：

【藍寶石】藍色的或紅色以外其他顏色的透明剛玉，也有無色的。硬度大，用來做首飾和精密儀器的軸承等。(《現漢》)

sapphire clear, bright blue jewel (OALD)/ “藍寶石”透明的、發亮的藍色的寶石。(《牛津高級學習詞典》)

《現漢》的“藍色的”是超量、零值義徵，因為下文已經有“紅色以外其他顏色的”；“剛玉”也是零值義徵，因為它比“寶石”不常見，難懂。《牛津》的“藍色的”是誤值；“藍寶石”指“紅色以外的”，這是世界上的習慣分類。因此應釋為：

透明的、發亮的紅色以外的玉。

【鏡子】有光滑的平面，能照見形象的器具，古代用銅鑄厚圓片磨制，現在用平面玻璃鍍銀或鍍鋁做

成。(《現漢》) Mirror a polished or smooth surface (as of glass) that forms images by reflection. (MW10)/ “鏡子”拋光或光滑的（如玻璃的）平面，可以通過反射映出圖像。(梅裏亞姆-韋氏大學詞典)

《現漢》的“古代用銅鑄厚圓片磨制”是超量義徵，似無必要。《梅氏詞典》的“拋光或光滑的平面”是偏值義徵，不準確，反映不出“鏡子”的真實面貌。因此應釋為：用玻璃等製成的，用來照人、物等圖像的工具。

總之，我們應該充分發揮智慧，利用語料庫，細化義位，精化義徵，進而創造出辭書現代化的國際前沿產品。

參考文獻：

- 1、陳曉鷗 1997 漢語詞典釋義的不精細現象，《辭書研究》第1期。
- 2、呂叔湘 1980 語文常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3、Sidney L. Landau 著/章宜華、夏立新譯 2005 詞典便編 纂的藝術與技巧，商務印書館。
- 4、王偉 2006 語文詞典中科技條目的釋義元素，《辭書研究》第4期。
- 5、薛恩奎 2006 辭彙語義量化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說”字條讀後

——關於分地詞典如何處理“通用詞”的一點想法

Post Reading of shuo(說)-related lemma in The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lects

——Some thought on how to deal with the “common words”
in region-based dialectal dictionaries

◎汪維輝 / 南京大學

提要：漢語方言詞典無疑要姓“方”，但首先是要姓“漢”。爲了便於進行方言詞彙比較，對於跟通語無別的一些基本詞（本文稱之爲“通用詞”），分地詞典均應予以收錄，并盡可能說明其與通語的異同。本文以《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42個分卷的“說”字條爲例，指出其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作者的看法。

關鍵詞：方言詞典 方言詞彙 通用詞 “說類詞”

Abstract: It is no doubt that dialectal dictionary should be surnamed “dialect”, but first it must be “Chinese”. For the convenience of comparing lexical words of dialects with each other, it ought to include all the basic words (we called “common words” in this article) which used as same as mandarin in dialectal dictionaries, as well as explai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ith mandarin. This article take examples of shuo(說)-related lemma in 42 separate volumes of The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ialects (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 point out some problems in the dictionaries, and bring forward opinions of the author.

Key words: dialectal dictionary, lexical words of dialects, common words, species of shuo(說)-related words

方言詞典的收詞原則可以因編纂目的而不同，歸結起來大概不外乎這麼兩種：一種是只收本方言特有的詞語，或者稍寬一點，用排除法，凡是跟普通話相同的詞語不收——因為要確定哪些詞語是本方言特有而為其他方言所無絕非易事；另一種則是不管普通話和其他方言說不說，只要是本方言所使用的詞語統統收錄——完全按這一原則來編寫的方言詞典似乎尚未見到，除了別的原因之外，這樣做篇幅太大也是一個實際困難。

《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42卷本）的收詞原則介乎這兩者之間，用主編李榮先生在《總序》中所說的話就是：“這兩個表（指《方言調查字表》和《方言調查詞表》）所列的單字與詞語，凡是本方言能說的，都盡可能問清楚。這樣各地的語料才能對比異同。這些語料不過是分地詞典的最大公約數。各地的編者有充分的篇幅，可以廣泛收羅本方言的字音與語彙。”也就是說，第一種原則可以完全貫徹，第二種原則則只規定了最低標準——兩個調查表所收的範圍。應該說，這個原則是精當的：既考慮到方言詞典的特點，又為方言間的詞彙比較研究提供了一個基本的依據。筆者因研究工作之需，查閱了此書每個分卷中有關“說話”義的詞條（以下簡稱“‘說’類詞”^[1]），對方言詞典如何處理“通用詞”^[2]的問題產生了一些想法。現不揣淺陋，將一孔之見貢獻出來以求教於方家。

《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42個分卷對“‘說’類詞”的處理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不便於比較。主要有兩個問題。

一是對“上位詞”（即表示一般的“說話”義的詞）的處理不一致，大概有四種類型：

1. 不收。如徐州、洛陽、建甌、廈門4個分卷都未收表示“說（話）”義的單音詞。筆者相信事實上是存在的。

2. 收錄詞條，但只作簡單的釋義，無例句。如

揚州、婁底卷。

3. 釋義並舉出例句。大多數分卷如此處理。

4. 在第3條的基礎上再加補充說明。如南京卷“講”字條云：“‘用話表達意思，評論人事或責備’義普通話用‘說’多，南京話用‘講’比用‘說’常見。”（239頁）“講話”條云：“‘用口語表達意思’義用‘講話’比用‘說話’常見。”（239頁）長沙卷“講”字條云：“用‘講’的時候多數不可以用‘說’替代，如‘講授’‘商議’‘論；衡量’‘講求’等義，而用‘說’的時候多數可以用‘講’替代。”（240頁）貴陽卷“說”字條云：“‘說’跟‘講’使用頻率相近。”（98頁）萍鄉卷“話”字條云：“‘說’、‘解釋；說明’、‘責備；批評’、‘商量；商議’四個意思也說‘講’。”（131頁）“講”字條云：“‘說’、‘講解；講述’、‘商量；商議’三個意思也說‘話’。”（309頁）

不言而喻，對於比較研究來說，第4類是最理想的，而第1類則使比較無法進行。

二是“義類索引”問題較多。義類索引非常重要，它是詞彙比較的一把鑰匙。比如我想知道“說話”的“說”各地方言中是怎麼說的，除了查義類索引之外別無他法。因此分類合理、收詞齊全、排列有序、查找方便是對義類索引的基本要求。而這套分地詞典的義類索引在上述幾個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問題。有的詞歸類不合理，讀者不知道該到哪個類裏去查找。比如《詞表》裏“說”在“貳拾貳 動作”的“（1）一般動作”小類，而不在“（3）語言動作”小類；“跑”、“走”也在“（1）一般動作”小類，而不在“拾陸 日常生活”的“（4）行”小類；“你住哪兒”的“住”在“拾陸 日常生活”的“（3）住”小類裏居然查不到，在“動作”大類裏也查不到，以致於這樣一個常用的基本詞被遺漏了，在許多分卷中都不見它的踪影。這是歸類和收詞的問題。至

於排列順序，問題更多，有些類詞兒多，要找一個詞真不容易。這些都給讀者使用帶來不便，影響了詞典的價值。拿“‘說’類詞”來說，上面說的這些問題都存在。有的分卷收詞不全，詞典正文有相應條目，而“義類索引”中却查不到。如哈爾濱、濟南、西安、忻州、杭州未列“說”字，丹陽、金華未列“講”字。有些分卷“義類索引”排列次序不清楚，查找費事。“‘說’類詞”的“義類索引”編得好的有南京、貴陽、武漢、上海、南昌、黎川、萍鄉、婁底、雷州等卷，都是先列出“上位詞”，然後再按小的義類排列。

筆者雖然只調查了“‘說’類詞”這一個例子，但窺一斑可以見全豹，這套詞典在處理“通用詞”方面類似的問題還比較普遍。比如我還抽查了有關“衣”“食”“住”“行”這四個基本詞在各地的說法，就發現存在同樣的問題。我想其中的深層次原因可能是“方言詞典姓‘方’”和“詞典的主要功能是釋疑解惑”這兩種思想在起作用。

筆者認為，漢語方言詞典無疑要姓“方”，但首先要姓“漢”。“‘說’類詞”屬於基本詞彙和常用詞的範疇，這類詞往往具有通行地域廣、常見常用、明白易懂的特點，方言色彩不太明顯，因此編寫方言詞典的時候容易忽視。有的編者可能認為本方言跟通語的說法沒有什麼區別，因此就沒有必要收入。其實像《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這樣的大型分地詞典，它的功能已經不僅僅是各地方言詞語的彙集和解釋，它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要為方言詞彙的比較研究提供基本的素材，而這種比較並不局限於各地說法不同的那部分詞，也應該包括大量的“通用詞”。正如李如龍先生所說：“不要因用字普通、字義明白而忽略對這些字作方言差異的考察。越是常用的字詞，越需要比較方言的差異。”（《漢語方言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頁122。）事實上，不論是詞彙史研究還是方言比較研究，這類詞有時恰

恰是最重要的。如果因為這部分詞簡單易懂就不予收錄或語焉不詳，就會影響比較研究，也會使這套詞典的價值打折扣。比如我想知道“說”“穿”“吃”“住”“走”“站”這樣一些基本詞在各地的說法，查42個分卷就很難得到全面準確的信息。現在《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的綜合本也已經編成問世，^[1]建議在適當的時候對這套詞典進行修訂，對於一些基本詞彙給予足夠的重視，不僅要注意本方言特有的詞語和義項，對那些“通用”的詞語和義項也應該儘量交代清楚。

筆者幾年前在一篇文章中曾經提出過這樣的觀點：“我們迫切需要編纂一套各地方言的詞彙集，只要方言中說的詞語，不管是否與普通話相同，統統加以收錄，以便於比較。有了這樣一份全面而可靠的方言詞彙資料，我們的研究工作才可能有牢固的立足點，一些衆說紛紜、難以定論的問題也才有可能解決。”^[2]我們希望能在《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的基礎上再擴大範圍，最終拿出這樣一套方言詞彙集來。這樣一份基本資料對於方言詞彙比較和漢語詞彙史研究都是極為重要和十分急需的。

註釋：

[1] 參看拙文《漢語“說類詞”的歷時演變與共時分布》，《中國語文》2003年第4期。

[2] 本文所說的“通用詞”包括在普通話中通用和在一個或幾個方言區通用的詞。

[3] 全六冊，江蘇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4] 汪維輝：《也說“面善”“萬國”——兼論編纂方言詞彙集的重要性》，《詞庫建設通訊》（香港）第16期（1998年5月）。

小議人名在網絡中的變異現象

◎呂長鳳 / 南開大學、哈爾濱師範大學

提要：在互聯網高度發展的今天，網絡語言不斷產生、日新月異。作為詞彙學研究對象之一的人名，在網絡語言的發展變化中產生了某些值得我們思考和研究的新興語言現象。本文首先對人名變異現象進行了界說，然後從形式、語義、語用功能等幾個方面對其進行了語言學分析，最後指出研究人名變異現象的社會語言學意義。

關鍵詞：人名 網絡 變異現象 網絡人名

Abstract: Today the Internet develops highly ,and the network language produces unceasingly, changes with each new day. The personal name as a study object of lexis, produced some new language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language. This article first tells what is the personal name variation phenomenon, then analysis it from the form, the semantics, and the pragmatics function, finally pointed out the significance of social linguistics which we research the personal name variation phenomenon.

Key words: personal name; Internet; variation phenomenon; network name

一、什麼是人名變異現象

在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網絡縮短了每個社會成員與世界的距離。今天，你也許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普通人，明天，或許因為一件什麼事你就可能成為眾人皆知的“名人”，網絡的力

量在這裏起到了絕對的推動作用。原本的普通人有一個普通的人名，而一旦成爲“網絡名人”之後，網民就會給他重新取一個名字，如：周老虎、劉羚羊、張飛鴿、王雲彩、董暴雨、楊不管、范跑跑、郭跳跳、姚抄抄、朱搶搶、蔣代代、余哭哭、王舔舔等。具體看下列：

周老虎站在審判臺上，審判他的似乎不是莊嚴的法律，不是跳動的良心，而是台下的觀眾。（《周老虎用真實的謊言完成角色轉換》，2008年9月28日《瀟湘晨報》）

“劉羚羊認錯了，張飛鴿認錯了，那個湖南的華南虎造假者也認錯了，這說明，謊言終究撐不了太久！”有網友這樣感慨。（《“廣場鴿”作者承認造假 網友質疑誠信稀缺》，2008年4月8日國際在線）

早前，江西天才少女因抄襲文章最終淪落成“姚抄抄”的事件依然記憶猶新，現在這位小作家張聞昕的走向又會如何？（《小作家出名後說“做人要低調”》，2008年10月10日《信息時報》）。

據《長沙晚報》報道大名鼎鼎的“范跑跑”已被辭退，貧困潦倒。（《“范跑跑”貧困潦倒 網友建議其辦私塾做導游》，2008年9月24日《武漢晨報》）

郭松民先生前些時候被稱爲郭跳跳，名聲不太好。（《並購匯源：請莫很傻很天真》2008年9月5日鳳凰網）

司法要打周老虎也要管董暴雨（2008年9月19日《東方早報》標題）

若然，“袁節約”之“節約說”，豈不是成了無的放矢？！（《李寶嘉再世，無須再寫〈官場現形記〉》，2008年9月25日紅網）

我們把這種某人因某事通過網絡爲大家所知，網民根據事件的特徵爲其重新命名的現象稱爲人名變異現象。通過這種方式得來的人名我們不妨稱爲網絡人名。網絡人名是由普通人名轉化來的，我們把原來的普通人名稱爲人名原型。如：周老虎（網絡人

名）——周正龍（人名原型）；范跑跑——范美忠（人名原型）。

網絡人名不是我們一般常說的網絡用戶名（即網名）。網名一般是指網民在網絡世界裏的一個虛擬名稱，包括上網時使用的用戶名、登錄名、昵稱、帳號等，如：網、梅、羔羊、楚烟烟、飛龍在天、花映碧水我獨憐、ZY、feng、oiusu1234、等。網名大多是網民自己取的（少數不具備命名能力的人可能會請他人代取），具有很强的自主性，而網絡人名一定是名主以外的人根據事件的性質和特徵爲名主命名的，對於當事人來說具有很强的被動性。

二、人名變異現象的語言學分析

1、從形式上看

網絡人名和普通人名一樣，也是由姓和名兩部分組成的。但是，普通人名可以是雙字的、三字的，甚至是四字的，形式比較多樣，而網絡人名却只有三字的形式：姓爲單姓；名爲雙名，形式比較單一。再進一步分析網路人名的名部分，我們發現有兩種情況：

① 名爲疊音形式的：

范跑跑、郭跳跳、姚抄抄、朱搶搶、蔣代代、餘哭哭、王舔舔、趙光光、易逃逃、舒灰灰

② 名爲非疊音形式的：

周老虎、劉羚羊、張飛鴿、王雲彩、董暴雨、楊不管、袁節約、王幸福、余含泪

2、從語義上看

網絡人名的姓部分來源於人名原型的姓，而名部分則是體現名主特點的部分。如：

范跑跑 人名原型：范美忠，原爲一名教師，因其在5·12汶川地震發生時丟下學生一個人跑出了教室而得名。

周老虎 人名原型：周正龍，因“僞虎門”而得名。

董暴雨 人名原型：董鳳妮，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新塔礦業有限公司尾礦庫發生“9·8”特大潰壩事故之後，身為襄汾縣委宣傳部部長的董鳳妮第一時間對外聲稱事故是由暴雨所引發的泥石流。

網絡人名從語義理解上常常是通俗易懂的。如“跑”“跳”“抄”“老虎”“羚羊”“暴雨”“不管”，這些詞語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見、常用的，我們普通網民具有把它們拿來給當事人命名的能力，同時所命名的人名又很容易為普通百姓所理解、接受。從感情色彩上看，網絡人名往往具有貶義的色彩。網絡人名大多為網民命名，其涉及的事件往往是社會所鞭撻的不良事件，網民從客觀的角度對其進行品評，並為事件當事人取了諸如“範跑跑”這樣的網絡人名。

3、從語用功能上看

①品評、表情功能

由網民命名的網絡人名大多具有強烈的公眾褒貶功能，因此，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將網絡人名作為社會評價機制的一部分。人們把那些造假者、涉假者稱為“周老虎”“劉羚羊”“張飛鴿”“王雲彩”之後，對於其他躍躍欲試者起到了一定的威懾、抑制作用，還敢造假嗎？小心也給你取個網絡認知度、接納度、傳播度極高的網絡人名。獲得了“楊不管”“董暴雨”“袁節約”之名後，我們的黨政官員們應該好好審視自己的言行，反省、思考怎樣才能做一名真正的人民公僕了。至於“范跑跑”“趙光光”“姚抄抄”們，在公眾道德的監督之下，還會從容淡定、無所顧忌地去做那些受到大眾非議的事嗎？小小的網絡人名表達了網絡時代下普通百姓的情感態度，這與我們過去所說的“善有善名、惡有惡名”是相一致的。

②描寫、審美功能

網絡人名與普通人名一樣，都是一種指稱人物的符號，但二者還有不同之處，具體表現在：普通人名基本上只是一種抽象性的符號，而網絡人名則是描寫性的。一個人出生後，姓是承繼前輩的，名是由長輩

給起的，這樣的人名寄托了命名者的某種祝願，但其仍然只是個抽象的代號，名字的寓意與名主的品德、命運等沒有必然的關係。因此，普通人名是第一層次的符號，是抽象性的，其主要作用是指稱。網絡人名則不同，網絡人名是網民根據與名主相關的事件特徵命名的，因此是第二層次的符號，是描寫性的，具有指稱和描寫雙重作用。這種描寫性符號是具有審美功能的，在語言生活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三、人名變異現象的社會語言學意義

人名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一種社會現象，人名的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個社會、一個民族歷史上或現時的社會、文化特徵。由“周老虎”引發了國人誠信問題的大討論，由“范跑跑”引起了有關國人綜合素質的爭議……網絡人名作為互聯網高速發展的產物，其誕生和迅速流傳，背後都是一種民情民意的表達。對這種具有普遍性情緒的表達，我們不僅僅需要從文字學的角度去解讀，更需要從社會學的角度去理解。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把握時代的脈搏，深刻理解我們這個時代。網絡言論的自由，使得網絡人名以勢不可擋之勢在我們的語言生活中不斷產生、繼續發展著。這種人名在網絡中發生的變異現象，應該引起我們語言工作者的深入思考。

參考文獻：

- 1、郭熙 2004 《中國社會語言學（增訂本）》，浙江大學出版社
- 2 鄭寶倩 1993 《華夏人名與中國文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從禮貌原則看中國的廣告語言

From the "principles of politeness" to see the Chinese advertising language

◎高軍青 / 澳門大學博士研究生、吉林大學珠海學院

提要：本文以語用學當中的“禮貌原則”理論為切入點，從正、反兩個方面探討當代中國廣告語言的特點。

關鍵詞：廣告 語言 語用學 禮貌原則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principles of politeness" theory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from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to explore contemporary Chinese advertising language features.

Keywords: advertisement language pragmatics principles of politeness

一、引言

現代社會，廣告是一種非常重要的交際行為，它是發生在廣告主體（產品提供者）與廣告受眾（消費者）之間的一種雙向交際活動。在構成廣告的諸多因素當中，語言是廣告的載體，是體現廣告創意、突出廣告主題的一個重要因素。廣告語言的運用直接影響著受眾對廣告的接受程度。

作為語言學當中的一門獨立學科，語用學是研究在不同語境中話語意義的恰當地表達和準確地理解，尋找並確立使話語意義得以恰當地表達和準確地理解的基本原則和準則的一門學問（索振羽，2000）。它是研究話語發出者使用語言與話語接受者理解語言的一門學問。而廣告語言作為一種典型的交際語言，涉及到話語發出者（廣告主體）與話語接受者（廣告受眾）兩個方面，因此，從語用學的角度對其進行研究更適合這一特定的言語交際行為。廣告又是一種具有明確商業目的的交際活動，產品提供者通過把相關資訊傳遞給受眾，以此來引起受眾的注意，激發其消費熱情，使其產生消費動機和購買欲望，從而最終使產品提供者得到利益。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廣告語言就必須以禮貌為前提，以尊重消費者為基礎，如果你的語言傲慢無禮的話，那麼想讓消費者購買你的產品是不可能的。因此本文以語用學當中的“禮貌原則”為切入點來探討當代中國的廣告語言。

1、理論背景

1967年，美國語言哲學家格賴斯(Grice)提出了“合作原則”和“會話含義理論”。他認為會話雙方之所以能夠進行交流，是因為雙方都遵循一些基本原則，這些原則使雙方在言語交際的過程中互相配合，以達到互相理解的目的，這就是“合作原則”。格賴斯把“合作原則”分為“量的準則”、“質的準則”、“相關準則”與“關係準則”四個方面。而在實際的言語交際中，人們由於種種原因，並不都是嚴格地遵守“合作原則”的，當說話人違反了“合作原則”中的某些準則或次準則的時候，聽話人就迫使自己超越話語的表面意義去設法領悟說話人所說話語的隱含意義，這種話語的隱含意義就是“會話含義”。“會話含義”關注的不是說話人直接說了些什麼，而是說話人說這句話可能意味著什麼。

格賴斯提出了“合作原則”，認為人們不遵守

“合作原則”就產生了“會話含義”，但他並沒有指出人們違反“合作原則”，利用“會話含義”進行交際的原因。為了挽救這一理論的缺陷，利奇(Leech)在1983年提出了“禮貌原則”，指出人們之所以會公然違反“合作原則”，是為了遵守“禮貌原則”。他認為在實際的言語交際過程中，“禮貌原則”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高於“合作原則”的，“如果你對你的鄰居不禮貌，那麼你和鄰居的交際管道就被堵住，你就不可能從鄰居那裏借到割草機”。（利奇，1983）利奇提出的“禮貌原則”包括六條準則：①得體準則：最小限度地使別人受損；最大限度地使別人得益。②寬宏準則：最小限度地使自己得益；最大限度地使自己受損。③讚譽準則：最小限度地貶低別人；最大限度地讚譽別人。④謙虛準則：最小限度地讚譽自己；最大限度地貶低自己。⑤一致準則：使對話雙方的分歧減至最小限度；使對話雙方的一致增至最大限度。⑥同情準則：使對話雙方的反感減至最小限度；使對話雙方的同情增至最大限度。利奇還指出禮貌關注的重點是他人而不是自己，消極的禮貌（避免不一致）比積極的禮貌（尋求一致）更加重要。

在利奇“禮貌原則”理論的基礎上，索振羽(2000)根據漢語交際的實際情況，將“禮貌原則”降級為“禮貌準則”，並提出了符合漢語交際特點的六條次準則：①讚譽次準則：說點過分但太過分的讚譽，是一種禮貌。②謙虛次準則：有點過分但太過分的謙虛，是一種禮貌。③一致次準則：減少分歧或對立，力求一致，至少達到部分一致。④同情次準則：減少反感，增進諒解，加深情誼。⑤寬宏次準則：得理讓人，給別人留面子。⑥恰當的稱呼次準則：視尊卑、長幼、親疏之不同，在交際中對聽話人使用恰當的稱呼也是一種禮貌。

2、“禮貌原則”中適合中國廣告語言的五條準則

廣告語言作為一種有明確商業目的的交際語言，“禮貌原則”中的各條準則對它發揮作用的程度有所區別。本文在前輩學者提出的“禮貌原則”的各條準則和次準則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廣告語言的特點以及漢民族文化的獨特個性，歸納出適合中國廣告語言的“禮貌原則”的五條主要準則，並根據這五條準則來對當前的廣告語言進行分析，以期能夠對中國廣告語言的規範發展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適合中國廣告語言的“禮貌原則”的五條準則分別是：

(1) 真誠準則：在廣告語言中，適度地讚譽受眾，實實在在地表述自己，誠懇地自我謙虛，是一種禮貌。

(2) 一致準則：在廣告語言中，儘量避免雙方的分歧，儘量追求雙方利益的一致或至少達到主要利益的一致，是一種禮貌。

(3) 同情準則：在廣告語言中，通過創造優美的意境給受眾以美的享受，或者體貼地表達對受眾的關心與愛護，使廣告語言具有一種人文關懷，是一種禮貌。

(4) 恰當的稱呼準則：在廣告語言中，根據不同的產品，不同的受眾群體使用恰當的稱呼，是一種禮貌。

(5) 文化認同準則：在廣告語言中，使用符合中國人文化心理的文字與表達方式，是一種禮貌。

其中，第(1)條“真誠準則”是整個“禮貌原則”的基礎，因為產品提供者以誠懇的態度、真實的內容、實實在在的表述向受眾進行資訊的傳遞，這是對受眾最基本的尊重。“真誠準則”是對前文所提到的利奇的“讚譽準則”和“謙虛準則”的概括提煉，因為在廣告這種交際行為當中，不論是讚譽對方還是自我謙虛都應該是以真誠為基礎的，應把握好一個合適的“度”，否則，過猶不及，反而會使受眾產生膩煩心理。第(2)、(3)、(4)條準則是繼承了索振

羽所提出的“禮貌準則”當中的三個“次準則”，並根據中國廣告語言的實際情況，賦予這三條準則以新的更加豐富的內涵。第(5)條準則是筆者根據中國廣告受眾的心理特點以及中華文化的獨特個性概括而成的。這五條準則在廣告語言的實際運用過程中有些又是分為不同方面或不同層次的，下面我們結合當前的廣告語言運用的實例，從正反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3、“禮貌原則”在中國廣告語言中成功運用的具體表現

上乘的廣告語言，都是以尊重受眾為基礎，遵循“禮貌原則”博得受眾的好感，從而成功實現其商業目的的。

(1) “真誠準則”在中國廣告語言中成功運用的具體表現

隨著社會的進步，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與完善，消費者的消費心理更加成熟，消費行為也更加理性。在這種情況下，以往那種不顧產品實際把自己吹噓成是“天下第一”、“完美無缺”、“能解決所有問題”的廣告語言，會被受眾輕易識破，繼而使之產生一種被愚弄、被欺騙的感覺，並對相應的產品產生排斥心理。與之相對，受眾更容易接受那種謙遜有禮、實實在在的廣告訴求。現在不少廣告就是抓住了受眾的這一心理，通過廣告語言和受眾進行真誠的交流，並給受眾留有自己思考和選擇的餘地，表現出對受眾極大的尊重。

比如海爾品牌的廣告語就是“海爾，真誠到永遠”，這一廣告語可以說是遵循“真誠準則”的典範之作，而與這一品牌廣告語相符，海爾各類產品的廣告語也都突出為顧客著想、為顧客服務的宗旨，如“海爾洗衣機，專為你設計”；“海爾冰箱，為你著想”；“海爾空調，永創新高”；“海爾燃氣灶，安全最重要”；“海爾洗碗機：享受生命，享受健康”。這些語言都是樸實無華，簡潔凝練的，沒有不

切實際的渲染與誇張，有的只是對受眾由衷的關愛和對產品品質的承諾。

在廣告語言中，符合“真誠原則”的成功案例比比皆是，如“九芝堂濃縮六味地黃丸，治腎虧不含糖”；“農夫山泉有點甜”；“五穀道場：非油炸，更健康”；“樂百氏純淨水：27層淨化”；“達利園青梅綠茶，綠茶配青梅還是頭一回”……這些都是用平實的語言說出產品的獨特之處，而這獨特之處可能正是這一產品領先於其他同類產品的地方。事實勝於雄辯，在這類廣告語中沒有比較，沒有宣傳鼓動，只有真實的資訊傳遞，而受眾自然會做出有利於自己的選擇。

又如“舒膚佳：促進健康為全家”；“中國電視報，生活真需要”；“喝匯源果汁，走健康之路”；“美加淨護手霜，像媽媽的手，溫柔依舊”；“美的電器：原來生活可以更美的”……這些廣告語都沒有把產品的使用效果說得天花亂墜，而正是這種真誠的敘說架起了產品提供者與廣告受眾之間溝通的橋樑。

“真誠準則”的基礎是產品提供者要以平等或稍低於受眾的身份與受眾進行交流，因為對於產品提供者而言，顧客就是“上帝”，所以在廣告中不應出現居高臨下，對消費者進行命令的強勢語句，應該代之以建議性或誘導性的話語。如“納愛斯雕牌洗衣皂：只選對的，不買貴的”；“三精牌葡萄糖酸鈣口服液：用心的媽媽會用‘鋅’”；“寧夏紅：每天喝一點，健康多一點”……這種勸導式、忠告式的廣告語比強迫式、命令式的廣告語更符合“真誠準則”的要求，因此也更容易為受眾所接受。

(2) “一致準則”在中國廣告語言中成功運用的具體表現

A. 在廣告語中表達雙方利益的一致，這是對受眾禮貌的表現。

當下，很多成功的廣告語都表現出產品提供者是受眾的夥伴或朋友，他們有著共同的追求。

如貝因美奶粉的廣告詞：“寶貝喜歡的，媽媽在意的，就是我們在乎的，育嬰專家貝因美。”這條廣告語巧妙地把“寶貝”、“媽媽”、“我們”（奶粉生產者）三者的利益聯結在一起。

亨氏兒童營養品的廣告詞：“健康活潑的寶寶，就是亨氏的寶寶。”這條廣告語給人的感覺是亨氏把消費者的寶寶當成是自己的寶寶一樣精心餵養，而寶寶的健康成長是亨氏和天下所有父母的共同心願。

天大藥業的廣告詞：“您的健康，是天大的事。”這條廣告語運用諧音雙關的修辭手法，其中的“天大”既可理解為程度副詞，也可理解為名詞，即藥業公司的名稱。這樣一來，就表現出受眾想要身體健康的願望和天大藥業所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而且突出天大藥業把這個目標看得高於一切，是“天大的事”。與之相類似的還有《人民保健報》的廣告詞：“您的健康是我的牽掛”，這樣的表達，使廣告很有親和力，使受眾感到溫暖，感到被尊重、被愛護。

《環球時報》的廣告詞：“和您一起看世界”；大白兔奶糖的廣告詞：“三十年好口味，大白兔與您共成長。”好迪的廣告詞：“好迪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這樣的廣告詞表明產品提供者不是居高臨下、以強勢者一方的姿態出現，而是永遠和受眾站在一起，與受眾一起分享快樂，分擔煩惱。

B. 在廣告語中表明雙方都在共同關注一個更高的目標，都在為這個更高的目標努力（這個目標通常表現為“中國”），這也是“一致”的表現。

很多廣告詞都表明產品提供者並不僅僅是以盈利為目的的，而是在為中國的進步而努力，國家的繁榮昌盛是所有中國人的願望，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產品提供者和受眾的目標是一致的。

如長虹電器的廣告詞是“長虹，以產業報國，以民族昌盛為己任。”這個廣告詞說明長虹承擔起了民族昌盛的重任，這樣一方面表明長虹是在為所有中國人的共同目標而奮鬥，從而得到受眾感情上的認同，

另一方面能夠以此激發受眾的愛國情操，激發消費者購買產品的責任感。與之相類似的廣告詞還有很多，如奧妮皂角洗髮浸膏：“長城永不倒，國貨當自強”；奧妮洗髮水：“黑頭髮，中國貨”；紅旗轎車：“坐紅旗車，走中國路”；美菱冰箱：“中國人的生活，中國人的美菱”；中國聯通：“情系中國結，聯通四海心”；平安保險：“中國平安，平安中國”。

(3) “同情準則”在中國廣告語言中成功運用的具體表現

所謂“同情”在廣告語言中的表現就是注意減輕其商業性，增強情感性，達到以情感人，以情動人的廣告目的。充滿真誠和溫情的廣告語，是對受眾情感的尊重。

A. 在廣告語中創造優美的意境，給受眾以美的享受和心靈的啟迪。

這類廣告語，在正文當中往往不會出現任何有關產品提供者或產品的資訊，只是在正文結束之後，在受眾被廣告詞所創造的優美意境所感染的時候，出現相關資訊，使受眾在記住廣告詞的同時也牢牢記住了產品。典型的例子如：

兒時，父親是山，
成長中，師友是山，
立業後，夥伴是山，
成功，只因一路有你。
傳遞價值，成就你我。

——芙蓉王

人生就像一場旅行，不必在意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風景和看風景的心情。利群，讓心靈去旅行。

——利群

B. 在廣告語中體貼地表達對受眾的關心與愛護，

這是一種禮貌。

通過充滿感情的廣告語，在產品提供者與受眾之間建立起帶有信任感的感情紐帶，這樣的語言能夠使受眾感覺到被關心、被愛護。

如威力洗衣機的廣告語：

媽媽，我又夢見了村邊的小溪，夢見了奶奶，夢見了你，媽媽，我給你捎去一件好東西，威力洗衣機，獻給母親的愛。

這句廣告語抓住了女兒要報答母親的心理，使產品成為了女兒感情的寄託，這種溫馨的語言，給受眾帶去了溫暖，從而引起受眾的情感共鳴。

孔府家酒的廣告語：

孔府家酒，叫人想家。

這句充滿了中國人倫理親情的廣告語，給受眾帶去濃濃的思家情懷。與之相類似的廣告語還有：“方太，讓家的感覺更好”；“有家就有聯合利華”。

“跑得再遠都回得了家”（濰柴動力發動機）。

南方黑芝麻糊的廣告語：

一股濃香，一縷溫暖。

使受眾在品味文字的同時，仿佛聞到了那一股濃香，感覺到了那一縷溫暖。

這種以情動人的廣告語，還有很多，如體貼地表達對消費者的關心與愛護的廣告語有：“時間在不經意的流逝，一天24小時，你有多少時間留給自己，停下來，享受美麗。——美即面膜”；“冷熱交替，小心熱傷風，嚴迪廣告。”；“鷹牌花旗參，累了來一杯。”；“再小的傷口也不該忽視——邦迪牌創可貼”；“關心女人，從金施爾康開始。”……直接宣揚“愛”的廣告語有：“愛是鼓勵，愛是關心，愛是分享，喜之郎，多點關心多點愛，果凍我就吃喜之郎。”；“當太陽升起來的時候，我們的愛天長地久”（太陽神口服液）；“樂百氏奶，傾注父母一片愛心，創造中國兒童美好明天”。

(4) “恰當的稱呼準則”在中國廣告語言中成功

運用的具體表現

在廣告語中，根據不同的產品特點和受眾群體，恰當地稱呼自己和稱呼對方，使受眾滿意，能夠產生最佳的交際效果。現在大多數的廣告語中不出現人稱代詞，這是廣告禮貌等級的原級表現。與之相對，在廣告語中以第二人稱代詞“你”、“你們”或第二人稱代詞的尊稱形式“您”來指稱受眾則為禮貌等級的比較級和最高級的表現。（周蓀娟，2004）

A. 在廣告語中以“你”、“你們”指稱受眾，能夠給對方一種平等交流、真誠溝通的感覺。

以“你”、“你們”指稱受眾，既不會給對方一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也不會使對方覺得被輕視，這有利於雙方的交流與溝通。比如商務通：“科技讓你更輕鬆”；福特汽車：“你的世界，從此無界”；“娃哈哈AD鈣奶，今天你喝了沒有？”；青春寶口服液：“青春寶，使你永葆青春”；三星VK500：“拍你所想，想你所拍”。這些廣告語通過恰當的人稱代詞“你”的使用，使受眾感覺到產品提供者始終是站在自己一方，為自己著想，並且是誠心誠意地與自己交流的，使受眾更容易從感情上接受廣告，進而接受產品。

B. 在廣告語中以“您”指稱受眾，突顯出對受眾的禮貌與尊重。

在一些廣告語中，產品提供者為了充分表現對受眾的尊重，以“您”來指稱對方，主動從與受眾平等的地位退居到次要地位，充分表現出以顧客為“上帝”的宗旨。比如上海大眾汽車：“上海大眾永遠和您在一起”；屈臣氏：“我們更加關心您”；吉之島百貨：“繽紛生活長伴您”；高露潔牙膏：“每天用高露潔刷牙，它令您口氣清新，牙齒堅固。”；凱歌全自動洗衣機：“她工作，您休息”。

C. 在廣告語中產品提供者以“我”、“我們”的身份出現，直接與受眾進行平等對話。

如娃哈哈純淨水的廣告語是“我的眼裏只有

你”，這條廣告語簡潔明瞭，但卻內涵豐富，既說明娃哈哈純淨水純淨無雜質，透過它可以看到對方的“你”，也說明產品提供者所在乎的沒有別的，只有“你”，把“你”的滿意放在了第一位，通過恰當的人稱代詞的使用，達到了與受眾真誠交流的目的。與之相類似的例子還有申花牌熱水器：“掌聲響起來，我心更明白，我的愛與你同在”；格力空調：“我們為你想的更多”；美加淨護手霜：“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沙宣洗髮水：“我們的光彩來自你的風采”；“紅星禦酒，融進你我真情”。廣告的發出者與接受者雙方都出現在了廣告語當中，產品提供者以第一人稱的身份直接表明自己為對方服務、為對方著想的立場，把自己對受眾的關心與愛護明明白白地表達出來。

D. 有些廣告語中出現的“我們”不僅指產品提供者一方，還包括了廣告受眾一方，這樣的稱呼縮短了雙方的距離，使受眾感覺親切。

如飛利浦的廣告語“讓我們做得更好”，其中的“我們”不僅包括了飛利浦產品的提供者，還包括了飛利浦產品的使用者，大家齊心協力才會“做得更好”。這一類的廣告語還有：“五十鈴汽車：讓我們來充分掌握能多快好省的運輸貨物的拖車頭吧”；“均搖牛奶，我們的健康裝備”；“《魯中晨報》：讓我們一起過好日子”。……這種把廣告雙方納入到同一個稱呼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五糧液酒的廣告詞“咱老百姓的五糧液”，一個“咱”字一下子就拉近了產品提供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心理距離，使消費者倍感親切。

E. 根據不同的受眾群體採用恰當合理的稱呼，也是對受眾禮貌的表現。

現在的一些打破傳統模式、標新立異、富有創意的廣告語，由於準確地把握了受眾的特點與心理，巧妙地運用恰當的稱呼，同樣給受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專門針對新新類人的動感地帶的廣告語“我

的地盤聽我的”，充分表現了年輕一代張揚個性的特點，深受年輕人的喜愛。摩托羅拉的廣告語“HELLO MOTOR”，以用呢稱（“MOTO”在這裏是作為“MOTOROLA”的呢稱出現的）和產品打招呼的方式來加以宣傳，獨具一格。

總之，在廣告語中不管運用什麼樣的稱呼，只要符合產品特點，符合受眾的心理，使其樂於接受，能產生良好的交際效果就屬於是“恰當”的稱呼、“禮貌”的稱呼。

（5）“文化認同準則”在中國廣告語言中成功運用的具體表現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廣告語言在傳遞商品資訊的同時也在傳遞著文化資訊。文化影響並制約著廣告語言，好的廣告語言能夠反映文化並為文化服務。能夠反映民族文化、符合受眾文化心理的廣告語言是對受眾的尊重，因此易於為受眾所理解和接受，從而能夠大大地促進廣告的宣傳交流效果。

比如中國人喜歡追求“口頭彩”，無論做什麼事情都想討個“彩頭”，求個吉利，所以一些廣告語言就抓住了國人的這一心理，在這一方面大做文章。最典型的就是洋酒人頭馬的廣告“人頭馬一開，好事自然來”。人頭馬本是外來品，經銷商為了打開中國市場，通過這一廣告語把外來產品和中國文化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得到了受眾的認可和歡迎，從而也使這一廣告語成為了廣告史上的經典之作。可口可樂在1998年新春推出的廣告語是“新春新意新鮮新趣，可喜可賀可口可樂”，這條廣告語，內容和形式都是中國人樂於接受的。從形式上來看，它採用了中國人喜聞樂見的對聯的形式，從內容上來看，它準確地把握住了中國人新春要有新氣象，以求順利一年的心理。這類的廣告還有“鴻運當頭，麥當勞”；“福滿多速食麵：福氣多多，滿意多多”；“銀馬座酒店：跨下銀馬座，好運自然來！”

再比如，“酒”是中國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好伴

侶，而中國的“酒文化”更是源遠流長。歷史上，“酒”總是和文人，和寫詩作文聯繫在一起的，“劉伶醉酒”、“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李白鬥酒詩百篇”就是明證。順應這一傳統，孔府宴酒的廣告詞“喝孔府宴酒，做天下文章”便應運而生了。“以詩會友”、“以酒會友”也是中國人的傳統習慣，於是就有了“喝杯清酒，交個朋友”、“悠悠歲月酒，滴滴陀牌情”的廣告詞。

其他的，如某飯店的廣告詞“吃不了，兜著走”，反話正說，弘揚了中華民族勤儉節約的傳統美德。鐵達時表1980年的廣告詞“為人民服務，為大眾計時”順應了中國80年代初的社會環境。廣式月餅的廣告詞“月是故鄉明，餅表思親情”，抓住了中國人“每逢佳節倍思親”、注重親情的傳統心理。三九胃泰：“九九九，祝您健康長久”（“九”諧音“久”）；達利園：“團團圓圓達利園”。這樣的廣告詞帶給受眾天長地久、團團圓圓的美好祝願，自然會得到受眾的青睞。

4、中國廣告語言中違反“禮貌原則”的一些表現

廣告是一種有著明確商業目的的交際活動，產品的提供者通過廣告傳遞相關資訊，說服和誘導消費者，最終達到促銷產品的目的。通過廣告語言對受眾表示出應有的禮貌和尊重，是廣告取得成功的基本前提。遵循“禮貌原則”的廣告，使受眾在感受到廣告語言魅力的同時，也獲得了精神上的享受。但是，不能否認，在我國當前的廣告語言實際中，還存在著一些違反“禮貌原則”，無視受眾感受甚至傷害受眾感情的反面例子。本人在這裏舉出數例和大家共同探討。

病例1、勁霸男裝，入選巴黎盧浮宮的男裝。

（勁霸男裝廣告詞）

病例2、現代醫院整形美容——想多美有多美。

(廣東現代醫院廣告詞)

“真誠準則”是“禮貌原則”的基礎，不夠真誠的廣告語言是談不上尊重受眾的。真誠的前提首先是要真實，所以在廣告中不應該出現明顯的欺騙受眾、不切實際地胡亂吹噓自己產品的語言。病例1乍一看好像沒什麼問題，但仔細琢磨就不太對勁了。以前我們在廣告中經常看到產品的提供者為了提高知名度，說自己的產品是什麼“省優”、“部優”、“國優”、“榮獲XX博覽會金獎”之類的，消費者看得多了就會產生懷疑，覺得怎麼好像隨便是個產品就能得到這些頭銜啊，久而久之，這些“優”、“金獎”的含金量在消費者心目中就會大打折扣。和這些已經過時的“優”、“金獎”比起來，“入選巴黎盧浮宮”就顯得時髦多了，但是受眾在看了這則廣告之後，不禁會想，這“入選巴黎盧浮宮”究竟是個什麼榮譽呢？據相關人士考證，勁霸男裝只不過是曾經在巴黎盧浮宮舉辦的一次服裝展覽會上得到過一個展銷的席位而已，廣告語中的“入選巴黎盧浮宮”明顯是言過其實，虛張聲勢，蒙蔽受眾。病例2說通過整形美容可以“想多美有多美”，稍有常識的人就會知道，整形美容只是彌補相貌上先天或後天的某些不足的輔助手段，且不說通過整形美容越整越醜的事情時有發生，就算真的整形成功，也只能說是在原有基礎上變得好看，而不可能是隨心所欲“想多美有多美”，這樣違背基本常識的廣告語肯定是會被受眾嗤之以鼻的。

病例3、恒源祥！北京奧運會贊助商 鼠鼠鼠

恒源祥！北京奧運會贊助商 牛牛牛

……

恒源祥！北京奧運會贊助商 豬豬豬1分鐘內幾乎相同的話語重複12遍，把12生肖輪流說一遍，這樣的“暴力廣告”，完全不顧受眾的感受，旁若無人地炫

耀自己是奧運會贊助商，表現出對受眾極大的冷漠與忽視，更談不上尊重了。與之相類似的還有腦白金反復播放的“今年過年不收禮，收禮只收腦白金”……；黃金搭檔的“黃金搭檔，送XX；黃金搭檔，送XX；……”。發佈廣告的目的，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但是產品提供者以違反“真誠準則”為代價，漠視受眾的感受，強迫受眾接受自己的廣告，接受自己的產品，這樣的廣告語，即使通過強制手段能夠使受眾記住你，那也絕對是“恨”上你，而不是“愛”上你。

病例4、覺得好吃就買唄，大家要給我面子哦。

(李宇春代言的某糖果廣告)

現在的廣告中有“三多”（露的多，美女多，明星多），通過明星來宣傳產品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可是像李宇春這樣直接站出來，要大家給她面子，強行推銷產品的廣告還不多見。這樣的廣告語只強調李宇春自己的“面子”，卻忽視了廣大消費者的“面子”，明顯地把產品與受眾放在了對立的兩個方面，產品提供者和消費者之間不存在任何一致的地方。看了這樣的廣告，消費者會想，既然我們之間沒有任何共同的利益，既然你只顧維護自己的“面子”，那我也沒必要為了你的“面子”而丟了自己的“面子”。

病例5、世上只有媽媽好，有斑的媽媽難看了。

(白大夫去斑霜廣告)

在孩子眼中，自己的媽媽應該是世上最漂亮的女人，不可能因為長了斑就在孩子眼中變得難看了。這樣的廣告詞大傷天下媽媽的心，尤其是對於那些臉上有斑，又無計可施的媽媽更會造成一種心靈上的傷害。這種廣告語明顯違反了“同情原則”，是對受眾極大的不尊重。

病例6、老婆腎好，你就別想跑。（美媛春口服液）

病例7、他好我也好。（匯仁腎寶）

病例8、想知道清嘴的味道嗎？（清嘴含片）

中國人在“性”或者“隱私”方面的表達一向是含蓄的、隱晦的，而以上所舉的這三條廣告語卻違反了中國人傳統的文化心理和表達習慣，赤裸裸地把“性”或“隱私”擺上臺面，這樣的廣告語給人以低級趣味之感，違背了受眾的審美心理，違反了“文化認同準則”，破壞了美感，使受眾的接受性大打折扣。在2002年千龍新聞網評選出的中國十大媚俗廣告中，有5條涉嫌性暗示，說明中國人在這一方面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在設計這方面產品的廣告語時就更應該慎重，更應該選擇符合中國人習慣的表達方式。本人覺得在這方面也有表現得比較好的廣告，比如倪萍代言的金雞膠囊的廣告語“婦科炎症別擔心，金雞膠囊說明你”；潔爾陰洗液的廣告語“難言之隱，一洗了之”。產品的提供者站在真心為受眾解除煩惱的立場上，真誠地與受眾交流，表現得大方得體，使受眾樂於接受。

5、結語

廣告作為“人類文明的第八藝術”，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它是產品提供者推銷商品、贏得顧客的重要手段。廣告受眾作為廣告產品的潛在消費者和廣告語言的接受者，他們能否從廣告語言中受到尊重、得到理解與愛護是他們能否接受廣告的先決條件，因此好的廣告語言一定是以“禮貌”為前提的。在當代中國的廣告語言中，符合“禮貌原則”的成功例子比比皆是，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違反“禮貌原則”、傷害受眾感情的劣質廣告也同樣充斥在消費者周圍。找出這些劣質廣告，分析其病

因，才能使中國廣告語言向更加文明、更加規範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 1、索振羽《語用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年5月
- 2、孫戈 盧穎《廣告語言魅力》沈陽：遼寧美術出版社 2002年1月
- 3、周明強《現代漢語實用語境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5年7月
- 4、陳露 廣告—禮貌—隱含 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 2002年4月
- 5、周蓀娟 廣告第二人稱禮貌指代標記 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 2004年6月
- 6、陳香 從語用原則看廣告預設 株洲工學院學報 2006年5月
- 7、裴燕萍 從語用原則看廣告雙關語 洛陽工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2007年8月
- 8、廖桂榮 我國近三十年廣告廣告語研究概況述評 江蘇廣播電視大學學報 2008年2月

從地名看亞洲地區的語言接觸

Place Names and Language Contacts in Asia

◎張惠英 / 海南師範大學

提要：本文通過韓國地名用字“里、洞”，台灣地名用字“社”，和內蒙、山西、河南、廣東、廣西、江蘇等地同樣的地名用字相比較，看亞洲地區的語言接觸和文化交融。

關鍵詞：地名 里 洞 社 亞洲語言接觸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place names “li(里), dong洞” of the South Korea, “she (社)” of Taiwan with that of mainland in China, to suggest the language contacts and the cultural interchange in Asia.

Keywords: Place name li Dong She language contacts in Asia

一、韓國地名“里、洞”

在韓國地名中，“里”、“洞”兩字的使用頻率很高。例如（據中國地圖出版社《最新世界地圖集》22頁）：

里：云川里 全谷里 下光丁里 丰岩里 榆川里 九切里 畫岩里 酒泉里 龍化里 鐵岩里 梅花里 義谷里 德城里 立岩里 乾川里 下西里 三湖里 長木里 唐項里 川里 梨陽里 新月

里 老玄里 月山里 知西里 里里 承彥里 大昌里 龙新里 朝岩里 固浦里 可興里 馆基里

洞：真安洞 新安洞 玉山洞 花本洞 方鱼洞

原来，“里、洞”在韓國是區、鎮、鄉、村之類的行政區劃名稱。2008年6月，筆者在韓國開會，買到2008年5月10日發行的《月刊導遊地圖 愛思科特首爾（漢城）》地圖上，就看到不少“里、洞”地名。例如：

九里市、清涼里、踏十里、往十里、上往十里

仁倉洞、橋門洞、忘尤洞、水澤洞、峨川洞、面牧洞、新內洞、中和洞、典農洞、長安洞、踏十裏洞、龍踏洞、松亭洞、君子洞、華陽洞、毛陣洞、紫陽洞、九宜洞、廣壯洞、月溪洞、樊洞、長位洞、下月穀洞、鐘岩洞、東仙洞、安岩洞、祭基洞、回基洞、裏門洞、清涼裏洞、馬場洞、往十裏洞、上往十裏洞、鷹峰洞、漢南洞、玉水洞、普光洞、東庫洞、西庫洞、彌阿洞、吉音洞、敦岩洞、東仙洞、三仙洞、昌信洞、普門洞、新設洞、三清洞、仁寺洞、明洞、南山洞、厚岩洞、葛月洞、南營洞、梨泰院洞、龍山洞、二村洞、桃園洞、麻浦洞、舊基洞、弘智洞、弘濟洞、社稷洞、新營洞、付岩洞、清雲洞、新村洞、北阿峴洞、大峴洞、阿峴洞、西界洞、青坡洞、鹽裏洞、孔德洞、龍江洞、玄石洞、滄州洞、新水洞、下水洞、合井洞、堂認洞、東橋洞、望遠洞、延禧洞、城山洞、南加佐洞、北加佐洞、鷹岩洞、神道洞、葛峴洞、龜山洞、大棗洞、驛村洞、新寺洞、繒山洞、津寬外洞、平倉洞、貞陵洞（以上在漢江以北）登村洞、鹽倉洞、禾穀洞、新亭洞、新月洞、木洞、楊坪洞、文來洞、堂山洞、永登浦洞、道林洞、大林洞、九老洞、加山洞、禿山洞、新林洞、新吉洞、汝矣島洞、大方洞、新大方洞、鷺梁津洞、上道洞、本洞、黑石洞、奉天洞、銅雀洞、南峴洞、方背洞、盤浦洞、蠶院洞、新沙洞、清潭洞、鶴洞、論峴洞、驛三洞、瑞章洞、道穀洞、浦二洞、開浦洞、廉

穀洞、逸院洞、水西洞、石村洞、紫穀洞、細谷洞、栗峴洞、蠶室洞、明逸洞、千戶洞、城內洞、芳蕙洞、松坡洞（以上在漢江以南）按，漢江以南的“木洞”既是行政區劃單位名，又是車站名，拉丁字母拼音為Mok-dong。“開浦洞”既是行政區劃單位名，又是車站名，拉丁字母拼音為Gaepodong。“鶴洞”是車站名，拉丁字母拼音為Hak-dong。漢江以北的“明洞”是車站名，拉丁字母拼音為Myeong-dong。作為區鄉等行政單位名的“××洞”不標拉丁字母拼音，而車站名則有拉丁字母拼音。

“里”作為地名，在中國大陸和臺灣都很常見。

臺灣的地名“里”，就以桃源縣為例（據《台灣省地圖集》47頁）：長美里、汴州里、中新里、瑞興里、南興里、霄里村、仁善里、月眉里、普仁里、普義里、內定里、北門里、興國里、新明里、中榮里、高榮里、水美里、照門里、清水里、埔心里、東流里、三湖里、瑞康里、永福里、福安里、瑞源里。

中國大陸的“里”字地名現以江蘇省無錫市為例（據《江蘇省地圖冊》74頁）：范巷里、谷里、薛灣里、石園里、前姑里、毛岸里、新塘里、濮莊里、花園里、井亭里、吳灣里、鬪甲里、孟甲里、樹巷里、向陽里、何家里、陸家里。

“里”，中國古代就是行政單位名稱：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歷代“里”轄戶數不盡相同。在古代漢語中“里”也指人聚居之處，可指宅里、里巷。例如《詩·鄭風·將仲子》：“將仲子兮，無踰我里。”毛傳：“里，居也。”高亨注：“里，廬也，即宅院。”所以用“里”作地名是一種古老的社會現象。

“洞”作為地名，內蒙古、山西、河南等地也常見。內蒙古、山西的“忽洞、圪洞”，也就是北京的“胡同”。山西“洪洞縣”的“洪洞”音同“洪洞”。

內蒙古以“忽洞、圪洞”作為地名常見，例如

(據《內蒙古自治區地圖集》): 西廠圪洞、麻黃圪洞、圪洞坪(6頁, 和林格爾縣)公忽洞、南毛忽洞、圪妥忽洞、大水圪洞(7頁, 武川縣)侯家圪洞、北圪洞(7頁, 清水河縣)南圪洞(8頁, 包頭市區)烏蘭忽洞、鰓忽洞北、鰓忽洞南、圪妥忽洞、北圪妥忽洞、鰓林忽洞、烏蘭忽洞、毛忽洞、賽林忽洞、大毛忽洞、東毛忽洞、烏克忽洞(9頁, 固陽縣)烏蘭忽洞、甘草忽洞(25頁, 察哈爾右翼前旗)公臘忽洞、小合雁胡洞(27頁, 化德縣)甘草忽洞、廠圪洞(27頁, 涼城縣)哈達忽洞、阿麻忽洞、塔布忽洞(29頁, 察哈爾右翼中旗)哈產忽洞、阿麻忽洞、阿來忽洞、古半忽洞(29頁, 察哈爾右翼後旗)點力素忽洞、哈產忽洞、賽忽洞(朝克文都鄉)、賽忽洞(活福灘鄉)(30頁, 四子王旗)大圪洞(37頁, 太僕寺旗)邢向東《神木方言研究》307頁, 就明確記載, 和內蒙臨界的陝西神木方言, 胡同就叫作“圪洞”。同書324頁又說到老派新派用詞異同時還特別指出, 老派稱胡同為“圪洞”, 新派除了說“圪洞”外, 也說“黑浪”。

在《山西省地圖冊》上也能見到一些“洞”字地名。例如: 廣靈縣: 橋洞 黑魚洞(21頁)靈丘縣: 煙墨洞(22頁)平定縣: 天氣圪洞(24頁)孟縣: 小老虎圪洞 大老虎圪洞 洞溝(26頁)長治縣: 洞子溝(27頁)襄垣縣: 圪洞溝(31頁)黎城縣: 六洞(32頁)沁源縣: 圪洞日(33頁)澤州縣: 洞掌 仙洞河(36頁)沁水縣: 梅洞 洞溝(39-40頁)朔州市區: 洞溝(41頁)應縣: 膠泥圪洞(46頁)平遙縣: 普洞 郝洞(50頁)祁縣: 上八洞 下八洞(51頁)左權縣: 洞坪上(54頁)靜樂縣: 洞子頭 水洞莊(57頁)甯武縣: 程家圪洞 大石洞 小石洞 圪洞溝 虎洞溝 梅洞(59頁)五寨縣: 洞兒上(62頁)河曲縣: 東溝子(63頁)繁峙縣: 白沙洞 洞溝門(66頁)洪洞縣: 洪洞縣(86頁)安澤縣: 鹽洞溝(94頁)平陸縣: 洞上(103頁)我們以為, 北方話“胡同”的來源, 和山西

話的“圪洞、骨洞”有著某種聯繫, 也就是說, 和“洞”有著某種聯繫。請看:

沈慧雲《晉城方言誌》33頁: 骨洞kuəŋ²² tuəŋ⁵³
(胡同)

金夢茵《陵川方言誌》42頁: 圪洞kɿŋ³² tuŋ²⁴ (小胡同)

喬全生《洪洞方言誌》30頁: 圪同ku²⁴⁻²² t' uen³⁰
(胡同)

沈明《太原方言詞典》276頁: 圪洞(小坑兒), 278頁: 圪洞kəŋ⁵⁴⁻² tuŋ⁴⁵。

吳建生《萬榮方言誌》33頁: 胡同ku²⁴ tuəŋ³³⁰(進了大門, 尚未到院子里的一段走廊)按, 萬榮的ku²⁴ tuəŋ³³⁰, 作者寫作“胡同”, 實際上就是“圪洞”。

晉語和其他山西方言詞頭“圪”和“忽”就有相通之處; 量詞“個”在山西方言中可讀同“骨、塊、怀、和、兀”; 山西方言的“核”, 聲母有k、x、k'三種讀法, 太原話是: 核桃kəŋ³⁴ t'au¹¹(沈明1994, 279頁), 文水話是: 核xəŋ³¹²(文)、核k'uəŋ³¹²(白)(胡雙寶1984, 27、28頁), 萬榮話是: 核桃 k'u²⁴ t'au³³⁰(吳建生1997, 37頁), 趙秉璿《壽陽方言誌》30頁: 核核(核兒)kuaŋ²² kua²², 《山西方言調查報告》72頁也說到“核”的聲母有多種讀法。所以, “圪洞、骨洞”寫成“胡同、衚衕”, 猶如“蒙古”之作“蒙忽、蒙兀”。

賀巍先生告知, 河南獲嘉縣, 凡是小巷子, 書面都寫“胡同”, 而口語音就是“骨洞”, 周圍地區也都是這個情形。河南社旗話沒有入聲, 所以“骨洞”和“古洞”相應, 而且和山西話的“圪洞”也一致。“古、骨、圪”都是詞頭, 都是“個”的異讀。

賀巍《洛陽方言詞典》就載有:

骨洞兒 ku³³ tuw⁴¹²: 胡同(45頁)活骨洞兒 xuə³¹ ku³³ tuw⁴¹²: 兩端都能通行的胡同(96頁)

所以，用“洞”作地名，和我們祖先穴居生活有關，今西北地方如山西、陝西等地，還可看到住窯洞、窟洞的地方。山頂洞人、千佛洞、莫高窟等說法，就是這種穴居生活的反映。

二、台灣地名“社”，和傣族《泐史》中的地名人名“奢、勳”

據星球地圖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的《台灣省地圖》，“社”作為地名用字很常見。例如：

社寮島（基隆市）舊社（基隆市貢寮鄉）塔拉南社（基隆市烏來鄉）外社、岳哈繃社、郭嶽社、布腦社、巴隆社（桃源縣）喀拉拜社、拉庫社、馬托業社、美喀郎社、塔巴霍社、台亞堪社（新竹縣）寒溪社、鹿皮社、布塔社、遼很社、肯央社、比亞毫社、西克昆社、匹亞南社（宜蘭縣）路分社、社苓（苗栗縣）新社鄉、西喀岳社、羅布果社（台中縣）社頭鄉（彰化縣）社頭鄉（彰化縣）吉庫次社、西拉庫社、西奎社、薩喀丹社、西拉幹社、塔次基裏社、博克隋社、庫巴央社、喀拉胞社、吉裏馬社、烏亞腦社、多苑社、塔戛班社、新社、阿霍郎社（花蓮縣）吉庫次社、西拉庫社、西奎社、薩喀丹社、西拉幹社、塔次基裏社、博克隋社、庫巴央社、喀拉胞社、吉裏馬社、烏亞腦社、多苑社、塔戛班社、新社、阿霍郎社（花蓮縣）翠巒社、喀木交社、帖比倫社、托洛庫社、富士社、萬大社、小埔社、堪塔班社、頭社、塔馬羅丸社、喀社、郡大社（南投縣）社後坪（嘉義縣）番社（台南縣）安丸那社、龍社、大社鄉（高雄縣）網網社、加奈典社、喀拉塔郎社、巴瓦莫里社、塔里裏克社（台東縣）撒莫海社、來布安社、喀巴塔那社、達迭爾社、拉塔社、阿馬丸社、庫那腦社、率芒社、中文社、快子社、牡丹社、高士佛社、社皮（屏東縣）台灣土人之“社”，也可指族群或土人種

類。徐珂《清稗類鈔·種族類·台灣番人》1935頁謂：“台灣土人，不知所自何方，俗謂之番人。聞自海外遷來，及宋末零丁洋帥敗，遁歸。其種類甚多，南自加六堂至崇爻七十二社，北自崇爻至雞籠番社尤不可勝數。”又謂：“台灣內山有社，曰啣，其人剪發，突鏡，大耳，……俗稱之曰雞距番。”這些“社”，既是土人村社，也指土人種類。徐珂同頁“畚客”條還指出：“或曰，畚客即社民，在閩浙間，俗訛為余民，而又訛為畚客，蓋漢時所謂山越者是也。”

游汝傑《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修訂版（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78—79頁：

高山語有一個地名通名是“社”。“社”本來是高山族基層組織名稱，相當於漢族的“村”。每社可有八九戶到幾百戶不等，史書稱為土社、番社。在西部平原可以找到許多含“社”字的地名，例如竹東有大八幾社，意為茂林村；東勢有稍來社，意為溫泉村；嘉義有流勝社，意為楓林村；潮州有乳芒社，意為石檣村；恒春有女仍社，意為笠山村。

其實，“社”作為地名，內地見得很多。請看廣西、廣東的例子：

廣西的地名“社”（據《廣西省地圖冊》）：

枯社、祿社（5頁，武鳴縣）六社、坡社（7頁，馬山縣）社背、甘社、上社、下社（13頁，柳江縣）社灣（13頁，柳州市轄區）肯社、良社（14頁，柳城縣）頭社、社耳、大社（14頁，鹿寨縣）社宜（15頁，融安縣）下社洞（15頁，三江侗族自治縣）溯社鄉、社塘（17頁，來賓市轄區）古社（18頁，金秀瑤族自治縣）板社（19頁，忻城縣）坪社（20頁，荔浦縣）社背（20頁，陽朔縣）社背（21頁，臨桂縣）社背、社膽弄（上有“山”）（21頁，永福縣）老社水（24頁，資源縣）上社（24頁，龍勝各族自治縣）社灣、社坪（25頁，平樂縣）社公嶺（25頁，恭城瑤族自治縣）社公塘（25頁，平樂縣）社面、社背、社

垌、社咀、社枚（26頁，蒼梧縣）白社、社塆（26頁，梧州市轄區）白祝社、社評、龍德社（27頁，藤縣）社垌、大王社、大社（28頁，岑溪市）官社、官社坪、垌社、社東（28頁，蒙山縣）社垌、社窩、社角、社角頭（30頁，防城港市轄區）社屋坪（32頁，欽州市轄區）社頭山、社頭、社根（33頁，浦北縣）大垌社、社嶺塘、吉社沖、社嶺、社步鎮（35頁，桂平市）冠社、社垌、社山、社塘崗、社龍（35頁，平南縣）長社坡、大社（36頁，玉林市轄區）社土充（36頁，興業縣）社坡咀、社化（37頁，容縣）社垌、社塘（37頁，北流市）社根、社背（38頁，陸川縣）社坡、社壇底、社根（38頁，博白縣）社六界（39頁，賀州市轄區）社尾洞（40頁，富川瑤族自治縣）陸社、社背、社坪（41頁，昭平縣）社郎、社屯、社馬屯（42頁，百色市轄區）合社、新社（44頁，西林縣）下社勞（44頁，隆林各族自治縣）坡社（46頁，靖西縣）浪社（48頁，田陽縣）社七（49頁，大化瑤族自治縣）紅社、白社（50頁，宜州市）拉社、延社（51頁，鳳山縣）同社（53頁，東蘭縣）那社村、那社鄉、岑社（53頁，巴馬瑤族自治縣）弄社上（54頁，都安瑤族自治縣）社村（55頁，環江毛南族自治縣）社堡（55頁，羅城仫佬族自治縣）

廣東省的地名“社”（據《廣東省地圖冊》）：

上社、下社、北社（5頁，廣州市轄區）社貝凹（6頁，增城市）新社、南社（11頁，佛山市南海區）社滘（11頁，佛山市三水區）匯龍社（11頁，佛山市順德區）布社（12頁，佛山市高明區）下社（13頁，乳源瑤族自治縣）社光（13頁，曲江縣）上裏有走之旁社（14頁，仁化縣）東亨社、五社（15頁，南雄市）新社背、社前（16頁，翁源縣）佳社（16頁，新豐縣）社前排、社背、頭營社（17頁，紫金縣）社前、社箭寨、久社鎮、新社（18頁，東源縣）社背、社光圍、社下（19頁，龍川縣）社落塘（20頁，連平

縣）社口、合水社（20頁，和平縣）仙客社（21頁，梅州市轄區）社前、社前坑、雙社仔（22頁，興寧市）社崗上（23頁，平遠縣）社妥、九社（24頁，大埔縣）社子前、社背（25頁，豐順縣）社崗下、社背排、社下、社前、社里崑（26頁，五華縣）社溪（27頁，惠州市轄區）社下（29頁，博羅縣）社排（31頁，陸河縣）東邊社（33頁，中山市）社咀坪（34頁，鶴山市）中社（35頁，台山市）春社（36頁，開平市）塘尾社、社塘（38頁，阳春市）社山（39頁，吳川市）橋社（41頁，連江市）社朗仔（42頁，徐聞縣）塘梨社（44頁，信宜市）社壇背（45頁，高州市）社村、社凹、社田、社崗頭、社山、社朱坑尾（49頁，廣寧縣）社村、社貴、社墩、社山（50頁，封開縣）社背、社坑、社鄧（51頁，懷集縣）社灣、社崗（55頁，清新縣）上社（59頁，饒平縣）社背埔（61頁，普寧市）葛麻社（62頁，雲安縣）格木社、社垌（63頁，羅定市）社坑、大社背（64頁，鬱南縣）

我們要說，“社”，在中國古代就指土地神：《國語·魯語上》：“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後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韋昭注：“社，後土之神也。”又因此土地神之名而成為地區的單，古代或六裏為社，或二十五家為社：《管子·乘馬》：“方六裏，名之曰社。”《晏子春秋·雜下十六》：“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稟邑，反市者十一社。”張純一校注：“二十五家為一社。”到元代，五十家為社：《元史·食貨志一》：“縣邑所屬村疇，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事者一人為之長。”古代有的地方稱生而眉白顏赤的人為“社公男”或“社婆女”（見俞琰《席上腐談》）。閩人稱父或老者為“老舍”，稱祖母為“嫲舍”，這“舍”也就是“社”。所以，“社”自古以來就既可以指神，也可以指人，也可以指村社單位。

《明史·土司列傳》中有很多用“奢、沙”作姓

氏，例如：“奢尾、奢蘇、奢貴、奢效忠、奢祿、奢崇周、奢崇明、奢世績、奢社輝、奢寅、奢崇輝、奢爵、奢勿、奢香、奢助、沙保、沙源、沙氏、沙卜、沙定洲、沙普”等，“奢、沙”都是麻韻字，都是“社”的傳譯。

李拂一編譯傣族古代文獻《泐史》中，就有“奢、奢鬼、薩”作人名地名，例如：“奢鬼猛（人名，死後的封號）、奢隴法（男子名）、奢昂法（男子名）莊奢（地名）”等。李拂一在《泐史》24頁注釋“奢鬼猛”時指出，“鷓”是“一種鬼神之稱，略等於社。亦可作護國神或城隍解。疑‘鷓’即‘社’之轉。”筆者受此啟發，以為這些“社、奢、沙、余、鷓”聲音相近，都屬同源。“社（奢、鷓、余、沙）”等廣泛用作東亞地區的地名人各族名的現象，反映了自古以來各民族之間的長期而又密切的各種往來，反映了各民族之間自古以來社會生活、思想信仰、語言名稱等方面的互相交融互相吸收。

最後，我們要說，其實閩語如永安話、沙縣話、三元話等的“佝（指人）”，如“丈夫佝（男子）、阿娘佝（女人）、囡子佝（小孩兒），也就是“社”（參張惠英2002，181—190頁）。“社”之稱人，猶如“伯、父、甫、子”之稱人。

還有，北方女真、滿族等稱女巫為“薩瑪、薩滿、叉瑪”等（南方彝族、侗族、拉祜族等也稱神為“薩”），以此命名的薩滿教流行於北方，清徐珂《清稗類鈔·宗教類》1983頁提出，“疑所謂薩滿者，特沙門之音轉耳”。筆者以為，“薩（沙）”即社也，“瑪”即母也，“薩瑪、薩滿”猶如“社母、社婆”（詳參張惠英2002，181—190頁）

參考文獻：

- 1、杜懷靜主編 2001 廣西省地圖冊 中國地圖出版社
- 2、高秀靜 2001 內蒙古自治區地圖冊 中國地圖出版社
- 3、李拂一編譯 1983 泐史 復仁書屋
- 4、賀巍 1998 洛陽方言詞典 江蘇教育出版社
- 5、黃秀蓮、沈文軒主編 1992 最新世界地圖集 中國地圖出版社
- 6、星球地圖出版社 2003 臺灣省地圖
- 7、邢向東 2002 神木方言研究 中華書局
- 8、徐珂 1984 清稗類鈔 中華書局
- 9、游汝傑 2003 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修訂版） 上海辭書出版社
- 10、張紅主編 2004 廣東省地圖冊 中國地圖出版社
- 11、張惠英 2002 語言與姓名文化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12、中國地圖出版社 1992 最新世界地圖集

試論語言接觸與漢語文白轉型^[1]

Language Contact and the Chinese Reform from Wenyan (文言) to Baihua (白話)

◎徐時儀 / 上海師範大學

提要：漢語的文白轉型既是自身發展的趨勢和思想文化以及思維形式發展的需要，也是語言接觸的影響和推動。南染吳越與北雜夷虜的語言接觸客觀上使白話成爲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彼此交流溝通的應用語體，推動了漢語文白此消彼長的轉化。漢語與印歐語言的接觸導致了漢語的兩次歐化，尤其是西學東漸的第二次歐化可以說是文白轉型的一個重要外因，促成了漢語文白消長由量變到質變的飛躍。

關鍵詞：語言接觸 文白轉型

Abstract: The reform from Wenyan (文言) to Baihua (白話) is not only the needs of their own development trends, but also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and the thought form,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and the impetus of language contact. The language contact with the South China mixed Wu (吳) and Yue (越) kingdoms and the northern mixed Yi (夷) capture's language causes the Baihua (白話) to become an applied style objectively, which are used and communicated by the emperor and the common people each other, and promoted the reform which the Chinese language change from Wenyan (文言) to Baihua (白話). Chinese and Indo-European language's contact has caused the Chinese two Europeanizations, particularly the second Europeanization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learning to the east's may say that is an important external factor of the Chinese reform from Wenyan (文言) to Baihua (白話), which has facilitated the increase in Baihua (白話) and the decrease in Wenyan (文言), and facilitated the Chinese change from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to the qualitative change leap.

Key words: language contact; the reform from Wenyan (文言) to Baihua (白話)

文白演變是上世紀初漢語的重大變動，文白的轉型深刻廣泛地影響了我們整個民族的思維和演說方式，成為中國文化由古典形態走向現代形態的起點。秦漢以來白話中的口語成分發展至清末民初，時代的變革促使文白的替代突破量變而完成了質變。文白的轉型自有其必然規律。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語言的一切變化和發展不會是偶然的，總有這樣那樣的原因，有內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內部原因指語言自身存在著引起變化的條件，外部原因指某種社會條件引起的語言變化。大致而言，漢語自身發展的趨勢和思想文化以及思維形式發展的需要導致了漢語文白的轉型，^[1]而漢語的文白轉型也或多或少受到語言接觸的影響。

一、漢語與異質語言的接觸

漢語的歷史悠久，使用區域廣闊，在中華文化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漢語與異質語言的接觸可謂源遠流長。上起商周，下迄清末民初，漢語既有親屬語言間的接觸，又有非親屬語言間的接觸，即既有內部不同氏族不同方言的接觸交流，又有外部不同國家不同語種的接觸交流，具有南染吳越與北雜夷虜的特點。漢語與異質語言的接觸中有交流和碰撞，也有交融和認同，漢語正是在與不同語言文化的接觸中不斷充實完善的，語體上則漸由文言轉型為白話。

漢語與印歐語言曾經發生過三次大規模的接觸，這三次接觸又導致了漢語的兩次歐化。第一次接觸是西漢時張騫鑿通西域，中西交通的經貿往來導致了兩漢至唐代漢語與西域語言的接觸，漢語中產生了“獅子、蒲桃”等一批外來詞。第二次是西漢末東漢初佛教的東傳，漢魏至唐五代大規模的佛經漢譯導致了漢語與梵語、犍陀羅語以及中亞的吐火羅語等語言的接觸，形成了漢譯佛典不同於文言的特有的句式，這可以說是漢語的第一次歐化。第三次即明清至民國的西

學東漸，西方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衝擊導致了漢語與歐美語言的大規模接觸，形成了一種不同於古白話的歐化白話，這可以說是漢語的第二次歐化。

漢語與阿爾泰語言也發生過四次較大規模的接觸，第一次接觸是漢代與匈奴的交往，第二次是北魏時鮮卑族的人主中原，第三次是遼金元時期契丹和女真及蒙古族的入主中原，第四次是清代滿族的入主中原。

二、佛經的漢譯與白話新文體

自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絲綢之路後，佛教由古印度經過西域傳入我國。佛教中的許多詞語潛移默化融入漢語中，取代了傳統的詞語而成為人們生活中的常用詞語。如漢語中的“宇宙”，佛教用“世界”表示。“宇宙”和“世界”的詞義原是時間和空間的概括。《淮南子·齊俗訓》說：“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世界”在佛教中的涵義指三世與十界。三世指過去、現在和將來；十界指八方和上、下。現在“宇宙”和“世界”都指空間而言，“宇宙”主要指太空，“世界”主要指地球上的空間。“世界”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廣泛，除了表示地球上的空間外，還可以表示較小的空間範圍。如“桌上亂七八糟，攤了一世界”。又如表示“現在”義的“今”與佛教詞語“現在”曾并存於漢語中，現代漢語中“今”為“現在”所替代，只用於書面語中了。

佛經的翻譯始於東漢，至唐達到極盛，經歷了東漢至西晉的“古譯”階段、東晉南北朝的“舊譯”階段和唐代以玄奘為代表的“新譯”階段。佛經的語言是印歐語系的梵語和犍陀羅語等古代印度語言以及古代中亞語言，漢譯佛經以漢語為基礎，又吸收了佛經原典的語言成分，可以說是漢語與印歐語言相互滲透和融合的產物。宋釋贊寧在談到佛經翻譯時說：“聲明中(一)‘蘇漫多’，謂泛語、平語言辭也。(二)‘彥

底多’，謂典正言辭也。佛說法多依‘蘇漫多’，意住於義，不依於文，又被一切故。”^[1]“彥底多”指古雅之文；“蘇漫多”指通俗之文。梁啟超在《翻譯文學與佛典》一文中指出：“佛恐以辭害意且妨普及，故說法皆用通俗語。譯家惟深知此意，故遣語亦務求喻俗。”^[2]釋迦牟尼采用實用主義的語言策略，說法的內容往往和日常生活相聯繫，並且用聽法人能聽懂的口語，力求通俗易懂。這種語言策略在他滅度後仍在執行，佛經的翻譯自然也遵從這一策略。據《法顯傳》載：“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口傳，無本可寫。”又據《三國志》裴注引魚豢《魏略》云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從月氏使臣口受浮屠經”。《高僧傳》卷二載翻譯《阿毗曇婆沙》時，“由僧伽跋澄口誦經本，曇摩難提筆受為梵文，佛圖羅刹宣譯，秦沙門敏智筆受為晉本”。可見最初翻譯佛經時，尚無書本，僅憑譯人背誦，往往多由西域僧侶口述。這些僧侶大多是通過與漢人交往在短期內掌握漢語的，這些漢語詞語往往多為俚俗口語。譯者翻譯佛典時往往不受文言文的局限，采用了很多當時的通俗口語，尤其是宗教的經典重在傳真，切合經文的原意，而不重在辭藻文彩；重在讀者易解，而不重在古雅，所以譯經大師們多以“不加文飾，令易曉，不失本義”相勉，^[3]注意從“雅古”到“今時”的轉換，即用“今時”之語取代“雅古”之語，使“千歲之上微言”的佛教奧義變成“百王之下末俗”的凡夫俗子也可理解的道理。這也使佛經中包含了許多口語成分，形成一種白話文體。^[4]因而漢譯佛經可以說是用既包含文言文又包含歷代口語成分的混合語言譯成的，形成漢語的第一次歐化，成為在漢語的發展史上影響古白話書面語發展的重要媒體。

佛經翻譯雖然屬於間接的語言接觸，但對漢語的影響已滲透到漢語的語音、詞彙和語法各個層面。佛經翻譯為漢語詞彙系統增加了大量新詞，如塔、和尚、尼姑、過去、現在、未來、剎那等。漢語的語法

系統也在佛經翻譯的影響下產生變化。如中古漢語的“取”字式處置式就是受梵語的影響產生的。^[5]佛經翻譯導致的語言接觸還使漢語中的俗字大量增加，並促進了漢語詞彙的雙音化進程。漢譯佛經中不僅有著文言文和大量口語、俗語的混合，而且還存在著漢語和大量原典語言的混合。梁啟超曾指出“吾儕今讀佛典，誠覺仍有許多艱深難解之處。須知此自緣內容含義，本極精微，非可猝喻。亦如近譯羅素、安斯坦諸述作，雖用白話，原非盡人能解也。若專以文論，則當時諸譯師，實可謂力求通俗。質言之，則當時一種革命的白話新文體也。”^[6]這種白話新文體的語言是語言接觸的產物，從整體上看是一種既非純粹口語又非一般文言的特殊語言變體。漢譯佛經既非散文，又非韻文，然而富有節奏感，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漢末以後數百年間漢語的實際情況，“具有強烈的白話味兒”，^[7]也可以說是文白此消彼長的量的積累。

三、漢語通語的南染吳越與北雜夷虜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的大變動時代，國家戰亂頻繁，南北對峙，國土四分五裂，人民遷徙，民族交融，語言接觸頻繁。漢語與南方一些少數民族語言的接觸產生了南染吳越的南方通語，而漢語與阿爾泰語間的語言接觸則產生了北雜夷虜的北方通語，^[8]南染吳越和北雜夷虜的語言接觸使漢語的口語和書面語產生了明顯的分歧，形成文白的對立。

五胡十六國時期鮮卑族一度人居中原，建立了政權，實行漢化政策。在漢化政策下，鮮卑語雖然很快就消亡了，却對漢語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如古白話中始出現的“哥”，來自鮮卑語。胡雙寶《說“哥”》一文認為“漢語作親屬稱謂用的‘哥’是從當時外族語言中吸收來的”。^[9]哥，先秦兩漢是“歌”的異體字。《說文》：“哥，聲也。”翟灝

《通俗編》說：“《晉書·西戎傳》：‘吐谷渾與弟分異，弟追思之，作《阿幹之歌》。’阿幹，鮮卑語謂兄也。阿哥，當即阿幹之轉。”南北朝時鮮卑人進入北方地區，民族間的大融合和語言的接觸使漢語中出現了鮮卑語借詞“(阿)幹”，後音轉為“哥”，成為漢語親屬的稱謂。這是很可能的。^[12]上古“哥”在歌部，“兄”在陽部，主要元音不同，不能通轉。中古“兄”轉入庚部，“哥”與“兄”的語音相近，因而產生意義上的聯繫，承接了“兄”的意義。“哥”在當時的鮮卑語中兼有“兄”、“父輩”等長者的意思，後逐漸用以指“兄”，在口語中取代了“兄”，遂成為古白話中的基本詞彙。如白居易《祭浮梁大兄文》：“再拜跪奠大哥於座前。伏惟哥孝友慈惠，和易謙恭。”

宋遼金元時期中國的北方地區一度處在契丹和女真的統治下，各種語言頻繁接觸，為了交際的需要，說不同語言的人交談時在語言上彼此都會包涵和容忍一些，各自也都會在語言的有些方面作些遷就和讓步。這些地方人們說的口語把漢語與北方少數民族語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當時在各民族間用來交際的“漢兒言語”。^[13]“漢兒言語”是語言相互滲透和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作為北方各兄弟民族交際的中間媒介使用，成為當時的共通語。^[14]北方少數民族語在與漢語的接觸中對漢語也有一定影響。如“漢兒言語”中表示“惡劣、不好”義的“歹”唐末五代時在北方漢語口語中使用，宋代傳入南方，漸由口語進入書面語，至元代則被普遍使用，成為漢語中沿用至今的常用詞。^[15]又如“帳”在契丹、蒙古等北方民族語言記載的史料中有“戶數”義，據馮繼欽等所撰《契丹族文化史》第八章《契丹族的家庭》說，史籍中的“家”、“戶”，“還有時而使用的‘帳’，一定意義上都是‘家庭’的同義語。由此可見，最遲在南北朝和隋唐時代，契丹人就以家庭為基本單位進行社會活動，并用家庭的數量部落大小和人口多少。”^[16]黃

時鑒在《元代札你別獻物考》一文中亦說，“蒙古人普遍使用氈帳。蒙古語原有ger一詞，義為‘帳，家’。”^[17]“帳”在北方游牧部族中有“戶數”義，這就使“帳”在詞義上與先秦兩漢時表示統計戶口多少等情況的“計”有了聯繫。“帳”的“計算帳目”義在漢語中的使用與當時我國北方漢族與西域少數民族的交往群處有關。^[18]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各民族間的交融加強了語言的交流，出於交際的需要，遷入中原的少數民族必須學會漢語，這些少數民族與漢族交往時說的也必然是在當時漢語口語基礎上形成的“漢兒言語”，因而以其時口語為規範基礎的古白話書面語也與蒙古語同時成為元代行政機關的官方語言。一些蒙古語為漢語吸收，如“站”、“胡同”等，還出現了一些表假設的“呵”、表因果或目的的“上頭”、表場所或對象的“行”、“根前”、“根底”等後置詞。又如上古漢語用“飲”表示“喝”的概念，南北朝時出現了“呷”。《洛陽伽藍記·城東景寧寺》：“呷啜鱒羹，啜啣蟹黃。”“呷”，呼甲切，入聲。宋元以後，北方話入聲消失，音變為“喝”。無名氏《凍蘇秦》第三折：“你敢也走將來喝點湯，喝點湯。”考原本《老乞大》：“俺不打火，喝風那甚麼？”原本《老乞大》所載為“喝”表“吃”義的最早用例，有可能是蒙古語表“飲”的口語記音。^[19]元代統治者為了維持其統治，也不得不學習漢語。他們學的漢語自然不可能是高深典雅的文言，而必然是當時通行的口語白話。元代皇帝要瞭解漢文典籍，由漢人大臣用當時的口語來詮釋講解，寫下來成為白話講章。元代的詔書敕令等都是先用蒙古語寫成，然後譯成漢語白話，形成“白話公牘”，^[20]這促使了漢語書面語由文言向白話定位。清代滿族人主中原，皇太極鼓勵滿人學習漢語，由初入關的滿漢雙語制到嘉慶時逐步通用漢語，其所學所用漢語主要是白話，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文白的演變，白話得到廣泛的應用。南梁吳越與北雜夷虜的語言接觸客

觀上使白話成爲上至皇帝下至庶民彼此交流溝通的應用語體，推動了文白此消彼長由量變向質變的轉化，初步形成文白轉型的雛形，對漢語書面語由文言向白話的演變有著深遠影響。

四、西學東漸與文白的轉型

1840年，帝國主義列強發動鴉片戰爭，憑藉長槍大炮闖入中國，中華民族飽受凌辱，而國門的洞開也使中西語言有了更多的接觸，來自西學的外來思想、觀念、科學和技術形成不可阻擋的巨大衝擊，大量的西學新詞順應清末以來洋務派所代表的西化傾向和主張社會革命的平民思想蜂擁而入，據高名凱等《漢語外來詞詞典》，僅從日語傳來的就有八百四十多個。

^[24] 五四時期這些新詞已遍及政治、經濟、軍事、心理、文化等各個領域，且大都是中國傳統文化基本上沒有而又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在新的生存語境中應該具備的，猶如一弘源頭活水激起了漢語表述系統的層層波瀾，這使早在秦漢就已凝固的文言應接不暇，而白話在中西語言的接觸中則有足夠的張力來融合西洋文化，以新詞彙、新句法、新文體、新風格來表述新事物、新知識、新思想，形成了漢語的第二次歐化，顯示了漢語表述系統中潛藏的強大的應變能力和再生能力。

張恨水曾以《三國演義》爲例，說明五四以來新文學歐化句式與當時一般讀者的美感距離：“‘階下有一人應聲曰，某願往，視之，乃關雲長也。’這種其實不通俗的文字，看的人，他能了然。若是改爲歐化體：‘我願去，關雲長站在臺階下面，這樣地應聲說。’文字儘管淺近，那一般通俗文運動的對象，他就覺著彘扭，看不起勁。”^[25] 張恨水說的新文學歐化句式與當時一般讀者的美感距離反映了五四以來歐化白話與古白話的區別。

五四時期的歐化白話也是其來有漸，歐化白話的

形成可以溯至近代西方來華傳教士翻譯的傳教讀本。如果說東漢佛教東傳，漢譯佛經是“當時一種革命的白話新文體也”，^[23] 那麼這些西方傳教士出於面向更多普通老百姓傳教的需要，翻譯的傳教讀本也力求語言通俗，多用接近當時口語的白話，已形成一種具有歐化包彩的白話，可以說是五四時期歐化白話的濫觴。^[24] 如19世紀70年代西方傳教士翻譯的基督教贊美詩：“有位朋友，別人難比，愛何等大，勝似兄弟，疼愛兄弟，愛何等大。世上朋友，有時離你，今日愛你，明日恨你，只有這位，總不誤你，愛何等大。”

“早起看見輕霜薄雪，沒到日中已經消滅。花開滿樹眼前富貴，一陣風來忽然吹卸。”^[25] 又如傳教士賓威廉翻譯的約翰·班揚所著《天路歷程》，初譯是在1853年，採用文言，後來出於傳教的需要，又在1865年改用白話重新翻譯。譯文雖用白話但帶有西方語言的表述特點，具有歐化色彩。如書中的開頭第一段寫道：“世間好比曠野，我在那裏行走，遇著一個地方有個坑，我在坑裏睡著，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人，身上的衣服，十分襤褸，站在一處，臉兒背著他的屋子，手裏拿著一本書，脊梁上背著重任。”^[26] 這段話與今譯本所用語言大致相同，與現代漢語也沒有太大的差別。^[27] 正如裘廷梁1898年在《論白話爲維新之本》一文中所說：“耶氏之傳教也，不用希語，而用阿拉克克之蓋立裏土白。以希語古雅，非文學士不曉也。後世傳耶教者，皆深明此意，所至則以其地俗語，譯《舊約》、《新約》。”^[28] 就本質而言，翻譯是把源語信息轉化爲目的語信息。由於語言的異質性，源語的某些語言特徵必然會進入目的語語言體系，對目的語產生影響。因而我們可以說，現代漢語書面語的歐化現象與五四後大量西方語言著作的中譯本的傳播密切相關，《聖經》的翻譯和西方傳教士的譯作已開五四時期漢語第二次歐化的先聲，爲五四時期文白的轉型奠定了基礎。

語言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血液。人們的語言觀念

既為文化傳統、文化觀念所制約，同時也為社會變革和文化碰撞所撼動而改變。一種語言表述系統的特質在於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西學東漸中大量的新概念蜂擁而入，每一個新概念、新詞語要求在漢語的表述系統中有一個相應的位置，舊的概念體系已無法包容和闡釋這些新的文化現象。明清以來西學的東漸和中西語言的接觸使人們意識到文言定型後作為中國傳統世界觀和思想體系以及思維方式具有強烈的守舊性，越來越脫離了不斷變化發展的口語，尤其是在中西的交往中已不能適應表達和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需要，文白的轉型漸成為大勢所趨。十九世紀末至五四時期一些新概念新思想如“民主”、“民權”、“君主政體”、“立憲政體”、“國家”等，通過中西語言的接觸和文化的交往不斷地為漢語所接受成為漢語詞彙中的新成分，“憲法、國會、議會、政黨、選舉、權限、民權、自由、法律”等新詞語替代了“皇帝、太監、龍廷、後宮、詔書、奏摺”等舊詞語，“科學”、“民主”、“人權”、“社會”等對文言而言屬於異質的西學術語概念範疇的異域語碼和話語方式進入漢語白話，正是這樣一大批有關文化與社會的關鍵詞融入漢語白話詞彙系統，^[2]豐富了漢語白話的語言表達功能系統，也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傳統的語言體系，而且句子結構也趨於嚴密，較之古白話有著更好的敘事功能和更科學細緻的藝術表現力，^[3]形成一種新的話語生態，促使白話取代了文言話語的文化範型，導致了漢語文白的替代突破量變而完成了質變。因而現代白話也可以說是中西文化交合產下的寧馨兒，語言的接觸也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漢語的文白轉型。

五、結語

語言是人們交際的工具，語言與人類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關。研究語言的發展不能不研究說不同語言的

人群之間的語言接觸。語言接觸是語言變異和語言變化研究的基本內容，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任何一種語言都不會孤立地存在，不同語言文化間的接觸交流總會導致語言間的相互吸取。中國歷史上由於戰爭和自然災害等原因形成頻繁的人口遷徙，人口的遷徙造成不同語言接觸的南染吳越與北雜夷虜，人們彼此間交際所用的口語也就與書面語越來越不一致，而語言的發展要求書面語與口語趨於一致，因而南染吳越與北雜夷虜的語言接觸促進了漢語文白的此消彼長。漢語在與阿爾泰語言、印歐語言的接觸中，吸收了大量外來詞和一些語法形式及表達手段。漢語與印歐語言的接觸導致了漢語的兩次歐化，尤其是西學東漸的第二次歐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文白轉型的一個重要外因，促成了漢語文白消長由量變到質變的飛躍。

語言接觸是語言相互影響發生變化的一個重要起因，語言接觸可以深入到語言系統的各個層面，語言接觸導致的語言變異可以涉及到語音、詞彙和語法，而社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則決定了語言接觸的深度，即決定了一種語言受另一種語言影響（干擾和借貸）的方向。因而漢語文白的轉型不僅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一種文化現象，隱含著價值觀念的更新，涉及到社會的發展和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等多方面，其中也涉及到語言的接觸，尤其是在西學東漸浪潮的衝擊下，印歐語言與漢語的劇烈碰撞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漢語的文白轉型。徐世璇《語言接觸性衰變的階段性和質變標志》一文指出：“語言接觸對各種具體語言的影響可能導致兩種性質迥然不同的結果：一種是相接觸的兩種語言互相影響、各自從對方吸收新的成分進一步充實發展。從其他語言中補充進有效的表現形式和表達手段，是語言系統及時更新、不斷豐富的重要途徑之一，有助於語言內涵逐步深化，結構系統更加擴展，社會交際功能進一步增強，從而保證語言不斷適應隨時發展的社會交際的需求。另一種是相接觸的兩種語言實力不均衡，處於弱勢地位的語言在強勢

語言的制約下逐漸衰退。”^[11] 漢語的文白轉型可以說是在印歐語言的劇烈衝擊下漢語語言系統的及時更新，標志著漢語新書面語系統的形成，具備了吸納西學和融合東西方文化的能力，適應了表達現代思想的需要，反映了時代的變革，為構建現代漢語奠定了基礎。漢語語言系統的更新不單純是以增加新詞彙和新句法為標志的外在形式的演變，更是把新概念和新詞彙所體現的科學成果和思維方式融入漢語語言系統的內在結構之中。這是漢語語言系統內蘊的生機所在，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生機所在。^[12] 語言的接觸是促使語言變化的外部原因，而且常常與語言的內部因素共同起作用。漢語的文白轉型既有語言演變發展的內在規律，又有外部的推動促成。五四時期，語言的變革是勢在必然，大勢所趨，但如何變革？如何既適應社會的發展又能保持民族的文化傳統？就當時來說，實際上有三種選擇。一是改造文言文，即在古漢語中增加西學東漸產生的新名詞、新術語和新概念，但文言反映的中國傳統思想和西學東漸帶來的西方思想從根本上是兩種思想，文言和西方語言是兩套語言系統，二者并不能輕易地相容。文言作為一個封閉而超穩定的系統，僅靠增加一些新名詞、新術語和新概念是不可能改變傳統的世界觀和思維方式的。二是廢漢字而改用西方的拼音文字，即全盤西化論，但廢除漢字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是徹底廢除古漢語，這在具有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傳統和文化自成體統的中國，當然也是不可能行得通的。第三種就是借用白話，同時吸收西學東漸的先進的話語方式、思想方式和思維方式，把西學東漸產生的新名詞、新術語和新概念改造為民族化、中國化的語言形式。^[13] 因為古白話是在東漢以來口語基礎上形成的，長期以來處在文言的附庸的地位，不具備獨立的思想體系，還未構成一個完整的語言系統，而又最具有工具性，可以按照一定的意志進行改造，既可以和反映中國傳統思想的文言兼容，又可以和反映西方思想的話語方式兼容，相較文言來說

生命力顯得更為旺盛，在漢語與印歐語言的接觸中也就彌補了文言的不足，而時代的變革則激發了古白話在文言壓抑下潛在的活力。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一文說：“一個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語言形成這兩個方面的關係極為密切，不論我們從哪個方面入手，都可以從中推導出另一個方面。”“民族的語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語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過了人們的任何想像。”“在所有可以說明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的現象中，只有語言才適合於表達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最隱蔽的秘密。”^[14] 在近代中國社會大變革這一時代的背景下，白話正好適合於表達民族精神和民族特性，“五四”新文化運動則適應社會的變革的需要，提倡白話文，以新的語言體系取代舊的語言體系，主張從人民大眾的口語中吸取更多更具表現力的成分，更好地反映我們民族的特色。白話文就是在這樣強烈的民主意識驅使下取代了文言文，適應了時代的發展，同時又未割裂民族的文化傳統。在中西語言接觸和文化碰撞中，白話成為中介，在一定程度上起著溝通中西思想的作用，既突破了文言的限制，克服了文言的缺陷，又適應了近代中國社會大變革強烈民主意識的要求。我們可以說五四時期的白話運動實際上就是傳統白話的改造運動。現代白話文實際上就是在傳統的白話文基礎上吸收了印歐語言的語法、詞彙，特別是思想詞彙，進一步深化了漢語的內涵，擴展了結構系統，從而完成了漢語的文白轉型，形成了與新的社會相適應的一種新興話語方式，表現的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和思想體系，保證了漢語不斷適應隨時發展的社會交際的需求。因而文白轉型形成的現代漢語可以說是古今、中西和雅俗衝撞交融的產物，漢語的文白轉型不僅僅是語體的演變，而且還促成了中國文化由傳統的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化，進而成為傳統中國走向現代中國的轉折點，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和開拓上產生了巨大和深遠的影響。

註釋

[1]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08BYY044);上海師範大學原創與前瞻性預研究項目。

[2] 參拙文《略論漢語文白的轉型》,《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

[3] 《宋高僧傳》卷三。

[4] 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佛學研究十八篇》,中華書局1989年版。

[5] 胡適《白話文學史》第九章《佛教的翻譯文學》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頁。

[6] 俞理明《佛經文獻語言》:“佛經文學用語實際上成爲一種專供佛教使用的、既不同於口語又區別於傳統文言的新型書面語,是以漢魏以來的民族共同語爲基礎,反映的主要是南北朝以前口語的白話文。”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24頁。

[7] 曹廣順、過笑容《中古譯經中的處置式》,《中國語文》2001年第6期。

[8] 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佛學研究十八篇》,中華書局1989年版。

[9] 羅杰瑞《漢語概說》,語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頁。

[10] 關於南方通語和北方通語的相互關係,魯國堯《“顏之推迷題”及其半解》(《中國語文》2002年第6期和2003年第2期)一文所論甚詳,此從略。

[11] 胡雙寶《說“哥”》,《語言學論叢》第6輯,1980年。又《詞彙學論文彙編》,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

[12] 陳宗振《我國突厥語的“父母兄弟”等稱謂及其演變》一文考察了維吾爾語、哈薩克語、柯爾克孜語等民族語的有關情況,認爲古代表“兄”、“叔”等“年長男親屬”稱謂的多義性、跨代性是與匈奴、突厥、回鶻等古代民族的家庭、婚姻制度相適應的。《民族語文》1996年第4期。

[13] 見於《三朝北盟會編》中所引《燕雲奉使錄》、《芬齋自叙》、《采石戰勝錄》、《續資治通鑒長編》中的《乙卯入國奏請》等。

[14] 太田辰夫《漢語史通考》,重慶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頁。

[15] 參拙文《說“歹”》,香港《中國語文通訊》總71期,2004年。

[16] 馮繼欽等《契丹族文化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7] 黃時鑒《元代札你別獻物考》,《文史》第35輯,1992年。

[18] 參拙文《“帳”和“賬”的形義演變考探》,香港《中國語文通訊》總55期,2000年。

[19] 參梁冬青《“喝”表示“飲用”義的始見年代及其書證》,《汕頭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

[20] 見於《孝經直解》、《直說大學要略》、《元典章》、元代白話碑和《老乞大》、《樸通事》等。

[21] 汪榮寶、葉瀾《新爾雅》大致上分十四個門類收集和解釋當時常見常用的新名詞,容納了當時新興的各種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如“國家之起源”、“三權分立”、“民法”、“商法”、“信用”、“保險”、“群之發生”、“人群要素”、“命題”、“直接推理”、“地球之運行”、“地熱之作用”、“光學”、“電學”、“原生動物”、“植物形態學”、“自然”、“勞力”、“資本”、“自然物”、“自然力”、“發明”、“發見”、“內涵”、“商業”、“生產勞力”、“無形資本”、“有形資本”、“固定資本”、“流動資本”等等。上海明權社1903年版,臺北文海出版社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收錄。參周光慶《漢語與中國早期現代化思潮》,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5頁。

[22] 張恨水《通俗文的一道鐵閘》,重慶《新日報》1942年12月9日。

[23] 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佛學研究十八篇》,中華書局1989年版。

[24] 周作人1920年所撰《聖書與中國文學》一文中曾說到:“我記得從前有人反對新文學,說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爲都是從《馬太福音》出來的;當時覺得他的話很是可笑,現在想起來反要佩服他的先覺:《馬太福音》的確是中國最早的歐化的文學的國語,我又預計他與中國新文學的前途有極大極深的關係。”《藝術與生活》,岳麓書社1989年版第45頁。

[25] 狄就烈《聖詩譜序》,1873年灘縣刻印本。

[26] 約翰·班揚《天路歷程》,賓威廉譯,清同治四年(1865)刻本。

[27] 約翰·班揚《天路歷程》,西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

[28] 袁廷梁《論白話爲維新之本》《無錫白話報》第1號,1898年。

[29] 詳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

[30] 王力曾指出:“五四以後,漢語的句子結構在嚴密化這一點上起了很大的變化。基本要求是:主謂分明,脈絡清楚,每一個詞、每一個詞組、每一個謂語形式、每一個句子形式在句中的職務和作用都經得起分析。”《王力文集》第11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80頁。

[31] 徐世璇《語言接觸性衰變的階段性和質變標志》,《語言接觸與語言比較》,學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頁。

[32] 參拙文《略論漢語文白的轉型》,《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08年第2期。

[33] 參拙著《漢語白話發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34] 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50-52頁。

姓名文化縱橫談

A rambling talk on Chinese name culture

◎楊琳 / 南開大學

提要：姓名作為專有名詞，與民族文化息息相關。本文論述了中國人名字的歷史演變、功用價值及現代取名應注意的若干問題。

關鍵詞：古人名字 取名

Abstract: as proper nouns, the nam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national culture. This article elaborate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names, their value and function, and some issues which the modern naming should pay attention.

Key words: proper noun, Chinese name, modern naming

一、古代的名和字

《禮記·檀弓上》有“幼名冠字”的說法，唐代孔穎達解釋說：“生若無名，不可分別，故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冠字者，人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意思是說一個人出生三個月的時候給他取一個名，到了二十歲舉行加冠禮的時候再取一個名，這個名就叫字。這說的是男子。如果是女子，十五歲舉行加笄禮時取字。取字意味著已進入了成年，男子可以娶妻，女子可以嫁人了。

成語有“待字閨中”，表示女子尚未許嫁。也用“未字”表示女子尚未許配。蒲松齡《聊齋志異·蕭七》：“君清門令望，可附婚姻。有女未字，欲充下陳，幸垂援拾。”這是周代的取字習俗。後世由於不再舉行加冠加笄之禮，取字也就不一定是男二十、女十五了，有可能八歲入小學的時候就有了正式的名和字。

取字的原則是根據名的意義來取。東漢班固《白虎通義·姓名》中說：“旁其名為之字者，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就是名和字要互相說明，互相補足。字的本義是生子，人的字要根據名來取，相當於是名孳生出來的，所以叫字。具體來講，取字主要有三種情況。

其一，取一個和名意義相同的詞語為字。如春秋時衛公子荊字南楚，荊、楚指同一種植物。《說文》：“楚，叢木。一名荊也。”楚國又稱荊國，也是由於荊、楚同義的緣故。其他如東漢張衡字平子、三國諸葛亮字孔明、唐聶夷中字坦之、清江永字慎修等，字和名都是同義關係。

其二，取一個和名意義相反的詞語為字。如春秋時晉大夫趙衰字子餘，衰是減少，餘是多餘；春秋時鄭公孫黑字子皙，皙是白晳，與黑相反；宋晏殊字同叔，殊是不同，與同相反；宋朱熹字元晦，熹是明亮，晦是昏暗；元趙孟頫字子昂，頫（俯）是低頭，昂是抬頭。

其三，取一個和名意義上有關聯的詞語為字，這是名字關係中數量最多的一類。如戰國孟軻字子輿，軻是車，輿是車廂；韓愈字退之，愈是超過，故以“退之”的辦法加以糾正。北宋蘇軾字子瞻，軾是車上的一根橫木，人們站著乘車時要手扶橫木，以防摔倒。字為子瞻，取憑軾遠眺之意。其弟蘇轍字子由，

轍是車輪壓出的印跡，車要沿著車轍行走，由就是沿著行走的意思。清劉師培字申叔，取自漢初《魯詩》傳人申培。孔子名丘字仲尼。《史記·孔子世家》：

“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雲。字仲尼，姓孔氏。”司馬貞索隱：“圩頂，言頂上竊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孔子頂如反宇的說法恐怕是小說家之言，不足采信。“禱於尼丘得孔子”的說法比較切實，孔子的名字當由此而來。“尼丘”今稱尼山，位於曲阜城東南30公里處。《說文》：“坵，反頂受水丘。”因“禱於尼丘得孔子”，故名丘字仲尼。

還有一種關聯是名和字都取自一句古代詩文。如三國趙雲字子龍，取自《周易·乾卦·文言》“雲從龍”之語；唐代茶神陸羽字鴻漸，取自《易經·漸卦》“鴻漸于阿，其羽可用為儀”之語；清錢謙益字受之，取自《尚書·大禹謨》“滿招損，謙受益”之語；北宋王安石字介甫，現代蔣正中字介石，取自《易經·豫卦》：“介於石，不終日，貞吉。”《象傳》：“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介是堅貞的意思，“介於石”是說堅貞如石，不可動搖。後人常用“介石”比喻堅貞的操守。《北史·隋本紀下》：“豈美璞韜采，未值良工；將介石在懷，確乎難拔？”明陸采《明珠記·珠圓》：“義士施偷天之計，郎君秉介石之心。”

除以上三種外，還有析名為字的取字方法。如宋代邵晔字日華，元代許恕字如心，明代章溢字三益，清代毛奇齡字大可，盧文弨字召弓。現代作家舒慶春字舍予，這是析姓為字。這類字比較少見。

周代男子取字時，字前喜歡加上“子”，字後喜歡加上“父”（fǔ），作為字的組成部分，表示尊美之意。加“子”的例子如孔子的弟子端木賜字子貢、卜商字子夏、顏回字子淵、冉求字子有，加“父”的

例子如周公的兒子字禽父、宋公子督字華父、宋公孫嘉字孔父、孔丘字尼父。有的還把排行加進字中，排行用字為伯（或孟）、仲、叔、季，如殷末伯夷、叔齊，春秋時秦孫陽字伯樂、秦百里視字孟明、魯孔紇字叔梁、魯孔丘字仲尼。後世也常用排行於字。如東漢班固字孟堅、三國孫權字仲謀、馬良字季常、西晉石崇字季倫。排行用字也有用長、元、次、少、幼等字的。名和字可以連在一起稱說。先秦時期的習慣是先字後名，漢代以後則變成了先名後字。《左傳·文公十一年》：“司徒皇父帥師御之，彫斑御皇父充石。”杜預注：“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孔穎達正義：“古人連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且此人子孫以皇為氏，知皇父字，充石名。”知道名字連稱習俗的這一變化，當古人名字連稱時，我們就可以根據其人的生活時代及先後順序去判斷何者為名、何者為字。《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肴，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左傳》是先秦文獻，所以“百里”、“西”、“白”為氏，“孟明”、“乞”、“乙”為字，“視”、“術”、“丙”為名。《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召孟明、西乞、白乙”孔穎達正義：“《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為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古人之言名字者，皆先字後名而連言之。其術、丙必是名，西乞、白乙或字或氏，不可明也。《譜》云：‘或以為西乞術、白乙丙為蹇叔子。’案《傳》稱蹇叔之子與師，言其在師中而已。若是西乞、白乙，則為將帥，不得云與也。或說必妄，記異聞耳。”“西”、“白”為氏應可肯定。其一是“百里孟明視”為氏字名全稱，與之並列的“西乞術、白乙丙”也應該是氏字名全稱。其二是“乞”與“術”、“乙”與“丙”意義有關聯，故應為字。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十二：“術讀為遂，文十二年《公羊》經正作遂。乞讀為訖。遂，終也，竟也。……訖亦終也，竟也。”又卷二十三：“丙，

火也，剛日也。乙，木也，柔日也。名丙字乙者，取火生於木，又剛柔相濟也。”春秋時期取干支為名字的並不少見，如鄭石癸字甲父、衛夏戊字丁、楚公子午字子庚等。“西”和“白”若為字的組成部分，既與名無關涉，也看不出在字中有什麼意義，所以應視為氏。有些人之所以把“西乞”、“白乙”看成字是因為有些文獻中說這兩人是蹇叔之子，既是蹇叔之子，他們的氏就是蹇，“西乞”、“白乙”就只能是字了。然而“西乞”、“白乙”為蹇叔之子說法正如孔穎達指出的，是沒有根據的妄說，未可信從。再來看兩個漢以後的例子。《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孔子弟子曰“原亢籍”，原為氏，亢為名，籍為字。曹丕《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驥馭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這是三國時期的文獻，所以融、琳、粲、幹、瑀、瑒、楨是名，文舉、孔璋、仲宣、偉長、元瑜、德璉、公幹是字。又如王安石《遊褒禪山記》：“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也是如此。

名和字在使用上有區別。名是長輩稱呼及自稱時用的，字是同輩及晚輩稱呼時用的，稱字是對人的一種尊敬，同輩及晚輩若直呼其名，是一種不禮貌的行為。西方人沒有“字”這樣的名字，中國人的“字”英語中可以翻譯為courtesy name。司馬遷曾給他的朋友任安寫過一封信，這封信很多古漢語教材及古文選本都選了，大都題為《報任安書》。這個題目是後人擬定的，但並不妥當。任安字少卿，安是名，司馬遷是不會稱呼“任安”的，而應稱“任少卿”。事實上信的開頭是這樣寫的：“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司馬遷”是自稱其名，“少卿”是稱人之字，符合禮儀規範。《文選》題作《報任少

卿書》，當為原題。

今天絕大多數的人雖然已不再取字了，但對尊長直呼其名仍然是不禮貌的。據《廈門晚報》報導，2004年11月26日晚上，陳某甲、陳某乙等人在一個酒家一起喝酒。陳某甲拿起酒杯對堂兄陳某乙說：“國仔，咱倆喝一杯”。陳某乙的朋友王某一旁搭話：“你不能叫堂兄的名字，應當稱大哥才對，你這樣稱呼就是沒大沒小”。被一個剛認識的外地人奚落，陳某甲頓時覺得很沒面子，更令陳某甲惱怒的是，堂兄陳某乙還幫王某說話。他怒不可遏，打電話叫來九個朋友，結果陳某乙的左手臂被砍傷，而王某被連砍數刀，一命嗚呼。這是一樁由直呼其名引發的命案。所以人際交往中必須重視稱謂禮儀，否則會造成麻煩。

二、古人名字知識的應用價值

古人的名字知識在學習和工作中有多方面的應用價值。

其一，在遇到古人名字時有助於判定正確的讀音。如孔子弟子曾參，參今天有cān、cēn、shēn三個讀音，該讀哪個音呢？我們得借助於他的字來確定。曾參的字為子輿，輿是車廂，參應為駟之假借，指車轅兩旁駕車的馬，所以應該讀cān。東漢許慎字叔重，重取慎重之義，應該讀zhòng。其他如春秋宋公子說字好父、司馬相如字長卿、司馬遷字子長、劉禪字公嗣等，名或字都是多音字，都需要依據名字相關的原則去確定。

其二，可據以判定古籍人名的歧異或錯誤。

東漢學者趙岐著有《孟子章句》，該書收入《十三經注疏》，影響很大，常為學者引據。趙岐之名不少著作中寫作趙歧，如《傳統語言學辭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有“趙歧”條，“孟子章句”條的解

釋中也作“趙歧”，《新型古代漢語》（巴蜀書社1993）148頁、《古代漢語》（黃河出版社1997）288頁也都寫作“趙歧”。在一些學術論著中也時見寫作“趙歧”。中華書局影印的《文選》胡克家翻印宋尤袤本，李善注引趙氏《孟子章句》亦作“趙歧”（見諸葛亮《出師表》“遂許先帝以驅馳”句下），可知歧、歧異作，由來已久。歧、歧音同形近，必有一誤，究竟何者為是？《後漢書·趙歧傳》云：“趙歧，字邠卿，京兆長陵（今陝西咸陽市東北）人也。初名嘉，生於禦史台，因字台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以示不忘本土也。”歧即岐山，在今陝西岐山縣。邠為古地名，也寫作邠，包括今陝西旬邑縣及彬縣一帶。歧和邠是周人的發祥地。周人先祖公劉由邠（在今陝西武功縣）遷居于邠，周人在此生活了九代。到了第十代古公亶父，遷居岐山下的周原，使周族得到發展壯大。趙歧為周土之人，故名歧字邠卿，以示不忘本土。由此可知，歧寫成歧是錯誤的。

南朝齊陸杲《繫光世音應驗記》第二三條：“王球字叔銜，太原人也。”董志翹《〈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譯注》（江蘇古籍出版2002）校記：“寫本、金剛寺本作‘叔銜’，《法苑珠林》、《太平廣記》作‘叔達’，《法華傳記》作‘叔衍’，未知孰是。”按：古有“銜玉”一詞。揚雄《法言·問道篇》：“銜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三國志·蜀志·秦宓傳》：“宓同郡王商為涪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銜玉以耀世。’”銜義為叫賣，“銜玉”謂叫賣美玉。《廣韻·尤韻》：“球，美玉。”名球字叔銜，適相對應，故以銜字為是。達、衍均與球義不相涉，應屬訛誤。又《論語·子罕》：“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名球字銜，當取待價而沽之意。

南唐詞人馮正中之名，古籍中或作延巳，或作延己，迄無定論。《辭源》、《辭海》作“延巳”，譚

正璧《中國文學家大辭典》作“延己”，張璋、黃余編《全唐五代詞》“延巳”、“延己”並存。

“巳”、“己”形近，必有一誤。十二地支，巳後為午，午有正中之義。《文選》載東晉孫綽《游天臺山賦》：“爾乃羲和亭午，游氣高褰。”李善注：“亭午，日中。”唐溫庭筠《菩薩蠻》詞：“夜來皓月才當午，重簾悄悄無人語。”“當午”即當中。延地支之巳則至午，午與其名“正中”相應，可知“延巳”是對的。若為“延己”，則與“正中”無關，故為形誤。另外，馮氏之字或作延嗣，嗣為巳之音誤，亦可證其字應為延巳。

宋代鄭獬《觥注記》云：“雙鳧杯，一名金蓮杯，即鞋也。王深輔道有《雙鳧杯》詩，則知昔日狂客亦以鞋杯為戲也。”根據漢代以後先名後字的連稱習慣，我們知道“深”是名，“輔道”是字。但根據名字相應的原則，“深”和“輔道”看不出有什麼聯繫，疑心其中有誤。查閱典籍，見《宋史·王韶傳附子案傳》云：“案字輔道，好學，工詞章。”案是官職的意思。《爾雅·釋詁上》：“案，官也。”“輔道”有輔佐主上的意思。《漢書·張湯傳附子安世傳》：“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又《車千秋傳》：“後歲餘，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新唐書·于志寧傳》：“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強起，為我卒輔道之。’”元代有名蕭輔道者（《元史·釋老傳·蕭輔道傳》）。名案字輔道，取為官輔佐主上之意。宋趙希弁《郡齋讀書後志》卷二雲：“《岷山百境詩》二卷，右皇朝王家，字道輔，少有能詩名。”唐圭璋編《全宋詞》王家小傳云：“案字輔道，一字道輔，江州（今九江）人。”並存異說。按：“道輔”與“案”意不相應，應為“輔道”之

訛。

南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四《用事切當》：“嘉熙乙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祝文，學士李劉功甫當筆，內用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巳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牧牛之喜。蓋時方有蜀擾。其用事可謂中的。”根據名字連稱的習慣，我們知道“李”為姓，“劉”為名，“功甫”為字。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及明蔣一葵《八朝偶雋》卷七引上文，均作“李功甫”。但清厲鶚《宋詩紀事》卷六十一“李劉”條引明孫雲翼《李梅亭先生小傳》：“劉字公甫，號梅亭。”“功”“公”同音，何字為是？我們認為“公”是對的。李梅亭名字當取自周人祖先公劉。若為“功”，則與“劉”沒有聯繫。

明代《說文長箋》的作者，有的書中寫作趙宦光，有的書中寫作趙宦光。《傳統語言學辭典》、《四庫大辭典》（吉林大學出版社1996）等皆作趙宦光，《古漢語知識詳解辭典》（中華書局1996）作趙宦光。整理本《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97）在“說文長箋”條下作趙宦光，但在書名索引及著者索引中皆作趙宦光。宦、宦音義不同，其中之一應為形誤。《四庫大辭典》解釋說：趙宦光，“亦作趙頤光，字凡夫，吳縣人（今江蘇蘇州人）。與妻陸卿子隱於寒山，讀書稽古，精於篆書。”宦即頤的異體。《說文》：“宦，養也。”王筠句讀：“宦即古頤字。”故宦光或作頤光。“頤光”是魏晉時代就有的一個詞。晉葛洪《抱樸子·暢玄》：“其次則真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遯勿用，頤光山林。”頤有蓄養、蓄藏之義，頤光即韜光養晦的意思。《漢語大詞典》：“頤光，猶韜光。謂頤養精神，藏才不露。”其字“凡夫”與“頤光”意思相當。其人隱居寒山，正是頤光山林，亦可謂“名副其實”。若作“宦光”，則名與字乖，亦與其行事不合。故當以宦字為是。

北宋鄭夬，夬或作夫，或作史，何者為是？其字

為揚庭。名字蓋取自《易經·夬卦》：“夬，揚于王庭。”故夬字為是，夫、史皆為形誤。

其三，古人名字關係的資料可以彌補文獻例證的不足。“身”古代有第一人稱代詞的用法。《爾雅·釋詁下》：“身，我也。”《爾雅》編成於西漢，這表明至少在西漢時期已有這樣的用法。但在文獻中學者們公認的最早例證是《三國志·蜀志·張飛傳》：“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楊樹達《詞詮》中舉的《韓非子·五蠹》中的下面這個例子學者們大都不予採納：“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但從古人名字關係來看，“身”的第一人稱代詞用法可能春秋時期就已出現。春秋時曹國有叔孫申，字子我。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經義述聞》卷二十二）云：“申讀為身。《爾雅》：‘身，我也。’郭注：‘今人亦自呼為身。’”聯繫孔子弟子宰予字子我的例子來考慮，王引之的解釋是可以接受的。既然“身”在春秋時期已有“我”義，《韓非子》中的“身死”理解為“如果我死了”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廣雅·釋詁》：“寤謂之灶。”典籍中找不到“寤”有灶義的用例。春秋時齊國有公孫灶，字子雅。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經義述聞》卷二十三）：“雅讀為寤，寤雅古同聲，故寤通作雅。《玉篇》引《倉頡篇》曰：‘楚人呼灶曰寤。’”名字關係表明寤有灶義是可信的。

其四，可利用名字關係求證古漢語詞義。這種方法自漢代以來就被學者們所採用。《說文》：“𡗗，旌旗之遊·蹇之兒。……讀若偃。古人名𡗗字子遊。”段玉裁注：“晉有籍偃、荀偃，鄭有公子偃、駟偃，孔子弟子有言偃，皆字遊。今之經傳皆變作偃，偃行而𡗗廢矣。”又：“施，旗旖施也。從𡗗也聲。晉樂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段玉裁注：“見

《左氏傳》。孔子弟子巫馬施亦字子旗。”名字的相互聯繫表明在當時該詞確有這樣的意義，這種證據還是有相當的可信度的。下面再來看幾個例子。

孔子的學生端木賜，字子貢。“賜”古代也有進貢的意思。《爾雅·釋詁》：“貢，賜也。”《尚書·禹貢》：“九江納賜大龜。”這是說九江地區進貢大龜。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二“子贛”條：“《說文》：‘贛，賜也。’‘貢，獻也。’兩字音同義別。子貢名賜，字當從贛。”這是不知賜有貢獻義而產生的誤說。孔子弟子仲由字子路。由有行走的意思。《廣雅·釋詁一》：“由，行也。”與路關涉。成語有“必由之路”。《漢語大詞典》：“由（—xíng）：謂依其道而行。由，通迪。”引《詩·大雅·蕩》：“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毛傳：“言居人上欲行用是道也。”毛傳把“行”釋為名詞道路（此義今讀háng），而把“由”釋為動詞“行”，“由行”是說“走這條道”。《大詞典》把“由”理解為介詞，而把“行”理解為行走，這是因不知“由”有行走義而誤解了毛傳。迪應該是由之後出分別文。

三、現代取名應注意的問題

取名是人人都會遇到的不大但也不小的事情。儘管我們的名字已經被父母取好了，但有些人對父母取的名字不滿意，想換它一下。更重要的是，每個人都會成為父母，都需要為自己的孩子取名。新婚夫婦從身懷六甲之日起，就琢磨著為即將出世的寶寶取名的事。飯後茶餘，案前枕上，《新華字典》翻了一遍又一遍，選不到滿意的字眼，嫌字典收字太少。於是又買來《康熙字典》、《辭源》、《辭海》之類，沒承想字詞多了反而眼花繚亂，不知取捨。結果寶寶已經呱呱墮地，名字尚在孕期。

雖然我們對名字不能抱有迷信的幻想，但追求吉

利祥和的心態幾乎是人人都有的，所以名字在有些情況下會對人的命運起重要作用。就拿尋找配偶來說，在未見其人的情況下，名字就可能是你選擇的主要依據。北宋米芾能書善畫，書法與蘇軾、黃庭堅、蔡襄齊名、合稱“宋四家”；繪畫上與長子米友仁共創“米派”山水。米芾愛潔成癖，天天要洗衣服。在任太常博士之職時，曾因洗掉了官服上的圖案而丟了烏紗帽，但愛潔之癖仍癡心不改。北宋徽宗宣和年間由官方主持編撰的《宣和書譜》卷十二中說：“米芾字元章，初居太原，後為襄陽人，官至禮部員外郎。博聞尚古，不喜科舉學。性好潔，世號水淫。違世異俗，每與物忤，人又名米顛。”米芾有一個女兒，長得很漂亮，求婚者絡繹不絕。米芾左挑右選，最後相中了南京的一位白面書生。宋代陳鵠《耆舊續聞》卷三記載說：“芾方擇婿，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吾婿也。’以女妻之。”原來米芾相中段去塵是因為這名字與他的潔癖相吻合。

肖楚女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著名革命家。1923年肖楚女任《新蜀報》主筆期間，幾乎每天都以“楚女”為筆名發表文章。由於文筆俊逸，邏輯性強，很快名聲大振。不少男青年猜測他是一位“楚楚動人的女子”，於是，一封封求愛信雪片似地飛到了編輯部。為了消除誤會，肖楚女在報上登了一則幽默風趣的啟事：“本報有楚女者，絕非楚楚動人之女子，而是身材高大、皮膚黝黑並略帶麻子一大漢。”名字的魅力於此可見一斑。俗語云：“賜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藝；教子一藝，不如賜子好名。”“不怕生錯命，就怕取錯名。”反映了人們對取名的重視。

那麼，取名應從哪些方面著眼呢？

其一，要易記

一個好聽的名字叫你想起人就能呼出名，甚至雖無一面之交，但名字卻過目難忘。要達到這一效果，

可考慮從以下角度取名：

①攝取人們熟悉的古代詩文或成語。例如：

劉禹錫、裘錫圭：取自《尚書·禹貢》：“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意為舜給大禹賞賜了一塊黑色的圭，宣告大禹治水立了大功。顏佩韋、朱佩弦（朱自清）：取自《韓非子·觀行》：“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於之性緩，故佩弦以自急。”“韋”是熟皮子，有柔韌鬆弛的特點，弦有緊張的特點，“佩韋”、“佩弦”意在警策自己改正急躁、緩慢的毛病。謝冰心：取自唐代詩人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詩的名句“一片冰心在玉壺”。冰心，晶瑩純淨的心。取自成語的如邢質彬、徐文彬（文質彬彬），田汝成、陳玉成（艱難困苦，于汝玉成），賈席珍（席珍待聘）、龔自珍（敝帚自珍）、王若愚（大智若愚）、王若虛（深藏若虛）、蘇步青（平步青雲）、陳煥新（煥然一新）。

有些名字連名帶姓和盤從古代詩文及成語中端出，渾然天成。例如：

陶鑄：取自《莊子·逍遙遊》：“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也。”意思是說這個神人他身上的塵垢廢物都能陶鑄出堯舜這樣的聖人來。拈出“陶鑄”二字為名，有“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氣魄。降大任：取自《孟子·告子下》：“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意思是上天將把重擔交給這個人。楊柳岸：取自柳永《雨霖鈴》詞：“楊柳岸曉風殘月。”意境很美。取自成語的如馬識途（老馬識途）、雷風行（雷厲風行）、黃鐘（黃鐘大呂）、張弛（文武之道，一張一弛）、賈連城（價值連城，“價”古文寫作“賈”）。這類名字由於整個姓名濃縮了人們熟悉的詩文成語，內涵豐富，無論耳聞還是目睹，很容易留下深刻的印象，堪稱名字中的上乘之作。

②用人們熟知的典故或習見的詞語取名。例如：

楚莊（楚莊王，春秋五霸之一），徐一夔（夔，堯的樂官，歷史上有“夔一足”的傳說），顧祖禹

(以禹為楷模)，戴宗騫(以張騫為楷模)，楊堅白(“堅白”是戰國名家公孫龍的一個哲學命題)，關山月(漢樂府曲名)，鄧友梅(以梅為友)，夏禹(禹為夏朝的開創者)，駱舟(駱駝常喻為沙漠之舟)，高明，舒張，凌霄。在姓名不能構成詞語的情況下，可以借助於諧音，如霍達(豁達)、楊帆(揚帆)、梁爽等，也可收到易記的效果。

③名由姓的偏旁組成。例如：林森，呂品，石磊、水淼、張長弓，胡古月，伊尹、阮元，高嵩。這類名字視覺印象不錯，因而也容易記憶。但像金鑫、牛犇、鹿羸之類的名字，不但書寫不便，而且犇、羸都是被淘汰了的異體字，電腦一般打不出來，會造成很多麻煩，不可採用。

④應用多種手段，造成豐富聯想。如舒舍予(老舍)，把姓拆成兩半作為字，視覺印象深刻。“舍予”有舍己、捨身的意思，還使人不難聯想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孟子·公孫丑下》)的名言。又如有人家居海邊一幢樓上，生女取名楊近水，有多種含義。一是紀錄了出生地，有紀念意義。二是包含了“近水樓臺先得月”的詩意和“近水楊柳先發芽”的哲理。三是近水者，似水也。水性清柔，常用來比喻女性之美。四是常言“遠水不解近渴”，但“近水”能解燃眉。這類名字有豐富的聯想效果，令人欲忘不能。

總之，孤立的幾個字放在一起不易記憶，所以應盡可能賦予名字以更多的含義，這樣才能收到“人過留名”的效果。

其二，要易讀

易讀指讀起來響亮順口。人名幾乎天天要呼之於口，因而讀音之美也是十分重要的。讀音可從以下五點來考慮。

①從韻母的角度來講，以母音收尾的韻母比以輔音收尾的韻母響亮，開口度大的韻母比開口度小的韻

母響亮。母音是樂音，開口度大則聲音洪亮，因而這類名字聽起來響亮悅耳。如唐弢、臧克家、吳強、李揚等。

②從聲調的角度來講，應四聲錯雜，這樣讀來抑揚頓挫，富有動感。如果都是一個聲調，那就失之平板了。如朱東星，連續三個陰平；傅季利，連續三個去聲，不是很好。

③要音節分明。姓名的每個字連讀時應有明顯的語音分別，以免誤聽。像師日知，三個字聲母都是捲舌音，韻母又都是開口度很小的高母音*i*，不但不響亮，而且不分明。李愛蓮，有可能誤聽為連連、連愛蓮。陳希昂，有可能誤聽為陳想。倪楊，有可能誤聽成娘。李黎麗、趙爾愛，連讀很拗口。

④慎用多音字。如果名字本身能告訴別人該讀什麼音，這樣的多音字採用無妨，如胡三省、陳省身、於省吾，省讀*x i n g*，取意於《論語·學而》“吾日三省吾身”之語。如果名字本身不能告訴人們該怎麼讀的情況下，多音字不宜採用。像秦樂，該讀*l è*還是*y u è*? 吳調公，是*d i à o*還是*t i á o*? 宋長，是*ch á n g*還是*zh ǎ n g*? 唐代文學家岑參，有人讀*sh ē n*，有人讀*c ā n*，由於岑參的字不詳，所以不知該怎麼讀。

⑤避免與不愉快的事物同音或音近。《清稗類鈔·姓名類》收錄的一則逸聞說，清同治七年(1868年)有個叫王國均的人參加殿試，其人會試中名列前十，但因“王國均”聽起來像“亡國君”，垂簾聽政的孝欽太后(即後來的慈禧太后)看到這個名字後很不高興，把他降在三甲，大好前程僅僅因為取名不當而斷送了。今天這種諧音忌諱仍然很流行。例如有家醫院的注射室有個護士叫段珍，病人不願讓她打針，怕針斷在屁股裏。有個叫裴多的大學生畢業多年找不到工作，後來才明白沒有哪個企業願意“賠多”，所以都拒絕錄用他。日常生活中也會因為名字與不雅的事物諧音而成為別人取笑的對象。如龐光大、杜子騰、楊偉、馬小辯、秦壽生、岳晶、劉產、

李昌富等。

其三，要易認

名字主要是供別人識別和稱呼你用的，要讓人易認易讀，以免造成麻煩。國學大師章太炎愛用僻字。他有三個女兒，大女兒取名“章珪(zhǎn)”，二女兒取名“章焱(lì)”，三女兒取名“章鼎(jī)”。三個千金聰明漂亮，但到了婚嫁年齡，無人登門求親。原來三個女兒的名字起得太怪癖，那些有心提親的人不知道怎麼稱名，怕被國學大師恥笑，只好敬而遠之。章太炎知道後，召集親朋好友在家中大擺宴席，專門向人們解釋了三個女兒名字的意義及讀音，三位小姐這才找到了各自的如意郎君。愛國將領楊虎城原名楊彪(zhōng)，意為冬天的虎，又冷又餓，有為則存，無為則亡。取意很好，但不便交際。由於電報號碼中沒有彪字，發電報時只好用“虎+冬”來表示，結果被誤認作“楊虎十冬”，像日本人的名字。由於罕見，也往往被誤認作彪字。弄得人和名對不上號。不得已，只好放棄，以字虎城代名。

今天一個人的社交範圍比過去的人更為廣泛，名字的易認性就顯得更為重要。如果採用僻字，那麼在報戶口、辦身份證、郵局匯款、醫療報銷等日常事務中會遇到困難，在升學、就業等重要關頭也有可能造成錯誤而坐失良機，因為現在的資料一般都用電腦處理，僻字在電腦中無法顯示。目前的漢字輸入法大都以《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基本集》所收的字為編碼對象。這個字符集是國家標準總局1980年發佈、1981年5月1日開始實施的國家標準，標準號為GB 2312—1980，俗稱國標碼。它是電腦可以識別的編碼，適用於漢字處理、漢字通信等系統之間的資訊交換。基本集共收漢字6763個和非漢字圖形字元682個，超過這個範圍的字大多數輸入法是打不出來的。1995年國家標準總局又頒佈了《漢字內碼擴展規範》(GBK)，俗稱國標擴展碼。GBK與GB 2312—

1980對應的內碼標準相容，共收20902字。有些輸入法掛接了GBK字形庫，如全拼輸入法。超出這個範圍的字，能輸出的輸入法就很少了。所以取名應選擇國標碼中有的字。實在不行，也可選用國標擴展碼中有的字，超出國標擴展碼的字萬萬不可採用，如果用了，將來不得不改名。改名是一件很煩瑣的事，涉及戶口簿、身份證等很多方面。

事實上，人名濫用生僻字也是法律所禁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身份證法》(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於2003年6月28日通過，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一章第四條規定：“居民身份證使用規範漢字和符合國家標準的數位記號填寫。”國家語委正在組織專家研製《規範漢字表》，這個字表收字8300個。一旦公佈，取名用字就有了明確的範圍。日本人名所用的漢字必須為常用漢字、人名用漢字，或者使用片假名、平假名(變體假名除外)。日本政府1981年發佈的《常用漢字表》共1945個漢字，2004年9月27日另規定人名用字983個，加起來總共2928個漢字，這就是日本人取名的漢字規範，不得超過。韓國文教部1972年頒佈的供大中學校使用的《教育基礎漢字表》收漢字1800個，這是韓國人取名的漢字範圍。在北歐諸國，政府專門制訂了人名詞表，政府機構有權拒絕登記古怪、易引起爭議或不便的名字。可見取名用字在許多國家都有限制。

易認還包括避免用形似字。著名翻譯家傅雷原名恕安，因恕與怒字形相近，人們常誤認作怒字，不得已改名為傅雷。電視連續劇《西遊記》中豬八戒的扮演者馬德華原名叫馬芮，常被誤認作丙或肉，造成麻煩，只好改名。其他如取名為羹，易誤作龔；取名為子，易誤作子。這些教訓值得記取。

其四，要創新

名字是個人的代號，區別性是名字的重要功能，所以取名要盡可能地“特立獨行”。如果步人後塵，

或者趨一時之熱，就會造成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時過景遷，便成明日黃花，自己覺得不合時宜，只好改名。如文革中流行的要武、反修、永革、捍彪、衛東、全紅、紅衛、躍進等，今天便覺不雅。二是重名增多，容易張冠李戴，造成差錯。某初中的一個班上有兩個陳蕾，兩人同時參加某報組織的徵文活動，公佈獲獎名單時有一個陳蕾的大名，但不知道是哪個陳蕾，班主任費了好大周折才搞清楚。一個單位如果有兩個同名的人，信件、匯款等很容易拿錯。所以重名造成的煩惱是很多的。重名絕大多數是單名，所以要避免重名，應該儘量取雙名。另一方面，要自出機杼，不因人熱。眼下取名流行疊字，如蘭蘭、麗麗、蕙蕙、蓓蓓、樂樂、毛毛等。疊字有親昵的感情色彩，這是父母樂於選用疊字的原因。但由於這類名字選字集中，重名很多，最好別湊熱鬧。有一種取名方

法是值得推薦的，那就是把夫妻的姓合起來作為孩子的姓，再取一個雙名，成為四個字的名字，這種名字重名的幾率低，同時還體現了夫妻的平等。

另外，孩子也不一定非得姓父母的姓，自創或自定一個姓氏也未嘗不可，很多作家不就是以自創的筆名為世人所知嗎？姓氏自定的好處是重名的可能性小，便於寄託願望。如“孺子牛”、“惜寸陰”、“獨釣雪”、“冰炭容”之類，都是很不錯的名字。

不過創新要符合有關規定。我國首部姓名登記法規《姓名登記條例（初稿）》，已由公安部於2007年研究起草完成。《條例》中首次對公民起名作出硬性規定：公民應當隨父姓或者母姓，也允許採用父母雙方姓氏。子女採用父母雙方姓氏時，為雙姓，不算複姓。按照目前我國現有1601個姓氏計算，這種做法可以新增加128萬個雙姓，將有效地解決姓名重複問題。

學術訊息

澳門語言學會於9月29日舉行年會，會長程祥徽總結了前段工作，希望加強學刊的出版。他並介紹籌劃年底即將舉辦的“兩岸四地語言學論壇”安排。“兩岸四地語言學論壇”內容包括法律語言、兩岸四地詞語比較和語言規劃三大部份，屆時將邀請兩岸四地的知名語言學者和有關人士出席論壇。年會並討論充實組織架構，討論吸收一批新會員，選舉著名語言學家周薦、徐傑為副會長，周薦兼任《澳門語言學刊》主編，增補數名年青理事。澳門語言學會現行架構為：會長程祥徽，副會長鄧景濱、周薦、徐傑；理事長邵朝陽，副理事長鄧駿捷、葉錦添，理事郭濟修、彭海鈴、王銘宇、鄭寧人、周非凡、陳仁聰、陳燕玲、吳蔚瑩；監事長禰偉旗，副監事長蔡志龍、張卓夫，監事黃翊、張正春。

由“英明領袖”的“二簡”所想到的

◎尉遲若水 / 澳門語言學會

2008年8月20日曾擔任過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的華國鋒同志，醫治無效，病逝北京，享年87歲。這位當年的“英明領袖”的去世引起了一片唏噓聲，不少人都在慨嘆華為人之老實，人品之敦厚。當然，人已故去，若再不厭其煩地將30年前已被批臭的“兩個凡是”抖擻出來，確有揪住辮子不放之嫌，顯得不夠厚道。但歷史就是歷史。一些人犯過的錯誤或罪錯以及因此錯誤、罪錯造成的災禍，史有定評。既是定評，就不應因當事人的刁鑽蠻橫而在事後加重，自然也不應因當事人的忠厚老實而在如今減輕。前者如江青等，後者即可以華國鋒為例。對“英明領袖”當年的“兩個凡是”，中共中央早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於北京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給予了堅決的批判和否定，史有定論，不煩再議。這裏只想提醒：善良、厚道的人們可還記得，文字改革歷史上著名的“二簡”？那可也是“英明領袖”的一大豐功偉績喲！

如今的年輕人可能不大明白“二簡”是什麼。“二簡”指的是《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或該草案中的那些簡化字。“二簡”是在1975年5月擬出並報請當時的國務院審閱的，那時候毛老人家還沒壽終正寢，責任似乎該由毛承擔。但是在1977年12月20日那一天《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及各省級行政區一級報紙同時發表“二簡”（草案）並徵求社會意見，次日《人民日報》開始正式試用，這可是“英明領袖”當政的年代，是華主席主導下的產物，華國鋒可是無可卸責的啊。什麼叫“二簡”

字？看下面這幾個例子就全明白了：“菜”寫作上“艹”下“才”的“芽”，“道”寫作外“辵”內“刀”的“辺”，“意”寫作上“乙”下“心”的“忝”，“冀”寫作上“北”下“一”的“北”，“鞋”寫作左“又”右“圭”的“娃”，“糖”寫作左“米”右“广”的“𪗇”，“停”寫作左“亻”右“丁”的“仃”，“籍”寫作上“竹”下“及”的“笈”。“二簡”字風行十餘載，到1986年6月24日纔由國務院發出《國務院批轉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關於廢止《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和糾正社會用字混亂現象的請示〉的通知》，宣布廢除。但是流風所及，至於今日。如吉利控股集團與韓國大宇合作開發的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經濟型標杆車“自由艦”，是1000餘名中外技術研發人員歷時三年的智慧結晶。“自由艦”的最大賣點是28項超強安全護衛系統，它於2005年6月28日在全國正式上市，立即成爲了搶手貨。但是該車尾部手書的“自由艦”的“艦”字却被寫成了不倫不類的左“舟”右“見”的“靦”。“艦”的簡化字應為“靦”。無論是把“艦”寫作左“舟”右“見”的“靦”還是左“舟”右“監”的“艦”，都是錯誤的，都是將簡化偏旁或繁體偏旁拿來隨意組字造成的。這可算受“二簡”影響的第一種類型。受“二簡”影響的第二種類型是自己隨便類推出新的簡化字。如“賜”字，就有大學教授在給友人的書信上將該字寫成左“貝”右“彳”的“𧵑”！“彳”是“易”的簡化形體，“易”沒有簡

化形體。

有“二簡”，是否有“一簡”呢？答曰：並沒有“一簡”的說法，卻有第一次簡化漢字——《漢字簡化方案》公佈和推行的事實。大陸解放後，中共中央十分重視簡化漢字的工作，第一任國家文改委的主任即是後來領元帥銜的陳毅。從1950年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編制《常用簡體字登記表》到1964年5月文改委出版《簡化字總表》，其間無數文改專家在十數個寒暑所花費的大量心血已隨時光流逝而逐漸淡出人們的記憶。但《簡化字總表》因已是今日中國大陸的用字標準而成為了漢字簡化史上的一座豐碑，則是毋庸置疑的。由第一次簡化漢字工作的史實和《簡化字總表》在後來推廣中所取得的積極成效不難看出，大陸第一次簡化漢字的工作是非常慎重、扎實穩妥的。無論是毛本人也好，當時的中共中央決策層也好，簡化漢字的目的就是想讓中國百姓在識文斷字上省點時間和精力，以投放到國家的經濟建設上去。應該說這不僅是當時中共袞袞諸公的良好願望，也是大多數專家和知識分子長期堅持而形成的共識。若有人對這一點抱有懷疑，那就請他搞一個調查，看一看“鬱、爨、鱗、蕭、龜、釁”這些字究竟有多少人能寫正確，有多少人能正確地說出那些字的筆畫、筆順。筆者相信，即使在今日之港澳，調查的結果也不會太樂觀，那麼在五六十年前的大陸，全民族文化水平極低的當時當地呢？情況就更可想而知！家住海峽對岸的馬英九先生所說的“漢字一點都不繁”，是就其本人學識而言還是在對咱們全中國人民的漢字水平調查後所得出的結論，那就不得而知了。

漢語簡化過程中有過許多爭論，利弊得失可以見仁見智，仍可討論，但不應含有任何政治意義，不應將漢字簡化過度政治化。公平的說，在漢字簡化工作上，中共主政的大陸是順應了歷史潮流，適應了國際交往的需要，積極推動了此一工作的開展的。歷史潮流是什麼？從歷史上看，簡體字在南北朝時即已見於

當時的碑刻，到隋唐時更多，稱“俗體字”，如“壽（壽）、盡（盡）、敵（敵）、顧（顧）”。劉複、李家瑞編，1930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的《宋元以來俗字譜》所收俗字330餘，不少就與《簡化字總表》一致，如“實（實）、听（聽）、旧（舊）、医（醫）、声（聲）、乱（亂）、归（歸）、断（斷）”。民初以來，有識之士如陸費逵、錢玄同、黎錦熙、楊樹達奔走呼號，當時國民政府的有關機構積極運作，也對漢字簡化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中共主政大陸後，接手推動漢字簡化工作，纔使簡化漢字工作走上了科學化的正確軌道。國際交往的需要是什麼？從同屬漢字文化圈的周邊國家的情況看，大家也都同樣在簡化漢字，有的力度甚至超過中國，讀者諸君看一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日本、韓國漢字簡化的情況，就不難明白。

如果說語言是民族的交際工具的話，文字就是記錄工具的工具。使用工具的人們有理由、有權利要求它更便捷、適用，因而纔有了歷史上無數次的文字簡化活動，也纔有了成為豐碑的《簡化字總表》。但是漢字單體量大，具有可視性，這就要求每一個漢字比之其他漢字都要有一定程度的合理的區別特徵，還要具有美觀娛目的性質。漢字不可太繁，太繁則難寫難記難認；漢字又不能一味求簡，一味求簡則可導致字與字間的區別特徵減少，導致易混字陡增，最終反倒影響了人們的正常交際。因此，在漢字簡化中找到繁簡間的一個恰如其分的接點，至關重要。“英明領袖”之所以會主導出“二簡”，固然因其不論對錯全盤繼承毛的衣鉢的理念所使然，而“二簡”之所以壽不過十年就被歷史和人民所拋棄，則是“英明領袖”不明白“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謬誤”的古訓所致。

漢字是我們祖先的發明，專利在握。然而，如果老這樣一味地糟蹋老祖宗給我們創造的遺產，說不定哪天韓國人冷不丁又冒出來申請個漢字文化遺產什麼的。能以優美的漢字自豪的，應該是中國人，應該首先是中國人，然而又不僅僅限於中國人。

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叢書

《語言翻譯卷》序

◎程祥徽／澳門語言學會

澳門是一座語言之城。在土地不足三十平方公里、人口不足五十萬的瀕海小城，流通著許許多多語言和方言，有人稱它是“語言拼盤”，有人稱它是“語言博物館”。在澳門，流通量最大的語言至少有三大語種（漢、葡、英）、五大方言（粵、閩、吳、客家、普通話）。漢語流通量大；英語流行面廣。英語迅速加大流通量與賭業開放、大量操英語的企業和人士湧入小城、城市國際化程度提升的新形勢相適應。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必要時使用葡語，葡語也是正式語文。澳門實行中文與葡文並存的官方語言制度，但不實行（也不應該實行）事事皆用雙語即所謂“雙語化”政策。回歸前澳葡政府推行的公務員必須是雙語人的“個人雙語政策”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被否定，“社會雙語政策”被越來越多的人認同。粵語是口語交際的主要方言，粵語與其他方言的差異很大，但方言的分歧不構成社會的分裂，各種方言統一在書面形式的普通話（即語體文）之下。普通話享有國語的地位，是國家統一的象徵，正被越來越多的澳門人學習掌握。人少地小語言（方言）多，產生許許多多“語言問題”。中文獲取官方地位的問題曾被列為過渡期的三大問題之一，而且貫穿在其他兩大問題中，即“法律本地化”“公務員本地化”都有賴“中文官方地位”的確立；至今語言使用問題還有待解決，尤其是在立法、司法、政府公文運作等方面，人們希望這些類文件能用市民看得懂、聽得明、最好具備中國民族風格的漢語文表述。目前，法律語言、公文語言仍然附著大眾所不能接受的“葡式中文”的幽靈，人們強烈要求儘快加以清除。

在語言學理論著述中，語言問題分內外。語言的“內部問題”指語言結構中的問題，例如歷時音變、詞源考察、語法辨正等等。語言的“外部問題”指語言與社會的關係問題，例如多語社會中的語言交流、相互影響、語文地位協調、語碼轉換、語文翻譯、語言規劃等等。語言的內部問題多屬傳統語文學，外部問題多歸現代語言學。傳統語文學偏重於語言內部問題的研究，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記載了這門學科的豐功偉績，文字學、粵方言學、詞義探源的研究在澳門至今還實力雄厚，成績驕人。現代語言學，特別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現的社會語言學，則醉心於語言外部問題的探討。澳門語言學者因置身於得天獨厚的語言環境，他們在社會語言學領域的研究取得豐碩的成果，得到內地與港台以及海外同道的熱情稱道，是中國社會語言學大軍中的一支生力軍。

澳門的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在澳門語言學與翻譯學領域表現了高度的熱情和勇氣。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澳門曾掀起“中文合法化”運動的高潮，參與者義正詞嚴，發表許多高論，極力爭取中文的官方地位。1985年5月4日《澳門日報》關專刊登載各界人士有關中文合法化問題的呼籲，這天的報紙將作為澳門中文問題的重要文物而存留史冊。九十年代初開始，配合形勢發展，語言官方

地位的討論再次掀起高潮，1992年3月澳門社會科學學會舉辦的“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獲得巨大成功，當時的主政者澳門總督派代表全程參加會議，並發表實質性的而不是一般應酬式的致辭。這些語言學事件或學術性活動，在澳門社會語言學和法律翻譯的發展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翻譯是不同語文之間你來我往的雙向活動。澳門的翻譯問題存在於中文與葡文之間，主要是把葡文法律文本翻譯成中文的問題。翻譯作為一種技巧或作為一門學科，在澳門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根據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原則，澳門今天的法律多數還是沿用舊有的法律。既然沿用原有法律，就要把大量用葡文制定的法律翻譯成爲中文。回歸前的澳葡政府和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在法律翻譯工作中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多成果。法律翻譯不是日常生活的口語翻譯，一般不採取意譯，更不採取風格對應的翻譯。法律文件是一種特定的語體，“準確”是這一語體的根本要求，“生動”不適用於法律語體。法律文件對語言的要求只有“說明”而拒絕“描寫”，名詞術語有固定的含義，例如法律用語的“消滅”不同於口語的“消滅”，法律用語的“瑕疵”不是日常語言中的“瑕疵”。法律翻譯宜用單詞對單詞的翻譯。這就難倒了澳門的法律翻譯專家。漢語與葡語分別屬於完全不同的語系，詞語構造與語法結構幾乎一點共同之處都沒有。漢語屬漢藏語系，是分析語，缺乏形態變化，詞序是主要的語法手段；葡語屬於印歐語系，是綜合語，形態特別豐富而不看重詞序。因爲語言特徵的不同，法律的中譯困難多，問題也多。平心靜氣而論，法律翻譯中出現的問題，不是葡文的過錯，也不是翻譯人員的錯失，是中葡兩種語文的民族風格完全不同而在翻譯法律文本時又不能採取風格對譯的手段。回歸後的今天，特區的法律還在用葡文草擬，然後譯爲中文，翻譯中出現的問題沒有得到完全的解決。公文語言的使用狀況好一些，但

同樣殘留著葡文格式和葡文語言的痕跡。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翻譯界，甚至困擾著整個社會。法律本地化途徑將是首先完善法律的翻譯，進而實現雙語立法。在這方面作理論闡述或發表的意見很多，本卷都有收錄。

本卷選編的論文主要是這二十年來具有代表性的優秀作品，包括如目錄所記七方面，從歷時語言學、語用調查、法律語文改革、筆伐葡式中文到語文教學與語言規劃。這二十年，語言翻譯學在澳門跳躍著時代的脈搏，鼓動著時代的風雲。

本卷作者群的主體是澳門人。按照叢書制定的編選原則，本卷的文章作者絕大多數都在澳門生活或工作，親身投入澳門社會，是語言翻譯生活的實踐者，同時也深切了解澳門市民對語言翻譯現狀的感受。另有一些曾在澳門的大學任教的著名學者，他們的論文不但寫的是澳門語言問題，而且是寫於澳門或者曾經在澳門舉辦的各類研討會上發表。例如葉蜚聲、蔣紹愚、丁金國、趙永新教授等。他們的學術參與，是澳門語言翻譯事業的一部分，他們的研究成果是澳門語言學財富的一部分。況且學術不分疆域，只要討論澳門語言翻譯問題，幫助澳門解決語言翻譯問題，有助提高語文水平和翻譯水平，叢書應當一體歡迎。

選人本卷的文章都是優秀文章，但叢書不以優秀爲唯一標準。一因同一主題文章多了，不能盡數入選，必需忍痛割愛；二因文章長短不一，體例各異，叢書只能選取字數適中的篇目，業已成冊出版的著作一般不收。有鑒於此，入選文章儘管優秀，未入選的文章未必不優秀。選編文章的目的只是爲了讓澳門人和澳門以外的人看到澳門語言學領域的面貌。

澳門人選編澳門人的語言及翻譯方面的優秀論文，是一項意義非凡的舉措，作爲本卷主編，希望此類論文選繼續不斷地編選出版下去，記錄澳門語言翻譯學發展的足跡。

是爲序。

學習和研究應用語言學歷史的 意義和方法

◎于根元 / 中國傳媒大學

學習和研究歷史的意義

一、學習和研究歷史，主要是把握現在和未來

1、學習和研究歷史，是要認識規律。我們研究的是現象和條件的關係，這就是規律，這個規律是一定的。歷史會有驚人相似的重演，因為條件相似所以現象相似。但是都不會相同。好像彈簧，豎的看是一個圓，橫的看，就不一樣了。所以研究的角度要縱橫交錯，不能只看平面、靜態、共時。時空不同，條件不會完全相同，彼時空的不會在此時空完全適用。我們說歷史的檢驗，這個歷史是相對的。釋迦牟尼也沒有說他的一套一直適用，達摩也只說他傳到六世。所

以，我們既要聯繫歷史狀況，看到它的長遠的歷史意義，又不能照搬。

2、要注重歷史規律。忽略了時空，忽略了比較，中國會誤讀世界，世界也會誤讀中國，中國也會誤讀自己。正確的基本形勢的估價很重要。例如中國現在到底強大到什麼程度了，有的估價差別太大，不同的估價，會有一連串不同的認識和做法。這在歷史上也是有教訓的。

3、我們都要提高認識。我們的認識往往有局限性，往往把帶骨肉當做活豬。關於語言學和應用語言學的認識，我做過幾次檢討。有幾次是公開的。有幾次還沒有公開，此外還有策略上妥協的。還有一些是暫時就這麼說吧。有的比較重要的認識，我還沒有闡述。

4、聯繫歷史而又站在今天的高度。歷史，有時候一時認識不清楚，後來人可能會修復對歷史的認識。這種修復也是相對修復。

二、以史為鑒

學習和研究歷史，本身就是學問。

一種傾向是對過去不太清楚。一些車轆轤話、車轆轤論題，可能跟這個有關。

還有一種傾向是動輒貶低過去，抬高自己。這是很不好的。

還有一種是盲目探索。

三、做好史官

我們幾千幾百年的歷史很難考證了，有時候幾十年幾年的事就不太搞得清了。如實記錄整理一些史實還是很有意義的，叫一些人說話做事注意一些，別太放肆了。我相信有前因必有後果，有後果必有前因。我認為這是唯物主義。前因後果簡單對應，那可能是機械唯物主義。認為說話做事可以不計後果甚至不承認有後果的，絕對不是唯物主義。我們有的官員在語文政策方面也應該有問責制。還有，我們訂的具體指標，如果沒有完成，也要有個說道吧。想不負責，那不行。你也不可能不負責，負責是各種各樣的，大家對你說的已經不當一回事了，也是一種後果。歷史不一定是史書，歷史更廣泛，有的在人們的心裏。我們自己在這方面也要注意。

學習和研究歷史的方法

一、聯繫社會的許多方面

例如，新中國成立後許多語言觀跟社會大背景具有密切的關係。我們的社會語言學不僅僅研究社會跟語言的關係，還包括社會跟語言觀的關係。我們對語

言學之外的許多方面要有一定的了解。

二、上面說的是橫的聯繫。還要注意縱的聯繫

我們學習研究一個時期的歷史。例如一百多年來的中國應用語言學歷史，我們要放在一定的世界的語言學的大背景下面來學習和研究，還要放在幾千年的大背景下面來學習和研究。

三、了解真實情況

不要前呼後擁地人家說幾句你就表態支持，這樣，人家背地裏可能會笑話你。了解真實情況，這裏學問很大，但是似乎又不是很難的事。真實情況擺在那裏，有的人就是不想看。真實情況裏才含有規律，你不看真實情況怎麼掌握規律？怎麼正確辦事？有的人，你跟他一說就知道他不怎麼知道真實情況，可是他又不怎麼下來深入了解，這樣的人辦不好事。

三、自己要有一定的實踐

不要過於迷信什麼“旁觀者清”。要做當事人。要盡可能了解第一手情況，要努力參加一些事情。文字上的史料是有限的，背後還有很多情況。有的我們沒有親身參加的，如果有條件，我們要重視訪談。實際上，我們有的很有條件訪談的也沒有注意訪談。

四、還要放得下

有的當事者迷，那是牽扯到自己的事模糊了自己的認識。學者有時候當官，當好了總比不怎麼懂的、不怎麼好的人來當好一些。但如果迷戀官位帶來的個人的所謂好處了，恐怕就要考慮了。如果對那個東西無所謂，當一段官也是可以的。現在，教授、博導有的也多少是個虛幻的光環了，也會影響我們對問題的認識，也要無所謂，也能放得下。這樣，或許不是我們去認識真實、規律，而是跟真實、規律諧振了。

